

中

华

英

方

丛

书

名人名家

他们成功的奥秘？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内幕新闻



王 霄 鹏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为使世人更多地领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中国杰出人物和海外杰出的炎黄子孙的风采，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同时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激励人们团结在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快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华英才丛书》。

一、本丛书由《中华英才》杂志社的同志选编。书中收录的文章，仅限于该刊已发表过的。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的介绍文章，该刊尚未发表的只好待将来另结集出版。

二、收入本书的文章，有访问记，有新闻特写；有的人接受采访次数多，有的接受采访次数较少。因此，文章长短不一，详略不一，少数人有多篇介绍。

三、有的主要领导人文中没有生年、籍贯、任职介绍，或介绍不全，或后来有变动者，一般均在文后注明。

四、此次出版，对原文中明显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一般保留文章原貌。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某些差错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12月

总 序

王霄鹏

历史是人类活动连续性的表现形式，人理所当然的必定成为历史的主体。有关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争论，已经颇具一些经院哲学的味道了。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并不复杂，就历史哲学而言，历史一定是由人民创造的；而对于历史学来说，重彩泼墨又决然会辉映在英才俊杰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后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总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那些曾经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身上。无论是开基创国的帝王将相，还是揭竿而起的义士，无论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还是造福当代的能工巧匠，他们在成就国家大事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千秋功名。当我们翻阅一部部记录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典籍的时候，我们最为之倾心的正是那些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呕心血，献生命而在所不辞的人中之杰，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展示忠贞与豪情的舞台，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智慧与才思的阵地。时势造英雄，我们在为风云际会的时代拍手喝彩的同时，又怎能不为这一时代的这些英雄豪杰们而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呢？

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移向现实，当我们用审视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炎黄子孙正创造着辉煌壮丽的繁荣盛世。近百年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强烈渴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前景广阔，是今日中国的生动写照。无论是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还是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今天中国的份量都越来越重。身为国人，理应骄傲，而不能妄自菲薄；身为国人，理应竭尽心智，进取不息。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大舞台，那么十一亿中国人都应成功地扮演自己应当承担的角色。生于斯、长于斯，正是历史对我们的“情有独钟”。

历史的机遇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为了今天这个时代，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奋斗与牺牲，铺设着通向今天的历史通途。历史的长剧，都是有着序幕和高潮的。今天的时代，是昨天时代的继续，又是未来时代的起点。我们处在这个“高峰”时刻，从总结与把握历史的角度，应该做些“瞻前顾后”的思索，这些思索应该包括：

——将我们的时代推向今天这个“高潮”的那些人民英雄，他们努力的意义何在？功绩何在？启示何在？

——对创造今天伟绩的人们，历史应该如何予以关注和记录；我们应该如何与民族的明天对接，当后代们在研究和评述今天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些什么作为基础，我们应该为他们留下些什么样的研究材料？

如果我们从“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这一命题来考察古往今来的各种事物，上述思索就不难得到解答，那就是：

——我们必须记录下前人为今天所做出的一切贡献；

——我们必须记录下今人为未来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历史的巨笔，在东方时空下，写一个大写的“人”字。

现在，我们编辑出版《中华英才丛书》就是一个尝试。

我们无法忘怀，作为开创今天辉煌时代的那些革命前辈领袖和他们的人

民，将军和他们的士兵们，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擎起的第一面红旗，向黑暗势力射出的第一发子弹，为壮丽事业洒下的第一滴热血。我们无法忘怀，为了建设新中国，各族人民、海内外同胞为此送上的一颗心，献上的一片情，付出的一份爱，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我们才有了创业的基础，才有了成功的辉煌，才有了胜利的保障，才有了光明的未来。从历史、从现实、从未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都没有理由忘记过去，都没有理由不重视现实，都没有理由忽视未来。烛照现实，启人慧思，登山临海，言近旨远。可以说，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生命价值核心的当今中华英才豪杰的业绩与历史上一切功成名就的千秋伟人的事迹相比，他们没有任何愧色。他们的业绩，他们的风范，他们的品格理应得到了与其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相称的褒扬。纵观今日世界，开放度、文明程度越高，则杰出人物的透明度就越高，就世界论之，地区与地区交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最终都是通过人，特别是杰出人物之间的交往来实现的。没有相互了解，何来交往？没有交往如何促进和平与发展？任何个人的经历、成就都折射着历史的光辉、时代的痕迹。从党史、革命史、创业史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坎坷与贡献、他们的奋斗与成功，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英才的业绩、英才的风范、英才的品格一经形成，就变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由人民来共享。人民希望了解自己的领导人和杰出人物，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是历史进步的又一个标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今世界上是当之无愧的最可爱、最可敬的人，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奉献了全部身心，他们贡献最大，他们最恪尽职守，然而，他们的付出与所得之间，却相差那样悬殊。我是一名无党派人士，说这话完全是出自于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我深深地感到，直至今天，我们的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本民族的杰出人物还不够了解，人民一旦了解自己的领导人和杰出人物，其作用确实不可估量。

由是我想到，历史决不仅仅意味着昨天，它应该就在此时、此地、此刻，就在我们面对的分分秒秒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回避现实，不能只把眼光放在以往。“浓墨重彩写今人”，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更何况，我们当今的时代，哪一时、哪一刻没有英雄豪杰在高唱着“大风歌”，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呢？

由是，我们首先要记录当今时代的一位伟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我们要为今天的时代和英雄们“树碑立传”的时候，他无疑是处在“领袖群伦”的地位。他的功绩是历史的，更是时代的。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我们一切今后能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人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他的思想与贡献，早已有许多皇皇巨著，在《中国一代政界要人》一书中我们所贡献给读者的，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一个侧面、一个镜头，如果因此能加深读者对这位深刻而又迅速地改变了中国历史面貌的伟大人物的理解，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倍觉欣慰了。

本着同一个立意，我们描述了领导着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中国当代领导人》，共和国的部省长和其他领导人《中国“京官”和“封疆大吏”》，戎马一生、驰骋疆场的《中国当代将军风采》，以及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中国大法官》、《中国大检察官》。这些“官”和“将”，可以说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本书在描写他们的时候，着眼点是要体现他们身上所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而并非官

职大小或军衔高低。应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平等的时代，官职和军衔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责任与才干上。领导着十一亿人口的一个大国的首脑，主政一方的行政首长，肩负重任的当代将军，头戴国徽的大法官、大检察官，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经历、思想、才能、作风、衣食住行、生活情趣，这些想必都是读者感兴趣的。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以往对领导人的一些新闻采访中，往往只写出了他们的公务活动，只是写出了他们“官”的身分和特色，还缺少生活情趣，这使读者深感不足。在编辑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疏漏，并努力地做了补偿和新的探索，相信读者在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新鲜的感受，您会看到，他们并不只是因为职位高才受人尊敬，他们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个人兴趣以及一些偏好，他们既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肃的工作态度，也有着充满人情味的家庭生活和朋友关系。江泽民总书记与普通群众一道唱京戏，李鹏总理深入火灾第一线……这些生动的细节，会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当然，由于采写上的难度，有些文章还免不了“工作味”强一些，而且有采访的局限性，对有些领导人的访问到今天也还在“预约”之中。对此，请读者予以谅解。

英雄人物和杰出领导都来自群众，他们是群众中产生的英才，是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力量哺育和造就了他们，他们又以自己的杰出智慧和力量领导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在这些英才身上，我们既能感受到时代气息，又能看到群众的力量，以及个人的天赋才干，在记录这些杰出人物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产生他们的时代基础和群众基础。我们描写他们，也是要通过他们，展现时代的风采和人民的风采。因此，在《中华英才丛书》中，我们采取了一种“全景式”的编辑立意，上到国家领导、将军、部长，下到平民百姓和海外华人中的人杰才俊、能工巧匠、鸿儒硕学、艺术大师，皆在其中。凡为我们的时代增添了光彩的人们，凡各个领域中的那些功成名就者，在《名人名家内幕新闻》、《海外杰出华人的特别档案》书中都会有他们的形象和业绩，以此成为当今改革开放时代的群英谱。这种编辑思想，其实也是古已有之，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体例，为我们展示了从上古传说到西汉这段历史风貌的。作者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串演着一个个时代，讲述历史风云，描绘风俗文物，歌颂正义和善良，揭露丑恶和不公，作者把对历史的评判，倾注在对人物的褒贬上，这种历史的眼光和笔法，头为我们有益的借鉴。

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唱赞歌，这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做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时，在选择采访对象方面有时也会遇到善意的推辞。我们当然首先要尊重采访对象的意见。正是这个原因，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些世人皆知的领导和已有盖世功勋的将军以及业绩辉煌的风流人物，在本书中并未出现，或者虽有触及，但材料和描述仍较简单和浅泛。对此，编者虽心有余憾，但确是力所不足，万望读者予以理解。掩卷沉思，我仍然强烈地感到，这些年的心血和劳动总算有了结果，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毕竟我们是在进行着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探索，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丛书绝非“年谱长篇”似的传记，更非盖棺论定式的鉴定，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要把这套丛书编成定论式的“史书”，侧重的是将主人翁最值得一书的片断，最为人称道的言行，最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多方位地进行描写。讲究叙述，真实准确是

本丛书的最基本的特点。

在跟踪时代英才，描绘风流人物，塑造时代脊梁，振奋民族精神的工作中，我们体会到了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新闻工作者的艰辛与甘苦，也领略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充满了信心和激情。置身于时代精英的行列之中，去挖掘他们的思想，展现他们的风采，讴歌他们的业绩，体会他们的甘苦；与改革大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促膝谈心，剖心曲、诉衷情，笑谈世界风云，共思创业大计，尽抒英雄气概，一诉儿女情长……这是一种何等丰富的人生内涵，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面前，生命的意义在升华，人类本性中残存的那些个卑微、琐屑、渺小、软弱，仿佛一刹那间都会随之烟消云散。

这是在与那些杰出人物的灵魂相碰撞时发出的共鸣。

当我们把这种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层面去思索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更深意义的发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名留青史的英雄形象，不能没有万人景仰的英雄激励，更不能没有引吭高唱的英雄颂歌。在任何一首时代的进行曲中，“英雄乐章”永远是最高昂、最响亮、最雄浑的主旋律，这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财富。清风、明月、小桥、流水，能够滋润人的心田，但鼓舞民族奋进的，永远是时代英雄们奏响的黄钟大吕。为此，我们选择了歌颂英雄作为自己的事业，作为这部《中华英才丛书》的主调。这种选择，难道不也是历史对我们的钟情吗？

——在我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的进程中，物质的因素是重要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忽视了精神因素的国家 and 民族，都将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同时，没有一股精神力量的激励，物质建设也会缺乏动力，缺乏明确的目标。对于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是单纯的物质因素所不能替代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发展，共同的信念是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民族的大义、国家的荣誉凝聚在一个个时代英雄们身上，具化成了崇高的气节、献身的精神和完美的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些中华民族人性中的美德与操守，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见贤思齐”、“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我们用精神典型来育化和激励人民群众的心理基础，也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可以说，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人民提供一些精神和道德上的楷模，这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之举。

——介绍杰出人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突出个人而歌功颂德。国运兴，则人才兴，从哑哑学语到卓有建树，从幼稚无知到主政一方，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的哺育、人民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大浪淘沙、新陈代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杰出人物之所以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是缘于坚强的信念、顽强的努力、不懈的探索。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一个人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折射着我们的历史和时代，他们的经历和成就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事如芒草春长在，人似浮支影不留”，如果我们的历史离开了群星堆灿的英雄豪杰，就显得贫困，就显得苍白，就显得枯燥，就是一部不完整的人类文明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准确地介绍他们，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

对优秀人物的介绍是一种颇见艺术功力、充满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我们所要倡导和发扬的时代精神，必须通过一个个人物来体现。他们精神上的崇

高、伟大，所以被人敬仰，是因为他们的事迹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他们同时又普通而平凡，所以人人才能效法。这与其说是一个宣传上的难点，不如说是我们肩负责任的光荣所在。伟大与平凡在最高的层次上是统一的。这是我们近几年来从事英才宣传的最深体会。为使广大读者对我们介绍的人物产生深深的认同，需要做艰苦的采访和挖掘，需要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才华。对此，我们进行了努力。读者会从书中介绍的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作者们对此的追求和投入的心血。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还要努力，在追踪时代英雄和描摹他们崇高与普通的闪光的生命历程中，倾注多少心血都不为过。因为这是一项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程，它需要深刻的思想内涵也需要精美的艺术表现。

谨以此书奉献给书中所描绘的每一位时代英才以及热爱他们的读者。

1993年12月 于北京

名人名家内幕新闻

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

夏莉娜 陈江南

有位外国作家曾经断言：“外交舞台是男人的世界。”这话虽有重男轻女之嫌，却不无根据。古今中外，似乎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代表一个国家衔命出使的，往往是须眉之辈中的佼佼者。然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打破常规，使妇女在外交领域同样有施展才华的天地。1979年2月，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出使荷兰。从那时开始，新中国有了一位又一位女大使。除丁雪松外，还有龚普生、李珣、林蕙丽、王桂新、祝幼琬、韩珮琳、顾懋萱……

这些巾帼大使的辛勤业绩，为新中国外交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我们拜访丁雪松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早已卸下大使之命她现任全国七届政协委员、中国与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我们问她，当时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她被选中担任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她谦逊地笑答，她至今也不了解个中原委。她说，她一生经历中有三次想不到。一次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领导上决定她去担任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她因为从未从事过新闻工作，感到突然；第二次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名她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她自忖，比她强的人很多，选她出任，感到意外；第三次想不到，就是想不到自己花甲之年，还二度被任命为大使，出使荷兰、丹麦。

其实，当我们了解了她的全部经历后，就不难找出问题的答案。

丁雪松是四川重庆人。1936年春，年仅18岁的丁雪松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被刚重建的山城地下党吸收为第一名共产党员。不久，她又来到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英姿飒爽的丁雪松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队长，后来又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秘书。此间她与来自朝鲜的青年音乐家郑律成相爱结婚。婚后不到8个月，郑律成即奔赴太行山工作。1943年春天，她生下女儿，因没有奶喂，只好卖掉郑律成心爱的小提琴，买回一只母羊，用羊奶哺乳，为了让孩子不忘记这一段经历，她给孩子起名“小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随郑律成回到朝鲜工作。她先后担任过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我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代表、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等职。50年代初，经过中朝两国领导人协商同意、周总理批准，她和郑律成又先后回到中国工作。

从此，她一直工作在外事战线上。“文革”前，她曾在中联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椰林婆娑的科伦坡、樱花盛开的东京、柬埔寨的金边……都留下她繁忙工作的身影。1971年，她从干校调到对外友协担任秘书长、副会长。在民间外交的岗位上，她面对“四人帮”干扰的极为困难的条件，努力恢复和发展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1976年冬，积郁成疾的郑律成，因脑溢血逝世。她强忍悲痛，奋发地工作。1977年上半年，她率领的上海舞剧团访问法国、加拿大取得巨大的成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道：“这样的文化交流，在增加知识和相互了解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下半年，她又不辞辛苦地带领友协代表团访问了北欧5国。

丁雪松在外交战线长期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尊敬。或许，正是基于此，她终于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大使。

丁雪松作为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第五届五次会议的代

表，参加了这两个意义重大的大会，从而使她对使节肩负的任务——要为争取一个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有更明确的认识。

出使荷兰和丹麦的4年多日子里，丁雪松积极宣传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穿针引线促进驻在国与我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她的指导思想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取天下之长为我所用。后来，由于荷兰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海军潜艇的决定破坏了1972年中荷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公报的原则，她在海牙仅工作一年零八个月，即奉命回国。1982年初夏，她又出使丹麦。她身处风景秀美的丹麦，却很少去游览名胜，而是不辞辛苦地到不少有专长的工农业发达地区，参观考察。在前任大使打下的基础上，经过她的辛勤工作和各方面配合，使丹麦政府对中国改革开放加深了瞭解。3年里，丹麦政府连续向我国提供了三批包括31个项目的混合优惠贷款，共1.6亿美元。这在当时其它西欧国家是不多见的。利用这些贷款和通过多种合作形式，使中丹经济技术合作结出硕果：中国最大的现代化乳品厂黑龙江乳品厂和年产10万吨啤酒的北京华都啤酒厂相继投产；从丹麦引进的4000多头良种奶牛在安徽、宁夏、内蒙古、广东等地安家落户；广西、广东等地利用丹麦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生产出的优质水泥，源源不断地运往建筑工地。丹麦外交大臣高度评价了丁大使的工作，他在为丁离任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说：丹中关系“好极了”。“丹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明显地证明了您的工作是成功的。您在哥本哈根留下了令人尊敬的声誉，这不仅是您的精力和能力。而且还有您的与你们高度文明国家相称的老练的工作。”

(1992年3月)

马烽谈“山药蛋派”

孙嘉成

记得那是1939年12月初，马烽抛开家眷，只身从山西来到北京，被中国作家协会借调，任党组书记。纷繁的工作，对一位快到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记者来到马烽下榻的作协招待所。尽管马烽病后初愈，还是兴致勃勃接待了记者。一经坐定，他便很敏捷地将思绪的闸门打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经历、创作观以及“山药蛋派”的诞生经过。

自身经历影响着创作道路

马烽1922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家中生活十分困苦。7岁时随母亲搬到汾阳县东大王村舅舅家寄住。16岁，高小没毕业就参加了八路军。由于马烽喜好写作，于是就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两年；1942年又参加了当时晋绥文联组织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后来他在《晋绥大众报》等报社当记者、编辑的六七年里，经常深入农村采访，编写民间故事、民兵的斗争事迹、小小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1945年和西戎合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段时间是一边参加“土改”等实际工作，一边写作的。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就留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创作组、文学讲习所的筹备等许多社会工作，并在其中担任一些职务。马烽告诉记者，他是在北京结婚、生儿育女的。他在北京的七八年里，偶尔回老家农村看看，再回北京搞点创作。但马烽觉得这不是个创作办法。他说，尽管城市生活条件很好，但我是写农村作品的，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长期未离开农村，对农村非常熟悉。而写城市，从头干起，也不易，反复考虑后，马烽觉得自己的优势以及创作的根应该在农村。他离不开那片抚育他成长的土地和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1956年带领全家又回到了山西老家。回去后，为了全面接触农村，他还当了两年汾阳县委书记。由于深入农村生活，他写了不少作品，像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60年开始写长篇传记体小说《刘胡兰传》，共20万字。这中间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马烽感慨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

为农民而写电影剧本

1976年之后，马烽主要是写电影剧本，他同孙谦合写了八九部电影剧本，有《山村锣鼓》、《泪痕》、《黄土坡的婆姨们》、《几度风雪几度春》、《高山流水》、《山花》、《扑不灭的火焰》。这些剧本有的拍摄了，有的没拍摄。说完，老作家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呷了口茶，接着谈起了他对写电影剧本的考虑。他说，在写农村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农民没有读小说的习惯，而电影却比较能够深入农村，打动农民。当时每个公社都有放映队，我想，利用电影这种传播工具，不是能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更多地给农民提供精神食粮吗？而且我对写电影剧本也有兴趣，何况写电影剧本与写小说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尝试。记者算来，当时马烽跑农村，写电影剧本，都已是五十五六岁的人啦。

所有艺术品都是为了宣传

马烽认为，不管哪种艺术形式，只要健康有益，都是可以传播的。他形象地作了个比喻：有人卖烤鸭，有人卖烤白薯，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条件，都可以卖。山药蛋不也是一种食粮吗？有人喜欢吃大米，有人就喜欢吃山药蛋。马烽谦逊地对记者说，尽管我为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写不好，但我的服务对象比较具体，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确实有写头，非常值得写。一个作家写作，说是为全世界写作，是让全人类都知道，这是空话，瞎想，不可能的事。也有人说，你们的作品都是宣传。好像他写作品不是宣传，只是自我欣赏一样。我说任何作品都是宣传，就连写情书也是宣传，要不，你写情书干嘛？他的结论是：宣传不一定是艺术品，但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为了宣传。

“山药蛋派”是自然形成的

当记者问马烽“山药蛋派”的来龙去脉时，马烽告诉记者，所谓“山药蛋派”不是自我命名的，而是别人加上的。在“文革”前，有些人对我们山西一些作家（包括赵树理在内）有点瞧不起，认为我们写的东西如同山药蛋，土里土气，不是猪肉羊肉，上不了酒席，不能登大雅之堂，是个贬意。打倒“四人帮”之后，山西有一个叫李国涛的人，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且说山药蛋派》。这篇文章是评论山西这些写农村作品的作家的，他用这个词时是褒而不是贬。从此以后，才开始在报纸上、书本里出现了“山药蛋派”这个词。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的创作宗旨没有变。如果说现实中确实存在“山药蛋派”的话，那也是自然形成的。

记者又问，现在的继承情况怎样呢？

马烽说，现在山西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写得好一点的像田东照、谢俊杰、王东满等人，还有一批，这些人都一直没有离开农村，写农村生活。当然他们和我们的风格多少有点差别，时代不同了，农村也在变化，题材本身、语言风格都有变化，他们有所创新。但总起来说，他们的作品风格仍属“山药蛋派”范畴，当然，人家承认与否又是一回事。无论别人怎么说，是说这种形式完了也好，还是说它将继续发展也罢，我们一概不评论。因为我们的创作目标在农村，是为农民而写，而不是为某个流派才写的。说完，老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

（1991年2月）

伟人遗体的整容师马燕龙

浦晓江

他是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送行的使者。给死者以安详，给生者以安慰，这就是马燕龙的一项神圣使命。对北京医院病理科这位普通的副主任技师来说，给遗体整容，只是他的“副业”，但他却在这方天地里默默奋斗了将近40年，从元首巨擘到黎民百姓，他使数不清的人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昔日的仪容笑貌。

走上遗体整容这条道路，母亲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马燕龙很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去世了。基督徒的母亲为他祖母整容，淡施胭脂，细描眉毛，清洗得很干净，穿上很素雅的衣服。他看到祖母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心里觉得母亲这样做非常有意义。

1949年6月，才16岁的中学生马燕龙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高高兴兴地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进了军委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作病理检验工作，同时又负责尸体检验。北京医院是高干保健基地，因此，马燕龙在工作中接触的都是革命老前辈。用他的话来说，他对他们的崇敬和热爱甚至是“超过父母”的。

1952年，察哈尔军区政委兼省主席杨耕田病故了。领导告诉马燕龙，聂荣臻要来向他这位老战友的遗体告别。作为负责尸体检验的一名医务人员，他想，不能让聂荣臻看到这样的病容，于是便试着为杨政委遗体进行了精心的整容。他在灵床周围设置了石鼓，摆上鲜花和绿草，使杨政委安详地长眠于鲜花丛中。聂荣臻和杨政委的家属看了非常满意。

这是马燕龙做遗体整容工作的开始，但他没有想到，此举竟开创了向遗体告别这种隆重庄严的吊唁仪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然而，正当他准备继续钻研这项技术时，“文革”开始了。马燕龙的妻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带着3个未成年的女儿到江西劳改。他本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被打发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负责管理尸体，兼管饲养实验用的动物。由于天天接送尸体，他接触到许多特殊死亡病例，这使他有进一步提高整容技术水平的机会。后来，他又潜心学习钻研绘画、造型、化妆艺术，到处请教有关专家，使他的整容技术日臻精湛。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逝世后，由于患的是皮肤癌，眼部面容破坏很大，根本分不清眼睛与眉毛的界限，眉毛几乎都溃烂掉了。马大夫通过细心琢磨研究，配制了一种与肤色相同的物质将缺损部位填补上，使遗体面部整洁如初，并且剪下自己的头发，为陈先生补足眉毛。周恩来总理在向陈嘉庚先生遗体告别时，称赞说：“这形象很好嘛！整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周总理的这句话，使马燕龙暗暗下了决心：把遗体整容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在我的一生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整容。”马燕龙说。“1976年9月9日，我正在北京郊区卫生部干校劳动，突然被上级派来的汽车接到了中南海。我坐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待命，这显然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住所，我看到了很多我熟悉的医学专家、教授在忙忙碌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既紧张又沉闷的感觉。很快有人告诉我：‘毛主席逝世了。’原来，我被选为毛主席遗体保护组的成员，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遗体整容。”

马大夫接着说：“整容工作是在中南海进行的。有位负责人交给我一张毛主席生前会见尼克松时的照片，作为整容时的参考，并且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毛主席的遗体准备保存下来，将来还要让亿万人民瞻仰，所以丝毫不能有差错。当时，由于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很好，面容很安详，我的工作就不很复杂了。但是，我仍然很紧张，双手不停地颤动，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整理好。有关领导看了后表示很满意。后来才送到人民大会堂，放到水晶棺中……”

当谈到为周总理整容时，马大夫十分伤感。周总理由于长期遭受癌病的折磨，逝世后面容消瘦，胡子很长。这使他一下想起长征时总理的长须。按邓大姐的要求，要设法使周恩来的遗体尽量保持生前的仪态。马燕龙在极度悲痛中开始了工作……

周总理安卧在青松翠柏和鲜花丛中，他面色红润，像刚参加会议回来，有点疲劳稍稍休息；他微闭双目，像在悉心思考着中国的大政方针……周总理英俊安详的遗容，使人们在那寒冷的1月平添了一丝总理没有离去的慰藉。

30多年过去了，经过马燕龙整容的人难以胜数，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著名作家、艺术家、国际友人……在他那像册目录上，记载着这样一些人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胡耀邦、叶剑英、刘伯承、乌兰夫……

周建人、史良、茅盾、叶圣陶、齐白石、周扬、丁玲……

李四光、马寅初、孙冶方……

路易·艾黎、夏庇诺、马海德……

究竟给多少人整过容，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只有那厚厚的十几本影集，忠实地记载着他默默的业绩。

有人说马燕龙是“特殊整容师”。是的，他的工作在平凡中蕴含着不寻常的涵义，尽管他的事业并不惊天动地，尽管他又没有太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也却因此得到人们的感激和崇敬。

茅盾的儿子韦韬在给马燕龙的信中写道：“家父的遗体由于您的精心整容和保护，使在悼念时看来安宁慈祥如同熟睡，使人感到慰藉。”

周建人的女儿周瑾写信给他说：“向遗体告别那天，我母亲看到了我父亲的遗容，感到十分满意。为此，我们非常感谢您。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找到了两本《鲁迅诗稿》，现送给您，请您留作纪念。”

曾荣获北京市公民称号的新华社专家、国际友人夏庇诺的夫人也在信中写道：“我们在此对您为夏庇诺做的出色整容，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许，一般人不能理解马燕龙为什么这么热心于遗体整容，有人说：这工作又苦、又累、又不吉利，又易沾染病毒……的确，他不仅给领导人整容，连一般群众找他，他也有求必应。因此他接触过数不清的遗体：久病而故的，猝然死亡的，车祸、工伤死亡，自杀、他杀的等等。由于病痛的折磨和生命的最后挣扎，不少人去世后容貌变形很大，从事整容工作首先得把这些奇形怪状的面容，矫正或整饰成生时或接近生时仪态。

马大夫的全部“家当”放在一个皮制的出诊箱里，里面有各色高级化妆品，以及黛笔、剪子、推子、梳子、刮脸刀、吹风机、药棉、酒精等等。现在，据他说，他整容已经可以做到使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露出黑黑的眸子；也可以使毫无知觉的脸孔，露出微微的笑容。因此，有人称他为“太平间里

的艺术师”。但他却说：“我干这一行的目的，是为让死者于干净净地同亲人见上最后一面，清清爽爽地离开人世。”现在他已收了6个徒弟，准备把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后人。

马燕龙是农工民主党党员，但他在谈到自己成长过程时，深深感激共产党对他的培养。现在，他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妻子王连清是一个著名的针灸专家，共产党员。他经常为她抄写整理书稿。他曾幽默他说他俩是“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他们有三个女儿，一家人对他的工作都很理解。

夜已很深了，我起身告辞，并习惯地伸出手来，但他犹豫了一下。我顿时明白了，他怕别人忌讳他那接触过无数死人的手。于是，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1991年7月)

学者化的演员于是之 张我威

他压抑着激动，慢慢地铺纸、蘸墨，屏息构想——连日来，不少活剧界朋友纷纷呼吁：在当前话剧不景气的挑战面前，有人弃艺，有人对话剧艺术的前景产生了动摇，有人仍然在顽强地坚守阵地……朋友们的呼吁、奋斗，使他难以平静。今天，不少同行中的新老朋友相聚，热情地要求他留下墨宝。他激动着，构想着。突然，他一变缓慢的节奏，快速地挥毫疾书。顿时，两个刚劲滞洒的大字跃然纸上：“观远”。伴随着一阵赞许，他从朋友们那里感受到了理解和力量。大家从“观远”谈到要在话剧受到挑战的今天，就着手组织力量迎接话剧艺术繁荣的明天，也谈如何争取观众，如何培养演员。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句：“是之同志是出色的演员，却有学者风度。”

演员学者化，正是于是之的追求和主张。

他自幼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贫苦的生活，使他15岁被迫辍学从业。几经失业、流离颠沛，他却以惊人的毅力自学唐诗和外语。始而苦读夜校攻下法语，继而旁听北京大学中文系，寻求知识。1949年，北平解放，结束了于是之的苦难历程。他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在舞台艺术这一诱人的领域，加倍地学习进取。1951年，他得以在老舍的力作《龙须沟》中扮演程疯子。一举成名后，他发表了《我演程疯子》的著名文章，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创造经验。至今，这篇文章对于表演艺术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接着，他又在《雷雨》、《日出》、《布雷乔夫》、《虎符》、《名优之死》、《骆驼祥子》、《茶馆》、《以革命的名义》等名剧中创造了周峰、李石清、兹翁佐夫、信陵君、左宝奎、老马、捷尔任斯基等众多的典型形象，又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成功地扮演了于永泽。这一系列鲜明形象的创造，集中在50年代的七八年中。作为一位严肃的勇于思索的艺术家，于是之从丰富的创造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明确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仅从“自我出发”不能创造出人物形象。他在《演员创造中的“我”与“他”》、《焦菊隐先生的心象说》等文章中，反复论述了“类型与典型的关系，外在和内在的关系，心象和形象的关系”，阐明了演员创造形象，是一个从外到内，从内到外，交错进行，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于是之的这些独具理论和美学价值的学术思想，一直积极作用于他后来的艺术实践。

1985年，年近花甲的于是之，在话剧《丹心谱》中成功地创造了老中医丁文中后，又在美国话剧《洋麻将》中塑造了魏勒老人。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清晨，人们都可看到一位拄着拐杖，右手有些不听使唤，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老者出现在紫竹院公园——这是于是之在排演场外的创造一瞥。他在创作日记中，有着这样一段关于魏勒的记载：“腿左膝盖有病，老伤，或因踢球造成。左脚内八字，因而拄拐杖。可能颈略向右偏，头稍向前探。写字用左手。面部肌肉随思想情绪有一种（或几种）不随意的微动。这些都得下边练，排练时不管。”当于是之和朱琳演出的《洋麻将》（导演：夏淳）出现在首都舞台上时，立即引起轰动——青年学生来信祝贺；不相识的观众纷纷到后台请他们签名；外国朋友也破天荒地走进化妆室要和他们见上一面；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戏剧报》为《洋麻将》举行了隆重的推荐演出，不仅从创造实践肯定了于是之、朱琳的出色表演，更从他们的卓越成果“推荐了舞台话剧艺术的某些基本美学原则。”

从程疯子到王利发，再到魏勒，不仅记录了于是之舞台艺术的实践，也记录了他关于表演艺术丰富而扎实的学术观点。他学唐诗、钻外语、精读鲁迅著作、擅长书法。他涉猎文学、美术、戏剧创作、哲学、历史等知识领域，从中获取营养，提高修养。他从几十年的切身体会中明确主张：对于演员，修养是第一性的，技巧是第二性的。他所说的修养，包括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修养和艺术修养；他所说的技巧即认识生活和艺术地再现生活的能力。于是之创造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正是他追求演员学者化的结果——他从众多的知识领域汲取营养，为自己的创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于是之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不仅担任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职务，还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剧协主席等工作。前不久，他在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而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后，接着又应邀率领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尽管他的社会活动如此频繁，剧院的领导工作如此艰巨，但是，他的学者气质仍然十分浓厚。

因为他深知，学问是多么有价值。

(1989年12月)

邓林画梅

吴霖

中学生邓琳因嫌其名笔画多而书写麻烦，去其“王”，于是，邓琳成了邓林。当时，邓林并不知道自己兴之所至所改的名字，会含有远古的一段悲壮故事的意蕴。《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她原先的名字，是取自父亲邓小平之姓，母亲卓琳之名合而为一的。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画界出现了一位以画梅花而著称的画家邓林。

邓林率真大气，这个特点，从她的生活和画中都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早在 50 年代末，她母亲将她领到汪慎生先生门下，学画小写意花鸟，后来，邓林觉得小写意难于表达自己内心热烈而奔放的情感，遂改画大写意。学画 30 多年过去了，已经是中国画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邓林却还自谦地自我评价：“笨人笨画”。

但是，邓林的画越来越受到世人瞩目，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当然，这其中有来自她家庭的缘由，但更多的，我想，还是来自于邓林画中的魅力。

邓林画大写意花鸟，画得最多的，是梅花。专业画家专画梅花，是需要有足够的胆略的，因为，这些题材在多年以前，就被中国画界公认为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在这种境界中，再向前走半步，都是难乎其难的。然而，邓林却一往情深，一如既往地画着梅花。从梅花的品格中，她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内心世界相契合的平衡。邓林对我说：“是我的性格，是对象的内涵，使我喜欢画梅花！”

邓林的梅花，热烈奔放同时也含蓄深沉，博大雄浑同时又透明稚拙。近年来，邓林多次出国举办画展，其中最多的题材，就是梅花。那些红梅、绿梅、白梅和墨梅，组成了一个极具邓林艺术特色的梅花世界。

1986 年以后，邓林对中国古代先民的彩陶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邓林充满诗意的画面上，开始出现了彩陶。先是以彩陶为器，插一枝冷梅；而后，彩陶的符号成为画面独立而又和谐的一部分；再往后，梅花消失了，充满画面的，是神秘而拙朴的彩陶图案，图案中浸透着寒梅芳香。至此，邓林完成了一个艺术家从自觉到自然的一场观念革命，她找到了目前最能抒发她内心情绪和感受的一种形式。以后，邓林笔下的梅花，已然有了崭新的面目。

也许是邓林好客的美名远扬，每天来找她的人仿佛总是络绎不绝，于是邓林便抱怨画画的时间太少了。邓林很用功，也很虚心。每有新作，请师友评点，她总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有时，她也把作品呈给政治家的父亲看，邓林对我说：“爸爸的评价是三个字：有进步。”这三个字，本身包含着朴素的哲理：艺术的道路上，不进则退。

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求过学的邓林，对音乐有着至深的情感。在她的画室，她很有兴致地向我们推荐她的音响设备，并用广东人的说法戏称自己是典型的“发烧友”。那天，邓林请我听的，是厚重严谨的交响乐，但实际上，她对严肃的流行音乐、民乐及京剧等是样样都喜欢的。这倒有点像她学画，只要她感兴趣的，都拿来一学，从不以门户之见看待艺术。最终，她所画得的，还是绝对邓林风格和气派的世界。

邓林的画室中，除了几幅自己近作，还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她给爱子拍摄的特写，并进行了大胆剪裁，突出那双稚气天真的眼睛；另一幅是她给

父亲拍摄的，老人家慈祥自然地坐在藤椅里，平和而坚定地注视着前方。邓林的摄影技术，在家里可称冠军，故此，只要全家出游，摄影师的重担便责无旁贷地落在她的肩上，对此，邓林很有些自豪感。

邓林画梅，自然也爱观梅。只要是冬季，邓林到哪里，总要去寻梅访梅观梅画梅的。有一年，邓林和父亲去了成都，邓林独自探梅，发现杜甫草堂的梅花开得十分茂盛，极有光彩。回到住所，便极力向父亲推荐不妨一游，父亲欣然同意前往。转了一圈回来后，邓林问看到了吗？哪知父亲邓小平幽默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一盆盆栽梅花。”原来，他一到草堂，就被游人发现，于是纷纷拥来，表达对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敬意。结果是邓小平看到了家乡人民的深厚情意，却没有能看到女儿热心举荐的草堂梅花！

从18岁开始学习中国水墨画的邓林女士，1991年已到了50岁了。邓林笔下的梅花，也在日新月异，蓬蓬勃勃地成长着。有一次见邓林画梅：她一面潇洒地走笔挥毫，笔下梅花朵朵，或怒放，或微笑，或颦眉，馨香弥漫而来，其势不可当；一面唱着歌，是自由的女中音，歌名叫不上来，歌声和旋律却很动人……这就是邓林，洒脱而热情的邓林，真诚而机警的邓林！

(1991年12月)

文章不著一字空 ——记方汉奇 张进

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从地板到天花板被近万册书籍严严实实地围成三面墙壁。微弱的阳光从唯一没被书籍堵住的朝南窗子射进来,投在伏案疾书的方汉奇教授花白的头发上。

自 1948 年从事新闻史研究至今,40 余年过去了,这位中国新闻史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始终恪守着“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座右铭。

40 年代末,方汉奇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曾花费 3 年时间在上海市新闻图书馆翻阅 30 余年间的《申报》。当时的《申报》版页多,且多旧闻旧事,不免枯燥。而当时 20 余岁的方先生却甘于埋头旧报之中,兢兢业业地进行了《申报》的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如今,方先生对中国古今各种大小报纸了如指掌。谈起各报的总编辑是谁,刊登过哪些重要文章,报纸的特色是什么等等,他如数家珍。学生们遇到史料方面的问题向方先生请教,总能得到准确的答案。久而久之,“活字典”便成了方先生的雅号。即便如此,他在编写《中国新闻通史》一书时,对早已谙熟的史料仍坚持重看原版的旧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内,时常可见方先生伏案读写的身影。

史学研究者,必是博览群书的通人。方汉奇不仅专注于新闻史料的研究,同时也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各方面的书籍。他把读书看作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夜深人静,即使在“文革”中,身处逆境,他依旧竟夜读书,200 多卷的大部史书《资治通鉴》就是他利用无数个夜晚读完的。

方汉奇治学一向重视做卡片。这种方法始于 1947 年,至今他已积累 3 万多张。方先生的卡片标题醒目,出处翔实,既录原文,也记观点——包括自己的体会和由此产生的新论点。每张卡片都写满了漂亮的蝇头小字,最多的一张竟有 1500 多字。

1948 年,方先生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 年夏,受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教研室主任罗列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后,又随新闻专业转入中目人民大学。方先生称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爷”。

方先生讲课不拿讲稿,一杯配茶放在讲台上,即开始侃侃而谈,他声音不高,但抑扬顿挫,极富韵味。其间不仅所讲年代、人名、地点准确无误,且旁证博引,时有佳言警句冒出。常常是台上讲得异彩纷呈,台下听得心驰神往,一节课下来,学生们都感到听方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方先生常说:“给学生一桶水,自己要准备十桶水。”时至今日,他衣袋中总装着备用卡片,每次讲课前他仍坚持细致的备课。

方先生除给研究生、博士生授课外,还主动承担给本科生授课的任务。对青年学生,他总是热诚关怀,对自学者也莫不如此。一位参加函授的女工,将 2 万多字的作业寄到方先生处。方先生逐字审阅,做了详细批改,并将一套《中国近代报刊史》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工。

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是方先生的为人之道。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全然没有门户之见。学术观点有分歧时,他常说,“不妨求同存异”。对与他的观点相左的文章他也积极给予推荐。同行们说,“方先生没有反对者。”

“有戏大家唱”是方先生倡寻的一贯思想。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新闻通史》共六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七五”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目前新闻学领域中学术性最强、包容量最大的一部专著。本来，掌握大量珍贵资料的方先生完全可以独立完成或与几个人合作编写，但出于对新闻史事业的高度热忱和责任感，方先生却不辞辛劳联络全国新闻史研究人员 50 多人，集中全国的专业力量共同编写。他自己默默地承担着大量的幕后组织和编辑工作，在名利面前，方先生就是这样甘于淡泊。

(1991 年 6 月)

中国“第一家庭”的女主人王光美

晓雪

这里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家庭”；在“文革”浩劫中，这个家庭先后有六位亲人被投进了监狱，有三位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最近，笔者有幸见到这个家庭劫后余生的女主人王光美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些痛苦的回忆。

找到王光美极不容易。要找她的人很多，要她办的事也很多。她每天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们的交谈是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安排的。

王光美一家现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幢有名的高楼里。这幢楼是以“部长公寓”而知名于京华的。但王光美一家的居室面积并不大，陈设也很简朴，客厅里有几张南方旧式藤椅和几张沙发，无甚“豪华”可言。看得出，刘少奇在世时节俭自律的传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家庭。

王光美今年已68岁了，满头黑发中已有了几许银丝。这就像她已过去的日子那样，既有幸福也有痛苦。从1948年她与刘少奇结婚，到1967年生离死别，她与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整整20个年头，其中19年是做少奇同志的秘书。失去丈夫后，她又被投进监狱长达12年之久。林彪、江青一伙主持审判曾判处她死刑，并要“立即执行”，是毛泽东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才保全了王光美一条性命。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后，刘少奇的子女被允许去监狱探视王光美，只见她满头乱发，憔悴不堪，目光呆滞，面如死灰，儿女们都说快要不认识母亲了。

但是，王光美是位性格坚毅的女性。她咬紧牙关坚持到了彻底平反昭雪的日子。她说：“是少奇同志与我诀别时的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鼓舞我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刘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的悲痛时刻，子女们有的哭得昏倒在撒骨灰的军舰上，而王光美不仅坚强地挺住了，还不时给孩子们鼓劲：“要挺住，至少现在是胜利了！”王光美的坚强毅力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光美家里现有高高几大摞材料。原来这是当年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用了40余万人，查阅了全国各地400多万份敌伪档案才得来的刘少奇的各种“罪证”。“文革”后，有关方面将这些材料全部交给了王光美。

这堆材料对王光美来说是个意外的大收获。收集刘少奇的文稿，为刘少奇作传，是王光美做秘书时就有过的想法。可过去苦干没时间，怎么收也收不齐，有些过去在地下工作时期发表的文章甚至连笔名都不知道。现在这些材料全收集到了一起，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了这些材料，王光美为刘少奇作传和出全集的夙愿将会实现了。

平反昭雪后，王光美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几年前她离休后，仍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王光美早年就以聪慧伶俐而享名政坛，如今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依然锐气不减，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快捷、清楚，她在各种会议上的坦诚发言和敏锐的思想，常常令人惊叹不已。

闲暇时候，王光美的身心又全部倾注在了儿女们的身上：照顾儿女，抚养小孙孙们。笔者曾见到，王光美冬天像一个普通的北京主妇一样，紧张地为一家人采购、储存冬季的主菜——大白菜。

刘少奇同志有7个子女。长子允斌、次子允若和长女爱琴均为前妻何宝珍所生。何宝珍是1923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30年代初被国民党逮捕杀害

于南京雨花台。她牺牲后，3 个孩子流落街头，当学徒、卖报纸、拣破烂，甚至给人当童养媳，是经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地下组织的努力，才将他们找回到延安刘少奇身边。允斌、允若先后赴苏联学习，后来相继成为新中国国防工业的专门人材。“文革”中兄弟二人惨遭迫害，双双在四十几岁时就含恨死去。爱琴也曾发配内蒙草原“改造”，但她终于熬到了出头的一天。她现在是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俄语副教授。

王光美与刘少奇生了 3 女 1 男。3 个女儿平平、亭亭、潇潇在“文革”中也几经磨难，没少吃苦头，所幸姐妹们坚信爸爸的事业，顽强地活了下来。现在三姐妹已分别取得了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

王光美的儿子就是河南省副省长刘源。刘源在“文革”中曾四处逃命，以躲避抓捕。他有时竟以卖鲜血糊口。传说，在那些日子里，有刘少奇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千方百计掩护他、接济他，才使他得以逃脱厄运。刘源自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到父亲最后逝世的地方河南省工作。在这块中国有名的穷地方，他扎根农村，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勤勤恳恳，又不乏主见，颇得人心。1987 年底，河南省人大换届选举，刘源以最高票数当选河南省副省长就是一个明证。

人们都说，刘源与其父刘少奇长得简直像极了：华发早生，声音微哑……王光美则说：“源源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大特征是为民着想。”刘少奇曾说过：“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而刘源正是忠实地按照父亲的教导忘我地工作着、奋斗着。

王光美曾给我看过一张彩色照片：刘源的儿子和祖母在一起看着照片，王光美略显一丝遗憾地说：“源源他们为了学业和事业，三十多岁才有孩子，这使我的小孙子们刚才几岁。但是，令我欣慰的是，孩子们都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

(1990 年 3 月)

事业与生活对科学家同样重要

——记王佛松

段佳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佛松笃信：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能只是一架科学机器，应该是热爱生活的。

这个结论来自他的人生体验。

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广东省偏僻的农村里，一个远山含黛，落日余晖的傍晚。17岁的王佛松轻轻放下书本，收拾脚下的洋杂百货，该“打烊”了，尽管今天生意寡淡，收入不多，但他又复习了一门功课，很是欣慰。

他知道，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能够勉勉强强读完高中，对于一个贫穷农民家的孩子来说已经不容易了，但他踌躇满志，他要发愤读书，要考大学，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父母生过12个孩子，只养活了4个，目不识丁的父母下决心让唯一的儿子补偿上辈的人生缺憾，再苦再难也要供他读书。他忘不了妈妈支撑着孱弱的身子去卖菜、卖蛋攒足他的学费，他也忘不了，自己每星期带米带菜去上课。他不相信客家人只有到南洋卖苦力，到外地做买卖才能活下去。他要读书，学知识救国家，学本领救自己。

高中毕业后，没钱继续升学了，他当了一所小学的一校之长，那个年代，乡间的小学校长不值钱，收入太微薄，只得辞职去摆地摊。好在，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即便摆地摊卖洋杂货，他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4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王佛松觉得一切部如昨天，历历在目：“不论是当教书匠，还是摆地摊，我觉得那段生活全面地塑造了我坚切不拔的个性，我感谢命运之神。”

1951年，人民政府给了王佛松继续深造的机会，那一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汉大学化学系。

人生的又一次抉择，也是又一次考验。

没有路费，可他不能轻易丢掉这一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倾其所有——把做小买卖和在小学教书辛苦积攒下的钱全部拿出，又从亲戚朋友那里求借资助，总算凑足了路费。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他完全是靠国家提供的助学金度过的。

5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王佛松在大学加入了共青团，当选为学习委员，进而担任了班长。大学4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那年选送留苏研究生，顺理成章地他成为入选之一。

武汉大学对于王佛松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不仅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感情历程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在武大，王佛松结识了后来伴他走过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廖玉珍。

也许飞速发展的新中国对年轻的王佛松太具吸引力，也许落后的高分子科学研究让才华横溢的王佛松大着急，也许还有那么一丝丝对心上人的缠绵思念，王佛松在苏联的列宁格勒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研究生课程。1960年初，满腔热血的王佛松回到了祖国，被分配到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廖玉珍已早他3年在此工作了。

本来，王佛松这时候的事业、生活都应该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新天地。但

是，1960 年的中国，人们因为自然灾害，国际封锁，正勒紧腰带，克服困难，忍受饥饿。加之一夜之间。当“老大哥”的苏联专家又全部撤走，国家许多建设项目陷入瘫痪，举步维艰，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也不例外，当时正在进行的合成橡胶的研究项目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去攻克了。

60 年代初，我国使用的橡胶 90% 是进口的，自己生产的几乎全是天然橡胶。国家非常重视合成橡胶的研究。专业对口的王佛松接受了这项艰巨的科研任务。

王佛松把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都当作一种难得的机会。1965 年他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合成顺丁橡胶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其基本性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决定，在锦州石油六厂扩大试验。对石油六厂来说，橡胶对他们太陌生了，有的技术人员连橡胶是什么都不知道。王佛松的工作是从在大食堂里给技术人员们讲解橡胶 AHC 开始的。在全国数以十计的单位大力协作下，终于使顺丁橡胶实现了工业化生产。21 年后，该项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佛松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是这个课题实验室小试的负责人之一，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

王佛松的世界里，橡胶总也跟他分不开。完成了合成顺丁橡胶的研究后，他又负责开展了合成天然橡胶的攻关。合成天然橡胶当时是世界上的尖端产品，也是航空等领域的亟需材料，飞机的轮胎就只能用天然橡胶。正当风华正茂的王佛松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作为“学术权威”，他同样没躲过批判，也没躲过非人的折磨。但他从这次“难得的机会”中，不仅研究了外国科学的新动向，还对照许多科学大师总结出宝贵的人生经验：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品行人格非常重要，要在事业上卓有成就，就应该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要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只要有一点缝隙，王佛松就不会停止试验，作为靠边站人员，他还是发现了合成橡胶新催化剂——稀土催化剂。这项一直进行到 70 年代末的工作获得 1982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后来的道路就比较顺利了。”王佛松轻轻一笔，把他多次获国家各种奖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称号，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等荣誉，以及在导电高分子新领域内取得的种种开拓性成就都淡淡带过了。

王佛松把他所取得的成就归于上大学、留苏、国家需要种种机遇，但他也不否认个人能力、个人奋斗的重要。他认为，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好的个人素质，缺乏组织能力，不依靠集体的研究力量，不能与人相处和合作，再聪明也将一事无成，也不会拥有完整的人生。

王佛松爱散步，总有夫人相伴；爱唱歌，只是没尝试过年轻人时髦的卡拉 OK；喜欢玩玩电子游戏机，不过是为了锻炼已开始钝化的脑筋及手指……看着乐呵呵、和蔼可亲、朝气蓬勃的王佛松，你不得不相信，他对事业的追求是执著的，对生活的热爱是真挚的。

(1993 年 1 月)

国学大师王利器 方铭

王利器教授是四川江津县人，生于辛亥腊月。其取名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喻。及冠，向宗鲁先生赐字曰藏用，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语，欲“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也”。又见《抱朴子》语曰：“书为晓者傅”，遂以“晓傅”为号。

王先生家学渊源，祖父乃前清廪生，颇有多望。先生慧心独具，幼而好学，7岁后蒙入学，凡12年余，于经史子集，博闻而多识。其后，受获德国学博士的叔父敦促，投考江津中学，虽只懂国文一科，仍蒙备取。中学毕业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旋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先生不仅学业优秀，且兼义薄云天。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修业三年，成《吕氏春秋比义》200万言。又慨然回成都，护送英年早逝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宗鲁先生的灵柩回巴县，水路坎坷，屡经惊涛骇浪，先生未尝畏缩。研究生毕业后，先生出任川大文科研究所讲师，兼成华大学教授。1945年日寇投降后，改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952年先生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到1975年退休。

先生学而不厌，勤勉敬业，于青年时养成早晨读书，下午著述的习惯，数十年不曾更改。在北大任教时，除在中文系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校勘学》外，还任北大医学院、法学院国文教授。院系调整后，先生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曾主持出版了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戴明扬先生《嵇康集校注》，其间补正拾遗之功不少。

先生著述甚丰，著作等身。198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尝有《千万富翁王利器》一文，以先生著述逾千万故。自民国迄今，先生出版的研究著作凡20余种，论文百余篇。值得指出的是，先生著作的大部分酝酿于1957年蒙难之后，在庄子所谓“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的岁月里，一边参加劳动改造，一边潜心读书。先生的著作中，1957年前出版的只有《文心雕龙新书》、《历代笑话集》、《盐铁论校注》及《史记选注》等书。其他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历代笑话集续编》、《风俗通义校注》、《郑康成年谱》、《文镜秘府论校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盐铁论校注（增订本）》、《九〇集》、《耐雪堂集》、《晓傅书齐文史论集》等，都是近十年来由海内外出版社出版的，不久前，先生领衔主编的《史记注释》，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虽以百元高价，发行量仍达万余。先生尚有《吕氏春秋比义》、《宋会要辑稿补》、《道教大辞典》及其他一些已完成的书稿未付梓。

先生的学术影响令国内学术界瞩目。50年代，周扬既以先生为国学“大师”，特令北大副校长季羨林等请已调至北京政法学院的先生回北大执教。在国外汉学界，先生也是高山仰止的权威。先生曾两次赴香港中文大学授业，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报刊皆载文介绍。《文汇报》并用特大字体为题全文登载先生有关小说《水浒传》的讲演。日本弘法大师诞辰1150周年之际，日本国文部省曾特邀先生赴日讲学，惜先生因挤公共汽车摔伤了膝盖及牙齿，未能成行。伤愈后，京都大学文学部部长服部正明先

生受文部省委托，邀先生赴日，并遣日本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京都大学主任教授兴膳宏来京商洽出访事宜。先生访日月余，先后在东京、京都、大正、关西、九州、神户诸大学为汉学家解惑。京都大学还特意举办了先生著作展，其中有许多书籍是海外翻印先生的著作，先生也是第一次看到。

先生治学态度严谨，范围广阔，实事求是，在经史子集小说戏曲诸领域，皆有建树。先生对于后学，更是热情提携。3年前，为了作学位论文的缘故，我曾奉武汉大学吴林伯教授之命，邀一位颇有慧眼的壮族汉学家专程拜访先生，当时先生刚从日本归来，又兼患骨质增生，起居不便，但谈兴甚健，热情好客。近日，以弘扬华夏文化为己任的《中华英才》杂志社编辑部为表彰为国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学者，命我面谒先生。先生虽逾古稀，衣冠简朴，虽略显清瘦，但却步履矫健，精神矍铄，其骨质增生之疾，竟也奇迹般痊愈。从下午两点至五点，先生频频往来于书斋兼卧室与书斋兼客厅的两间斗室；对我提出的有关问题一一作答，海而不倦。临别之际，悄立阶前，挥手致意，谦谦儒雅，恂恂然一代大师风范。

先生不固不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他寄望后学勤奋学习，不受“深废浅售”的世俗干扰，为发展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先生说：“社会要进步，学术要发展，这是必然规律。”先生很高兴地看到毕竟有许多热爱中华文化的莘莘学子在刻苦耕耘，希望有关方面能给予实质性的鼓励，五千年文明便会持续发展下去。先生以自己的经历为例，现身说法，希望政府和学者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贡献，忧国忧民的古道心肠，确令我们感动。

(1991年8月)

在科学的王国里探索

——记王淦昌

刘敬智

王淦昌于1907年5月28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少年时他就酷爱算术，曾在竞赛中表现出惊人的机智和聪颖，深得老师赞赏。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高中的王淦昌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一天，他参加游行后，抱着一大捆传单沿途散发，被一个英国租界的印度巡捕抓住。可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个印度巡捕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同情心，把他放走了。就在这一年，他报考并被录取为清华首届本科生，一年后进了物理系，就读于我国著名实验物理学教授叶企孙门下。

在一堂普通物理课上，叶教授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在很短时间内作出了正确回答，引起了叶教授的注意。从此，叶教授经常对他进行个别传授和鼓励，激发了王淦昌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

1928年，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吴有训教授到清华物理系任教，很快也对王淦昌发生了兴趣。他特别注意到了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吴有训自己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培养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毕业并留校作了吴教授的助教。不久，他便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对清华园周围氧气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并写出了论文，得出有关北京上空大气的五点结论。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从师于德国柏林大学的迈特纳教授，他学习十分刻苦，在实验室常常工作到深夜。

1930年，他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一个云雾室着手研究当年玻特先生发现的一种贯穿射线，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1年查德威克教授正是采用了云雾室方法，证实这种贯穿射线乃是中性粒子流，这种粒子就是中子。1935年查德威克由于发现了中子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迈特纳教授曾遗憾地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

1933年，法西斯的阴云笼罩了德国，迈特纳（犹太人）教授被剥夺了教书权利，被迫逃往瑞典，这使王淦昌感到窒息和痛苦。1933年12月，他的论文通过了以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为主考人的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决定回国。当时，中华大地正遭受日本法西斯的蹂躏。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答：“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由于中国当时没有从事近代物理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国后便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在山东大学，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淦昌与浙大师生一起开始了迁移生活。这期间，不管多么艰苦，只要一停下来，王淦昌就支起黑板为学生讲课。在广西宜山时，他还自编了一门“军用物理”课，听课者意外地多。连他也想不到，为开这门课积累的知识，居然为他二十多年后研制祖国第一代核武器作了准备。

1940年浙大迁到了贵州遵义。一年以后，物理系（又称理学院）又迁到遵义附近的湄潭县，一呆就是7年。就在这7年中，浙大物理系由于她丰硕的学术成果，浓厚的学术空气，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这一时期，王淦昌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在这之前，人们在理论上已经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但是，由于中微子不带电，静止质量又等于零，因此难以从实验上确认中微子的存在。1941年10月，王淦昌经过反复思索，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提出了捕捉中微子的新方法。此文发表于美国的一份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阿伦按着王淦昌的建议进行了实验，终于用实验方法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抗战胜利后，浙大返回杭州。不久，由于吴有训的推荐，王淦昌获得了范旭东奖金，他是继侯德榜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人。同年9月，他又赴美进行合作研究。1949年1月回国。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邀请到中国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1951年任副所长。从1955年开始，王淦昌关于宇宙射线的研究成果陆续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中《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国际会议上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到1957年，王淦昌主持建立的落雪山宇宙射线观测站已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的事例，其中有些是稀有的。

1956年9月，王淦昌代表中国到设在莫斯科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后又兼任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1959年3月9日，王淦昌领导的物理小组，从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张反西格玛负超子事例的照片，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事例。它填补了粒子——反粒子的一个空白，使理论上关于反粒子的推测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60年12月，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所任期届满，返回了祖国。不久便接受新任务，参加研制我国第一枚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69年春，王淦昌任九院副院长，同时接受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任务。并于当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79年12月，72岁高龄的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近十年来，王淦昌关注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和激光约束核聚变的研究。正是在他和一批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我国三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和金山核电站投入施工建设。

1964年，王淦昌提出了用高功率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得到了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使我国激光约束核聚变的预研工作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1978年，在王淦昌的全力争取下，原子能所建立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组，并着手建立强流加速器。1984年，他又向国家科委提出，将受控核聚变能源的开发列为国家长远规划的重大项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80高龄的王淦昌在继续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奋斗。

(1990年3月)

王朝闻“夕不甘死”

赵建勋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是如果早晨听到了真理，晚上即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所以有一次周扬跟王朝闻开玩笑说：“朝闻夕死，你这个名字不吉利。”王朝闻朗声笑道：“马克思主义之道是永远闻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常生不死。”

王朝闻，原名王昭文，四川人。30年代去杭州考学，一同投考的还有一个四川人，也叫王昭文。为了避免很多误会和麻烦，需要其中一个改名字。那个王昭文说，我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坚决不能改。王朝闻说，我的名字也是我父亲起的，我也不能改。然而僵持下去究竟不是办法，最后王朝闻从孔老夫子的语录里取出两个同音字，使矛盾得到了解决。于是，现、当代中国的著名雕塑家、美学理论家便是王朝闻，而不是王昭文。

拨了半个上午的电话，总算问到了王朝闻家的电话号码。和我通话的是王的夫人。她向王老说明我的意思，王老说，现在就有时间，马上接受采访。我一看表，都10点半了：从府右街赶到红庙北里，少说也要40分钟，还有多少时间可供我们采访、拍照呢？

北平和平解放王朝闻就进了北京，40多年过去，他乡音无改，仍然操一口浓重的四川话。文如其人。王朝闻说话正像他的文章，自由洒脱，朴实明朗，充满辩证法。他说，很多老年人感到晚年寂寞，可是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恨不得长着两个脑袋，同时或交替着干两件事。人老了，行动迟缓，但感觉更加敏锐。王自称大器晚成。十几年来他已出版了120多万字的专著。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朝闻集》计16卷，“文革”前的著作只有4卷，其余12卷都是近十几年写成。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作，年复一年，从不懈怠。有一次住了一个月的医院，竟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自任总主编，组织70多位老、中、青年学者共同编写大型的14卷本《中国美术史》（国家重点科研计划），为认识和发展中国优良的美术传统，提供了具有应用科学性和历史经验性的读物。王朝闻刻了一枚图章：“夕不甘死”，坦露着一生求索、永不满足的精神境界。

说起刻图章，我想到王朝闻不仅是一位著名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提到雕塑，王老笑了，回忆起1940年毛泽东主席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观时对他讲，“你是搞泥菩萨的。”

“泥菩萨我没搞过”，王朝闻说，“倒是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做了一个大型毛主席头像浮雕。”他深情地谈起当时的情形。吊装时，最初没有对准中心线，雕像过于仰头，党校的学员们在下面大喊：“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弄准确了，大家才热烈地鼓起掌来。可惜这尊浮雕在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期间被破坏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王朝闻承担了制作封面毛主席像的任务。尽管已有在延安时代的基础和经验，王在正式投入创作之前还是遍访见过毛主席的人。经过苦苦构思，他决定在浮雕上突出毛泽东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特征。微蹙的眉头，稍稍抿起的嘴唇，表现出一代伟人独特的性格。

王朝闻具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还有《刘胡兰》（圆雕，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民兵》（圆雕，现存中国美术馆）等。他没有见过刘胡兰，刘胡

兰也没有留下来一张照片。他是凭着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崇高评价的理解，以一个农村姑娘为模特儿创作的。刘胡兰的母亲看过后连声说“好”，认为雕塑把胡兰子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了。

听王朝闻谈话正像读他的文章、欣赏他的雕塑作品，你不可能不被吸引和感染。不知不觉时针已指向下午1点。从王夫人的眼色上我们知道实在该离开了——王老还没吃饭呢！而王老谈兴正浓，看样子他并不希望就此结束。看着他挥动手臂朗朗而谈，你不会相信他已是82岁的耄耋老者。

他又谈到改行。一个雕塑艺术家改行专门从事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是王朝闻始料不及的。1941年，为了批评当时宣传画里的公式化，他发表短论《再艺术些》，是他业余写作的处女作。到了1949年，他在中央美院任教，同时担任副教务长，写作仍然是业余的。由于白天忙于份内的工作，写作只得牺牲睡眠时间。如今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作，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不到1年，王朝闻就应新华书店之约，交出一部论文结集《新艺术创作论》。从此客观上越来越促使他逐渐向理论研究方面靠拢，终于完成了由前一专业向后一专业的转化。

他说，这转化既是无意的又是有所准备的。所谓有所准备，就是他在认真向生活学习的同时，不仅反复学习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反复研究过《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孙子》等哲学、军事著作，以及各种传统的画论、文论、词论、诗论。他尤其喜欢毛泽东军事著作，认为其中充满辩证法，能够给人许多启示。

最后，这位老共产党员希望通过《中华英才》告诉青年朋友：不论从事哪一行当的工作，必须尽可能从各方面充实自己，避免没有后劲的所谓“一锤子买卖”。任何人的成功与失败都难免有客观原因，但主要在于个人是否努力。

(1991年10月)

古元以木刻留下时代的痕迹

李虹

步入古元的画室，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宁静、丰富而又古朴的艺术世界。就在这极具魅力的天地里，一向少言寡语的古元全神贯注地用他手中锐利的刻刀和色彩丰富的画笔，创造了一幅幅充满激情、质朴优美的版画和水彩画。他的《瑞雪初晴》、《严冬已过》、《冉冉秋声》等，都是意境清新淡雅，笔法严谨流畅的抒情杰作。

谈起作品的抒情格调，古元淡淡笑着说：“这与我生长的家乡有关。”

曾经孕育了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广东省中山县，以其蔚蓝的大海、碧绿的果树、金色的稻谷、秀丽的山峦也同样孕育了一位后来享誉中外的大艺术家、原中央美院院长古元。

古元对故乡有着绵绵不尽的眷恋之情，他自说：“我从小就喜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喜欢到野外让清新的风吹在脸上，听小鸟在树林里歌唱，看鱼儿在池塘里追逐嬉戏。”

还在上中学时古元就读了丰子恺翻译的《西洋名画巡礼》，但他没有追逐印象主义和野兽派、立体派等的足迹，而是以他独特个性认识了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拾穗》、《扶助者》、《晚钟》中农村恬静优美的田园生活，令他感到十分亲切。

多少年来基于这种情调，无论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东北土改，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古元都始终没有改变再现大自然美好的抒情格调。

然而、对于现已满头银发的古元来说，他心中最思念的地方，还得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延安的碾庄。

回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他说：“碾庄，是培育我艺术生命的摇篮。”

如果说大自然给予他的是诗情画意，那么这个小得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贫瘠落后的碾庄，给予他的则是真诚、朴实和温情。

1940年6月，21岁的古元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到群众中去的号召，他来到距延安90里的川口区碾庄村。在那里，他学会了耕地、锄草、收割、放羊、起圈、赶车……并且创作出一大批堪称中国近代美术史的里程碑的优秀作品——《牛群》、《家园》、《锄草》、《逃亡地主又回来》等等，这些精彩的作品，留给人们的不只是艺术的享受，还有历史的思考。这令艺术大师徐悲鸿极为震惊，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在老乡的土窑洞里，古元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体验了来自朴素情怀的心声，体验了苍凉和悲哀后的灵魂震撼。

于是，古元将智慧的目光、独特的艺术构思，赋予了手中的刻刀以新的灵魂和生命。

1956年《祥林嫂》的问世，是古元在艺术创造中又一突破。画面上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两只痴呆的眼睛和那张麻木的脸，以及手拄讨饭棍的手，把旧中国妇女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与古元度过金婚之年的老伴蒋玉衡告诉我，她很喜欢这幅作品，因为古元将祥林嫂极其不幸的一生以及鲁迅先生所要挖掘的社会背景表现得很充分。

但是，在采访中，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古元对骆驼的理解。

早在延安时期，古元就被骆驼那独特的形象和有节奏的步伐深深吸引住了。在骆驼身上，他感悟到了一种献身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因此，骆驼的形象也就经常出现在古元的画面上：有描绘骆驼在烈日下行进的水彩画《风尘仆仆》，有黑云压顶、飞沙走石的水彩画《大漠飞沙》。而《骆驼赞》则是其中一幅极具表现力的木刻作品，构图饱满、黑白对比强烈、形象鲜明、刀法粗犷，上面还有一段文字：“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

古元的体会是：“美术作品往往是借景抒情的，画家的创作是有感而发的，我为骆驼画像，是赞美坚强的精神，以此自勉。”

生活中的古元老老实实做人，这已经传遍美术界。

50年代初期，毛主席在紧张工作之余，参观了一些准备出国展览的美术作品。当看到古元的木刻作品时，他停住了，转过身问陪同的周扬：“古元是个老实人，现在进城后还老实吗？”周扬回答说“是”。毛主席接着说：“好，做人应该老老实实。”

说来倒也奇怪，喜欢旅游的古元，却很少游历名山大川和风景胜地。这些常常被一些艺术家所描绘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画面之中。作为一个画家，他常常为一些平凡小事而欣喜若狂、流连忘返。他的感觉颇像诗人、音乐家。

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古元对于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求，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把我经历的时代，尽可能在我的木刻上留下一些痕迹。”据悉，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古元将在中国美术馆和深圳分别举办个人作品展览。

(1992年5月)

诗坛泰斗艾青 顾天雯

1933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看守所里，一位瘦瘦的、梳着长发的青年望着窗外，思绪也如雪花般纷飞，他心潮澎湃，不能自己地写下了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从此，诗人艾青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如今，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艾青已经80岁了。

当我穿过青砖铺地的整洁的小院跨进艾青的住宅，我看到一位高大的老人坐在书桌前的扶手椅上，正沉思着，看到我来，他慢慢地走了出来。

艾青一个多月前刚从医院出来。今年春天，他在应邀参加一次文艺界会议时，不慎摔倒在地，导致右臂肱骨粉碎性骨折，后来从香港购了合金钢肱骨假体换上，艾青以极大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苦，他称自己是“八十换骨人”。现在艾青已能勉强写字，但肩头长长的刀痕尚未消褪，金属的骨头还不能和血肉之躯完全协调，所以手臂稍一抬高就剧痛难忍。但艾青的话语却依然那么幽默：“我一辈子都在右边出问题。”——他右眼失明，右腿曾被镰刀割破，还被打成“右派”。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小山村。他少年时喜欢美术，19岁远渡重洋，赴法国巴黎学习绘画。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这位青年带着“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在一次活动中被捕。监狱生活的限制使这位美术青年走上了诗歌的道路。

艾青说：“我写诗是因为我痛苦，我必须喊出来。”是的，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殖民地的耻辱、封建制度的罪恶，各阶层人民的不幸，撞击着诗人的心，促使他拿起笔来，他写大堰河，写道旁的乞丐、补衣妇，写那负载了北国人民的悲哀的手推车，他满怀同情和悲哀，他的诗沉痛而愤郁。他希望他的诗能够给被寒冷封锁的土地带去一些温暖，给被奴役、被剥夺的人们送去一份慰藉。这一时期他的诗大多收在诗集《大堰河》和《北方》中。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诗人。抗日战争使艾青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睹八方烽火、万民流离，他深信人民能够用鲜血来洗却自己身上的不幸和耻辱，深信祖国能够像凤凰涅槃那样在民族战争中得到新生。映衬着鲜血与硝烟，他写下了《复活的土地》、《吹号者》等激越高亢的诗篇。这些诗在抗战中广为流传。许许多多青年怀揣着艾青的诗走向延安，而诗人自己也在1941年由周恩来介绍来到了延安，成了人民队伍中的一名“吹号者”。

艾青毕生追求光明。他讴歌光明，礼赞太阳，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他以“燃烧着痛苦的嘴问向东方：‘黎明怎不到来？’”在延安，他写下了《给太阳》、《黎明的通知》等诗，宣告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解放后，他写下了许多清新愉快的短诗，诗中闪现出仿佛被阳光照彻全身后透明的天真和欢欣。

1957年，正当诗人满怀欣喜地为新中国歌唱时，厄运却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他的歌声被阻遏了20年，这20年，他得到王震将军的保护，先后在北大荒和新疆生活。正像他的夫人高瑛在一首诗里写的：“北大荒的严寒，袭击过你；大戈壁的黄沙，抽打过你。你有你的性格，你有你的脾气，时间的刀斧，也无法把你弯曲。”高瑛，这个1957年时才20多岁

的姑娘，在一次要求她和艾青划清界限的大会上，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退出共青团，从那以后，和艾青风雨同舟生活了 30 多年。她说，即使在新疆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艾青仍对孩子们说：“比如你们生在这里，难道就不爱这个地方了吗？”——仍然是那个“对土地爱得那么深沉”的艾青呵！

当我问及艾老他最喜欢哪首诗时，他说：《光的赞歌》。这是他在历经 20 年苦难后的力作，诗里没有丝毫失望和颓丧的阴影，有的只是对光明更热烈的向往，更坚定的信念，苦难使诗人更多了一份理性的深刻。

艾青说过：“生命是一种燃烧”，其实创作也是一种燃烧，诗人将他的生命完全倾注在诗歌中了。交谈中，艾老几次感叹道：“写诗太难了！”这位蜚声中外的著名诗人此刻平静地坐在我对面，尽管他行动迟缓，腰板却依旧挺得笔直，宽宽的脸上写着坦诚和老人的天真。他已经历尽人世劫波，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了一辈子，但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歌唱黎明的诗人一生都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凌晨 3 点左右起床开始写作，即使现在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写作了，他仍然四五点就起来，坐在桌前，等待光明的降临。

艾青杰出的诗歌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荣誉。许多人写信来感谢他的诗给了他们希望和勇气；他还曾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诗集。而对这一切，艾老说：“我很惭愧。”

结束采访时，已是黄昏，胡同里走过许多下班的人们，我多么想拦住那杂沓的脚步，大声告诉他们：“你们知不知道，艾青就住在你们中间？”

(1990 年 11 月)

第一个走遍神州的农学家卢良恕 段佳

初访卢良恕教授，是1992年6月下旬。那几天，他是报纸上、电视里的热点人物。作为大陆首批访台学术交流的科学家，刚刚从宝岛归来的卢良恕，日程表上已经没有空白。我还是费力挤占了1小时。

在卢良恕宽宽的办公室宽宽的书桌旁，我匆匆说过已掌握的材料，急着表明来意：想要听听您访台过程的内幕新闻。

卢良恕稳稳地坐在桌子后面，目光炯炯有神，雪白的衬衣一尘不染。智者的敏锐，老者的宽厚，从他仔细聆听的神态中传达给我。他抬手理了理一丝不乱的满头银发，开口对我说的头一句话竟是：“你很守时，采访准备挺充分。”

当我握着卢良恕宽大的手告别时，他对农业溢于言表的钟情，对问题滴水不漏的回答，对时间与众不同的看重，都引起我强烈的再访欲望，我想深访这位被台湾报刊称为“大陆农学泰斗”的卢良恕！

从台湾到西藏——卢良恕成为我国第一个走遍 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学家

“卢教授从西藏回来了。”从台湾归来不足1个月，卢老又行色匆匆去了西藏。按事先约定，卢良恕的秘书顾晓君及时向我通报情况。

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中国农科院卢良恕的家里再次采访他。

缺氧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似乎并没有在68岁的卢良恕脸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满面的红光，舒心的微笑，让人深深地感到了卢良恕的兴奋和欣慰。他终于在1992年完成夙愿，走遍中国版图上的31个省、市、自治区。这对于一辈子研究农业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和重要！

递到我手上的，是一份报送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西藏—两江考察报告》。这是卢良恕率专家组赴藏—两江考察的结果，稿成于1992年8月1日拉萨。

蓝天白云下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是西藏农业的血脉与摇篮，这一两江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也培育了灿烂的藏族文化。千百年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部依傍着这一两江河得以繁荣。国家把西藏—两江综合开发列为“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以农牧业为主体的区域性综合开发，以此推动—两江地区，进而带动全自治区经济发展。卢良恕一行6人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邀请，于7月18日抵藏，进行了为期15天的考察。

还未进藏，考察组的每个成员先要吃透一叠厚厚的材料，并随之分到一个考察的主攻重点。从拉萨东郊的养鸡场，日喀则地区的草原站到贡嘎县万亩低产田改造工地，泽当郊区农民家里，十多天马不停蹄地奔忙，除了抵御高山反应的种种症状，还得不断开动脑筋，完成任务。

其实，最不轻松的是卢良恕，他除了承担与别人一样的负荷，还得阅读考察地区的全部材料，把握考察大方向，再针对组里每个成员的专长和能力，布置他们考察的任务。田间、地头、水库、工地，卢老总是一双轻便的旅游鞋，蹬蹬蹬地走在队伍中间。

一边走一边与自治区政府龚达希副主席、—两江开发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加保主任交换意见，每到一地，便与当地领导、技术干部广泛座谈讨论，考察结束的第二天，考察报告也写出来了。自治区的领导握着卢良恕的手久久不放，一谢再谢，只希望能多留他们几天，多得几条开发西藏的锦囊妙计。

从上海到成都——青年卢良恕怀着赤子之心， 立志要用科学改变中国

卢良恕选择农业作为一生的事业，与学工业的外祖父胡仁源有密切的关系。

1924年11月，卢良恕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的人家。父亲留学美国，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虽然父亲早逝，但从事财会工作的母亲仍以自己辛勤的劳作，使良恕、良惠两兄弟受到良好教育，让他们学有所长。留学英国、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外祖父胡仁源，对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卢良恕有很深的影响。

卢良恕的中学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外祖父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经长沙、桂林抵达贵阳。卢良恕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立志要“科学救国”。在贵阳清华中学毕业后，他与家人商讨上大学读哪个专业的问题。外祖父认为国家的兴旺，不仅要靠发达的工业，更要有发达的农业，因此他主张，良恕和良惠两兄弟，一个攻读农业，一个攻读工业。这正好与卢良恕“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一拍即合，一生的道路也由此选定。

1943年至1947年，卢良恕在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深造，不仅成绩优异，也是体育上的活跃分子，网球、乒乓球、游泳，什么项目他都不弱。当时的系主任、著名玉米专家吴绍骥非常赏识这位聪慧踏实、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卢良恕一毕业，吴即力荐他到前中央农业实验所麦作系从事小麦研究工作。他又回到了南京。

在南京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卢良恕和大他几岁的蒋彦士成了同事。1919年，蒋彦士去了台湾，并成为台湾著名的农业专家，现在是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回忆当年，卢良恕感叹道：“当时相处，他是我的老师辈，但两人都是风华正茂，这次赴台作农业交流，再见蒋彦士学长，两人都是白发苍苍了。”

“您当时为什么没一起去台湾呢？”我总觉得，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一定埋藏着神秘的故事。

卢良恕淡淡地笑了，他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们种在地里的小麦带不走。我还保管着几千份小麦资料。”

其实，卢老带不走的又何止小麦呢？

从江苏到北京——卢良恕努力革新中国大地上 古老而沉重的农业

或许，变革的时代造就了卢良恕。所以，卢良恕一辈子都在革新，用新思想、新方法变革古老而沉重的农业。

1953年，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粮作系任助理研究员的卢良恕，受派带领一个多专业结合的小麦工作组，深入安徽省淮北地区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淮北地区，虽然土地和庄稼人已给松了绑，但农业生产条件极差，抗灾能力薄弱，“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小麦亩产只有几十斤，种粮食的农民还是食不裹腹。

1953年4月12日，早起的农民们在开门的刹那间都愣住了，田里的麦

苗全罩上了一层重重的春霜。此时的小麦正在孕穗阶段，这一场春霜，冻掉的是农民整整一年的口粮。果然几天之后，受冻麦苗一片枯焦，有人认为既然麦苗几乎已经冻死，不如翻耕重种春播作物。卢良恕琢磨的却是革新，用新的思维和方法挽救麦苗。他带领工作组的同志泡在地头，一棵麦苗一棵麦苗地仔细查看，发现冻死后的麦苗基部分蘖不久又重新出现新芽了。他们运用阶段发育的观点进行了新的分析，认为这些麦苗仍有抽穗结实的可能。工作组向地委领导建议：受冻麦苗不要翻耕，必须加强追肥、浇水管理。当地领导接受了建议。果然冻麦获得了一定的收成，解决了灾年当地群众的大部分口粮。

说起这次农村蹲点，卢良恕至今仍感受颇深，他觉得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次飞跃，不仅为他后来的小麦科研工作，也为他负责农业科研管理和宏观农业的战略研究工作，奠定了广泛而良好的基础。

1982年，卢良恕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当时的中国农业，正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得以长足进步。就在这一年，他的事业和研究又有了一次飞跃，在农业宏观战略研究方面，他开始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主持了中央12个部委9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中国农科院20个专业研究所共200多人参加了《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的工作。他们采用客观系统的分析方法，对横向13个专题，纵向28种作物及分区定位进行了系统研究。该项成果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8月，卢良恕参加了由中央领导主持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新趋势及其对策”的科学家座谈会，并代表农业科学家发言。他认为，十几年的改革，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当前恢复粮食的商品属性，调整人们的食品结构，已成为新的趋势，必须针对这一国情研究改革的对策。他从宏观角度提出：应重点加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食物结构调整、食物开发的研究。他发言中的意见，特别是从“传统粮食观念转变为现代食物观念”，“种植业必须从粮食、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转向粮、经、饲料的三元结构”，以及“在种好十五亿亩耕地的同时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和走“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之路等，很快得到决策圈的重视，并先后被有关部门采纳。

从40年代到90年代——卢良恕变化的是头上

有了白发，不变的是爱情

卢良恕与土地、庄稼打交道，已整整50个年头了。卢良恕说，他从未离开过心爱的农业。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似乎也比别人幸运，许多人被迫离开了专业，而他下放“五七干校”，仍然是务农。

卢良恕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健康的身体也归功于从没离开过专业。他认为，常年与小伙子们一起外出考察工作，总在田间走，不仅做了工作，而且也锻炼了身体，同时也是最大的生活享受！

桌上电话铃响了。卢良恕对着电话报告他最近的行踪，一口气说了半个月，一天不拉，一句不乱。我想起秘书顾晓君的介绍，记忆力惊人卢良恕的一大特点。顾晓君说，刚开始给卢良恕当秘书的时候，自恃年轻，记忆力好，没过几天就发现，比起卢良恕来，实在是小菜一碟。卢良恕不仅记人记事过目不忘，就连枯燥单调的农业数据，他也总是记得准确无误。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里，卢良恕已经第五次起身，穿过过道，到书房

为我取材料去了。我有些不忍，深怕卢良恕太受累。打量眼前简朴的客厅，普通人家有的沙发，普通人家有的电视，普通的书桌和茶几，屋里的所有，没有一件可以表明主人是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重要身份。卢良恕每次都很快取来材料，与我想要的分毫不差，想必他的书籍资料都整理得有条不紊，探手可取。

告别卢良恕出门时，房门的吱扭声非常刺耳，显然是缺油了。一旁的顾晓君张罗着给门上油，我这才知道，卢良恕的三个儿子都没在身边。

我好奇地向顾晓君打听，事事寻求革新的卢良恕，家具为何也不革新一下呢？顾晓君乐了：“你还没看见卢院长用了近40年的床呢！”据说，卢良恕结婚时用的棕绳床，一直跟随着他们夫妇，他们都忙，没有时间处理家务，所以他们夫妇一直没把它换掉，直到去年才下决心把它更新。连知识分子最看重的书架，在卢良恕家也没有统一的规格。大小不等，高低有别，颜色各异的书架，在卢良恕的书房里楞摆了一面墙。卢良恕的理论是只要取放书籍方便就很好。

顾晓君告诉我，卢良恕最钟爱的，还是他的实验室——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他的实验室里泡着。很快，他又要去云南考察。

在卢良恕的行色匆匆中，我的两次访问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我打从心里想再三访卢良恕，找想去看他新换的床，看他七高八低的书架，还想去拜访伴随卢良恕走过40年人生旅途的夫人尹雪莉，她一定会告诉我她对卢良恕钟情农业一生的感受和评说。

(1993 年 1 月)

号称“大百科全书”的文物专家史树青 阿遥

知道史树青先生名字的人，准听到过对他的这样两句评价：他是位“杂家”，他非常热情。

这正是对他恰切的评价——学问与人品。

史先生的“正业”，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鉴定研究文物的专家。同时，他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馆和炎黄艺术馆顾问、北京书画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这么些个兼职，史先生却不仅仅是挂个头衔，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副业”对于他来说，依然是“正业”。

文物这个领域，学问浩如烟海，能成为名家，要花费多年心血，有人甚至毕生难成。史先生的知识和研究范围，不局限在一项两项，历史、考古、博物馆学功力皆深，书画、石刻、碑帖、青铜、陶瓷、版本、目录、金石杂器、民族文物、宗教文物、诗词歌赋均有涉猎，人称有如一部“大百科全书”。

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博工作，鉴定过的文物超过 100 万件，在史先生的经历中，很有些不平凡的故事。

少年名家

史树青先生，1922 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不仅经营着数家买卖，还有收藏书画古玩的雅好，可谓亦商亦文。史先生从小就伴着父亲谈书论画，还常随父亲出入于琉璃厂古玩店、旧书店。环境的耳濡目染加上他的聪颖好学，他小小年纪就掌握了不少书画知识，对古代文物入了迷。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的。学校与他从小迷恋的琉璃厂仅咫尺之遥，更给他提供了大量增长知识的机会。他常常到古董店看字画，去海王邨旧书店买旧书，还刻了一枚印章：“未冠读书海王邨”。古代礼制，男子 20 岁行冠礼，“未冠”就是不到 20 岁的时候，看来这段生活的确给史先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他的爱好与鉴定的本领，在学校里渐渐出了名，老师们常常对他大加称赞。他的老师张鸿来、孙照等先生，都是很有学问的学者，同样有书画爱好。一次，有人托张鸿来先生鉴定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几位老师在一起品评，都说是赝品，张先生说：“还是让我的学生看看吧。”于是把史树青叫到宿舍。史树青看过那幅画，说：“是真的。”教师们大为疑惑。后来，画拿给琉璃厂的专家鉴定，果然是郑板桥的真迹。从此，史树青鉴定书画一鸣惊人。老师们若有朋友来鉴定或购买书画，就常请史树青协助。1941 年，他高中毕业时，请老师们在纪念册上题字，张鸿来先生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纵同为奕犹贤已，莫误含英与咀华。”那一年，他才 19 岁。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师从古典目录学家余嘉锡、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史学家陈垣诸先生，还兼修美术系启功、溥雪斋等先生的课程。从上高中时起，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北海团城的国学书院应月课，每月交两篇文章两首诗的试卷。书院还在每周开课，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史、

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是学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大儿小儿”

大学毕业后，史先生又在本校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47年，由余嘉锡先生介绍，进入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业务骨干。40多年来，他以渊博的学识，为国家发现和保护了大量珍贵文物，而他的学识，竟又给他引来飞灾横祸。

这种事当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年头。

事情源起于1958年，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民主斗士，周恩来总理指示，应将柳亚子的书稿、遗物作为革命文物收藏。柳氏家属于是无条件地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了整整两卡车的物品。后来，博物馆在清点造册时，发现了两匣印章，有100多枚。保管人员请史先生为印文的篆字注释。其中遇到这样两枚印章，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称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另一枚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保管人员对印文含义大惑不解，以为用这样的词加之于领袖是大不敬。而史先生对大家说：“话出有典，未必是不恭之辞。”印章就登记入藏了。

其实，前一枚印中的你正平，就是三国时赤身击鼓骂曹的祢衡，他性格傲岸，没有媚骨。王尔德，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文学家，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莎乐美》等，就是他的作品。柳亚子把自己比作这两个人，是自我欣赏，含浪漫文人的积习。而那“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祢衡认为曹魏政权中只有孔、杨二人值得钦佩，其他人都不值一提。此处的“儿”，是男儿、男子汉的意思，同现代汉语的“健儿”一样，是美称。柳亚子的这方印文，用他诗人的热情与洒脱、大大称颂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二枚更流露出对这两位领袖人物的感情，柳亚子年龄比斯大林小，比毛泽东大，于是说他像对兄长一样看待斯大林，像对小弟一样善待毛泽东。

不料，“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揭发：柳亚子的两方图章有问题，史树青说印文是好意。事情报到了康生那里。这个号称热爱金石书画而掠夺了大量文物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挥笔批示：“反动之极，二印立即销毁，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博物馆收藏反革命文物，有关人员必须追查。”康生的批示一下达，博物馆又揪出了五六个人，首当其冲的史先生被关进了牛棚，被一再批斗，屡次抄家，他珍藏的字画、宋版书和家中的财产，遭到了肆虐的洗劫。这场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到澄清。

藏而不私

尽管曾经遭到不白之冤，尽管在“文革”中史家的藏书丢失许多，剩下的按7分钱1公斤卖掉30多元，劫余的书画5角钱一幅被文物店大批“收购”，史先生对文博事业的爱仍然矢志不移，因为这爱是由衷的。

史家曾经有过些旧藏，自从史先生成为国家的一名文博工作者后，家中的文物也改变了私藏的性质。

1959年，社会上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海瑞为官清廉，打击贪官污吏，应该学习海瑞精神，一时间掀起了一股海瑞热。当时刚刚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布置通史陈列，专家们认为，陈列应体现宣传、学习海瑞的

新精神。经讨论，这部分陈列定名为“海瑞揭发了明代的黑暗统治”。陈列需要展品，馆里开始了征集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史先生，率先捐献出家藏的一幅海瑞墨迹条幅，为展览提供了急需的文物。当时馆领导曾兴奋他说：“应当奖给史树青五百元奖金！”而史先生却分文未取。

到了1965年，风云突变，为反彭德怀，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历史博物馆歌颂海瑞的陈列成了配合《海瑞罢官》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无私地捐献了文物的史先生，被说成为彭德怀歌功颂德，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三家村”的帮凶。他被株连进了这起大冤案，屡遭批斗。

学者爱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小逛琉璃厂的史先生当然不例外。踏进他老宅的居室，首先看到的是满眼的书，觉得史先生似乎是睡在书上的。他后院的竹影书屋：更堆得像书库一样，只见书影，不见竹影。史先生则一边叨念着“用书都不好找”，一边侧身挤到最里边的书柜前，很神奇地三翻两翻就找到了他要用的两本线装的元曲，大概人与书早已心有灵犀了吧。

史先生的书，也不是为藏而藏的，它们对史先生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也为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解决了大量问题。他刚刚找出的那两本元曲，就是准备给别人检寻一首小令用的。前些年，史先生的老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为感谢他的借书热情，特意寄来一信，信中没有写字，而在纸上画了一块本匾，上书“有求必应”四个字，是给史先生挂匾呢！史先生高兴之余，幽默他说：“汝昌不是画家，我看这块横匾确是他唯一的绘画真迹！”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开玩笑都是满口术语。

海南识宝

今年9月，“’93中国文物精华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全国各地的100余件文物精品参加了展览。其中来自海南省的一枚汉代银印，就是史先生慧眼识宝发现的。

1985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在海南岛组织文物普查，史先生作为专家应邀参加。当普查组在乐东县鉴定文物的时候，史先生在一匣印章中发现了这枚蛇钮银印。印章形制古拙，具有汉印风格；翻过来一看印文，“朱庐执刼”四个篆字一下子叫史先生兴奋起来。他告诉大家，“朱庐”是西汉海南的郡名，“执刼”是官爵名称，这枚印说明了西汉皇帝为海南岛的少数民族首领封了爵，这在以前从未发现过，经询问得知，印是乐东县一位黎族农民种植橡胶树时挖出来的，当即交给了县文化馆，受到了奖励。但若不是史先生识得印文，公开了它的价值，这枚“海南第一古印”则只有沉睡在天涯海角，不知何时显耀于人间了。

发现了“朱庐执刼”印，史先生又替它大作宣传，在《人民日报》上先刊登了详细的新闻报道，又在副刊上发表了考证文章。为古代遗存较少的海南发现了一件珍贵文物，史先生不仅自己高兴，而且要向更多的人展示它的重要价值。

(1993年11月)

新中国第一只“白天鹅”

——记白淑湘

胡志刚

1953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北京天桥剧场不时飘出阵阵悠扬的舞乐声，舞台上，一只纯洁可爱的“白天鹅”正翩翩起舞。她那娴熟的舞姿、优雅的动作、明快的节奏、楚楚动人的神态，不时博得坐在台下的周恩来总理和全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这里上演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诞生的第一个古典芭蕾舞名剧《天鹅湖》，而剧中那极为引人注目的白天鹅奥杰塔的扮演者，正是新中国第一只腾空飞起的“白天鹅”、当时芳龄18的白淑湘小姐。

33年后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笔者走进位于京城陶然亭一侧的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访问了这位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的白淑湘女士。

胖瘦适中的身段，满头乌黑的秀发，入时雅致的服饰，开朗洒脱的性格，这就是已走过51岁人生之旅的白女士留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数句寒暄过后，我们便自自在在地交谈起来。

白女士祖籍东北，生在湖南，长在北京。她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走上舞蹈生涯之路，却完全是出于她个人的爱好。

早在湖南读小学时，白淑湘就与同胞姐姐白淑妹双双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正是由于个人爱好和颇具天赋，不满12岁的白淑湘，顺利考取了当时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成了一名小演员。翌年（1953年），她荣幸地参加了贺龙元帅率领的第五届赴朝慰问团，同梅兰芳、马连良等艺术大师们一起，慰问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可爱的人”。

“真正学跳芭蕾舞，我是从1954年进入新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起步的。”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诞生，白淑湘进入该校学习。到1957年，她和她的舞伴们在老师和外国专家指导下正式排练新中国第一个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从这时起，白淑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芭蕾舞第一：

- 《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奥杰塔
- 《海侠》中的米多拉
- 《吉普赛》中的米尔达
- 《巴黎圣母院》中的古都拉
- 《泪泉》中的扎列玛
- 《西尔维亚》中的西尔维亚
- 《拿波里》中的女主角
- 《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
- 《沂蒙颂》中的英嫂
- 《草原儿女》中的母亲
- 《杜鹃山》中的柯湘

……

这些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不仅使海内外广大芭蕾舞爱好者大饱眼福，更为创建不久的中国芭蕾舞艺术殿堂增添了光彩。

“没有耕耘，何以收获”。白淑湘在艺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完全是她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结果。

“伏依得”（芭蕾术语），这一世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里规定的高难动作，是白淑湘扮演白天鹅奥杰塔与黑天鹅奥吉丽雅角色必闯的一道难关。该动作要求演员的一条“主力腿”以脚尖为圆心，在原地用脚尖脚掌起落，另一条“动力腿”离地甩动，带动身体作360度旋转，并且不是转三圈五圈，而是要连续旋转32圈，就是这个动作，不知使多少演员望而却步。

然而，白淑湘却知难而进。那时候，连晚上做梦她也在练“伏依得”。梦醒之后，她又悄悄跑进排练厅，在灯光下一圈接一圈地练起了“伏依得”。练了一阵儿，为增强效果她又搬来几把木椅围了个圆圈，自己站在中间练。可这下就苦了，只一会儿功夫，她的腿和脚就被周边椅子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钻心的疼……

就这样，这位姑娘终于征服了“伏依得”，不仅能从容地按要求旋转32圈，最多时还能连续转上60多圈。于是，扮演《天鹅湖》中的天鹅的主角非白淑湘莫属了，新中国芭蕾舞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舞星诞生了！

如果说闯过“伏依得”这道难关是白淑湘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第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外力迫使她脱功8年之后重返舞台，则是她超人意志创造出来的第二个奇迹。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脱功8年后，白淑湘回到芭蕾舞团时，身体除了落下多种疾病外，肌肉已变得僵硬，体重大大超重。按常规，国外的舞蹈演员，即使脱功一二年都难以恢复，而白淑湘面临的却是漫长的8年呀！

怎么办？难道就此告别日思梦想重返的舞台吗？不！白淑湘拿出自己的韧劲，练长跑，泡游泳池，节制饮食；上午练，下午练，晚上还练……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挤搏苦练，奇迹竟又一次出现了：随着体重由129斤急剧降到106斤，她的基本功也迅速恢复。不久，白淑湘便再展英姿，扮演吴琼花参加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全部演出。继之，古典芭蕾舞独舞《天鹅之死》和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又成了她献给观众的拿手好戏。从此，新中国第一只“白天鹅”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她又活跃在中华大地的芭蕾舞台上。她先后挑起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的重任。

白淑湘对艺术对事业的追求是执著的。白淑湘从艺30多年，付出的简直太多太大了。她直到33岁时才结婚，婚后又果断地下了为艺术不生孩子的决心。她说：“干事业总要有付出，有牺牲，我觉得为了艺术和事业做出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对您这个决心，您先生同意吗？”见笔者提出这个问题，白淑湘以一种幸福且感激的口吻答道：“是啊，按中国传统说法，叫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但值得骄傲的是，我先生也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子汉。他身为一名高科技工作者，对事业的追求同样是执著的。所以，当我向他提出自己的决心时，他非但没有埋怨和呕气，反而非常理解地完全支持我，因此，我特别感激我的先生，是他使我延长了几年舞台艺术生命……”

谈到今后的打算，白淑湘成竹在胸，满怀信心地接连谈出了三方面想法：将自己掌握的艺术和经验传授给年青演员，继续为发展祖国的芭蕾事业尽力；总结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寻找机会汲取新的知识营养，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头脑。

白淑湘，人们由衷地祝愿你的执著追求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1992年2月）

情到深处人孤独
——记冯骥才
姜苏鹏

初次见他，只觉得自己在缩小，脱口便称：“大冯”，1米92的大个儿，突兀在眼前，脚下的鞋足有47码，我惊讶他怎么会写出《三寸金莲》。

第二次见他是在天津他的家里，满屋的古董收藏，比传闻的还精彩，可印象最深刻的偏偏是一帧发黄的旧照，那是他的母亲，一个极美的女人，我猜想她一定会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只是他不肯讲。

我一直努力感觉真正的他，他爱调侃，爱讲笑，让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一经他嘴里说出，就特别的好玩，可一细品，却又透着一股人生难以言喻的无可奈何。也许因为51岁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给我真实的感觉像是人在秋风里，尽管采访时窗外是明媚的春光。

“我的第一个读者是上帝”

“文革”期间，他曾寂寞地写了十年。有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他“你的第一个读者是谁？”他说：“我的第一个读者是上帝。”因为他把写的东西全烧了，古往今来，很少有几个作家有这样的经历，一边写一边烧，但他却声称“我尝到了创作的自由。”还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自由，关键是心灵的自由，是不是作家都不重要。”他最欣赏哈姆雷特的一句名言：“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讲起写作的起因，要追述到1967年。有一天，他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从牛棚里放出后，来找他。看到朋友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心里犯堵，便在家门口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卷，俩人就开始抽闷烟。抽完了一包，什么活也没讲。于是他又买了一包，俩人又开始抽。抽到一半的时候，屋里已全是烟，彼此都看不清楚，这时朋友使劲一口气，呼地一下把眼前的烟全吹散，他两眼像红灯一样通红，说：“冯骥才，咱们这一代这些痛苦，这些事情，将来的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完了就完了，谁都不会知道！”说完朋友就走了。可他却一直在想着这句话。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开始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以及痛苦、希望、彷徨、迷惘都偷偷写在碎纸上。那个时候，这样干无异于玩火。写完之后，他挖空心思地藏砖底下、墙缝里、烟囱眼、棉被角，可是还怕藏不住，就开始烧，只把那些最重要最不忍烧的卷成一卷，用油纸包起来，搁在自行车的大梁管里。本以为从此天下无事，谁知没过几日，又怕自行车丢了。最后他终于想出一个法子，就是背故事，背完后，再把它烧了。十年烧掉的稿件大概有二三百万字，实在是可惜。我在想，焚稿的时候，他的两眼一定如他的朋友，像红灯一样通红。1976年唐山大地震，家里的房子全塌了。从房子里爬出来的他，在废墟里竟然清理出一大包文稿。当年藏得连自己都忘记了在什么地方，也够得上“出土文物”了。

粉碎“四人帮”后，离开画界走上文坛，对于他来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当生活把他肆意掠夺一番之后，于是把文学馈赠给他。而从1989年冬起，他又不著一字，重操画笔，竟一口气办了六次《冯骥才画展》，他说：“绘画和文学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往返，我把这种往返看作是一种甜蜜的往返。”

花非花雾非雾

他说：“我的接收系统有两个‘频道’，画画是彩色的，写作是黑白的。”他还说：“画非画，文非文，画同文，文亦画。”听起来有点儿玄。

他讲：“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大量的感觉是无意识的，随时随地的光和影，各式各样的形象在你眼前流动。经常感受到这些东西，它们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不定哪一天，这些东西凝聚成一个境界，凝成一个画面让你激动得要命，你特想把它画出来。可那时你在写作，但这画面你已逼真地看到了，从心里看到了，只是没有时间将它形之于纸。当你日复一日地写作的时候，有时你会觉得文字只是一种符号，甚至没有生命，没有感觉。这时你把一张纸铺上，颜色哗地一铺，你觉得何必搜肠刮肚地去描写呢，画中的一点一线，一块色调，一片水墨，都是语言，于是你将沉醉在绘画里。”

“遵从生命”，在他，文学是对于社会人生的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

无论是他的绘画还是他的写作，有一种感觉是同样的，那便是痛苦，内心的煎熬。他告诉我，最近他和吴冠中聊天，他非常欣赏吴冠中的一个观点，就是画绝不重复。吴冠中在画一张画之前，心里总怀着一种特别痛苦的感觉来找这张画，且一旦画成，不敢再看这张画，生怕一看不是原来的感觉。他说这种感觉他也有，写完一部作品，绝不敢看，生怕有哪句写得不精彩。他给我讲了一段亲身的体验。

有一次他在屋里进行哲理性的思辨，一会儿觉得思维一片迷迷茫茫，一会儿又觉得有一句话特清楚，这句话伸得很长很长，伸到一定时候又分叉，中间又中断，被另外的东西给遮挡过去。他觉得就是一片树枝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大脑空间里充满了思维的理性美，于是他就用一大片冬天的树枝来画各种各样的思维轨迹。这种感觉是稍纵即逝的，他不可能再为画一张画而重新思考一个哲学问题。

他似乎特别喜欢秋天，他的画，秋天的主题居多，讲起秋天的画意更是伤感。有一幅题为《往事》的画，画的是晚秋时节的芦苇花。那是有一天，他有一种莫名的忧郁，便独自一人在苇塘边钓鱼，水已经凉了，生命都在衰竭，大自然也开始偃旗息鼓，芦苇的叶子在风里摇曳，很是凄凉。而这时的芦花却长得特别的饱满，饱满得就像一大片棉花那样，它在风中自己无可奈何地脱落，轻轻地在空中飘舞，在逆光下它出奇地闪亮，仿佛是生命最后的辉煌。歌唱家张权和关牧村看了他这张画都感动地哭了。

他说：“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恋爱一样，是在痛苦中追求幸福。”

后开尘封已久的爱

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是音乐。有一天我一大早起来听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中间一段牧歌式的曲调，从远到近，由轻到重，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画面，一只被冰雪封冻的船搁浅在岸上，老远的春天的雪正在溶化，黑色的雪水一点点往船头逼近，就像音乐往里边逼的感觉。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幅画的构图，于是就顺着音乐开始作画，整整画到下午黄昏的时候，屋里的光线模糊不清，于是再听音乐，再看这幅画，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出现一个文学的感觉。”说到这里，他眼里一片柔光。他继续说：“当爱还没有成为一种爱，只是一种双方的感觉，这种感觉往爱方面冲，在要碰还没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双方一种最大的力量。是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境界。”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散文，他怎么也不肯说出散文的名

字，这或许是他心灵的秘密，因为他说过：“人有时需要心灵的隐私，因为隐私是你独享的生命的內容。”不知为什么他描述的这种感觉让人一下联想到他的《船歌》。

那篇散文写得很美，涂着一层淡淡的伤感，也写了一只船，横卧在荒漠的沙地上，一群孩子每天都去推这只船，终于有一天，大海涨潮了，把船从海滩托起带走，而这群孩子没喊没叫没欢呼，全部哭了，这情景让他记了30年，执著得如同信仰。文中写得最动情的是那个银柳一样的女孩，总爱用黑黑的眼睛专致地望着他，那眼好深。在他的面前，她总是把《少女的祈祷》弹乱，那时的他却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她是那样的纯净，他对她的感觉好像总停留在一个点上，红红的瓦，蓝蓝的天，一个穿粗蓝布背带裤的女孩，在费力地干着笨重的活儿。终于有一天已长大的她要永远离开他，丢下一句：“我，不能回头了。你信里没写的话，我全明白……”临行前送他一大束辉煌的银柳，留给他一片温情的迷茫。世事悠悠情未了，一笑只有问青天。这感觉似乎越来越遥远，但也许正是因为年代久了，才会有如此醇厚的味道。

谁解其中味

他说：“中国小说有一个很大特点，叫雅俗共赏，有人问雅俗怎么能共赏。这就跟桃一样，桃肉这部分是通俗的，谁都能吃，桃核里面还藏着桃仁，你只有敲开桃核才能吃，这是雅的部分。小说的故事情节一般人都能看懂，这是一般读者都能知道的。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哲理，这就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说‘谁解其中味’。”

他的文化系列的三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就是采用的这个形式。看起来好玩，内涵深厚。从1985年初，他开始进行历史反思，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上有很大的问题，国民的心理弱点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障碍。他的小说总是用一个东西来影射，让人自己去认识。第一部小说《神鞭》用无所不能的辫子作为影射，阐释国民心理的顽固性。第二部小说《三寸金莲》用中国妇女裹了1000年的小脚，谈中国人的自我束缚力，他把中国人的这种畸型变态美，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去体会这么可怕的东西，过去的中国人是如何把它变成美，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变态美，人们一旦建立了这种美的标准，就很难再否定自己，关键是它已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美国女孩到杭州看盆景，人们告诉她这是千年古柏，女孩看后‘哇’地就哭了，旁边的中国人不知怎么回事，就问她，她说：‘太痛苦了！中国人怎么把它弄得那么痛苦。’于是赶紧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很有讲究的，它要讲究虚实、高低、争让、繁简……讲着讲着，女孩也迷住了，一棵树怎么变成这么美，比原来随便乱长的美得多了。因为中国文化年头太久了，大有办法了，有着一整套的东西，你很难轻易地否定它。”他的小说一开始就说“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尤其在变革的时代，在放脚的时候，比缠脚还痛苦。第三部小说《阴阳八卦》写的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方面“怪圈”。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怪圈，她的怪圈表现在与西方人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认知世界是一个解析的方法，它把世界的过去和将来，已知和未知分得很清楚，因此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未知的将来，比较起来，中国文化有一个怪现象，她把过去和将来，已知和未知都搁在一块儿，她是把它们都包容起来，采取一种模糊的方法认知

世界，中国人讲气功、中医，似乎什么都知道。在文化上更是获得一种博大的、神秘的境界。”

写完中国文化这三个层次后，他将在今年的夏天写一部中西文化碰撞的小说《单筒望远镜》，写一个外国牧师的女儿和中国书生的恋爱故事，没有语言交流的、悲剧性的恋爱故事，很独特。这部小说完全不同上面三部小说的写法，形式很洋。

他的另一部书《100 个人的 10 年》，书中将如实的记录 100 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心灵史，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发表的部分作品遭受了冷遇，他感到悲哀。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他：“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这一代人写心灵史，你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做买卖去了？”读了这封信，他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到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我没有权利放弃这使命！”他说，他肯定要把这部作品写完，准备在 199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30 周年和粉碎“四人帮”20 周年的纪念日上全部发表。

大冯讲话时总在调侃，总在笑，但笑得其实并不轻松，很深的眼里读出的是很深的孤独。

(1993 年 6 月)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冰心 傅强年

去年仲秋，我来到北京西郊一座高等学府宿舍大楼内的高知楼，中国文坛巨匠冰心老人就住在这里。

客厅陈设简洁，朴素端重。向阳的书案上摆着一盆姿色动人的水仙花，一朵朵白瓣黄心的小花，浮在碧玉般的叶片上，悄悄地竞吐芬芳。

冰心老人安然地坐在沙发上。89岁高龄了，肤色依然白里透红，又高又阔的额头上刻着几条明显的皱纹，一双丹凤眼流露出慈爱和宽厚。

目前已足不出户的冰心，从敞开着窗的书屋里，看清了外面的世界。她说，这十年，文学繁荣了，女作家，年轻作家、从农村成长的作家多了。她希望作家们多写一些社会实况。冰心解释说，那就是“写美好的、也揭露不公平的现象。”

听说我是《中华英才》的记者，老人高兴他说：“中华英才多，要写写他们。不过，不可笔下生花，一定要写谁就是谁。”接着她向我们介绍了她的一些情况。

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冰心生于福建省福州，但童年却是在临海的烟台度过。

大海养育了冰心。海水、浪花、贝壳、海鸥……，陶冶了冰心的性灵与情感。“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翻开冰心早期的作品，常常亲切地写到大海，写日出。有人问她：“为何爱海？如何爱海？”她高兴地回答：“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的逐渐的爱起来的”

大海，融进了冰心的生命。她的一生，都与大海不可分割。即使是在她进入高龄，且又遭遇到乱世的时候，她也仍然爱着海：“当我优从中来，无可言语的时候，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起来，宁静了下去！”

她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长青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冰心毫不例外地走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罢课、游行、开会和街头宣传等革命活动，她呼吸到了新潮中的时代气息。

革命的激情在冰心的胸中燃烧了。她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长青之路。

1919年9月，她以“冰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小说用对比手法描绘两个家庭的不同生活方式，提示了为着事业改良家庭生活的必要。这是她第一次用“冰心”的笔名。为什么选择冰心作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觉得自己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读者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与谢婉莹有什么关系。此后，她以冰心的笔名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妹》等小说，深刻地揭示社会、家庭、妇女等社会问题，表现了冰心对封建势力和社会现状的不满。

徘徊中探索人生

1919年的冬天，19岁的冰心在一本杂志上偶然发现一个十分新鲜的名子

——泰戈尔，同时在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中读到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了哲理、又十分美妙的诗歌。当她读着泰戈尔那些关于太阳、月亮、星星、土地、大自然，特别是那些关于上帝、神、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等等富有哲理而又十分清新美妙的词句的时候，这位 19 岁姑娘的那颗敏感、善良的心里，充满了虔诚的感动。

泰戈尔的诗句和西方的宗教教徒信奉的《圣经》，都对着她歌唱上帝的爱、神的爱、大自然的受、人类的爱、不朽的爱；歌唱永生、死亡、幸福、受苦、沉默等等。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在上面生存的世界到底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年轻的冰心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她在 1921 年 10 月 1 日所写的散文《问答词》里是这样表露的：“我想什么是生命？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这一时期的冰心是烦躁的，做为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女性，她愿意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欢乐；但是，她看到的又多是令人失望的事情，这种失望的情绪，是当时那些有理想、肯思考的一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心绪。

1921 年初，冰心参加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她一如既往地继续发表文章，探索着人生与社会的诸问题以及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法。

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女子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 1926 年。当年，她返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在赴美留学，离开祖国亲人之际，她开始写寄小读者的通讯。后来集结成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深最广的儿童读物之一。后来，经历了抗日战争。再以后又到了日本。1949 年至 1951 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耕耘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了东京，冰心和丈夫吴文藻以及三个孩子，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着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冰心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1951 年，她回到了祖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她和吴文藻。

1953 年冰心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时，冰心已经是 50 多岁的人了。但是，她怀着一颗永不老的童心认真真地为孩子写作。

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冰心先后为孩子们写了《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这两组通讯。冰心这一时间所写的其它散文，不仅保持着她独特的艺术风格，更在富于时代气息的广阔背景上，展示了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呈现出明朗乐观的色调。1980 年，她创作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的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等 1980 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得了荣誉奖。

冰心是一位多产作家。1932 年所写的作品，大部收入分为诗集、散文集、小说集三集出版的《冰心全集》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开始出版 5 卷本《冰心文集》，1983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3 卷本《冰心选集》。冰心还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诗集、剧作和其他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1986 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3 卷本《冰心著译选集》。

冰心 80 年代散文是真情和真言的化身，她的人生道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

说是一个完美的典型。198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专门举办了冰心文学创作生涯70年展览。展示了冰心70年心血的结晶。

1949年以后，冰心曾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副主席等职。

她身兼多职，但仍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她真诚地对待人生，以言以行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对恼人的世态、不洁的风尚，她总是以锋利的笔委婉地道出，直率地抨击，进而大声呼喊。成千上万读者从她的作品中时时可以看到伟大的母爱和一颗童心。

(1989年4月)

风雨七十载 叶茂根弥壮

——记阳太阳

郭锡权

“人生70古来稀。”阳太阳先生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无论走路、谈话节奏感都是很快的。尤为可贵的是，阳先生老而弥坚，壮心不已，满怀激情，不断把佳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令我们赞叹和敬佩。

谈起阳先生自然要先谈他的画。阳先生在画坛耕耘了70个春秋，风霜剑月，辛勤耕耘，使他的画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阳先生思路广、功底深，无论是国画、油画、水彩画他都擅长，所作山水、人物、花鸟、静物手法多样，他融中西艺术精华为一体，新雅华润、气势磅礴、独树一帜，既有中国画的飘洒、神韵，又有西画的透视、骨脉。端木蕻良先生称他为“现代石涛”，蔡若虹先生则说他“已经走进了中国绘画传统中那种令人梦魂缭绕的‘写意’的兴府”。

或许是桂林甲天下的山水给他以灵秀之气，这个晚于清代大画家石涛200多年的“现代石涛”，6岁时已喜爱泼彩弄墨，10岁读私塾，正式学画，从此与书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青年时期，阳先生在上海与同仁创立了著名的“决澜社”画会，为追求新绘画新思潮，1935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大学艺术研究科研究各国绘画并积极创作，当年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不平凡的艺术才华。他的大型画《恋》入选日本世界性“二科美展”，与世界名家马蒂斯、德朗、鲁奥等人的作品同展，蜚声东洋，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抗战爆发后，阳先生毅然回国，以书画为武器，鼓舞人民抗战。此时他的画风发生了变化，从早期倾向西方现代流派转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当时的作品如《女战士》、《沙原上的船》、《磨刀的人》、《持枪的人》、《小号手》、《铁窗里的战士》等等，受到了进步人士的热情赞誉。正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他不是把自己锁在艺术的玲珑塔里，而是努力使自己的整个艺术跟随时代并为时代服务。他曾写道：“艺术的时代性与永久性不可分的，只要我们能代表时代，这作品就是时代性，也就是永久性。”“如果艺术脱离了生活，抹杀了人性，逃避了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仅会流入颓唐，还会变成有害的东西。”这是阳先生对于过去艺术道理的总结。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对从事美术的青年，就是对全体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也是很有启迪的。

我喜欢阳太阳先生的画，他的画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还是一种心灵的净化，他的画有一种蓬勃向上、催人奋进的艺术力量，使人倍感山河的美好，人生的活力，从而能激励观众的爱国热情。可惜的是他的许多早期作品在“文革”中流失了。现有作品《漓江木排》（水彩画、1953年作），可以说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他融中西绘画艺术为一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天空任鸟飞》（水彩画、1979年作），笔法洗练，境界开阔，简漫几笔，渲染出宏大的气势和深刻的寓意。《幽壑春雨》（中国画、1984年作），高山白云、小桥流水，布局巧妙，层次分明，浓淡相宜，画面一派生机盎然。其它如《漓江清远》、《月色》（国画）、《林间》、《沙原上的船》（油画）、《春的讯息》（水彩画）等等佳作，不胜枚举。阳先生是一位勤奋的艺术家。茅盾先生生前曾题词：“画家阳太阳，久居八桂乡，山水甲天下，

应研朱墨忙。”

阳先生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艺术教育家。从 1942 年任桂林美专教授，1943 年创办“初阳画院”起，他精心地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美术人才，曾历任华南文艺学院、广西艺专、中南美专、广州美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书画院等院长、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在阳先生的熏陶培养下，他的子女们也爱上了美术，成为专业和业余画家。1983 年《阳太阳家庭画展》在广州、桂林、南宁等地举行，展出了他同子女等人的 200 多幅作品，受到同仁、观众的赞誉。

我与阳先生相识甚晚，接触频多。1985 年中央委派我到广西任区党委常委、区党委组织部长，阳先生重视人才，举贤荐能，我也深有所感。在人物画方面卓有建树的中年画家刘字一，一幅《良宵》堪称传世之作，为我国的艺术宝库增添了珍品。当年阳先生为把这个难得的人才推向社会，使他的才华得以光大、益于民族，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他跑市里、跑区里、跑北京，心底无私，积极推荐。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积极作各方面的工作，终于使刘字一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阳先生对我在任职期间工作上的支持。有知识的人，才尊重知识，是人才，才能尊重人才。凡是工作搞得好的单位和部门一定有爱才、育才、惜才、荐才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位干部都将荐贤举能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一定会大大加快。

阳太阳，这位画家、书法家、诗人、艺术教育家，70 载的努力追求，半个世纪的无私奉献，都源于他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有深沉的爱。他是一棵长在漓江岸边的大榕树，岁月的风雨使他叶更茂、根弥壮。

(1990 年 9 月)

革命文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阳翰笙 傅 光 明

阳翰笙原姓欧阳，名本义，字继修，1902年11月7日生于四川高县罗场镇。6岁入塾读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而后迪他少年时期思想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在他家乡的传奇和保路运动风潮、武昌起义的烽火，这些可歌可泣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激荡。他从小爱看川戏，地方戏曲的熏陶，祖母、母亲给他讲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滋润他文学的稚芽萌发，对他日后走上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创作的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阳翰笙的中学时代，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他如饥似渴地读新书，接受新思想，而且把理论运用到社会活动的实际锻炼中。他参与组织学生联合会；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闹学潮，罢课，驱逐反动政客校长。后因遭军阀通缉，离开四川。在离川前，他找到早期共产主义革命领导人恽代英，同他一连畅谈了7个晚上，明白了只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改造社会。今天，他还无限深情他说：“恽代英是照耀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

阳翰笙到北京时，已错过各个学校的考期，便同几个四川同学跑到西山。《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使他心境拓开，对人生有了彻悟的认识。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陈毅主张他到上海大学去学对改革中国有用的革命道理——“陈毅的点拨坚定了我的志向。”他说。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许多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担任着该校的系主任和教师。在上海大学，阳翰笙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理，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并于1924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时，他接受恽代英、萧楚女的领导，在全国学联和工商学联合会工作，并作为学联代表，参加了五卅运动，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大潮。五卅运动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完全自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期间，阳翰笙在北伐军和南昌起义军中工作。他为自己能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党工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在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他（周恩来）那共产主义的胸怀，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谦虚朴素的美德，时时感染着我，鼓舞着我。我为一参加革命，就有这样一位党的领袖、革命的同志始终领导我，指导我，感到幸福。”

1930年，阳翰笙同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发起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了大量宣传革命和进步思想的报刊、书籍，同国民党残酷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期间，他还同田汉一起筹办了艺华电影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阳翰笙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这两个组织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团结广大的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

一致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阳翰笙既是一名革命者，又是一名文化战士。他热爱文学，在繁重的革命和行政领导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小说、电影剧本和话剧。他最早以华汉为笔名，写了许多小说：《暗夜》、《十姑的悲愁》、《寒梅》、《两个女性》、《复兴》及长篇《地泉》等；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北国江南》、《青年中国》、《八百壮士》以及与沈浮合写的《万家灯火》等，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1936年开始，阳翰笙专心致力于戏剧创作。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写下《前夜》、《李秀成之死》、《寒上风云》等，宣传团结抗日。以后又相继写了《草莽英雄》、《天国春秋》、《三人行》、《两面人》等。其中，《天国春秋》写于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是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的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酷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采取了这一历史的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的斗争武器。”《草莽英雄》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

阳翰笙的剧作大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战斗性。他的历史剧，深刻地赋予历史事件以重大的现实意义，让历史人物的言行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富有强烈的讽喻意义。

解放以后，阳翰笙主要从事文艺统战工作。他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书记。从第二届文联起，他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从第四届文联起，他担任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上。“文革”期间，他备受迫害，沉冤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了9个寒暑。

及至阳翰笙再度迎来生命的春天时，已是耄耋之年人苍老，两鬓染雪忆沧桑了。从70年代末，阳翰笙开始撰写回忆文章，后连缀结集出版成《风雨五十年》。这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出发点是，作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使一些混乱甚至错误的评估得到澄清。提到回忆录，阳翰笙目前手抖得厉害，一时还无法完成。但他表示，“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将继续写下去”。

阳翰笙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始终以总理为榜样，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革命工作为己任，时刻关心别人疾苦，而很少关心自己。

阳翰笙回顾自己的一生，总是说：“我能够在政治和文艺事业上多少做一些事情，不是仅靠个人的天赋，而是靠党的培养和历史的造就。”

(1991年10月)

雕塑永远的丰碑 ——记刘开渠 远乡

每当人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瞻仰巍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总要在那些象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程的浮雕周围流连，只要看到那些浮雕，就会想到为建设新中国而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想到为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雕塑家和能工巧匠们。在这些雕塑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名字，就是刘开渠。

七月流火。我们顶着骄阳，扣开了北京西单太仆寺街一座四合院的大门，拜访了 85 岁高龄的雕塑艺术大师刘开渠先生。

刘先生生于安徽淮北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0 年考进北京美术学校，毕业之后，为了生计，辗转于上海和南京，后得蔡元培先生之助，于 1928 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成为法国著名雕塑家朴含的学生。1933 年夏回国，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此后他一直从事雕塑创作和教学，曾创作了《孙中山铜像》、《无名英雄纪念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工农之家》、《鲁迅先生像》、《任弼时同志像》、《萧友梅像》等优秀雕塑作品，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在他的艺术生涯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刘开渠先生当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应我们的请求，他以无限的深情，向我们讲述了建碑的情况。

毛泽东主席为纪念碑奠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可是这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却来之不易。从 1840 年直到 1949 年这一百多年间，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筹备开国大典之际，党中央作出了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周恩来总理指出，建碑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1949 年 9 月 30 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刚刚结束，下午 6 时，毛泽东主席率领全体政协委员为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奠基礼由周总理主持仪式，毛主席挖下了第一铲，之后其他领导也挥锹铲土，广场上欢声雷动，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动工了。

“我们请来了一位副市长”

1953 年初，三封急电连续拍到杭州，借调刘开渠到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工作。接到电报，刘开渠急忙将自己所担任的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和杭州市副市长的工作做了交待，匆匆赶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彭真在介绍刘开渠时，风趣他说：“我们请来了一位副市长。”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郑振铎，负责建筑设计的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组组长为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刘开渠则担任了纪念碑的全部美术工作。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纪念碑，正面碑心石上镌刻毛泽东主席题字，碑身后面镌刻周恩来总理书写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书法功力很好的周总理，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好碑文，又亲自送到工

地上，并谦虚地说：“不行再重写。”

全身心投入纪念碑浮雕创作

英雄纪念碑浮雕是建国后首次由许多位雕塑家共同创作的大型史诗性艺术品，不仅要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英雄的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抗、斗争史。题材的选择既要有高度概括性，又要具体真实。最后，经中央审定，浮雕选择了这百余年斗争中的八个重大历史题材：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全国等。

为了学习、继承中国古典雕塑的优秀传统，表现新的革命题材，刘开渠带领8位雕塑家考察了云岗石窟、天龙山石窟、太原晋祠彩塑，以及麦积山、龙山、开封、徐州、济南等地的雕刻，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在整个浮雕创作过程中，刘开渠既要负责整体设计，又要完成自己担负的创作任务。为此，他搬来了铺盖卷，吃住在工地上。他以饱满的精力，创作完成了碑正面《解放全国》的三块主题浮雕。它们是：《支援前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欢迎解放军》。最大的一块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高两米，宽6.2米，雕刻了24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个冒着枪林弹雨摇橹送解放军渡江的船娘的形象，尤为生动感人。刘开渠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以精湛的雕塑语言寄托自己的无限热爱，为人民、为后代留下了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生动的教材。

经过数年的努力，这座雄伟的纪念碑于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那天，首都50万人正欢庆国际劳动节，也就在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了揭幕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国际歌乐曲声中，碑上的红披徐徐下落，显现出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首都各界人民向人民英雄们敬献了花圈。5月2日，纪念碑正式开放。

刘开渠肩上的重担卸下了，而他的大女儿却躺进了医院的太平间。大女儿患有肾炎，但刘开渠一直因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能做的，只有将热泪洒落在年仅19岁的女儿那苍白的面颊上。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付出的岂止是劳动和心血。

告别刘开渠，我们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感到它更加雄伟，高大。不由想起郭沫若《人民英雄碑》的诗句：

天安门广场，波澜壮阔的海洋，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中央——
庄严、朴素、纯洁、坚忍、大方，
像崇高的灯塔在放射着光芒。

(1989年10月)

艺术大师刘海粟十上黄山 宣 奉 华

“黄山白发看争高”

1988年盛夏，93岁的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冒着酷暑，十上黄山。他步履矫健地山中石蹬道上攀登，用他那机敏的眼摄取黄山变幻莫测的奇景，又用他的手将山、石、松、云连同他的强烈的感情、个性和追求，全部倾泻在画布、宣纸和金笺上。上山30多天，作画30多幅，这是他70年来十上黄山创作最多、收获最大的一次。

刘海粟首次登黄山是在1918年初秋。从此他便与黄山这座奇险壮丽的名山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对黄山的深情厚爱与日俱增，老而弥笃。尤其是在1980年以后，他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迸发出炽烈的创作热情，曾七上、八上、九上黄山。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阔大高远的境界。海粟老人在1982年九上黄山时，更为《黄山颂》泼彩巨幛题诗云：“昔我师黄山，今作黄山友，万顷碧峰波涛连，千们紫霄龙蛇走。松石海泉成四绝，湖溪潭瀑叹无偶！泰岱虽雄伟，西岳徒峭陡，匡庐衡嵩及峨嵋，五岳名山此尽有……山乎终古寿无垠，我欲与之长相守！”这次十上黄山，他又口占一绝，向国内外关心他的人们表明自己上山的心迹：“年方九三何尝老，历劫二千亦自豪，绝顶骑云今十上，黄山白发看争高。”

虎 啸 龙 腾 意 纵 横

海粟老人是1988年7月12日十上黄山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不顾旅途劳累，开始作画。他来到桃花溪边，看到一棵老树上缠着青藤，树下有一块巨石，便请随行人员把4尺宣纸铺在画板上。笔走龙蛇，点染挥洒，仅半小时，一幅写意画便已完成。老人又挥笔在画的留白处题写：“戊辰秋刘海粟十上黄山写龙虎斗”，龙指的是老树盘藤，虎则指巨石蹲踞。在海粟老人眼底笔端，树与石都是那样充满生命力，显现出龙腾虎啸的气势。

金 笺 泼 彩 创 奇 观

8月7日，海粟老人沿着宿雨初霁、雾露犹沾的石阶，登上白鹅岭，面对莲花、天都、佛掌诸峰，展开了一幅质地厚重的金笺纸。“自占金笺破墨难”，要在金笺上作重叠的群峰，多么不容易啊！可海粟老人却站立在画板前，从容地舔笔，调墨，略一沉思，便以铁线在金笺上勾画出石的嶙峋，山的远影，以浓墨画出近山的凝重质感，用淡墨晕水画出更远的山峦或隐或现的轮廓，短短一个半小时，便将黄山挺秀峭拔的几个主峰和幽壑林泉尽收眼底。画在金笺上的黄山，比实有的黄山更加奇险深幻，烟云浩渺。

在金笺上泼墨，泼彩，泼水，使之既有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又有油画的强烈光色效果，这是海粟老人晚年的独创。1984年他在青岛首次以金笺纸画红梅，取得成功。他欣喜地在画上题诗：“自古金笺破墨难，辉煌未必损高寒；险奇原自浑茫出，烟雾丹霞卷彩澜。”这次十上黄山，海粟老人多次在金笺上作画，写牡丹、杜鹃，这幅金笺山水是他在金笺上泼墨泼彩，施水表现黄山神貌的成功杰作。

筇 边 佳 兴 发 春 红

8月4日上午，海粟老人在始信峰作油画《石笋》。这一景区千峰厅峰，形态奇谲，古来游人根据奇峰怪石的状态，给它们起了许多名字，编了许多神话传说，如仙人对弈、三娘教子、达摩面壁等等。海粟老人惊叹：“瑰诡耸拔，奇幻百出，虽善绘，妙处不传也。”

他面对神秘的群峰看了许久，终于在画布上以中国画的线条画起了近处山石的绛赭色的轮廓。看那色块，是油画，看那用线、笔墨韵味，又似国画，在海粟老人笔下，国画与油画早已融为一体、宣纸上有光的斑斓、油料的彩霞；画布上有银钩铁画，有线的流转，墨的氤氲。他手持画笔、刮刀，在画布上纵横驰骋，一会儿，庄严的山、流动的云、嫩绿的树、峥嵘的石便都各得其所，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亮、青春勃郁的和谐画面。画上体现出烂漫的童心、浪漫的热情和简洁朴素之美。海粟老人转过身来对弟子们说：“这幅画很重要，我又变了，这画中有新的东西。”

早在30年代，西方的艺术评论家们就已注意到海粟大师油画创作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藏于亦特巴姆国家美术馆；他的油画《北京前门》、《森林》、《月夜》、《向日葵》、《巴黎圣母院夕照》、《绣球花》等十多幅作品均被选入巴黎秋季沙龙或蒂勒里沙龙展出，博得西方画坛的赞誉。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中国艺术家，能在他的画面上，撷取他祖国传统的精英，达到心与天游的境地。”

海粟老人十上黄山所作的画，由前些年的粗豪奔放而转向平和、凝重，在描绘景物的形态上更加趋于阔大、简洁，更突出性灵和主观感受，因而使画面更加随意自由，无拘无束，更富于写意性。

(1989年10月)

笔墨成天趣 心魂系关山

——记关山月

马 平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便熟悉一幅画——苍浑的万壑群峰，隐现在雾蔼缥缈的云海里，一轮鲜红的朝暾，在遥遥天际放射出煌煌光华……面对这天与地构筑成的恢宏景观，一代伟人毛泽东欣然命笔，用他那舒卷豪放的笔势，在这幅山水画巨构的上方挥写了六个遒劲大字——“江山如此多娇”。数十年来，这幅中国杰作一直赫然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

画的创作者，便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画家关山月、傅抱石。前年早些时候，在北京饭店的一所房间，我有幸面晤并采访了关山月先生。

春阳那一缕柔柔的光波，透过湖蓝色纱幔悄然泻进室内，洒在关山月先生浅灰色的毛衣和红润的脸庞上。那天，他显得兴致极高，那不停挥动的手臂，那粤音浓重的极健谈锋以及那双仍不乏明慧的眼神，似乎说明，在这位年已78岁的老人身上，仍潜蕴着无穷的活力。

关山月原名齐泽需，1912年出生于广东阳江，1933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在小学教书之余，他兼习绘画。当时，岭南派开山大画家高剑父已极具声望。高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所授的绘画夜课，撩拨着年轻的关山月求师若渴之心。一次，关山月顶替一位好友的名字走进课堂，聆听高先生讲授中国画绘技。当高先生发现他不是自己的学生后，让关山月拿作品看。画作展开，高剑父大为惊叹。没想到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笔墨功力竟如此扎实深厚。欣喜之余，高先生将关山月画作“贴堂”示与同学，当众褒扬。关山月旋即坦诚地披露实情，使得高剑父大为感动。自此，关山月即追随高先生左右，耳濡目染老师绘艺与为人之道，并入“春睡画院”，二人莫逆，师友情深。

言谈间，关先生流露出对老师的崇敬之情。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高剑父在艺术主张上亦标新立异，提倡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革新，且无畏当时众多人的责难皆议，而关山月先生也正是在这点上，与老师相契共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艺术观。

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绝难与火热的生活脱开干系。这点，在关先生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中便可窥见。1938年广州沦陷后，关先生逃难至澳门。他魂牵梦萦，时刻焦虑祖国的危亡。他拿起画笔，满怀激情地创作出了大量反映抗战内容的画，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等4幅作品曾参加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

1940年，他毅然离开澳门前往桂、黔、滇、川、康、陕、青、甘诸省写生，体察民间疾苦，并开办抗日画展，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

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悠久灿烂，向为关先生所倾倒。1943年，他沿河西走廊，过张掖，出嘉峪，入祁连，越戈壁，深入敦煌千佛洞观摩研究古代佛教艺术，在夫人李小平的协助下，临摹壁画七八十幅，蔚为大观。后郭沫若先生于重庆观其作品后连连赞叹，并题辞曰：“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为见之。”由此，可见关先生在艺术观念与手法上的鼎革之绩。

关先生既是我国的一代美术家，也是一位成绩卓然的美术教育大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任市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教授之职。解放后，更置身心于美术教育事业，并于1978年任广东画院院长至今。数十年来，他为培

养美术人才竭尽心力，深受后学爱戴。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杰出画家，关山月先生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创作的画题极广，山水、人物、花鸟皆所擅长，而尤以写梅著称于世。他的梅作，或疏简瘦健，清俊孤傲；或明艳华茂，大气磅礴，然都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精神性格，赋予它蓬勃的生命力量。而这，恰反映出关先生一生耿直、追求光明正义、坦诚磊落的为人之道。他的著作《俏不争春》，早在 1982 年即被日本《读卖新闻》评为世界名画，并被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在最具权威性的世界名画专版上，赢来一片赞誉声。

在笔墨技法上绘画观念上，关先生珍视传统的旺健生命力，但又不固守定势，主张根据现实需要，因内容选择手法，并将两者紧密相融。创作中，他强调要通过作品体现和抒发感情，而反对无病呻吟和自视清高。因之，其画作风格多变，用笔雄浑，尤重视和追求“写”的效果和笔情墨趣。在色彩表现上，则丰富清新，气魄宏大，能于雄伟中见清丽，有质有势，格调高，意境深远，示人以襟怀开阔和明朗向上的艺术享受。

近年，关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把一生对祖国河山的印象以系列组画的形式都画出来，一年一幅，活 10 年画 10 幅，20 年画 20 幅……而今，已相继完成《长河颂》、《碧浪涌南天》、《江南塞北天边雁》、《黄河落天走东海》、《轻舟已过万重山》等数幅巨构。组画之一的《大地回春》，是应邀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精心创作的力作，现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内大厅。

(1991 年 1 月)

中国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吕厚民 月 升

真正幸运的摄影记者是这样的：他们的镜头与国家与民族与历史相伴随。快门每每的开启闭合，凝结了生活现实，注入了摄影记者的精神追求，也融铸成一页页历史，成为一份宝贵的形象文献。

他们用生命感受着生活，记录着历史。

他们的身影也不可磨灭地嵌入了这份生活与历史。

吕厚民属于这样的人。

事情开始于 1950 年 1 月的一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的吕厚民，刚刚跨进办公室，科长就对他说：“小吕，领导决定从明天起你到中南海去工作。”消息好突然，他匆匆跑回单身宿舍，收拾了一下，背着铺盖卷便到中南海报到。这时节，他年龄只有 22 岁，只有两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工作的经验，再就是刚步入高中的文化程度。

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干练的摄影记者。容不得多想，一声令下，他的摄影生涯从此揭开了难忘的一章。

从 1950 年到 1957 年，他在中南海中共中央警卫局摄影科，专职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其工作、外事活动、国内视察、各种会议和生活照片。1958 年至 1966 年他任新华通讯社摄影记者。其中 1961 年至 1964 年又专职担任毛泽东的随身记者。

历史选择了他，把他推上了这样的位置——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倾其生命的光华，和着共和国脉搏的有力搏动，为党和国家留下一份领导人活动的生动的形象档案。

这是一个需要高度的责任感、机敏的反应、娴熟的技术、谨严的作风、对决定性瞬间的感悟能力和捕捉能力齐备的工作。

这也是一项以深沉的历史目光战胜单调的周而复始的“工作感”，充溢着诗情与想象，充溢着爱心与理解的，无时不在的艺术的发现与创造活动。

只有真正理解它，方能把握它。

只有真正热爱它，方能驾驭它。

吕厚民的新闻摄影，是这两个点的相交与重合。

1993 年 7 月，在北京民族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吕厚民以《人民公朴人民领袖》为题，一下子推出整整齐齐、蔚为壮观的 200 多幅作品，内容囊括了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许许多多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各界的交往，以及生活的多个侧面。

这是一位摄影记者交给历史的答卷。

这里，既显示了吕厚民处理每一个新闻都一丝不苟、简洁洗炼、追求完美的严谨风范，又频有如诗如歌、如史如画的高潮迭起……

那是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开会。中午时分散会了，人们夹着文件包纷纷往外走，就在这时，吕厚民看到周总理拿着一份文件大步向毛主席走去，直觉催促他紧紧跟上，就在总理与主席交谈的刹那，他按下了快门。他用的是一架美国产的斯比格莱费克斯新闻镜箱，用钨丝灯泡，拍一张换一底，拍一张换一灯泡。精彩的瞬间总是稍纵即逝，根本来不及换片、换灯泡，吕厚民和那个时代一起走过来的杰出记者一样，练就了“就这一下子”的摄影硬功。“就这一下子”拍成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留住了领袖间

亲切自然的一份交流，让人过目难忘。

伴随着共和国年轻的步履，吕厚民的相机频频曝光，于是，我们看到了：

1953年，在武汉街头小贩的小吃桃子前，毛主席与群众娓娓交谈，揣着手的孩子们笑着，看着。

1961年夏，毛主席在上海驻地不停地工作，卫士好不容易说服他出来散步，在路经乒乓球台前时与护士打乒乓球。主席接过球拍，一个漂亮的回球，笑逐颜开。这情景，在《毛主席打乒乓球》一照里分外动人。

1962年夏的庐山含鄱口，毛泽东在连续几天的会议之后，来到山间散步，眺望峰峦叠翠，极目万里云天，远处是一碧万顷的鄱阳湖。毛泽东侧坐石条凳上，在苍茫天地间沉沉地思考着，眉宇不展。摄影作品难以涵盖一切，它托给你的只是凝重的瞬间，特定时空中典型的瞬间，其余的一切，留待人们去回味，去填补。

还有那幅春光明媚、繁花满树的季节，周总理和邓小平等漫步颐和园，在日理万机之后，有一份与大自然的亲近，和战友间的潇洒畅谈。等等等等。

领袖人物，重大事件中的、群众中的、生活中的领油人物，在吕厚民的镜下，不只是新闻中的主角，不止于事件性的记录，而是智慧、涵养、情操、精神世界坦然流露，可感可近的人，是深入体察形象从而在心灵深处引起强烈共鸣后的契合和沟通。它往往凝聚着人类蓬蓬勃勃、奋斗不息的生命精神，和伟大人物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创造与穿行的从容和自信。这也许就是吕厚民作品长久以来拂之不去，熠熠生辉的迷人之处。这也许就是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在这些作品面前留连忘返，不断地带着新的思路、眼光、思考与之交流，并总能有所获得的奥秘所在。1985年5月，吕厚民摄影作品曾经在日本东京展出。日本写真家协会名誉会长渡边义雄、著名摄影家滨谷浩发表观感时也曾这样说：“吕厚民的作品很珍贵，是历史的记录。看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朴实、伟大的面容感到亲切。”

与照相机相伴了40多个风雨春秋，吕厚民无憾无悔，只有无限温馨的回忆和发自心底的欣慰。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常务书记，他多年来的涉猎题材十分广泛，人像、风光、纪实、民俗、舞台都有佳作，并屡屡在国内外获奖。1992年为表彰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荣誉。然而他心中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在中南海工作的那段往事。

要是问起吕厚民，什么是新闻摄影的要义？他会谦和地一笑，然后平静而简捷地告诉你：“新闻摄影，是新闻，也是艺术。”

他从最本质的意义上体会着这句话，用几十年的生命里程实践着这句话，目光炯炯有神。

(1993年10月)

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一次会见

晓 飞

10月的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任继愈走向一辆停在中南海丰泽园前的小轿车。远处，身材伟岸的毛泽东主席向他频频挥手致意。

这一幕情景，今年75岁的任继愈依然历历在目。坐在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的任继愈一派学者的儒雅，全无山东汉子的彪悍。他早年喜爱佛学，在西南联大时从我国佛教史权威汤用彤和现代著名哲学家贺麟。解放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研究佛教的文章。毛主席读了这些文章很感兴趣，并于1959年10月的一天深夜，特地邀请任继愈到中南海面谈。

那晚，毛主席身披一件白色毛巾浴衣，脚穿一双拖鞋，轻松自如地坐在卧室外屋的一张藤椅上。见到任继愈后，毛主席马上站起来，走上前去与他握手，极为亲热。这位伟人与标准像上的形象不太一样，头上早生华发，眼角边有深深浅浅的几道皱纹，但精神矍铄。

毛主席微笑着说，我看过您写的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佛教的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做过，实在难能可贵。过去梁启超也写过一些研究佛教的文章，他写的不太明白。

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时任继愈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书（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

谈话的气氛十分活跃。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他得知任继愈还没有配备助手协助工作后，风趣地说，北大哲学系有500多人，这么大的系，抽一两个人出来搞宗教，完全应该的么。

透过外屋可以看到里面毛主席的卧室，只见过道里、书桌上和床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地堆满了书。这位博古通今的领袖接着谈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还就孔子和老子的评价问题与任继愈进行了交谈。毛主席说，他同意任继愈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是保守派，但他不同意任继愈关于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说老子不像个唯物论者。随口背诵了《老子》的几段名句。

“道常无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不知不觉夜幕褪尽，绯红漫上了天际。按照毛主席的作息表，他请任继愈共进“晚餐”，由随后赶到的胡绳等作陪。毛主席首先亲手给任先生斟满一杯茅台酒，把当时不多见的大龙虾虾段夹在任继愈的菜盘里，自己把虾头吃了，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任继愈，吃得饱饱的，好好搞哲学。

中南海夜谈意义深远。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欧14国前，向毛主席请示，要加强对外国情况的研究，成立若干外国研究所。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认为唯独没有提到宗教。至今影响着世界上广大的人口的宗教，我们对它还很不了解。毛主席特别提到了任继愈的名字，赞扬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在成立14个外国研究所中包括世界宗教研究所，由任继愈负责筹建。

与毛主席谈话以后，任继愈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之外，每年至少

撰写一篇有关佛教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哲学史上的具体问题，成为国内外名声显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墨子》、《老子今译》（修改本称作《老子新译》）、《韩非》、《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等。任继愈发表的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分析各个名家各个学派的史料时，把学说、学派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时代思潮来考查，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任继愈在学术界的地位，可以用他的校友、台湾著名语言学家周法高回忆西南联大时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主编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现在成为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重镇，大有取冯友兰、汤用彤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可算是（西南联大）第一届研究生中目前在大陆学术界最活跃的一位。”

（1991年11月）

百年不醒的强国梦

——记孙越崎

隆 莉

解放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及国家大量的珍宝运往台湾，并命令政府各部门将所属的重要物资、档案及技术人才运过海峡。于是，大量的财富迅速地在本来就很贫瘠的大陆上消失……

然而，当蒋介石在惶急中退守台湾岛，惊魂未定时，回首中却发现自己极为重视并亲自督运的政府重要部门——资源委员会留在了大陆！这恐怕是蒋介石留在大陆最大的憾事之一。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孙越崎。

每天清晨，孙越崎就坐在自己的桌前，写一些回忆性的资料，或者给老朋友们写信，而每天的几份报纸是必看的。

他已经不做自编的那套体操了。自去年因肺炎等疾病住院后，他身体不如从前了，但他仍拒绝我的搀扶，自己走到窗前坐下，说：“我自己能走。”

到1993年10月16日，孙越崎就整整100岁了。

100年中，既有桑海沧田的巨变，又有酒酸成醋、香化为灰的时刻，孙越崎经历过幸福时光也承受过悲痛的煎熬。如今，昔日的尘埃落定，又100年即将开始，这位记忆力惊人的老人，面对我关于上一世纪的探问，只是轻叹道：“这个世纪啊……”

于是，我只能从与他闲聊的片言只语中，从他91岁的老伴不时的插话里，连缀历史的片断，领略他100年生命中的繁花异树……

爱国叛蒋一生艰险堪惊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背叛他的竟是自己一直信任的孙越崎。

当初孙科当行政院长时，曾在组阁时把孙越崎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去掉，换上他的亲信吴尚鹰。因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经营全国重工业的经济部门，相当于重工业部，下辖121个总公司，上千个生产单位，有职员32000多人，其中60%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各企业共有工人六七十万人。资委会在政府中财大气粗，举足轻重，掌握了资委会，就意味着掌握着巨额财富。然他把内阁名单报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又把吴尚鹰勾掉，亲笔写上孙越崎的名字，可见蒋对孙越崎的重视和信任。

孙越崎任委员长时正值国共最后决战时刻，在光明与黑暗、再生与毁灭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他冒着生命危险，顶住蒋介石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压力，组织资委会员工保护厂矿财产，档案资料，最终组织全体员工弃暗投明，使资委会所属全部工厂、矿山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国民党政府中，部一级单位全体留在大陆的只有资委会。此举对解放初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1949年11月孙越崎组织资委会香港贸易事务所起义以后离开香港时，蒋介石曾派军舰追捕，幸亏截错了船，蒋盛怒之下开除了孙越崎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只是鞭长莫及了。

再回首，孙越崎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艰难的就是围绕南京工厂拆运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了。

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打电话叫孙越崎上他家去。那时蒋家在南京的陆军学校，即原来的明故宫。孙越崎说：“他家的房子是平房，里面布置得不

是很华丽。”

蒋介石先问孙越崎：“现在你们华北的情况怎样了？”

孙答：“我刚刚接到电报，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已经给共产党占领了。”

蒋：“你们破坏了没有？”

孙越崎不但没让破坏，反而让工人保护好工厂，但他不能这么回答，于是说：“我们只能让工人破坏，但工人不愿意，因为工厂没了，他们的饭碗也没了。”

蒋又问：“那么南京有几个工厂？”

孙答：“在生产的有5个，还有几个正在筹备，没有投产。”

蒋说：“那好吧，你把还在生产的5个工厂迁到台湾去。”

孙答：“现在这几个工厂连维持费都不够，拆、运到台湾再重新组建，这要相当多的钱！”

蒋说：“没钱没有关系，你做预算来，我批。”

孙越崎没办法推了。他把5个工厂的人找来，跟他们讲：“我实际上实在不愿意拆，但没有办法。其它地方还可以马马虎虎，南京在他的眼皮底下，不拆是不行的，而且他又同意做预算，只好拆吧。”

于是，孙越崎做了预算，还故意把预算做得特别大，想迫使蒋介石改变主意。然而孙越崎记得自己把预算报上去，蒋介石第三天就批下来了：如数照办。并说，他已经告诉中央银行了，孙越崎只需去问中央银行要钱就行了。

钱有了，孙越崎只好把5个工厂拆了。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撤往台湾，因此，这5个厂中只有一个厂装上了轮船，另外4个厂的设备都运到码头待装。资源委员会的船都停在江心，要等别的机关的船离开码头了，他们的船才能靠岸。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引退到奉化去了。孙越崎高兴极了，心想：他现在到了奉化，过几天一定会到台湾去了。于是，拿起笔来就写5个工厂不迁。交给秘书处去办正式的命令。

孙越崎万万没想到，蒋介石仍在奉化发号施令，并一再让汤恩伯催迁，还召见前行政院长翁文灏，怀疑孙越崎被共产党左右。孙越崎下令不迁工厂之事他迟早会知道，这可是“欺君”之大罪呀！

孙越崎说：“我当时真害怕，连夫人也不敢告诉。”

于是，他找到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说：“现在正是和谈时期，我们却在南京拆工厂，人家就会说：你们没有诚意，只不过想拖时间。”李宗仁觉得有道理：“对，别拆了。”

当时孙越崎放心了：“这下有李宗仁这块挡箭牌，不用怕了。”只是以后有些后怕——蒋介石连李宗仁都可以随时抓，更不用说他了。

1965年李宗仁先生回国。孙越崎特意从唐山到北京去看他。他们是老熟人了，李宗仁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越崎担任经济部东北特派员、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李宗仁认为孙办事得力，很赏识他，这次会面他们都很激动。李宗仁问及当年蒋介石下令迁台的那些工厂，知道留在大陆了很高兴。孙越崎奇怪他何以在事隔多年后还记得这批工厂，他说：“我当年飞离南京前给汤恩伯打过电话，嘱咐他这是内战，希望他不要毁掉南京，他答应了，我才放心飞走的。这和你当时不肯迁厂去台是一样的心情，所以还总记着。”

陈迹塞北江南艰辛致力救国

除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失望外，孙越崎不肯去台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舍不得那些他一手创建的工厂、矿山。直到现在，他还不时如数家珍地念叨他的北京铁厂、琉璃河水泥厂、京西煤矿、华北电力公司、华东电子管厂……甚至台湾的苗栗油矿、高雄炼油厂、新竹燃气厂……这些工厂是他青春的梦，中年的事业，老年的慰藉，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当五四运动的号角在北京吹响时，孙越崎正在天津的北洋大学采矿系上学，他以校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带领本校与天津 14 所大中学校近万人一起举行罢课，并作为四代表之一去同河北省长（军阀曹錕之弟）谈判。事后他被学校开除，遂转到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矿冶系继续学习。毕业后，到距乌苏里江不远一片荒凉的穆棱去创办煤矿。1929 年，他赴美国深造，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矿冶，后又赴英、法、德等国考察矿业。1932 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经苏联归国。

他曾任国民党国防设计委员会矿室主任，国防设计委员会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总工程师、整理专员、总经理，湖南省湘潭煤矿公司总经理。1938 年后任四川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煤矿公司总经理，甘肃玉门油矿总经理……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孙越崎当时正任中福煤矿总经理。为了保护煤矿的设备，保护中国本来就不强大的工业实力，为抗日作后盾，孙越崎说服了中原煤矿公司董事和英国福公司代表，全力组织全矿工拆迁了地面、地下的机器设备，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好友卢作孚的协助下，抢运到四川。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先后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等合办了天府、嘉阳等 4 个煤矿，孙越崎任四矿联合总经理，这对抗战后方工业民用燃料的供给贡献很大。抗战中，敌占区各煤矿拆迁到大后方的，只此一家。

孙越崎曾说自己平生有两件聊堪自慰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拆迁中福煤矿。

抗战时期的重庆，人们都称孙越崎为“煤油大王”，因为他手里不但有煤，还有油。

40 年代以前，我国石油一直仰赖国外。抗战时期，日军封锁港口，油源断绝。当时往国民党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决定开发玉门油矿，他与周恩来协商，要求将延长等地的原国民党政府的钻机运到玉门钻探石油，周恩来慨然应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1940 年，孙越崎被任命为甘肃矿局总经理。在荒无人迹的戈壁滩上，怀着为国找油的壮志，孙越崎不顾当时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历尽千难万险，两年后在嘉峪关外立起了新型石油城——玉门油矿。国产汽油、煤油、柴油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军需民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为了表彰孙越崎创建玉门油矿的巨大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在他之前获得过这项金奖的只有 4 名成绩卓著的工程师，他们是：修建粤汉铁路的凌鸿勋、发明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飞架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和制造了第一台国产柴油机的支秉渊。

长命岂止百岁 笑迎祖国昌盛

当年孙越崎从香港北上赴京途中，他已经收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的任命，到京后，周恩来总理曾设宴热情欢迎他。

此后，他担任过唐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等职，继续他几十年的工业梦。当然在那人人都难以逃避的巨大灾难里，他这个国民党的高官自然是一个重要对象。

1976年唐山地震时，他被倒塌的房子压了半天，终于得救，但两条肋骨已被压断。回北京定居后，孙越崎和老伴及女儿、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不久“文革”结束，他担任了煤炭部顾问。孙老90大寿时，当时的煤炭部长高扬文曾带着生日蛋糕前往祝寿。煤炭部的重要会议必请孙越崎参加，孙老也倾尽全力为之出谋划策，他的许多重要建议都被采用。

此后，孙越崎工作日益繁忙，担任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民革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在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期间，经过亲自调查，他建议包钢改用内蒙古自产炼焦煤，以节约资金，减轻铁路负担，在华北油田、蔚县煤矿、北京焦化厂调查后，提出京冀联合开发蔚县煤矿，建坑口煤气厂，向北京送气，早日实现首都煤气化的建议；他热情帮助长江之上出现第一家民办的集体所有制航运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的重建，孙老指出，只有国营一个公司独家经营，是造成长江航运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热情地支持这项改革；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他又上书中央，直陈自己的见解……

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孙越崎一直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孙越崎说：“资源委员会中有不少人现在台湾任要职，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陆续派去台湾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工业的。”他说，自己与台湾的陈立夫先生是北洋同学，与台湾的前“行政院”孙远璇先生、“政务委员”李国鼎先生、“经济部长”李达海先生、赵耀东先生都曾在资源委员会中共过事，他还是孙远璇先生的证婚人呢。他常说：“我真盼有生之年能与现居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再见一面……”

孙越崎曾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的名字：“我原名毓麒，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鉴于有忘国之忧，前途崎岖，自己将名改为越崎，用我们绍兴话念是音同字不同，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如今，他的愿望已成现实。这位与毛泽东同年的百岁老人，又处在两个世纪间辉煌的交点上。

这次到孙越崎家，发现比上次来时多了两件东西，一是墙上挂着的一幅江泽民与孙越崎的合影，上面有江泽民亲笔题字：“孙越老百岁寿辰留念”；另一件是邓颖超生前留言，为他百岁生日送的一尊笑容可掬的老寿星。老寿星和对面墙上挂着的那幅众人熟知的周恩来的坐像悄然相对，传递着那个世界的两个故人对孙老的遥遥祝福。

(1993年3月)

启功的烦恼

吴 霖

启功教授不爱看电影，并声称绝不看悲剧。他的理由大概是充分的：人生何必自个儿找不痛快！所以，启功平常只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也不是没有选择的，除去新闻联播，他常看《世界各地》和《祖国各地》，而速战速决的喜剧小品和相声，以及《动物世界》，则是他最为喜爱的节目。

近两年，旅游形成热潮，登山攀岭者纷纷争先恐后，启功却不敢趋众。有一次，他对我说：“别人登山揽胜，高兴得很，我却老想哭。”

为什么？

因为启功面对大好河山，良辰美景，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已去世多年的老母亲和爱妻。

启功是有名的孝子。一岁丧父后，是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他长成。晚年病中，适逢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成。老母亲想去看看，但终因病得厉害，未能遂愿而歿。对启功来说，这是人生一大憾事。启功夫人章佳氏，长启功两岁，与启功相依为命数十载，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尝过许多的酸甜苦辣，也从未有机会坐上火车去游山玩水一番。1975年章佳氏撒手西去，启功痛不欲生。启功有《启功韵语》诗集行世，其中有《痛心篇二十首》，俱言其哀伤之状，举凡读者，无不含泪神黯。许多年后，有人试着为启功做红娘，启功一概拱手谢绝。

1990年，启功带着100多幅自己的字画去了香港，举办了一次辉煌的书画展。此次书画展卖书画所得约200多万港币，但，这些钱一分也未入启功私囊。启功将其全部收入捐献给了国家，用来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这事的缘由是：启功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前些年有意为他建立一个艺术馆，启功坚辞，称不敢，实则不愿。他倒有心搞一个奖学助学基金，用来鼓励和帮助那些学习优秀而家境困难的学生。他将这个基金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此来纪念他的老师、原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

励耘书屋是陈垣先生的书房之号，当年，启功以高中学历，任教于辅仁大学，多得益于陈垣先生。今天，启功以自己成功的奉献，报答恩师当年的培育之情，不正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吗？今天的启功，以书画、古典文学和鉴定文物三绝，而驰名海内外。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古老的道理，在启功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启功先生对我曾认真地说：“初进辅仁，陈先生时我书如何教，文如何改、如何圈、如何点，都一一加以指点。我启功能有今天，是一分都不能离开老恩师的好处的！”

说起来，启功还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后裔，所以，他自然也有爱新觉罗的姓氏，但是大约是没有叫他为爱新觉罗先生的，因为从清朝起就没有人把爱新觉罗姓氏作为口头称呼，所以，人们多将他的名字前后拆开，称他为“启老”和“启先生”。启功没有子女，倘若有一子半女，启功说必让他们以后为姓，代代相传下去。启功对某些人不论场合到处将爱新觉罗的姓氏挂在嘴上，是颇有些微词的。

启功是个名人，名人自有名人的烦恼，单是神出鬼没的求字大军，就足以使启功难以招架了。于是，便有一传说，云：启功曾在自家门楣处，贴一字条：“大熊猫冬眠，谢绝参观”，以阻挡不屈不挠的不速之客。某次，我

笑问启功，启功亦笑答：此系讹传。

倒是在前两年，启功为对付不约自请者，而在自家门上贴过这样一个字条：“谢绝参观，启功冬眠，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但，根本无效，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总鱼贯而来。于是，启功便伺机东“躲”西“藏”，仿佛地下工作者一般。

“躲”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启功，在4号楼的一间客房里对我说：“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篇近4万字的论文《说八股》，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僻静之地，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的。”那里离启功的家只有一箭之遥，且自费住宿，缘何？逃避也。

启功戏称自己的字是十年“文革”中抄大字报练出的功夫，故应称“大字报体”。当年，启功抄写的大字报，很少有能保存多日的，因为总会有喜欢启功书法的人，偷偷揭下藏起，以致于后来一俟有启功所抄的大字报贴出，需让人看守。

医生对上了年纪的启功谆谆告诫，戒食此物或那物。但自称不是美食家的他，总是置若罔闻，譬如酒照喝，肉照吃……过去，启功会抽烟，也抽过烟，但现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抽了。他的养身之道仿佛就是四个字：顺其自然。学过太极拳的启功，现在早已忘了路数，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遗憾的。

某次，我偕启功先生看一个画展，启功对其中一些以动物为主题的画连连称好，还幽默地以成语加以评点。这是一位天性善良，热爱生命的长者。启功很遗憾地对我说：“文革”中抄家时会丢失了一本很有趣的“百狗图”。还有一个故事：启功出访他国归来，海关的先生们很诧异这位老先生一件电器也未带时，启功却变戏法似地掏出了一个小兔打鼓的电动玩具。启功不爱陌生人随便给他照相，但如蒙准在他家里可以给他照相者，他必坐在一大堆动物造型玩具中，抱着一个布制大青蛙或大耳兔对着镜头微微而笑。

1993年入夏以来，北京持续高温，因此“居大不易”也。已逾八旬的启功先生，便是盛夏酷暑的“受害者”。

眼下，启先生极少出门，而且，除了老朋友的电话，启先生是难得与外界联络的。并非刻意追求修身养性，他实在需要平静。

白天的喧嚣过去之后，夜晚，启先生却仍然时常失眠。大凡读过《启功韵语》的读者，相信都还会记得数年前启先生有关失眠的戏作，多达八首。现在，失眠又开始打扰启老了。

于是，但逢夜阑更深而不能寐时，启先生便或听收音机，或握卷细读，直到实在困了乏了，才能睡上一会儿。就像他曾写到过的“何须求睡稳，一榻本糊涂”。可是，睡不好觉的滋味，实在是令人烦恼不堪的。

前些日子，有人寄材料至启先生所在的师大，称某处某人在伪造启功作品云云。校方拟沿线索去顺藤摸瓜一番，未想，启先生却莞尔一笑，轻描淡写他说：“不值一查”。

早在几年前，启老曾和谢稚柳先生被邀宴于深圳，席上，主人称自己珍藏一幅启老书法，想请他看一下。启先生当时笑曰：“不用看，写得不好的，必是我写的；写得好的，想必是假的。”一番戏谑之语，顿时惊了四座。

启老接着幽默地说：“倘是真品，无所谓好坏。如是假冒的，必刻意求工求精。”谢稚柳一听，拊掌称妙。其实，赝品再如何模仿，又如何能得启先生手迹之风采万分之一呢？

还有一事也属奇事，某人周游山东兜售启功书法条幅若干，每幅仅数千

金。买者大喜，便宜买到了好货，焉能不喜？遂派专人赴京，直奔荣宝斋装裱。未想，见多识广的师傅一眼看过，便告之：假的。

买者不信，径奔师大而来。又鉴定之，始知荣宝斋不谬。买者痛心疾首之极。启老知之，便送了一幅字与其。买者遂欢天喜地而去，此番所持者，真迹不容置疑耳。

对近来频频出现的假冒事件，启先生含蓄地说：“这位（些？）朋友，大概是短钱化了。对此事，我决不追究。”其实，启先生何曾希望署上自己大名的“假冒伪劣”货色去招摇撞骗，他说了真心话。“要想追究，也追究不过来，化不起那个精力呵。”或许，那些假启功还很盼望真启功能诉诸公堂呢，这样，他们岂不是皆能一夜之间成“名人”了？

让启老最为烦恼的，是另一类假冒。某日，一位台湾人对启先生恭敬地说他化了上万美金，求得几幅明清书法作品，上面还有启功的鉴定题跋。在启老的众多头衔中，其中一个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但凡经他过眼的文物，当是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的。

启老一听此事，便赶紧声明：“我从未在这几件上题过。”其实，这几幅作品还真曾被启先生过目过。只是当时启老一眼便认定是赝品，便拒绝了题跋。他又怎能想到，仅隔数日之后，该作品竟会被另一个“启功”题上了。

对这件事，启老非常有意见。他说：“造假古画，本来就是错。假冒我的题跋，使我成了假见证，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

对这些已明显侵害了启功名誉的违法行为，不知道启先生进一步还会有什么对策。不过，他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古字画上有我的题跋，就轻易相信。至少，可以拍成照片寄给我看一看。”

与启先生相处，深感他是个外圆内方，谈吐智慧幽默，办事却极有原则的人。他为人非常随和，却绝不随便。他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他说：“小动物再老实，你老用棍子捅它，它也会呲牙。”遇上忍无可忍的事，启先生也会拍案而起，而且是非非有个结果不可的。

盛夏的烦恼，终会过去，取代而来的，是秋天的沁凉和气爽。可是，启先生的另一种烦恼，何时能解呢？“惟有杜康”，大概是自欺欺人的，或许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罢？

（1991年10月）

齿入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

——记李琦

王奎庭

1988年9月，为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10周年，画家李琦应有关方面之邀准备为日本首相竹下登画一幅肖像。事前，有关方面只安排李琦在近处观察了竹下首相一面，可参考的资料也只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张小照片。李琦凭借他深厚的艺术功底，传神地将竹下首相的形象用画笔再现出来。当时日本各大报都刊登了竹下登首相在这幅肖像旁的照片，并对该画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赞誉。竹下本人说：“这幅画是我至今得到的所有画像中最能充分表达我内心世界的一幅！”

1987年12月，香港著名画家赵世光应全国侨联邀请，来北京访问。在参观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二天，李琦教授携着一卷画交给客人说：“我已经给你写了肖像。”赵先生一愣说：“昨天我没看见你动笔啊？”“我是昨天晚上默写出来的。”李琦说。展开画卷，更令赵先生吃惊！李琦是用最难控制的毛笔、宣纸，以最简炼的线条勾勒出来的。形象惟妙惟肖，连赵先生的内心感情及性格也表露无遗。赵先生后来在一篇题为《神乎其技》的文章中写道：“多么敏锐的观察力！多么传神的描绘力，在香港，许多位人像画家用过各种工具，面对面画了许久也未能描绘出我满意的肖像，而李教授于短促的谈话时间，竟能洞察到我的内心世界……”

对默画人像这一神技，李琦总是戏称其为“副业”，他的“正科”是创作人物肖像画。60年代初李琦创作的《主席走遍全国》被美术界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人物画作品之一，也是李琦创作进入高峰期的里程碑。

《主席走遍全国》，真实地再现了领袖为人民的事业而日夜操劳，奋斗终生的崇高品格。画面上主席衣着简朴，一手拿草帽，一手叉腰呈小憩的动作，还有被风吹起的一缕头发，这些细节，生动地再现了作品的主题。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写过这样几句话：“一顶草帽手中拿，刚回来还是又要出发？群众生活心头挂，您把全国当作家。”画面非常简洁，没有任何背景，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余地……

1962年，李琦创作的《同志》，表现了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亲切会见的情景。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传祥促膝谈心，刘少奇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画卷中刘少奇手拿烟卷和蔼可亲，时传祥神态朴实，李琦再一次用传神的笔法塑造出刘少奇和时传祥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李琦曾多次见过周总理，聆听过他的教诲，他多年来就想为总理画像立传。1988年3月5日，周总理诞辰90周年，李琦画了一幅总理肖像。中国延安文艺学会请艾青题字后，以学会的名义将此画送给邓颖超。邓大姐收到肖像画后，专程约请画家李琦、古元，诗人艾青，话剧表演艺术家吴雪等延安时期文艺界的老战士，邓大姐对大家说：“这幅画很逼真，我非常喜欢！”

李琦人物肖像画的特点是善于捕捉和刻画人物的神情气韵，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看起来寥寥数笔，却笔简神全，别有韵味。例如，李琦的作品《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画面上周总理正面向观众慈祥地微笑，他习惯地用那

只受过伤的右臂抱着左臂。总理真实动人的风采，独具魅力的眼神，给人关怀，给人激励，使人难以忘怀。

这些年来，李琦教授的技法日益老到，他陆续画了鲁迅、李大钊、马克思、白求恩、雷锋等人物像，朱老总的画像也正在创作之中。李琦教授为什么特别对领袖人物肖像孜孜以求呢？这与他独特的经历有关。

1937 年秋，9 岁的李琦随父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直到 1946 年入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在延安的 9 年，他经常可以见到革命领袖，并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彭大将军抱过他；毛主席曾摸着李琦的头问他几岁了？念过书没有……

1962 年，王光美找李琦要他画《主席走遍全国》那幅画时，又把李琦领到毛主席跟前，李琦对毛主席说：“在延安时能常见到主席，进城后就没有机会了。”毛主席笑了，握住他的手说：“那，你可以常来嘛！”

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邓小平同志肖像画——《我们的总设计师》就是李琦以他精湛的中国水墨画技巧，成功地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非凡气质和卓越风采。

画面上，邓小平同志头稍向左侧，那眺望着远方的眼睛，投射出深邃、睿智的目光，仿佛在运筹、勾画着改革开放宏伟蓝图，那微微抿起的嘴角，显露出刚毅和自信的神情，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坚定信念。

对此，李琦是倾注了心血的。

(1993 年 1 月)

李准的龙马精神

姜忠亚

李准是久负盛名的小说作家和电影剧作家。50年代初，他以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而一鸣惊人。其后又以《老兵新传》、《李双双》、《耕耘记》、《龙马精神》、《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黄河东流去》等小说和电影剧本而饮誉全国，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1928年5月17日，李准出生在河南省孟津县下屯村一个生活虽不阔绰，却过得融洽、和睦、平静，弥漫着书香翰墨之气的耕读之家。祖上是蒙古族人，原姓木华黎，后改姓李。李准的祖父是一位博闻多识、学富五车的秀才，曾在洛阳县试中夺得第一；伯父和叔父均是乡村教师；父亲也念过几年书，后在外经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李准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时，他进入麻屯小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常袋镇达德中学读书。当时河南大旱，读了一年，便被迫辍学，只好在祖父办的私塾中学习。在这里，李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古典文学名著。15岁时，由于生活拮据，到洛阳车站恒源盐栈当学徒，从此走上社会。学徒生活是很苦的，每天扫地、做饭、擦烟袋什么都得干。但李准在师兄李宝才的影响下，从书本中找到了乐趣。他用勒紧裤带省下的钱，把洛阳“聋子书店”里的中外文学名著全部租看了一遍。

1944年，日寇的铁蹄踏进洛阳，恒源盐栈倒闭，李准只好回到家中，在父亲办的邮政代办所当邮递员。凡他送的报纸，他都仔细地阅读过。由于工作关系，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当时，他还参加了镇上的业余剧团，时常编些旧戏演唱。李准性格敦厚、朴实，待人热情、赤诚，经常代目不识丁的农民写信，因而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理发匠、吹鼓手、屠户、更夫、算命先生等。这些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久久地萦回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他进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解放后，李准先在豫西中州银行当职员，后任货币计划股股长，不久调到洛阳市干部文化学校当语文教员。生活中的人和事时时激动着李准的心。1953年，他根据党的农村政策创作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显露了他出色的文学创作才华。自此，李准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创作了《孟广泰老头》、《妻子》等数十篇小说和剧本。

1957年，李准涉足影坛，倾力创作了电影剧本《老兵新传》，获得国庆十周年优秀影片奖。随后，以电影《李双双》为标志，他的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和丰收期。影片上映后，轰动全国，久映不衰。李双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周总理多次在会议上表扬《李双双》的创作，肯定了作者的创作道路。在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李双双》荣获最佳故事片奖，李准也摘取了最佳编剧奖的桂冠！

正当李准的创作精力旺盛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李准受到了残酷迫害和打击。他倾注心血创作的长篇小说《沧桑路》的手稿也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一次，造反派召开大会批斗李准，放映他的“毒草”影片《龙马精神》。岂料放映后，观众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笑声迭起。主持会场的人告诫大家不要上当，要严肃，不要笑，但观众就是不听，笑得更厉害了。李准暗暗记下，观众一共笑了30多次。快到结束时，主持会场的人又叫大家不要中毒，不要哭，但观众忍不住还是哭了。可是，受到人民喜爱的

艺术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粉碎“四人帮”后，李准又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他的笔又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牧马人》、《双雄会》、《高山下的花环》、《王结实》、《芒果》等电影剧本和小说相继问世。长篇巨著《黄河东流去》以磅礴的气势和丰富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画卷，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

李准在 40 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 50 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创作或改编了 20 余部电影剧本，还创作了不少戏曲和活剧剧本。他有着丰厚的农村生活积累、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根底以及外国文学和“五四”文学的素养，不愧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这一点，除前辈作家赵树理之外，似乎无人能与之比肩。李准善于通过一个村庄、一个家庭去反映农村生活，表现农民悲欢离合的命运，揭示出农民生活的意义和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前进的步伐。著名导演谢晋在筹拍《牧马人》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请李准改编剧本。李准不负重托，影片获得了第六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筹拍《高山下的花环》时，谢晋再度邀请李准合作，影片获得更大的成功。在第八届“百花奖”评选中，《高山下的花环》赢得 90 多万张选票，名列最佳故事片之首，同时还囊括了 5 个单项“金鸡奖”，李准和李存葆同时赢得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荣获“百花”、“金鸡”最佳编剧双顶桂冠的电影剧作家。

李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一行行清晰而闪光的足迹，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了一笔十分可观、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他和谢晋三度合作的影片《清凉寺的钟声》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中，我们预祝他们取得新的成功。

(1991 年 3 月)

火红的交响乐章
——记李德伦
宋立新

北京音乐厅恢宏的演出大厅。

掌声经久不息。

美国费城交响音乐团团员微笑着鞠躬，文质彬彬地离开演奏席位，中间休息，坐在前排的贵宾们起身走进休息室。

贵宾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主席江泽民，他握着李德伦的手说了很多，神情很激动，有两句话他一再重复：“请你相信我们，请你放心。”

和平里居民区楼群。

这栋灰色的建筑物和周围的建筑环境十分和谐，一样残旧，灰暗，只是一块满布灰尘的小木牌表明住客的身份：“中央乐团”。敲开一户的门，50年代的家庭韵味扑面而来，客厅里的老钢琴，挂满墙的字画，旧式家具摆设，显示出主人儒雅的情趣。午后的阳光从稀疏的树叶中照在主人自摄的黑白照片上，在不明亮的光线中，人的思绪也恍惚起来。

主人颇有节奏的咳嗽声拉回了倒流的时光，一位已发了福的老者与来访者寒暄，在沙发上坐稳后，他疑虑地问：“你想和我谈什么？”那口气好像很久没有生人来了。

谈什么？来访者感兴趣的当然是中国著名的交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辉煌的历史以及对今日交响乐坛的“指教”。

“不要拔得太高，随便聊聊吧”，他淡淡地回复。

1917年6月6日，北京。

李德伦很会挑选日子，在大吉大利之辰，诞生在一个北洋军阀家庭，父亲很爱好京戏，是出了名的票友，当时的红角余叔岩、杨小楼、马连良都在他家唱过堂戏。铿锵鼓乐中成长起来的李德伦，对音乐、美术、诗歌等统称为艺术的东西十分着迷。不过，在中国国粹熏陶之下，他如何迷上外国古典音乐，至今他自己也难以说清。

21岁，在家人半求半逼之下，他放弃了人们当时不屑的下九流的爱好，进辅仁大学攻读历史系，然而与音乐的情缘扯也扯不断。两年后，大学未毕业，他便秘密南“逃”，考取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师甫磋夫、杜克生和弗兰克尔学习大提琴和作曲理论。家人的盛怒在时间的调和下变淡了。“我父亲后来来上海看我，算是‘追认’了我不辞而别的行动目标。”李德伦至今仍为自己的抉择而得意。

然而在1943年的日伪统治时期，李德伦的家境开始衰微，无法维持他念书的费用。“是钱逼我走上指挥台的”，李德伦的这份坦诚想必出乎许多人意料。

是的，大少爷的架子被打碎后，李德伦参加了黄佐临主持的苦干剧团，担任配乐，在原指挥北上度蜜月之时，李德伦被众人推举下，“篡夺”了指挥席位，第一次演出是由刘琼主演唐明皇的《杨贵妃》。由于剧团经费紧张，李德伦身兼三职，配乐、指挥、演员，印象最深的饰演角色是《牛郎织女》中的老牛。兼职一多，李德伦便觉分身无术，有时候，牛郎织女蜜意浓情需音乐烘托，不识相的老牛忘记该下到乐池转换角色，仍以一个舒服的姿势躺在台上。又有时织女已上仙界，牛郎需老牛协助升天，而“老牛”仍在台下，

沉醉在指挥棒的乐趣里。

1946 年李德伦到了延安，成了延安管乐团重点保护的“专家”，教习各种乐器演奏，此时，他心里惦念着一个上海女同学。“我在半工半读时，她常跑去看我排戏，挺痴情的。”李德伦在夫人李珏不在座时，“拔高”了自己的形象。周恩来洞悉了他的心事，问他：何不接她到延安来？李德伦羞红着脸答道：因未在上海举行婚礼，故不敢带女友私奔。周恩来笑骂他封建。周恩来亲自与李德伦的女友通话，问她愿不愿意来延安，她当然满心欢喜地来了。翌年，李德伦与李珏结婚。

1953 年，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

李德伦离别妻儿，在最小的孩子才刚满月时，被国家送到这里。

在莫斯科，他做阿诺索夫教授的研究生，正规地学习指挥，他认为自己当时是很努力的，第一个暑假都没有回国，他的努力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100 周年的纪念册上得到肯定。他的老师教了几十年的学生，只有 4 名学生载入此册，李德伦是其中之一。

1957 年，已调至中央乐团的李德伦，身着黑色中山装，在人民剧场上演他在中央乐团数十年指挥生涯第一乐章。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首曲目的名子是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而后还有卡巴列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36 年过去了，李德伦指挥过数不清的音乐会，第一次登台的曲目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而后，他成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红的指挥家。1959 年，国庆 10 周年庆祝会在大会堂隆重举行，身着黑色燕尾服的李德伦指挥 500 人的乐队，演奏《春节序曲》、《哀格蒙特序曲》，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及一些外国首脑和使节观看了李德伦激情的表演。以后他多次担任重大活动的乐队指挥，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揪上批斗台。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提琴的夫人在旁陪斗，伤心欲绝，她从此发誓不再碰琴。

1987 年，北京举行交响乐之春，在首都体育馆，李德伦指挥 800 人的乐队，演奏柴可夫斯基的 1812 序曲，连演三场，场场爆满，那是交响乐火红的年代，李德伦既骄傲又畅快。“那次是我目前为止，指挥过最大阵容的演出。”

在一次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江泽民、李德伦同时在座，有一位文艺界前辈发言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是要大众化，懂得就要，人不懂的就不要。”李德伦不服地反驳道：“那交响乐要不要？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并不是很多人都懂得它。”江泽民发言了：“交响乐是地球上人类的文化，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人类就要继承和发扬。”之后，江泽民找来李德伦，对他说交响音乐一定要搞好。

1993 年 3 月 26 日的电视新闻，给人印象很深。

当时，吴祖强在江泽民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文艺组座谈会时说：“现在有一家海南公司要出钱支持中央乐团，要让中央乐团改名字。”江泽民激动地插话道：“支持可以，名字不要改。”全场掌声雷动。总书记要保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门艺术、一门渗透了李德伦等众多毕生为此奋斗的音乐家们心血的艺术，一门代表着世界文明、中国文明的艺术。

那次会后，江泽民立即责成海南省省长阮崇武办理支持中央乐团一事，李德伦很快去了海南，与海南国际招商投资有限公司签定了合作意向书。不久，海南国际招商投资有限公司把商定的 60 万赞助费划到中央乐团帐上，并

请李德伦监督使用。

“这笔钱不是来填补大锅饭的。”李德伦道出了这笔钱的使用计划，“第一要演出经过严格排练的高质量的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演员可获得演出津贴。第二要排练新创作的中国作品。第三是力促留学海外的音乐尖子回国。”

“其实，钱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中央乐团的管理体制问题。”李德伦在很多场合都直言不讳地说出问题实质。

“一个指挥是乐队的灵魂，乐队必须按照指挥艺术的设计来安排工作，这一点在中央乐团是根本行不通的，有时候要演出了，就临时借一个指挥上场，双方只见过几次面，指挥的风格，乐队的优势、劣势，大家都不清楚，如何能演绎出高质素的音乐？按国际惯例，一个交响乐队今年演完一个作品，三年之内不能再演，而我们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曲目，丢人呀！”李德伦痛心疾首之时，脸微微有些泛红，但他很快平静下来，长叹一声：“有些气生不完，我没法再憋气了。”心痛与心哀的情绪，在这时候交织着。他沉默地注视着他最喜爱的一张自摄的黑白照片，在 50 年代的万人大车间里，密密麻麻的工人们围站在临时搭成的舞台旁，小舞台上的几位艺术家投入地演奏，人们的情绪通过黑白像纸冷静地处理，仍掩不去那一份随音符起伏的激情，那是李德伦不肯尘封的回忆。在他辉煌的岁月里，他的脑子里只有情，只有音乐，简单、专注、深刻。此刻，焦急的烦愁似乎远了，而他又在投入地忘一次了。

“江泽民同志那次握着我的手说：‘你相信我们，请你放心。’是告诉我，国家没有忘记发展交响音乐这门严肃艺术，一定会切实支持的，听了他的话，我怎会不放心呢！唉，我可能太贪心，我焦虑的是想能快一点。”76 岁的李德伦发出迟暮的感慨。他盼望着，那个交响乐火红的年代再重来一次，艺术生命力永不停歇。而他即使没有站在指挥台上，那个在他心里的，穿着黑色燕尾服，在国庆 10 周年庆祝会上激情演出的年青指挥，一样会再次昂扬起来，在指挥棒飞舞之际，将生命的礼赞凝聚于最高境界，激发出人们深藏内心的一切美好感受。

(1993 年 8 月)

主动的严文井 段 佳

以前是从童话、小说里认识严文井的。印象里的严文井生动，迷人，能把人生的道理蕴藏在故事里读给孩子们听。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像许多做大学问的老先生一样已经谢顶，头发稀疏。唯一特殊的是牙，笑起来的时候，满口只有孤零零的一颗上牙在正当中把门。严文井认认真真地吃着碗中的汤面，一个劲儿强调：“这是我自己做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忽然，一直乖乖卷在沙发上的小猫摇着尾巴跑向门口——严夫人康志强回来了。严文井仍埋头吃面，只是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喜欢它，它却喜欢她。”

严夫人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严）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下午两点吃中饭。不像我，每天早起舞剑做操，锻炼身体。可是也怪，他从不锻炼，身体一样挺好……”严文井急了，反驳道：“谁说我不锻炼，你以为舞剑做操才是锻炼？我每天叠被铺床，擦桌子扫地，哪一样不是锻炼身体？”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循着做家务的动作比划开了。别说，还真有点儿太极拳的味道。

我们不愿错过这个精彩镜头，举起了相机。严文井来了精神：“我儿子也是搞摄影的。”提起子女，他掩饰不住自豪。“我有5位‘千金’，虽然现在看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如果响应了当年的号召，再有5‘千金’，我就是‘万元户’了。”

“子女都没跟我们同住。”她接过了话头。63岁的严夫人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活跃。我们很快知道严文井除了喜欢京剧还喜欢听交响乐，知道了乖巧的小猫会用尾巴跟着交响乐打拍子，甚至知道了严夫人年轻时不仅参加过军，还得过抗美援朝纪念章。这时，被“冷落”了半天的严文井冷不丁冒了一句：“她是在导弹部队！”

不“解气”的严文井还攻击夫人“真正军人的不是”，因为“她放过枪吗？她一夜急行军走过140里吗？她能一边走一边睡，还做梦吗？”乐呵呵的严夫人接口道：“他的意思是让你们问他的这些光荣历史。”严文井毫不谦让地抢着自我介绍。他是1938年5月到延安的，在第4期抗日军政大学开始了军旅生涯。第一次试枪，把手枪放在木板上开了一枪。严文井右手比划成手枪状，一脸当年的紧张和兴奋。

看着严文井如此生动的动作和表情，很容易想到他写的童话。当谈起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时，严文井说起一段趣事。他1935年到北平，两次投考大学，都未被录取。“那种考法是考不出真正的人才来的。”严文井气恼地说，“当时有一道语文题是：为什么桌子、椅子、狗不能用‘们’？至今我也不明白考官出此题是何用意？不过，”严文井无不得意地说，“我在后来的童话作品中着实用了些‘桌子们’、‘椅子们’、‘狗们’，小小地讽了它一刺。”

说到作品，我问：“您最近有什么儿童文学的新作？”

严文井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我最近写杂文多，好久没为孩子们写东西了。不是我不爱孩子了，是我的创作激情受到环境的‘制约’。我创作儿童文学的高产期，一是儿女们还小的时候，一是孙儿孙女们还小的时候，编故事是为应付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急需。而最近我考虑的多是成人的问

题，是社会甚至宇宙的问题，所以，只能用成人的方式来表达。”严文井说这番话时带着一脸的严肃。

“那您最近参加过孩子们什么活动？”我穷迫不舍，不愿错过有关孩子的话题。

严文井坦率又诚恳地说：“我很长时间不参加为‘六一’儿童节组织的活动了。这些活动千篇一律，孩子们说着大人的话，用语文老师的口气发言，刻板、笨拙。我坐在主席台上又累又尴尬……”

长期搞儿童文学创作的严文井认为，童心可爱而可贵。儿童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天地。当他在用“桌子们”、“椅子们”、“狗们”这样的语言写作时，就是这样想的。一谈到孩子们，严文井很开心，表情又开始生动起来。77岁的严文井现在虽考虑的多是成人问题，但仍很关注儿童的成长，他有一颗不混的童心。

(1992年11月)

新穴禹的梦想 ——记张光斗 张忠达

经历了 79 年风风雨雨的张光斗信念依然如故。在清华大学他的办公室里，张光斗不忘的就是他的六字信条：自尊自信自强。

张光斗说，我这么主张了，也争取着去做了，从年轻的时代开始。

和许多有作为的人一样，张光斗从贫寒起步。1912 年 5 月，江苏常熟某镇的一个张姓小职员之家增添了一条小生命，父亲将他取名为光斗。他是最小的儿子，3 个哥哥平均年龄大他 10 岁，父亲的希望便是来日家庭情况有所好转的时候，能供他在学业上搏个前程。几年后，他的哥哥们也陆续工作了，开始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挣钱，因而此时，张光斗便成了光耀门庭的希望。

张光斗入学了，清苦的环境所能教会他的就是勤奋，他的优良的学习成绩超过了父兄们的期望，因而舍弃了送他去职业中学就读的计划。张光斗来到上海南洋大学附小读中学。依然是如同以往的勤奋，依然是如同以往的优异成绩，最后他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从这时起，张光斗开始步入他将为之献身的事业。那年，他刚满 18 岁。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迎来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1935 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远渡重洋，入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30 年代的美国，正和中国一样遭受着水害的威胁，田纳西河的泛滥便是一个著名的事例。所不同的是这儿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张光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着那些极为有用的知识，在一点一滴求知的同时，张光斗的脑子里便也开始勾勒着一幅整治中国江河湖泊的宏图，虽然还是粗糙而模糊的。在这儿，张光斗创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从 1935 年 7 月入学，到 1936 年 5 月，短短不到一年，他便取得了硕士学位。在进入下一个学期的攻读博士学位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正像他留学美国之前那样，他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洪涝灾害情况，带着问题返回学校。

但是摆在张光斗面前的远远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在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工程力学的同时，世界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张光斗愈来愈坐不住了。虽然他仍拥有一方宁馨的学习园地，虽然他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导师，著名的工程力学专家威斯特伽特教授，虽然他获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优厚的奖学金，等待着他的也是一片广阔的前途，但张光斗还是不等念完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程。时隔 50 多年，张光斗回忆起来，仍然掩饰不住激动的情绪，他说当时他只是迫不及待地想为抗日出一份力了。

美国的土地上少了一个勤奋的东方学生，而中国的土地上却有了水利水电事业的开创者。回国后，张光斗即主持了四川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站的设计。从世界驰名的高等学府一下子扎入了穷乡僻壤，张光斗却是满心的欣悦。毕竟是在为祖国出力了。在山沟里滚爬摸索，一干就是几年。在山坡上，在沟渠边，留下的不只是他的汗水与足迹，还有那份爱情的甜蜜。就在这里，他同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钱玫荫女士喜结良缘。山沟里汇融着创业干劲以及浓浓的情爱，无论是生活的艰苦还是技术上的难题，都不曾使张光斗退却，而终于在这儿留下了他迈向事业的一个个踏踏实实的足印。首战告捷后，张光斗又开始了四川万县瀘渡河水力发电站的设计，不久又大功告成。在水浪的轰鸣声中，发电站送出的电流，化成了灯泡耀眼的光辉，化作了机器巨大

的动力，这时张光斗感到了由衷的满足。在抗战的日子里，这些地区的兵工厂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着军工产品。作为发电站设计者的张光斗，不无自豪地说：“我为抗日尽了一份力量。”

张光斗似乎一干便不可收拾，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的大后方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水电站。这便犹如在古老的土地上开了一条先河，中国人第一次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水力资源。但接着张光斗却越来越不满足了，因为这些水电站只具备 600 至 3000 千瓦的发电能力。他渴望着能为祖国设计大发电量的水电站。

1943 年，张光斗受命赴美国学习大水电站工程技术。他来到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当他徜徉在田纳西河河畔，看着这条被美国人民制服了的曾经兴风作浪的野河驯顺地在他的脚边流淌，张光斗感慨万千，中国这个拥有世界级河流的国家，何时也能像这样征服自然。有着一定实践经验的张光斗更明确自己的此行的目的。因而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吃住在工地，一个工程一个工程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白天积累实践经验，晚上学习理论知识。就这样度过了两年，而张光斗也成了—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工程设计专家。

张光斗回国了，是为着筹建长江三峡工程。他先后担任了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副总工程师、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在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考证后，他认为在当时建造三峡工程条件不具备，因而提出建造一批中型水电站的计划。在他的促成下，岷江、黄河上游、资水、滙江、钱塘江、古田、华中等 8 个水电站勘测处先后成立。但是在获得了大量的水电站地址的宝贵资料时，国民党政府已无力修建水电站了，张光斗不由得扼腕叹息。总处的美籍工程师柯登回国了。临行前，他深情地望着张光斗，希望他能和他一起到美国去，并许以优厚薪金与全家移居美国。但张光斗便如当年在美国国土上谢绝了美国导师的挽留—般，这一次，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拒绝了美国专家的盛情邀请。他当时说：“我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张光斗的设计大中型水电站的梦想在新中国才变成了现实。从 1949 年起，他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但同时也参与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水利建设。几十年来，张光斗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游的葛洲坝、隔河岩；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广阔土地上的各大水电站，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新中国的水利发展史上，记下了他光辉的一笔笔业绩。1955 年到 1956 年间，张光斗多次应邀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农业六十条”中的小水电—项就是应他的要求列入的。

在张光斗的治水生涯中，密云水库的设计当是一项杰作。1958 年，为了解决潮白河下游的防洪及北京的供水问题，中央指示建造密云水库。这项工程难度大，要求高，整个枢纽包括 2 座主坝、5 座副坝、3 座开敞式溢洪道，共 19 座建筑物，总库容达 44 亿立方米。虽然这是一项难题，但显然为张光斗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遇，多少年等待的机遇。张光斗思如泉涌，一笔笔地在空白的纸上勾画出了绚丽的宏图。设计中，他推出了国内首创的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新技术，为建造密云水库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许多并不是由张光斗设计的水利工程中，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倾注了心血。在工程学界，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里”，典故就出在二滩拱坝枢纽的布置上。当时张光斗坚决主张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而事实也证明了他正确。像这般为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献计献策的事还有许多。譬如对葛洲坝工程，他提出炸掉原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站布置的建议；譬如对丹江口水利枢纽，在大坝出现问题时，他当即上书中央力陈己见，终于避免了不应有的隐患。如此种种，张光斗赢得了国内同行的尊重。

对水利事业的贡献使得张光斗声名远播。在去墨西哥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他应邀对该国的几项水利工程提供技术谘询。由于他的建议对工程极为有益，墨西哥政府为表彰他对该国水利的贡献，特聘请他为墨西哥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他在毕业后所取得的成就，授予他 1981 年度“哈兹国际奖”。张光斗是第一个领受了此奖的中国大陆学者。

时间进入了 90 年代，半个世纪前的旧话重提，为是否建造三峡工程，中国国土上的学者展开了一番空前的论战。作为水利权威的张光斗，以多项科学的依据支持着这个建设项目。他在前后半个世纪间对这一问题态度的变化，恰好反映着时代与历史的变更。其实，水利这项古老的课题，正呈现着方兴未艾的势头，在经历了多少岁月之后，逐步取得了应有的地位。由于张光斗的倡导和水利界同仁的努力，水利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成了与能源、交通等并驾齐驱的经济战略要点。

过去，张光斗常呼吁“宁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现在的水利建设正越来越大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点。如今，张光斗垂垂老矣。然而，这位现代中国水利发展的见证人却依然在展望着未来，看着布满山河丘壑的地图，他心中描绘着的或许正是一幅新大禹治水图。

(1992 年 3 月)

张含英一生治河操碎了心

陈玮 周惠

“余热夕阳颂，向前赤子心”，这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水利专家、中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张含英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两句诗。

张含英先生曾长期担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 65 年的工作生涯中，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祖国的水利事业。如今他已耄耋之年，但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水利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余热。鉴于他的模范事迹，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张含英献身于祖国的水利事业不是偶然的。他 1901 年出生于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菏泽市。由于黄河泛滥，家乡常遭水灾之苦，这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改造黄河，为民造福，成了他以后学习水利、投身水利的最初动机。在报考大学时，他填写的几个志愿都是水利专业，足见其志。1918 年至 1921 年，张含英先后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求学。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继续深造，1925 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学成后，他立即回国投身于治黄实践，曾先后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总工程师、委员长等职。为了取得治黄的第一手资料，他不避艰险，从 1932 年到 1946 年间，先后两次对黄河下游和黄河中上游进行考察，走遍了龙羊峡以下的黄河各处峡谷。同时，他还全面搜集整理历代治黄史料，用现代科学观点加以分析研究，撰写了《历代治河方略探讨》、《黄河治理纲要》等 10 多种论著。他打破传统的治河观念，主张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综合开发、除害兴利等治河思想。然而，在旧中国，尽管他历尽坎坷，为治理黄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社会黑暗，战祸频繁，他的抱负和理想始终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治黄事业。1949 年，张含英先生受聘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 年起，又相继担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人民治黄行列。他在《黄河治理纲要》中阐发的许多思想和建议，都受到了重视和采纳。现在，按照张含英的建议，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三门峡等水利枢纽工程都已建成，其他坝址也都在拟议或筹建之中。此外，他还参与领导了全国的水利建设，主持或参与组织了许多水利工程项目，为推进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含英先生不但学识渊博，在业务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一直追求进步，矢志不移。新中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实践，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1953 年，他率队考察黄河中游，到达延安时，曾写一首《初访延安》诗，其中一句为“江南燕子飞来迟”，表达了自己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真实感情。1956 年，张含英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此后，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历经政治风波，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1981 年 5 月 12 日，根据张含英的表现，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在会上，这位 81 岁的老人非常激动，即席口占两绝，其中一首为：“决议庄严收党婴，深惭届耄获新生。高标近的长征路，意志钢铁分秒争。”张含英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充分展示了一个老知识分子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张含英在生活中，同样身体力行。他一生安于清贫。他的家训是：“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廉洁治事，勤俭持家；戒骄戒躁，谦虚为怀；服从真理，反省消灾。”张含英有4子3女，建国后，他虽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但从不谋特权为一个子女安排过工作，也没有为本人和家属提过任何特殊要求。

1982年，张含英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每天上午去办公室，至今未止。主要是学习文件，阅读新出的刊物和杂志，写点心得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在此期间，他潜心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明清治河概论》、整理编写了《治河论丛续篇》、翻译出版了《水力学》、《防洪工程》等书，总结了前人治河的经验教训，给后人以借鉴和启示。

(1991年5月)

百岁老人张国基穿过世纪风云

夏莉娜 王永志

这是天边一抹绚丽的晚霞，如诗如画。

这是人间一棵不老的青松，铁骨铮铮。

张国基，一个同毛泽东有着半个多世纪交往并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革命老人，一个在海内外从事华侨教育长达五六十年、桃李遍天下的华侨教育家，1992年4月度过期颐寿辰。

天下桃李颂恩师

1992年4月6日，当鹤发童颜的张国基一口气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十支红蜡烛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等来宾不约而同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那动人的旋律回荡在金碧辉煌的北京华侨大厦厅堂里。

4月11日，香港尖沙嘴海城酒楼举行了“庆祝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师百龄大寿”盛宴，2168名祝寿的嘉宾当中，大部分是张国基老师的学生，其中有100多人是专程从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澳门等地前来参加祝寿活动的。这是一次华侨界前所未有的盛大寿宴。

曾受过张国基教诲的学生代表纷纷上台，赞扬恩师辛勤工作、循循善诱的教育精神，言词间表露了无限的崇敬与深情。

张国基高兴地从坐椅上站起来讲话，他感谢在座的学生与朋友的祝贺，并深情地说，这次南来听到大家事业有成，很多学生已经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为专家、学者、医学博士、教授、企业家、大老板，还有许多人热心教育、举办公益事业而成了慈善家。这是学生们的光荣，自己这个当老师的也感到欣慰……

望着这位神采奕奕的百岁老人，大家簇拥在他的身旁，无不敬佩他敏捷的思路、高雅的谈吐，更为他虚怀若谷的精神所感动。

张国基于1920年到新加坡开始他的教学生涯，两年后又在印尼登上了讲坛，后来回到国内在长沙任教，其后又再次出洋，辗转近40年。其间，他任教最长的一所学校是他与另外5位老师在印尼雅加达创办的“中华中学”，他担任副校长一职长达19年。这所中学成为印尼华侨社会公认的最负盛名的侨校。1952年，由吴学谦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华中”，他说：“华中是华侨的骄傲，是南洋的一颗明珠。”直到1958年，他回国后定居北京，又担任了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直至今日。

张国基一生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的学生有几万人，单是现在定居香港的企业家、大老板的就为数不少，否则怎能筹备如此盛大的寿宴。

对于这位教书育人70余年的老教育家，他的学生们都说张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他不仅教授知识颇有耐心、循循善诱，而且对人诚恳热忱，待学生如兄弟。这给他的每个学生及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毛泽东的不解之缘

人们都说张国基与毛泽东有“四同”：同龄、同乡、同学、同事。

张国基说，他出生在离韶山冲不远的益阳农村一个贫苦家庭。他4岁时父亲病故，是母亲把他拉扯长大。7岁时他才进私塾，辛亥革命以后，到益

阳高等小学读书。

1915年，张国基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毛泽东在第八班，张国基在第十三班。毛泽东当时以好学不倦、律己严格、言行一致和胸怀大志，在全校师生中具有很高威信，也给张国基留下深刻印象。他十分喜欢听毛泽东评说古今人物，谈论读书心得，且深为润之先生精彩的论辩所折服。

1917年张国基作为学生志愿军警卫学校的一员，曾追随毛泽东包围溃败的北洋军阀残兵。张国基回忆说，这时的毛泽东已显露出了韬略与组织才能。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张国基也是其中的一员。学会大概一周或半个月开一次会，大多由毛泽东主持，研究学术或国事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张国基是学联骨干之一，当过副会长。毛泽东因已经毕业，名义上不算学联成员，但实际上是统筹全局的总指挥。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反帝的运动，湖南学联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词就是毛泽东写的。

1920年初春，张国基赴新加坡从事华侨教育前住在上海棋盘街，毛泽东住在相隔不远的毕勤路。那时毛泽东和张国基等人常常聚集在一起商讨湖南的建设问题和新民学会发展前景等等。

当张国基等人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同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时，毛泽东亲自送大家到船上。临别时，他紧紧握着张国基的手说，你要牢牢记住咱们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直到邮轮汽笛长鸣，即将起锚时，他才依依不舍地走下轮船，挥手作别。

到新加坡后，张国基孜孜不倦地传播中华文化，但也没忘记新民学会宗旨，一直与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

1921年2月，张国基的母亲去世。当他安顿好教务请假返里抵达家门时，毛泽东已经寄了两封信到张家。信中除了表示哀悼之情，还特别谈到了有关改良旧社会封建传统的习俗、不搞任何迷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希望张国基料理家事之后速到长沙。

心有灵犀一点通。张国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已同杨开慧结婚，而负责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从巴黎回到长沙，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学会继续向外发展等问题。并请萧和张到一些单位对法国的勤工俭学和东南亚各地情况作汇报和介绍，每到一处毛泽东都亲自陪同。

张国基的假期届满，即回南洋任教，后来又到印尼执教。他遵照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采取世界主义以及发达文化为己任的意见，进行实验，专心致志地开展教学，并在言行中灌输做人的道理，以此取得了华侨社会的信任，获得了很大成绩和很高信誉。

身在千岛之国，张国基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局势和毛泽东的情况。

1925年6月，张国基亲自护送一批印尼华侨回国。其后这批人跟着毛泽东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

1926年12月，张国基下决心辞去中华学校校长职务，回国参加大革命。临行前，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张国基回国后立即到长沙清水塘去见毛泽东。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告诉张国基：“我过几天去湘潭、湘乡、衡山等县去作农村考察。”张国基则对毛泽东说，他的一位老师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邀请他当训育主任兼

教语文课。

一个月后，张国基忽然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一封电报，叫他火速到武汉。于是，张拿着电报去找校长商量。这位姓王的校长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外请人。”就这样，张国基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来找毛泽东。毛对他说，“广州农民讲习所停办以后，在这里又创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

这段时间是他和毛泽东接触最多，几乎每天都要同毛商量教学问题一二次。

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亲自给学员讲课，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首先在这里公开发表的。在农民讲习所的日日夜夜，张国基对他的学兄润之更感敬佩，对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志向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严峻时刻，张国基迎着急风骤雨，在毛泽东和周以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张国基应毛泽东之邀，秘密赶到南昌，参加了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独立第一师师长。

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8月9日，张国基回到武汉。在去农民讲习所的途中，遇到了行色匆匆的毛泽东。他向毛描述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并催促毛说：“现在局势很紧张，你要快快离开此地。”

毛泽东告诉张国基，他当天就要离开武汉。由于街上不便交谈，他们握手告别。而这一别，使这两位老同学睽隔27载才重逢。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张国基现在是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北京文史馆馆长、燕京华侨大学董事长、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名誉校长、第一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虽身居高位，但一贯生活简朴、廉洁奉公、淡泊名利、自律甚严。

张国基这次赴港回京几天后，我们去他家里看望他。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幢普通的六层楼房中，这是三层一个不带过厅的两居室，普通的水泥地面上，没有地毯。一张大书案占据了这间会客室兼工作室的三分之一空间。案头堆满书报、张国基自己的书法作品及文房四宝。

张国基笑着从他的旧藤椅上站起来，一边请我们随便坐，一边讲起他的香港之行，他的声音仍然很洪亮，脸色红润，记忆力极佳。

秘书告诉我们，张国基这次在香港一共住了8天。每天早7点多到晚上11点来人不断，打乱了他平时的生活习惯，回到北京来比较疲倦，我们是破例被接待的。

张国基是这样一个人，总希望自己为社会多做些事，而尽量少索取，更不要组织上的特殊照顾。

张国基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始终是一个人生活，所有家属仍在老家。组织上考虑他上了年纪，起居需要有人照顾，同他商量把他的一个孙子调来北京与他同住，并给他当秘书。张国基为这事发了好大脾气。

别看张国基平时待人平易，很关心别人，可有时却非常固执。组织上曾几次要给张国基调新房，他都不同意。这一次组织上看张国基年满百岁，想给他换个楼层低点的房子，他还是坚持不要。

这时我想起了在张国基90岁大寿时，他在国外的学生汇集了生日贺礼

10 万元人民币，而张国基把它全数捐给了家乡，用以兴修水电设施。在张国基 95 岁寿辰时，他的海外学生又送了近 25 万元港币贺礼，这笔钱后来被用在海外成立的“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上，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工作出色的教师。

在张国基并不宽敞的居室里，摆放着他自己常用的几件最普通的旧家具。唯一的大书案是张国基从华侨补校买的一张旧办公桌，又请人做了一块大木板放在上面改造而成的。墙上挂着一位中年书法家写的条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们想，这正是张国基平生为人的真实写照。

(1992 年 7 月)

一代摄影艺术宗师吴印咸 李振盛

吴印咸这位与 20 世纪同龄的老人，在摄影艺苑中辛勤地耕耘了 70 个春秋。由于他“在摄影艺术和技术上功勋卓著”，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理事会于 1988 年 4 月 25 日举行盛大的授勋大会，向他颁发了“功勋奖状”。

多年来，吴印咸所拍摄的大量的优秀摄影作品和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照片广为传世，教育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名字随同他的作品，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尊敬。

从影七十年蜚声海内外

1900 年 9 月，吴印咸出生在江苏沐阳一户书香之家。其父毕生从事教育，学问广博。由于自幼受家庭的教育与熏陶，吴印咸立志读书做事决不后人。

高小毕业那年，遇水灾困扰，家庭无力供给上中学，他便报考了淮阴一家生产棉布和线毯的工厂。在厂里，他半工半读，半日当织毯工人，半日学文化。他利用自己酷爱美术的本领，设计了不少新颖的线毯图案，受到好评。结业后厂里留他教图画课，这成了他一生从事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契机。

1919 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吴印咸考取了刘海粟美术大师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他看到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玩弄照相机，感到摄影比绘画更接近自然，更变幻无穷，因而十分渴望自己能有一架照相机。当他在一个旧货店见到一架标价 3 块银元的勃朗尼方匣式旧相机时，徘徊许久，终于下决心用自己节衣缩食的钱买下了它。这架只有一档快门，用手升降控制光圈的方匣相机，竟使他的人生之路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美专毕业后，他先是在家乡当了 4 年美术教员，而后来来到上海滩，先后做过照相馆的摄影师、电影布景的美工师和电影摄影师。这个时期，他所拍摄的照片主要是反映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例如《晓市》、《饥寒交迫》、《难兄难弟》、《呐喊》、《吃斋果腹》、《过别墅有感》等代表作品，就是大都市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心态的写照。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电影摄影师，在夏衍的建议和鼓励下，他先后于 1935 年拍摄了田汉编剧的《风云儿女》，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拍摄影片，在运用镜头变化和光线的层次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在上海公演时，成为轰动一时的名片。后来他陆续拍摄了《都市风光》、《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其中《马路天使》在摄影技巧方面的成功轰动了整个影坛，它不仅成为 30 年代进步电影的杰出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吴印咸电影摄影技巧走向成熟的标志。

1938 年夏，抗日烽火连天，袁牧之电邀吴印咸到武汉，商讨周恩来邀请他们到延安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的事。他们正苦于没有足够的胶片和器材。恰好这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传来一个好消息：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之后，本想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因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未能成行。伊文思在武汉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当他得知吴印咸等准备去延安拍电影，便决定将自己随身所带的电影摄影机和胶片赠送给八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印咸受党组织委派，秘密地去接收这批器材。在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旁，过了一会，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

国人，将一台摄影机和 2000 英尺电影负片交给吴印咸，并低声说：“延安！延安！”他们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由于环境险恶，不便交谈，在夜幕中匆匆分手，竟然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当这两位老人 1957 年在北京再次会面时，彼此仔细端详对方的面孔，回想起汉口夜晚初次见面的情景，无限感慨与快慰交集在心头。

吴印咸将伊文思所赠的摄影机和胶片，几经周折全部安全地带到了延安，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电影器材。当吴印咸与袁牧之一起到达延安后，正式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他先是担任摄影队队长，后来被任命为延安电影团负责人。1939 年 1 月电影团奉命深入到敌后广大地区，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及许多我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场面，还跟随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共同生活了两个月，曾两次上战场，拍摄了白求恩大夫在前线古老的小庙里抢救伤病员的纪录影片和著名的文献照片《白求恩大夫》。1940 年电影团从敌后回到延安，他除了拍摄大量的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文献纪录电影片外，还拍摄了毛主席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的重大政治活动的大量照片，例如人们所熟悉的《登机告别》、《运筹帷幄》、《创业》、《组织起来》、《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前线视察》、《兄妹开荒》、《南泥湾》等等，这些照片成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教材。

吴印咸自 1935 年首次在上海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以来，先后举办个人摄影展达六次之多。在二三十年代，他的作品大多以暴露旧中国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为主题。参加革命后，他的作品由暴露转变为歌颂，歌颂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业绩，歌颂延安精神和革命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建国后，他的作品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为主旋律。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现实主义的写照和摄影画面的艺术处理，用来增强摄影作品的生命力，则成为我摄影的主要风格。”

育人四十载桃李满天下

多年来，吴印咸十分重视并关心摄影教育事业。他一贯认为摄影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知识不可能成为一名摄影家。

早在 1943 年，他在延安就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率先举办了二期摄影训练班，亲自讲授摄影课，为中国革命培养了第一批摄影骨干力量。

建国 40 年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为国家培养摄影人才上，被誉为一代宗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是由他亲自创办的，30 多年来，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摄影人才，他们遍布祖国各地，成为电影摄影、新闻摄影、艺术摄影和摄影教育的中坚力量。吴印咸的学生中成为摄影艺术家、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者，比比皆是。

60 年代初，当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时，吴印咸的著作《摄影艺术表现方法》就是我们的教材；为我们讲授摄影课的几位青年教师，也都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由吴印咸教过的学生。1962 年，年逾花甲的吴印咸还应邀专程由北京赶到长春，亲自为我们这些立志投身摄影事业的学生讲授《摄影构图》和《人像摄影》课。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精心传授他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知识，在灯光实验室中认真指导学生实际拍摄。亲自作灯光照明示范，在用光、构图、摄影基调等方面，对我们要求极

为严格，使我们得益匪浅。这一切，在我做新闻摄影教学的岗位上，成为课堂教学的“资本”。一晃近 30 年过去了，现在我的儿子也学了摄影专业，曾有幸聆听过我的老师、八旬高龄的吴印咸讲学。说来也巧，我现在作为一名摄影教师，吴印咸的孙子竟又成了我的学生。摄影，成了我们几代人之间不解的机缘。

总结自己从影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和丰富的经验，吴印咸先后编著出版了《摄影艺术表现方法》、《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构图 120 例》、《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等近 20 本著作。这些著述为一代又一代爱好摄影的青年人提供了自修教材，为广大的摄影工作者提供了业务工具书。

目前，即将 90 岁高龄的吴老，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理事长、名誉主席和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前不久，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荣誉教授称号。日常他要参加很多社会文化活动，还集中精力整理编辑他自 1923 年至 1989 年的摄影作品选集，并准备撰写他从影 70 年的《摄影回忆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印咸曾充满激情地对我说：“我步入这个世界已快 90 个年头了，有诗曰：‘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着摄影事业，为着广大的青年一代的未来，我尽到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

(1990 年 1 月)

人也磊落画也真淳 ——记吴作人 周昭坎

前年，著名老画家吴作人 80 岁。几家美术出版社有心出版他的传记和文选，可惜，事不由人，拖到去年才印出。当编辑挟着样书，踏进北京西郊吴作人寓所那间兼作会客室的简朴书房，深怀歉意地向吴作人说明原委时，不料，吴老却说：

“那有什么关系？不怪你们，怪我早出生了一年！”一句笑话，把大家全逗乐了。顿时，这间因为堆满了书而显得拥挤的书房，如沐春风，笑语频传。无怪乎，大凡和吴作人有过接触的人都这么说：在吴老身边，你可以同时感受到智者的聪敏、贤者的豁达、仁者的慈爱和艺术家的真诚，就像欣赏他的那些水墨画，无论高原牦牛、沙漠骆驼、竹丛熊猫、池中游鱼或水色天光中的仙鹤，都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沉静温和与给人以进取的激励；一种从容高洁，和净人灵魂、潜移默化的感染。有人说：看了吴老的画，牢骚、暴戾之气都自然消散，哪怕猛鸷的苍鹰、粗犷的牦牛，到了吴老的笔下就像烈酒变成了老窖，那种剑拔弩张之势，都化为深厚含蓄之美。这是一种高度文化修养之美，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之美。吴作人以他的人品、气质与修养，继承了中国文化中这一最有魅力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欧洲写实主义精确的造型技巧，在民族审美理想滋润下创造了一种水墨画简约、清新的画风，独步中国画坛，称誉世界艺林。

“人也磊落，画也真淳”。正是这种中国人所崇尚的“艺品人品俱高”的艺术家品格，吴作人被推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荣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在国外，他同样享有极高的声望。1983 年，受聘为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和美国奈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客座中国部高级研究馆长；1985 年，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艺术文学最高勋章”，1988 年，比利时国王授予他“王冠级荣誉勋章”。

对于这位耄耋画家来说，过去的 80 年，可谓“功成名就”，本应是无所可求的了。但是，就在他的弟子和敬慕者为他庆祝 80 岁生日的那天，他却说：“我还要做一件事，就是以我的一些作品的义卖收入作为基金，成立一个国际美术基金会，用以奖励和资助国内和国外华侨、华裔优秀美术家的创作和研究，以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亲自联系奔走，并且于 1988 年暑期，专门为义卖挥毫，创作了一批精彩作品。他亲自为“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设计了会徽，那是他 40 年来经常描绘的牦牛的一个头。他说：“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但是，这牛不是普通的老黄牛，它是高原上的牦牛。牦牛不仅有黄牛吃苦耐劳的品格，而且更有坚毅不拔奋力进取的性格。我希望基金会能有这种牦牛精神，为美术事业做一点贡献。”

吴作人，祖籍安徽泾县，1908 年生于江苏苏州。家境贫寒，3 岁丧父，弟兄 9 人全靠长兄抚养。因为祖父是一位画师，遗下两箱旧字画和一些笔墨纸砚颜料，给了年幼的吴作人最早的美术启蒙。后来，他终于考进了上海艺术大学和南国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师从徐悲鸿，并在徐悲鸿的鼓励下，远赴巴黎半工半读，考进了巴黎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后来又考进比利时王家美术学院巴思天教授工作室。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1935

年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团赴前线写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又辗转于大后方，深入青海、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并到敦煌考察古迹。1946年，他应徐悲鸿之邀，北上接管北平艺专，任油画教授兼教务主任，直到迎来解放，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先后任教务主任、副院长、院长，1979年任名誉院长。

吴作人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一个有志于美术的人，尤其是青年，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应该像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每每想到这里，总忘不了徐悲鸿、巴思天以及他的长兄吴之屏为他提供的机遇和经济上的帮助。所以，到了耄耋之年，还一心筹划，要实现建立国际美术基金会的夙愿。1989年9月18日，“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首发“青年奖”，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

吴作人内心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为获奖的两位青年画家分别赠送了亲题的勉词，对他们寄予无限的深情与希望。

吴作人经常说：“我一生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在人生观上，在思想境界上要无我：一个是在艺术观上，在艺术境界上要有我。”这里所谓生活上的“无我”，就是对个人得失的超脱；而所谓艺术上的“有我”，就是对艺术个性的锻铸和对艺术尊严的捍卫。当然，这种“有我”决不是眼下时髦的那种故作姿态、哗众取宠的“自我表现”、“自我怡悦”。他一向主张“艺为人生”、“艺术上的最高表现是同情而不是自私”，坚持“艺术是人世的，是时代的，是能为人们理解的。也只有那些能为人们理解的艺术，才能垂之永久。”吴作人以自己的诚与勤，实现了他的追求。

(1990年7月)

台湾企业界的“铁娘子”吴舜文

林 木

一提起“铁娘子”，人们马上会想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而在 20 世纪的中国企业界，也出了一位“铁娘子”，她就是台湾省知名女企业家吴舜文。

吴舜文所统领的台湾裕隆企业集团，包括以汽车、纺织为主的 23 家分公司，她担任其中 21 家公司的董事长，麾下管理着 1.1 万名员工，其总资产超过新台币 500 亿元。经营企业，她理想高、目光远、重实际、不投机；做人处事，她诚实、守信、公正、坚毅。知易行难的品德使她在素来由男性主宰的工作领域中脱颖而出。

那么，她究竟是如何开拓出这一片光辉灿烂的人生？

狐狸袍下救活的小女孩

1913 年农历 11 月 8 日，中国人才之乡——江苏常州正值严冬季节，寒风呼啸，雪花纷飞，整个一个冰冷彻骨的世界！以商、官传家的赫赫绅士吴镜渊家，膝下已有三子一女的吴氏夫妇，正引颈期盼着第五个儿女的诞生。哪晓得婴儿落地后竟然不哭也不动。接生婆以直觉判定：“小孩冻死了！”经过阵痛的产妇诸慧芳，勉强睁开疲倦的眼睛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听说是女孩便无力地挥挥手，表示冻死也就算了。但是，丈夫吴镜渊不肯放弃，他把奄奄一息的小生命轻轻抱起来放进自己暖和的狐狸袍里耐心地捂着，直到感觉婴儿的小腿开始慢慢蠕动……

这个在生死边缘被父亲用皮袍子救活的女孩，就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女企业家吴舜文。

按吴族家谱排列，吴舜文与堂房姐妹为“柔”字辈，其姐妹分别叫静柔、顺柔，而她取名怀柔，以纪念那段在父亲怀中活过来的故事。舜文则是她对外的学名。

童年时代的吴舜文长得明净、俊秀，聪明活泼，就是“顽皮、捣蛋”了一点。她喜欢和堂兄弟们一起玩踢毽子、造房子和跳绳等游戏，不愿与姐妹们呆在一块学女红。每当她大哥放假回家后，她总爱同他们一起参加球类竞技。而三个哥哥并不喜欢这个“会捣蛋的小女生”。他们常背着她玩斗蟋蟀，一次，好奇的小舜文趁他们不注意，掀开蟋蟀罐盖子看个究竟，结果让蟋蟀跑掉了。虽然她偷偷给补回了，但仍被哥哥识破而遭到斥责。另一次，她竟因大姐不让她看打麻将而操起剪刀将大姐的长辫子剪断，被父母亲狠狠教训了一顿。

从小就是“领袖相”

在吴家的六个子女中，要数吴舜文最具“领袖”威仪。她小小年纪就知道支姐呼妹，要这个为她倒茶，要那个给她拿东西，并在游戏中担任组织者。母亲看不过去便数落她：“肩不挑，手不能提，七寸（毛笔）、七分（女红）也不喜欢，只会调兵遣将。”“我听你一下叫这个，一下叫那个，最好有一天你能一呼百诺！”

令母亲诸慧芳未料到的是，几十年后她这句话真的成为现实。

1924 年，12 岁的吴舜文未经任何考试，进入常州一所教会学校念小学二

年级。次年，她的父亲吴镜渊在上海看到极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中附小招生，便让她考进了中西第二附小三年级班。中西女中教育方式西化，聘请外国教师均用英文教科书教学，学生大多来自豪门巨商之家。吴舜文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受到了严格的自我训练，奠定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为以后继续深造和事业发展作好了准备。

不甘寂寞 赴美深造

1935年，即将高中毕业的吴舜文奉父母之命，与上海泰利机械厂老板的儿子严庆龄结了婚。虽然婚后夫妻相爱、感情甚笃、生活优越，但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的她，却因丈夫为事业而忙碌，自己却无所作为而苦恼。她胸有鸿鹄志，想干一番大事业，却无从做起。每当她面对孤灯只影之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猛烈撞击她的心，难道从此就做一个无所作为的良家妇女吗？“不，我不甘寂寞！我要展翅高飞！”吴舜文暗暗下定了决心。后来，她随丈夫参与了一些工厂管理工作，立即才华毕露——头脑清晰，办事干练，深得严庆龄的赏识与器重。

大陆解放前夕，吴舜文随丈夫移居台湾。1951年，严庆龄着手创办台元纺织厂，他多么需要妻子能在此时鼎力相助啊！可是，心存宏愿的吴舜文却毅然决定赴美深造。严庆龄在她的“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真诚精神感动下，同意并支持她远涉重洋飞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38岁的吴舜文深知这次学习的机会难得，因此，她珍惜每分每秒时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其余时间除了吃饭外全部用于学习。她没有参加过周末娱乐活动，也没有闲暇的星期天，更无潇洒、快活的假期旅游，有的只是书本、笔记为伴。皇天不负苦心人！吴舜文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以深厚的学识和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哥大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52年，踌躇满志的吴舜文满怀豪情自美返台，开始描绘她多姿多彩，光辉灿烂的人生画卷。

纺织界第一位女董事长

吴舜文回到台湾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丈夫创办的台元纺织厂工作中去。她广纳善言、博采众长，想方设法增加和更新设备，调动员工积极性，使纺织厂产品和质量不断提高。1953年，丈夫严庆龄筹组了裕隆汽车制造公司，便把台元纺织厂交给吴舜文管理，并任命她为纺织厂董事长。从此，吴女士成为台湾纺织界第一位女董事长。

首创三班工作制

吴舜文主导台元纺织厂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台元”在企业界率先实行“三班工作制”，从而带动企业界掀起一场工作时间大革命。

50年代，台湾纺织界洋溢着安乐顺利的气氛，业者之间没有竞争，员工工作平稳。深谋远虑的吴舜文则认识到，顺境终有尽头，业者迟早要向国际市场进军，但条件是更新设备，提高效率和改良产品质量。然而那时的台湾纺织业者因业务来源稳定，不重视产品质量，一味追求数量。一般纺织厂将工人上班时间分两班，每班工作10小时，如需赶货就加班两小时。由于工人体力有限，超时工作必然影响效率。于是，吴舜文下定决心在1960年率先在自己工厂实行三班工作制，每班工作8小时。结果是，工人工作效率与技术

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工时虽短产量反而上升，员工精神饱满，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公司利润不减反增。在“台元”工作了37年的工人王瑞妹深有感触地说：“我相当景仰董事长以一介女性之身，竟能如此大刀阔斧。”

“三班工作制”的优越性一展现，台湾企业界立即学习，一场工作时间大革命在全台展开，为台湾工业起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吴舜文管理企业的格言是：工人肯关心公司的前途，老板肯照顾员工的需要，就是公司成功的最佳保证。1962年，她以关心员工生活成绩优异而荣获“光荣事业主”奖。

“人家不做，我要先做”

观念新而富远见是吴舜文管理好企业的法宝之一。她常说，公司要不断发展，就必须吸收新技术、新理念，不断革新。“人家不做，我要先做”。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50年代初她就警觉到，台湾纺织业要冲出本岛，销往世界，产品一定要好，而产品要好唯有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1960年，在她与丈夫的决策下，台元公司扩建厂房并引进英国著名的纺织机械厂家PLATT纺锭1.4万余锭，使用后效果良好、产量大增。1967年又增购了2.1万余纺锭，成立了第二纺织厂。“台元”还第一个带头使用自动筒子机，第一个抛弃传统的日本纺机而转购比利时高精度性能织布机，第一个购买瑞士无梭织布机……

设备和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台元公司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市场兴旺，利润持续上升。为了使企业继续发展、精益求精，吴舜文仍不断鼓励高层主管人员及时买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并营建新厂房。一位前台元公司总经理回忆说：“董事长只要听我们说机器是首创的，尽管价钱昂贵，同行都没有引进，她一定批准购买。”

汗水迎来丰收的喜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台元纺织公司经过不断引进技术和对制度、福利的改革，其规模不断扩大。60年代，由于它领先开拓了澳大利亚和英、美市场，业绩迅速起飞。1969年，其外销业绩首次超过1000万美元，居台湾纺织业之冠，从此蝉联“外销绩优奖”长达12年之久。“台元”初创时期，厂地面积为145亩，资本额200万台币，两万纺锭，240台织布机和800名员工。80年代后，其地产比原来增加8倍，员工和纺锭也为当初的8倍，资本额便达到300多亿新台币。“台元”的业务也渐由上游的纺纱、织布，延伸到针织、成衣、制线和染整，无论是平布织花或牛仔布开发，始终走在浪潮的最前头。

一向强调前瞻性的吴舜文，还不止一次地在景气低迷、企业界人心惶惶、怨天尤人之紧要关头，欣然拿出巨资去投资。她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不景气时投资，然而等到景气恢复后，再添设备往往就晚了一步。台元公司与众不同，景气低迷时先行扩张，更新生产设备，一旦景气复苏即可全力冲刺，发挥如虎添翼之效果。“台元”于1967年以4100余万台币收购了处于困境的台湾“中纺”公司和1972年购并“台昌”纺织公司，便是最有名的事例。对此，一向支持妻子的严庆龄也翘起大拇指说：“好啊，你为女性争了光！”

1980年，台元公司外销金额超过1亿美元，荣获台湾当局颁发的金质奖章。翌年，“台元”举行30年厂庆，全体员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隆重庆祝。

吴舜文在冠盖云集、欢声如潮的气氛中发表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激情讲话。她特地敞开厂房大门，让充满钦羡的同业一睹她引进的多项尖端生产设备。此时的她，犹如经过千辛万苦以优异成绩第一个跑完马拉松的运动员，心中感到无比的欢快与自豪！

回忆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台元”副董事长吴振家说，手握公司所有权的吴舜文、严庆龄能充分授权给管理者，信任专才，从不任意安插亲友困扰人事，使上层决策能充分下达，乃是台元纺织厂优于同行的重要经营条件。

教育战线再展才华

从事教育和管理企业，是吴舜文事业生命中的两大血脉。她因主持台元纺织厂获得过许多殊荣，也从从事教育工作而得到喜悦和成就感。

吴舜文在“台元”任董事长期间，同时又先后受聘于台湾东吴大学和政治大学，从事英语、国际关系、西洋通史、公共行政和西洋近代史几门学科的讲授工作。她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师生们的称赞和尊敬。她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备课认真，授课一丝不苟；她要求自己一上讲坛就“融入讲题，浑然忘我”；她对学生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20余年杏坛的春风化雨中，学生对她的评价是，一位既严格又认真的好老师。她的职称也从讲师逐步升到了教授级别。

丈夫去世承接“裕隆”

1981年3月，对吴舜文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月份。那月，与她携手共进，比翼双飞，开创了非凡业绩的丈夫严庆龄，在与病魔抗争了四五年之后，终于撒手人寰。这对吴舜文的精神乃至事业都是一个严重打击。然而不向命运低头的她，硬是打起精神，为丈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擦干眼泪，毅然挑起了丈夫遗留下来的重担——裕隆汽车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成立已经28年的裕隆公司，在她丈夫严庆龄董事长的执掌下不断发展壮大，其生产的汽车在台湾和东南亚市场已很受欢迎，销路一直不错。吴舜文继承夫业担任裕隆董事长，以她特有的眼光和智慧，引进人才、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力排众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裕隆汽车业再获发展，将生意做到了欧美。她还遵照丈夫的遗志，投入大笔研究费用，致力培养中国人自己设计汽车的能力，制造出台湾牌子的“飞羚”汽车，为中华民族争了光。10余年来，她以独到的眼光、非凡的魄力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将裕隆汽车公司发展成为拥有万名职工，总资产达500亿台币，包括汽车、纺织、电子、通讯等20多家分公司的裕隆企业集团，令中外企业家对她刮目相看，尽管全世界汽车工业的方向盘甚少由女性执掌，但吴舜文——中华民族的中帼英雄，却在世界企业家们的口中被称之为象征勇气与魄力的“龙头”、“龙的女儿”和“铁娘子”。对此，吴舜文曾说：“我和她（撒切尔夫人）有颇多相同之处。我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做决策快且不轻易反悔；更重要的是，一旦机会来敲门，我们都绝不放过。”这或许就是她事业成功的秘诀吧！

老当益壮重振“台元”

吴舜文接手裕隆汽车公司后，无暇顾及台元纺织公司，“台元”的经营逐渐失去前瞻性。1987年底，全球纺织品市场一片萧条，“台元”为节省开支而大幅缩减经营范围，自此曾经风光一时的台元纺织厂衰落了。

“台元”能就此消沉下去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1988年，吴舜文的独生子、24岁的严凯泰开始接下裕隆汽车公司的领导工作，使吴舜文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抓一抓“台元”。她积极督促“台元”往“少量多样、加工层次高”的产品发展，并运用雄厚的资财使高科技产业主角化，以使“台元”重振昔日雄风。如今，“台元”已与高科技紧密联结在一起，首先开发“高功能电表”，接着又设立“台杰资讯科技工业公司”，生产黏着式电脑主机，堂堂进入下个世纪主宰世界经济的电子行业。

1992年，精神矍铄的吴舜文已年近八旬，但她毅然接下了“台元”经营管理的重担，亲自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决不服输的战斗姿态投入了拓展“台元”广阔发展前景的征途。她满怀信心地说：两年后，“台元”必让人们刮目相看！

(1994年3月)

陈贻焮把一只眼睛献给了杜甫

李 方

陈贻焮教授盲一目，而目光依然淡泊幽远。

穿过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弯弯小径，沿路的松竹流水，石阶石桥，仿佛在暗示我去体味一种做学问的境界。先生窗外的竹篱上藤蔓缠绕，虽值金秋，阳光雨露之下，依然青翠可人，恰与窗内先生的身影构成一份宁静与和谐。

想起一次在北大和美国留学生罗伯特喝酒，罗伯特顺口背出一首唐人王翰的绝句“葡萄美酒夜光杯……”，一板一眼，字正腔圆。我惊奇之下赞了几句，不想罗伯特不以为然地说：“我读硕士已经第二年了，陈先生正指导我念陶渊明呢！”嗨！我心想，这回碰上个洋师兄。

“是陈贻焮先生吗？”

“还能是哪个陈先生？”罗伯特那口气大有电视广告中那句“我只认力波啤酒”的劲头。

联想相声界洋徒弟满天飞的状况，一次我问陈先生：“您是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怎么这回收了个洋硕士？”言下之意，先生您是不是也在赶时髦？先生仿佛看破我的意思，收起笑容说：“罗伯特这孩子真好！他爸爸是美国一位律师，可他因为热爱咱们中国的古典文学，不要家里一分钱，跑到北大来念书。再说，他刻苦，底子也不错，我就收了他。他经济上很拮据的，我还得帮助他呢，向学校申请给予适当的照顾。”

陈先生 67 岁了，可做事依然往往出人意料，就是在学术界也赢得了一个“打家劫舍陈贻焮”的名声。“这名声不太好听吧！”先生笑着向我解释，“其实不过是朋友开玩笑送给我的，一方面指我做学问不因袭古人，另一方面也是说我并无门户之见，别人的成果，只要我认为正确的，就毫不犹豫地用在我的研究中。”“当然我用的时候是要注明出处的。”先生补充道。

唐代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人一杯咖啡，坐在先生对面，那种春风化雨之感，令人尽洗俗尘。先生向我扬扬手中的杯子说：“我喝咖啡从来不加‘伴侣’不加糖，咖啡嘛，就是品个苦味儿！”

品尽做学问的苦，方登澄澈湛然之界。先生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有人说我是把这只眼睛献给了杜甫！”

“我太喜欢杜甫了！早就想写他的评传，心里也一直有一种创作行动。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拖到 1979 年才得动笔。然后是整整 5 年，日日夜夜都与杜甫在一起。那时候我真是活见鬼了，老是恍恍惚惚地看见杜甫。他就像我的亲兄长，虽在斗室之中，却带我游遍大江南北、鲁东川西，我们仿佛一直在同吃同行同卧，同喜同悲。我手里的笔仿佛已不属于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写下去。写到杜甫春风得意时，我也跟着他手舞足蹈；写到他悲凉的处境时，我干脆扔下笔大哭一场，哭过以后再接着写。”

一个人钟爱他的事业竟能到了如此地步！难怪当初我读 100 多万字的三卷本《杜甫评传》时，竟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当时我仿佛从杜甫的形象后边看到一个身影，从杜甫的诗歌后面听到一个声音，原来那就是陈贻焮先生！每当读到淋漓酣畅之际，便觉先生与杜甫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唯其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才使洋洋百万言的宏著中始终充满一种浩然之气，即使以杜甫如此曲折的身世，在众多的低回哀婉之处，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哀而不伤，

不害文气。

“我的左眼就是在那时候损坏的。起先是看东西一片模糊，然后就慢慢感受不到光亮，直到《评传》写完之日，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看，我是把一只眼睛献给了杜甫吧！”

我注视着先生的左眼，但终于未看出任何异样。双眼的目光一样的淡泊和幽远，这是先生的风格。

前几年陈先生开杜甫专题研究课时，我曾慕名前往聆听，但到了门口，却不曾挤进教室。听课的人太多了，教室就像一个满载的车厢，我只是从人头缝隙中看见了先生，藏青的外套，厚实的身影，神光内敛而意韵悠长。

从《唐诗论丛》、《王维诗选》直到《杜甫评传》，陈先生著述已达 200 多万字，先生的名字也被美国传记学会收入 1990 年世界第 3 版的《国际名人录》。所谓“酒好不怕巷子深”，先生虽淡于名利，但终有许多后辈学者拿着自己的书稿找上门来，请先生力之作序，而先生为人又极认真，不愿天马行空地空放几炮了事，故每部书稿都要仔细看来，所费时间精力极多。先生苦笑着对我说：“其实我多想有时间再干点自己的事，选评一本《唐人律诗精华》。”

回来的路还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先生与我同行。路边有几个小孩停下玩耍，抬起头来喊：“陈爷爷！陈爷爷！”先生蹲下身参与了孩子们的游戏，并回过头对我笑道：“我们是忘年交！”

是未名湖了，秋天的湖水倒映着塔影，深湛而宁澈。天空中小燕子在扑翼高飞，沿湖的小径上年轻的学子匆匆来去，与先生擦肩而过。先生抬眼向远方望去，西天夕阳无限，晚霞满天。

(1992 年 2 月)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陈荒煤

韩小惠

这位老人，行年八十，名字叫作陈荒煤。

曾读过他的许多散文名篇，像《梦之歌》、《你是怎么想的》、《广玉兰赞》、《告慰丽尼》……无不为他浓郁的情感诉说和大家气象的行文所震撼。一个久已的疑惑在心头盘旋着：像他这样一个久居高位的官员，何以还能这样地“文学”？

他真的是一位官员，而且是大官。1932年他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在那一年入了党，1933年到上海加入“剧联”，后转入“左联”。1938年他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52年由中南军区文化部调中央电影局，历任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担任过六届、七届政协常委、教育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四次文代会上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夏衍先生对他有一小段恰如其份的评价，说他是“从书生到作家，从小说家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

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他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也体现在他的理论研究实践上。今天回想起来，当初开篇时真是一张白纸，一片远天。解放区来的作家们，包括李准、孙谦等名作家在内，过去谁看过电影？当时进影院不也还像孩子过节？硬叫他领着这群“孩子”写电影，岂不是让星星放出月亮的光芒？他豁出命来干了，白天与他们一起摸爬滚打，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夜晚独坐灯下苦读苦写，用理论充实这支先天不足的队伍。最后，星星不但超越了月亮，还放射出太阳的万道金光，《李双双》、《五朵金花》、《青春之歌》……一部又一部电影名片征服了亿万颗心，新中国也终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剧作家队伍。

像他这样亦革命，亦文字的专家领导，我们党内不是很多的。而他的个性也极其执拗，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松最后一条封锁线，即是写作。他写了大量散文和论文，但是没有长篇小说——其实他从内心里多么渴望写小说啊，他说自己是个“小说迷”，可是他没有时间。

他不是那种前呼后拥的领导者，也不是那种张张扬扬的文坛活动家。他似乎不怎么爱说话，更不爱说闲话，有时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见到他，都见他沉默的时候多。你跟他说话、谈事情，他也总是静静地望着你，然后很简练地答复你几句。他的身体似乎不是很好，比较瘦，脸色也不怎么红润，用冯牧先生的话说，是“人已垂垂老矣”。这似乎还不是年事已高的缘故，而是“文革”遭受长达十年折磨所致。但是他的朋友真多，朋友们无不说他精神矍铄，明目达聪，不减当年。这“精神”二字，当然不仅仅指体力上的含义，更是指他心中的激情与火焰。

我过去没有采访过他，对他不太了解。他给予我的第二次震动，是在上一个年度的岁末，为他举行的“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上。那天一清早，首都文学和艺术界那么多人冒着严寒赶到会场，使政协礼堂宽大的三楼会堂变得狭小局促。会场里满眼是名人，荣高棠、张光年、王蒙、林默涵、周巍峙、吴雪、高占祥、冯牧、袁鹰、邹荻帆、李瑛、张锲、叶楠、李国文、从维熙、蒋子龙……一长串的名单简直无法写完。群星灿烂中央，坐着他。他依然是那一副风度，大部分时间沉默着，睿智的目光从眼镜片后面静静地对着你。于是我心中又盘旋起第二个疑惑，他怎么会在中国文坛树起了这样

高的威望？

后来轮到他致答词了。我听见他寥寥数语，如泣如诉：“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比如1958年我写过《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伤害过一些人，至今感到深深内疚。请大家对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多批评吧。”全场声息全无，人人心头风雨大作。这于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话语，体现的是他为人文的一贯品格。

会后我听见他发自内心地告诉我，他“很感动”，他庆幸自己做对了三件事：第一，“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懂得创作的艰苦，所以我与剧作家们的关系，更多的不是领导、指示的关系，而是教师、兄长、朋友。”他一生从不整人，也从不以一己好恶作为工作和用人的标准。日月入怀，自然追随者众。第二，“我懂得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始终强调‘写人、感人、树人’，即使是在最严酷的日子里，也不向极左势力低头。”尽管这曾多次招来祸殃，他依然顽韧如初，我行我素。良史之辞，人心岂能不向？第三，“近年来，我在各种大小场合一再表明我的一种心情，即自己一辈人老了，个人的写作当然要抓紧，但更重要的事情是培养年轻人。”为此，竟有人批他这是“跟在青年后面跑”。他淡然一笑：跟就跟，跑就跑，你说我这是罪名，我还认为这是我的光荣呢！

他还有感到光荣的一件事，就是人都不敬而远之地称他“陈老”，而是直呼“荒煤”。“陈老”固然当之，但“荒煤”岂不更为亲切？他虽一辈子当官，当大官，但从心底里，他也一辈子执拗地认定自己是文人，他在好几篇文章中坦诚地明示了自己的这种执拗。他说，他的母亲和姨母都热爱文学，使他也从小就无师自通地爱上雅典娜女神，许多字都不认识时就读起小说。他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受革命文学的影响，那是“创造社”蒋光慈们的功劳。即使是在1939年走上前方的时候，他也心心念念地想着创作，从那里到后来的漫长岁月，他曾多次不得不检查自己“不安心工作，只想文学”……

我真惭愧自己对他的作品读得太少太少，从1935年他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刘麻木》起，一生之中他出版的书已经是数十卷。这样执著地对文学倾注了一生爱心的老人，他的心地是多么的纯净，他的境界是多么的高尚，漫说行年八十，就是再活三千岁，他又怎么不还是属于文学？

文学究竟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回答。有的人认为文学是匕首、投枪；有的人认为文学是功名、利禄；还有的人把文学当作打人的棍棒。而荒煤当然也有属于他的思考。但是我没有贸然地请他作答，因为这似乎不是能用语言说清楚的，这是火一样的一种信念。

当前的文坛何等热闹，作家作品何其多。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向大家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像荒煤一样真诚地、执著地、高尚地对待文学吧，使文学之火不熄地燃烧下去。

(1993年3月)

陈博士“布道”

隆 莉

陈定国博士说话时声音很大，即使面前坐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也许这是因为他习惯面对众多学生讲课的缘故吧。在采访过程中，只要我一停笔摆弄录音机，他便马上住口，直到我重新提笔。虽然隔桌对面而坐，他也能准确地看出我写的什么字，并不时加以纠正，于是我体会到了这位博士的厉害。

我曾随便问过几位台湾朋友：“你知道陈定国博士吗？”，回答不外乎是：“当然，我读过他的书。”“知道，我听过他的演讲。”或是“当然，我在电视上见过他。”陈博士名气之大，于此可见。

我也曾奇怪，陈博士在台湾主持过很多有关经济的重大项目的论证研究，又曾是台湾大学商学系主任、商学研究所所长，目前又是泰国正大集团执行副总裁，著作和教材已出版了 20 多种，然而认识他的人还是称他为“陈博士”。大概作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博士这个称呼，更能代表他的特色吧。

陈博士这次到大陆，是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给现代企业高级主管国际研修班讲学的。这个研修班有 200 多个学员，都是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陈博士给他们讲了 3 天课，每天讲 10 小时。他说：“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时间很宝贵，所以我想尽量多讲一些。”

其实，陈博士已不止一次来大陆讲学了。他刚到正大集团工作，谢国民总裁就对他说，中国的高层领导很聪明，很优秀。中层的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也很好，但他们中有些人缺乏世界企业经营运行体系的完整知识。作为在大陆投资最早并且最多的一个外资企业，正大集团要与很多企业和很多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他希望陈博士能利用自己渊博的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来大陆讲学，并且把这项工作放在优先位置。因此，陈博士除了对

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几十个合资企业的高级主管人员进行培训外，还应中国石化总公司、北方工业总公司、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等一些大型企业的邀请，给他们的高级主管人员讲课。不仅如此，上海市政府、上海企业家管理协会也曾请陈博士给他们讲学，陈博士为此不遗余力。

他感慨地说：“大陆改革开放后，大家对管理知识感到如饥似渴。大陆的学生很勤奋，素质也不错，今后他们会干得很好的。”

祖籍福建的陈博士出生在台湾嘉义。他自幼聪颖好学，才智过人，曾获台湾经济建设人员特种考试特优等第一名和台湾公务人员高等考试企业管理人员优等第一名。1973 年，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从 1979 年开始任台湾大学商学系系主任和商学研究所所长。

台大是台湾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商学系又是台大一流的系，然而台湾当局拨给它的经费却不多。于是，陈博士便用办企业的方法来办商学系。通过举办企业经理培训班，让企业经理来“赞助”，这既可改善教学条件，也使学生学到了“实践”经验。陈博士还和台湾报纸《联合报》、《经济日报》一起举办教授、企业家和行政官员的联合演讲会。由报社出钱，出演讲场所，陈博士出演讲题目，每星期六请一个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教授和一位部长主讲，星期日再由报纸把演讲全文登出来。由于参加演讲的都是权威人士，因而在社会上造成轰动。用陈博士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万马奔腾的气

势”。台大商学系也就更加有名了。

与此同时，陈博士还担任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咨询委员、台湾“行政院”铁路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全省铁路的规划管理工作）、台湾“经济部”国营事业管理委员会顾问（设计总体经营制度），还要给台大商学系的大学部、商学所的硕士班和博士班上课。陈博士给人的印象是生气勃勃，永不停息。

虽然陈博士后来离开台大去帮助台塑集团王永庆工作，但每当谈及在台大的那些日子，他总是眉飞色舞，充满怀念之情。他说：“我已把我的经验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我在跟北京大学座谈时也谈到，如果他们办管理学院，我可以帮助他们，一定会成功的。”陈博士对此充满信心。

1987年，陈博士到泰国正大集团工作时，正大集团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经营还不太景气。陈博士在考察了这些企业的情况后提出，到中国来的总经理一定要强，一要会讲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二要有管理工作经验，三要有积极奋发的精神。于是，他在泰国对即将派到大陆的高级职员进行了三周密集培训，把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知识灌输给他们，使他们一到中国，就使企业管理基本做到了文字化、合理化、电脑化。目前这些企业大部分已开始盈利。

当问到陈博士何以放着书斋里“清闲”的教授不做却“下海”搞实业时，他说：我念了十几年书，教了十几年书，写了几十本书，名气已经够大了。不过我不能只“说”不“做”。我准备在实业界再“念”一个“博士”，“念”了再“念”，百“念”（“炼”）成钢啊。

在一般人看来，身为“洋”博士，日日穿梭于纽约、香港、台北、曼谷之间的陈定国一定是“洋味十足”。然而陈博士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夫子”。他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对儒、释、道家都颇有研究，还与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关系密切。他拿出正在研读的一本南怀瑾的著作给我看，只见上面有批注、有图解，看得出他研读得很用心。他翻开书后附的南怀瑾著述目录，把自己读过的书一一划出：《论语别裁》、《定慧初修》、《孟子旁通》、《楞严大义今释》、《易经杂说》、《老子他说》、《金刚经别讲》、《道家、密宗与西方神秘学》、《历史的经验》……当然，陈博士对这些不仅是感兴趣，而是把博大精深中国古代文化融汇贯通在他的管理思想中。例如他主张，成功的主管人员的“做人哲学”应是谦虚的老子哲学，即老子的为人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成功主管人员的“做事哲学”应是扎实的中国哲学，即做事三宝：内用黄老（道家）、外示儒术（儒家）、落实于韩非（法家）。陈博士谈起这个话题时，旁征博引、生动形象、引人入胜，难怪读他的书听他的课的人都感觉如沐春风，如饮甘露。

除了研究管理理论和搞实业外，陈博士最喜欢什么呢？他说：“我最喜欢‘布道’，即布企业有效经营之道。”他解释说：“大乘佛学中有三大布施方法，最低级的是财布施和法布施，即给人钱财，给人一技之长；中级布施是内布施；最高级的布施是无畏布施。人有时懂得怎么去做却没有胆量去做，怕东、怕西、怕南、怕北，一怕步子就迈不出去。无畏布施就是教给别人以无畏的精神，就是勇敢地行动！所以我在布企业经营管理之道时最注重给人以无畏的精神，把‘知’和‘行’统一起来。”

陈博士认为，赚了钱给自己是利己，在佛法上是小乘之道。中国人讲究兼善天下，这是大乘之道。他说，中国古代所说的福、禄、寿、喜代表了很

多人的追求。福是有钱，禄是有地位，寿是长命，喜是欢乐。他认为助人为快乐之本，只有帮助别人才能得到快乐。

因此，陈博士说：“我认为雷锋精神就挺好嘛。”

(1992 年 2 月)

暮年更恋故乡情

——记邹荻帆

李 虹

好久，75岁的诗人邹荻帆没有说话，在光线有些淡的书房里，他端坐着，他在回忆……“我想找到那沙滩上的渡头，那是个古渡头，青石砌成的台阶铺上堤街，堤街直通到家门……”诗人谈起自己的家乡湖北六门是那么温暖而亲切。

当年，出生在以木匠业为生的小市民家庭里的诗人，看惯了木工叔伯们的拉锯、铤锯、挥斧、跑刨，听惯了花鼓戏那凄婉扬抑的曲调。劳动人民的苦难、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还有那些诉说不尽的木棒鼓声和渔鼓调的皮影戏，如今想起来都还历历在目。诗人早期的叙事长诗《没有翅膀的人们》、《在六门》和《木厂》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心境下完成的。谈起当时的创作体验时，诗人感慨地说：“不少诗作者是以写少男少女的爱情而开始的，而我几乎绝少写过爱情。那时，我的家乡连年闹水荒，随后是铺天盖地的蝗虫。由于我幼稚和生活的局限，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要比斗争更多一些、具体一些。我不能回到青春时去补课。因而，它带着弱点也无法修饰。”

岁月匆匆，悠悠数十年过去，诗人家乡的山和水已找不到旧迹，那古渡、木船、对岸的疏林、黄叶也早已是高楼林立……

但是，那一份浓重悠长的激情却难以平静。

1982年诗人还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重温儿时家乡的一切，另有一种情致，便以《邹荻帆抒情诗选》献给故乡人聊以自慰。

1934年开始诗歌创作的邹荻帆至今已出版诗集20多种。可提起处女作的发表过程却还是记忆犹新。

说来有趣。那时，诗人在湖北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将800行长诗《没有翅膀的人们》投寄给上海一家刊物，结果被退稿。同学们举着被退的稿子说：你的大作发表了。这让刚刚握笔抒发情感的他很不好意思。他再投稿到《文季》时，便不敢留写地址。原以为会石沉大海，不久竟意外地在《中流》上看到了这首诗。诗人有些纳闷。后来，听靳以老说，当时《文季》停刊，主编巴金把这篇诗稿转给了《中流》，得以发表。

“巴金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慢慢起身从书架里取下来一个很精致的镜框，那是巴金和诗人的合影。他用手指点着说：“那时我很年轻，他一直关心我的创作并且经常鼓励我。”

50年的创作生涯过去，诗人曾任《诗刊》主编，如今是中国作协理事。

在创作中，“真情实事”是诗人一向追寻的创作原则，不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体诗，总是和时代和人民息息相关。多年的经验使他体会到一个诗人在他整个写作经历中，不必执著于只写一种题材。创作对现实生活会有改变，社会生活更会有改变，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应是多种多样的，既可写抒情诗，也可写叙事诗、讽刺诗等。

邹荻帆写诗也写小说。《颤抖的灵魂》就是诗人记录知识分子在干校所遭受的苦难经历的小说。当然，这和诗人10年牛棚生活是分不开的。

谈起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两鬓斑白的老人，诗人感慨万分。1985年诗人和夫人史放酝酿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青年男女对于爱情、婚姻和生活追求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名为《花落水流红》。

遗憾的是，夫人史放没能和他一起分享完书的快乐，便于：1989 年去世。邹荻帆告诉记者，第二部里的女主人翁，便有她年轻时的影子。现在，这部大约有 60 万字的长篇书稿，已完成了 40 万字。

邹荻帆多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便是在清晨时写作。现在，诗人在清晨还增加了另一项内容——20 分钟的锻炼。早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运动运动关节、听小鸟在树上卿卿喳喳，也许就在这时会有什么灵感油然而生……

如今，诗人又觅到了有情人，老俩口很和谐，相互理解，又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位夫人是大学外语系教授，离休后成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邹荻帆的书房里挂着几幅或清新淡雅或隽秀怡人的画，想必是她的得意之作了。婚后他们还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夫人的住所离他的住所很近，邹荻帆风趣地说：我们是“一国两制”。

(1993 年 3 月)

中草药的活字典 ——记萧培根 李 方

这是个充满谜一样魅力的人。

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那么在他的大智慧面前，你会觉出自己的“小”来。

相传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叫神农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遍尝百草，摸清它们的药性，开创了中医中药几千年的事业。

“中药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身体试出来的，应该让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否则，就对不起咱们的祖先啊！”

北京北郊西北旺乡，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59岁的萧培根教授风风火火地从外边走进来，与我稍作寒暄，就坐回堆满书籍文稿的大办公桌后，开宗明义地对我讲出这番话来。

外国人有管萧培根叫“中草药的活字典”的。因为在我国7000多种药用植物中，萧培根就能熟悉掌握五六千种；他曾出访40多个国家，曾在非洲做过详尽的药用植物的考察研究，即使在非洲药用植物学领域，他说的话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有份量的。如果说萧培根开创了中国的药用植物学研究还不太为一般人所知，那么他主持开发的西洋参、沙棘、天麻等药则早已深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了。对于一个大智慧的人，他那个早就谢了顶的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藏了多少智慧呢？我在心里掂量着，但没有结果。

一套10卷本精装的《中国本草图录》赫然摆在面前，光看2000多元的定价就够惊人的了，而翻开来往下看，就更有一种走进宝山的感觉。那一幅幅精美的图片配上详尽准确的说明，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的确，中草药是美的，是一种自然美和淀积了我们多少先人艰辛探索的历史美的和谐的结合体。而萧培根，作为这部洋洋巨著的主编，就是这种美的发掘者和创造者。在传统的领域开出一个新天地来，难怪这部书被称为“今日之本草”，萧培根也被尊敬爱戴他的人誉为“今日李时珍”！

“其实我哪能和李时珍相比！你们还是不要这么提吧！”都说谦逊和成就成正比，在萧培根身上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萧培根也有他毫不掩饰的骄傲，他绝无犹豫地承认他是国际药用植物学的权威之一。当然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也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骄傲了。在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中有5个代表，一人代表一个大洲。“我是整个亚洲的代表！”萧培根说。我也听出了他的话外音：作为判断一个事物的标准，不再仅仅是外国人说好才算好，我萧培根说好也算数！

在澳大利亚，有萧培根签名认可的中药是免检的；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别人发言不得超过1小时，只有萧培根可以多讲10分钟；国外学术刊物都抢着发萧培根的学术论文。萧培根告诉我，他可以用英文、拉丁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写论文，见我惊奇，便向我解释说：

“其实也没什么方法，不过是做有心人，还要善于抓紧时间罢了。我刚工作时有一阵子跟着苏联专家，于是我就学俄文，随身总带一本俄文字典，一有机会就努力听苏联专家说话，听懂多少就记多少，不久就可以纠正翻译的错误了。再比如我学英文，每天早上6点都起来听广播，火车飞机上也不耽误，现在我能直接与外国人对话，他们都不相信我从前没学过英文。”

萧培根谈他的外语经，虽然自认为不过是刻苦，但我想总有天赋的成份在里头。他的秘书彭勇证明了这一点：“萧教授脑子特别快，我是跟不上的，他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快！”

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曾经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同班，萧培根自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话里充满了对祖国的责任感和炽热之情，也就难怪在作为中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当技术官的时候，除了做好他的工作外，竟在不长的时间里为国家节约了4万多美元的外汇，这就是一颗赤子之心，再加上肯干会干，出大成就也就不奇怪了。

萧培根是我国在药用植物学领域中起步较早的人。“要敢于实践，去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毕业后分配的工作于萧培根来讲是陌生的，他当时连最常见的药用植物“洋地黄”都不认识。但他不气馁，22岁就带着35个大学生建立了研究室，以后几年内几乎跑遍了神州大地，风餐露宿，边学边干，终于在1961年编成了200万字的《中药志》，赢得了国内外医药界的一致好评，有人称它为“中国近代本草的代表作”。

“在整理传统药物之外，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发现药用植物的新属种，扩大我们在药物选择上的范围，这是我们的任务。”

为了考察研究藏医藏药，萧培根曾先后6次进藏。一回他在西藏发现了一种药用植物矮莨菪，又发现藏医在用这种药治病上有独到的功效。于是萧培根就采用植物亲缘学的思考方法，先推测，后证实，发现这是一个含莨菪碱非常高的新品种，这个发现在国际上也属首创。萧培根发现的新属种很多，仅在贝母一类中，就有川贝母中的暗紫贝母，有湖北贝母，这些药在国际上都是以“萧”字打头命名的；我国曾发行了一套药物特种邮票，其中的贝母属种就是萧培根发现的。电影《李时珍》里有李时珍翻山越岭采药的镜头，作为“今日李时珍”，萧培根也是没事就往山里跑，以至被人戏称为“萧大仙”，结果发现了许多“宝贝”，终不负“大仙”之名。

“有充分的信心，但还要会干！”萧培根说。别看就“会干”两个字，含义却大，我想是意味着刻苦加上智慧。萧培根讲了“文革”时他下干校的一件事：

“在江西永修。永修，这个名字在当时看来多么有意思！”

他当时在干校的“五七”制药厂当制剂车间主任，可是连最基本的工序制做颗粒都不会，只得从头学起。“学些基本功，收获还是很大的！”萧说。当时，地方上流行脑炎，症状是发高烧，每天都要死几个人。萧培根每天经过当地医院时，医院都通知他死亡数字，求他这个“草药大王”想想办法。于是萧培根的智慧又高速运转起来。当地夏天苦热，气温在40℃以上，萧培根却大中午地把自己关在屋里上了床，望着天花板皱着眉头苦思冥想。“好几天都是这样。这时知识起作用了，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一是要从草药里找抗病毒好的，二是要找解热特别好的，两边一凑，我发现可以把抗病毒的鹅不食草和解热的柴胡搭配起来试试。”人命关天啊，萧培根有了主意就立刻试行，到车间组织工人把两种药配成针剂，马上送去试用。结果有效，于是扩大临床到几百例，这种药也就成了固定产品，被命名为“热可平”，至今还在大规模生产，成为江西省的拳头产品。

萧培很大概是个全才，学术成就突出，当领导做管理工作也不逊色，他自称是“宏观型管理”。1983年他受命在被称为“北京的西伯利亚”的西北旺建立中国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管着手下300多人、1000多亩土地，

8年多来事业蒸蒸日上，已经为国家创造社会效益8000多万元。萧培根脑子里是有经济效益这根弦的，他说：“我们下一步是把中草药推向世界。在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还要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这世界上有死做学问的科学家，有死赚钱的企业家、商人，看来萧培根两者都不是，可他脑筋往哪边转哪边就亮，而且亮得不一般，也许这就是大智慧吧。也许这么说有点简单化，可萧培根确实干什么都既淋漓尽致又游刃有余。他在紧张的超负荷工作之余，还有心思听点古典音乐，收集了30本外国邮票，年轻时喜欢的球类是打不动了，就打打太极拳，生活得蛮有滋味。

问萧培根还打算干几年，他却拿出一本大红证书来给我看，是国家发给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的，赫然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印。脸上透着得意：

“我是专家，不会退休的！”

(1992年3月)

我成了新中国的公民

沙博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成立 40 年了。问起我这 40 年间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就如同问一位母亲最欢喜几个孩子当中哪一个那么难以回答。40 年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此我只讲一讲对我个人影响最深的一件事,那就是我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请求得到正式批准。

我想成为中国公民的愿望是我多年来思想感情发展的结晶。1947 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时,语言不通,对中国政局不甚了解,来的主要目的是想逃避美国的生活方式,多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多增加一些语言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更没有永远留在中国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律师,我颇有正义感,对剥削、虐待老百姓的现象深恶痛绝,但意识形态上仍属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后来,几乎是一到上海我的观点就开始转变了。上海的贫富悬殊之大简直令人瞠目。

满街满巷的乞丐,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有的怀里抱着一个,身边还拖着一群大小、两眼发直的孩子。他们大多来自贫穷的乡下,满街追拥着有钱人,除偶尔得到几块铜板的施舍外,更多的是被呵斥和唾弃。唯有屈指可数的少数人显得额外阔气。

尖叫的豪华大轿车在挤满行人、马车、黄包车等各种车辆的狭窄马路上横冲直撞。

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本不顾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百姓的饥苦,竟无耻地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拱手送给帝国主义列强。当时,上海的许多仓库里,都囤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以出卖主权换取来的美军留下的大批物资、器械,据说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但事实上大部分都被统治阶级的军官老爷们巧取豪夺据为私有了。

我到中国后见到的这一切曾激起我的同情和义愤。正是我亲眼见到的这一切,才使我领悟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指出的“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

1948 年,我与凤子结婚,她是一位戏剧演员,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家进步杂志的记者兼编辑。是凤子和她周围的同志们使我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我很想去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创的崭新天地。后来,寒春和我们夫妇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试图通过天津和夹口进入解放区,但是没有成功。我们接到指示重返北平并在那里等候。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我亲眼看见大队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笑容满面、浩浩荡荡地开进西直门。人们欢欣鼓舞,轻松、喜悦的情绪随处可见。

10 月 1 日,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当听到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凤子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感动万分。这里虽不是我的祖国,但却仍然感到一股电流般的激情在人海中激荡。衣衫破旧的百姓,身着军装的男女军人,经历了苦难深重、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今终于迎了解放。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胜利,欢呼对新生活的渴望。我作为一个异邦他乡的外国人,看到这一切,怎能不受感动呢?

从那一刻起,中国的命运和我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中

国除台湾以外都迅速得到解放，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亿万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接踵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等一系列开创性工作。虽然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全部成功，有的甚至失败了，但是却体现了一种勇敢的创新精神。由此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非常崇敬和仰慕。

我有一个温馨的家。1963 年我的中国女儿长到 13 岁了，凤子仍在剧院工作，我在外文出版社从事文学翻译。办公室的同志们对我非常好，我还结交了几位中外朋友。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之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兴趣越发浓厚起来，我赞同中国的目标与政策，感到在北京工作比在纽约更有意义更令人满足。我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绝对没有想过要回美国（短期的探访除外）。就是说，我决定永远留下来，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我微不足道的贡献。

就是这样，1963 年 7 月，我正式提出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填了几张简单的表格并陈述了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国籍的原因。几个星期之后，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没有正式的仪式，没有效忠的誓言，有的是一份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盖有中国政府章的承认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证书。从此，我成了新中国的一员。

1983 年我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和向政协系统的各位专家、学者学习，这对于我了解中国的情况，做好工作，大有裨益。通过参观考察，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封建残余，还有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中国的事情确实很复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但是，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遵循党章，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切实按照宪法和法律去做，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1990 年 1 月)

中国穆斯林的骄傲 ——记沈遐熙大阿訇 朱 军

北京有条牛街，这里 90% 以上的居民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牛街东侧，有座阿拉伯风格的高大建筑，便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入夏时节，在全世界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访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我国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哈吉·伊里亚斯·沈遐熙大阿訇。

(一)

71 岁体格魁伟的沈遐熙，面容慈祥、语气谦和，这样一位超脱的忠厚长者，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乡音，我以为他是西北人，沈遐熙却笑着说：“我是正宗的南方人。”

原来，沈遐熙的祖籍是江苏南京，青少年时曾在上海生活过。1938 年，他只身前往西北回族聚居区，从此便数十年献身于祖国的民族、宗教事业。

1952 年，由包尔汉、赛福鼎等人倡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沈遐熙任伊协常委。1955 年他作为中国政府正式派出的由 19 人所组成的首批穆斯林朝觐团的成员，赴圣地麦加朝觐。此后，沈遐熙长期在甘肃、宁夏从事民族、宗教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甘肃省伊协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客座教授、副院长，中国伊协常务副会长等职。1987 年，沈遐熙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主持中国伊协的日常工作。

在我国与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正式建交以前，沈遐熙就率领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了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个国家，所到之处受到上至国家元首下到普通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他又以中国伊协的名义向这些国家发出了回访我国的邀请，为中国与各伊斯兰教国家正式建交和友好往来在民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90 年 3 月 26 日，巴基斯坦共和国在国庆之际，通过驻华使馆将一枚“卡迪·阿兹姆之星”勋章，即“真纳”总督勋章（真纳为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缔造者）隆重授予了沈遐熙，以表彰他对伊斯兰教与在中巴友好邦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沈遐熙成为继周恩来、邓颖超之后，中国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宗教界人士。

然而，在谈及被授予“真纳”勋章的感受时，沈遐熙讲，此项荣誉不仅是给他的，也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穆斯林的。“真纳”勋章第一次授给他这个宗教界人士，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穆斯林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高。

(二)

采访这位海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宗教界人士，记者很自然地问到了他对中国政府的《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有何看法。沈遐熙拿出一本反映伊斯兰教在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集资料，对记者说：“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他列举了一系列数字阐述他的观点：我国现有 1700 多万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 1.5%，而在全国政协中就有 59 位穆斯林委员，占委员总数的 2.84

%，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 97 名是穆斯林，占代表总数的 3.27%；都远远超过了穆斯林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而在旧中国穆斯林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台湾当局至今不承认回族是独立的民族，二者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沉吟片刻，沈遐熙又说：“前苏联有 5000 多万穆斯林，相当于中国穆斯林总数的 3 倍，却仅有 100 多座清真寺，每年有 20 多人赴麦加朝觐。而我国清真寺达 25000 多座，每年赴麦加朝觐的至少在 1000 人以上，最多时达到 2400 人。可见，无论从哪方面比较，都说明，今天的中国穆斯林都已真正拥有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在宗教信仰上的权益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的第 6 部分已作了很精辟的阐述。”

在谈及中国伊协的宗旨与职能时，沈遐熙介绍说：“协助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团结广大中国穆斯林热爱祖国并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维护广大中国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发展和加强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依照这样的宗旨与职能，中国伊协成立 40 年以来，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广大穆斯林的信任与拥护。”

沈遐熙说，1989 年，上海某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性风俗》，严重伤害了国内广大穆斯林的情感。

为妥善处理此事，沈遐熙果断决定，以中国伊协的名义，亲自率领调查组赴上海，一方面在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的有力帮助下，根据确凿的证据，由上海市司法机关对《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单位及有关责任者作出停业整顿，并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处理意见；一方面多次往返于上海、北京等地，在广大穆斯林中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此事得到圆满妥善的解决。

后来，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后，在中南海召集各界宗教爱国人士座谈时，再次肯定中国伊协在处理民族、宗教事务上的立场是坚定的，措施是稳妥的，值得各宗教团体学习。

沈遐熙回忆说：“在这次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还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专门阅读了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认为它博大精深，值得认真研究，并建议中央负责宗教事务的领导同志也认真阅读包括《古兰经》在内的各大宗教流派的经典著作，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座谈会上，沈遐熙建议我国驻伊斯兰教国家的外交人员，应多通晓这些国家的民俗传统知识，有针对性地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当即表示赞同。

(三)

傍晚，当记者与沈遐熙先生告别后走出中国伊协大厦时，盛大的古尔邦节之夜已经降临。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穆斯林成群结队地涌向牛街清真寺，记者随即加入到这欢腾的人的洪流之中。

清真寺门前，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青年，托着满满一盆烤熟的羊肉，邀请来宾品尝。据说，这是真主安拉在古尔邦节之夜赐予信徒们的最吉祥的礼物。

“来，朋友！尝一串我的烤羊肉，吃了它真主会保佑你的！”

我被这真挚的情感融化，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祝福你，中国的穆斯林。

(1992 年 9 月)

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

——记杨献珍

夏莉娜 陈济

“七一”前夕，我们到北京医院看望了杨献珍老人。他静静地躺在病榻上，见到我们时，颌首向我们示意。这位年高96岁的老人，鬓发和双眉已被岁月染白，只是那目睹了人世间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的双眼，依然那样锐利、深邃。作为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代教员和领导，为了党的事业，他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他对此无怨无悔，初衷依旧。

狱中秘办“党校” 传播马列

1931年，杨献珍奉命到华北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在北平被捕入狱，经严刑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带着沉重的脚镣，他被关进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面对死亡，杨献珍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斗志。他积极参加狱中党的活动，继续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杨献珍早在入党前，就已是湖北省国立商科大学的英文助教，不仅英文学得得好，中文底子也很扎实。此时，他作为狱中党支部的学习干事，他欣然受命和其他几位同志共同担负起翻译秘密得到的马克思主义外文文献的重要使命。为了避开监狱看守的注意，他们的翻译工作只能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翻译出一节后就编好号码，马上传递给各个监房的难友传阅。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杨献珍他们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一天翻译出好几千字。在狱中，杨献珍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等各种刊物上的许多文章。尽管这些译稿没能保留下来并出版，但在当时对于提高狱中党员的理论素质和鼓舞斗志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狱中，杨献珍除了将精力放在翻译书稿之外，还参加了狱中秘密出版的刊物《红十月》的编辑工作，针对狱中同志的不同水平，担负起教员的工作。一些当年同狱的难友、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珍惜这段经历。他们认为，当时的那所监狱，事实上已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杨献珍则是这所“大学校”的教员“作为当年同狱难友之一的薄一波曾谈道：“杨老一生贡献很多，办党校，宣传、捍卫马列主义，这是他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贡献。30年代，杨老在监狱中开展的学习活动，实际上就是党校，不过不叫党校。所以，我说，杨老办党校的时间最早，也最长。”

1936年9月24日，杨献珍被党营救出狱。这之后，他的工作几经变动，但都没有离开过党的教育工作。

首任党校校长 教学有方

1955年8月1日，当时的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献珍被任命为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在担任党校校长期间，杨献珍不仅关心和注重党校自身的建设，而且还积极参加教学工作，为正规培养和提高我党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方针，也就是通过学习掌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学会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正确领会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等等。

针对当时党校学员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杨献珍特别重视在教学中宣传和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他认为，在西方战斗的唯物主义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从唯心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则基本上跳过了思想发展中的这个重要环节，直接迎来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既是一件好事，又潜存着不足。这种思想领域中跳跃式的发展，其后果就是：往往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使辩证唯物主义变形的危险。正因如此，杨献珍在教学和工作中反复强调要坚持唯物主义这个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不断告诫人们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

杨献珍无论作为一位校长，还是作为教员，对工作都是极为认真负责的，对学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发现缺点，马上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有时候，星期一早晨他甚至要亲自站在校门口察看学员是否按时返校。学员的作业和学习、思想小结他都亲自批阅，发现问题，就在课堂上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有些学员受到批评不大自在，但过后便觉得那一段生活收获很大，令人难忘。

杨献珍身为校长，对学员要求虽然十分严格，但同时却又使人感到他非常和蔼可亲。党校的老学员还能回想起当年与他在校园里一起散步，一起交谈、探讨问题的情景。一到教学期间，他就搬到学员楼去住，学员如有问题可以随时找到他。有一次，一个班的学员课后请杨献珍来参加他们的讨论。虽然提出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心里想杨献珍大概来不了。却没想到杨献珍不仅来了，而且还提前了 10 分钟到达讨论地点等候大家。

反对教条浮夸 再遭厄运

杨献珍对真理的追求，对党的忠诚，注定了他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要走厄运。

疾恶如仇的杨献珍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也欢欣鼓舞过，也兴高采烈过。但不久他就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浮夸风等严重问题，他坐不住了。对于这位培养了大批党的中、高级干部的高级党校的校长，更为痛心和不能原谅的是，竟有那么多党的干部在违心地说话。

在经过了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杨献珍在 1959 年 6 月 12 日接见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学员参观时，对当时出现的弄虚作假、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缺乏党性等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心情沉重地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不仅使生产受损失，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个损失更为巨大，比粮食丢在地里的损失还要大得多。

杨献珍的这个讲话印发后，被康生等人作为反对三面红旗的证据，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7 月对杨献珍进行了半年多的批判。这次批判成了杨献珍的祸根，引发了后来的 8 年监禁和 3 年半的“流放”生活。

到 1965 年，杨献珍的问题又被提出来，并且给他定了诸如“反对毛主席”等 10 条罪状，撤销了他在高级党校的一切职务，并被赶出了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党校。

终生唯信真理 无愧无悔

“文革”开始后，杨献珍再次遭到迫害。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给他定下的罪名外，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合二为一”的三次理论“论战”中的许多正确观点也统统成了他的罪状。1967年5月，他被关进党校造反派私设的监狱，同年9月，又被投进“四人帮”的监牢达8年之久，之后，又被“流放”了3年多。

离开中央党校的讲坛，开除党籍，监禁，“流放”等等一连串的厄运，对于杨献珍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也意味着理论、学术生命的结束。面对这个打击，杨献珍不能不感触万分。他没想到，历史的命运之神是如此地固执，它不但要让自己像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经受监禁和流放的痛苦，还要像德国唯物主义者那样体验孤寂的煎熬。他没想到，自己在解放前因为是共产党员而坐坐了7年多国民党大牢，在共产党执政后，竟又坐了8年大牢。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始终没有屈服，始终问心无愧，始终充满力量。

在被监禁的8年中，杨献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监狱里没有桌椅，他只能用左手支在被子上托着书看，经过8年时间，他的小棉袄和毛线衣的左袖时都给磨穿了。他先后反复重读了《毛泽东选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十几本经典原著。反复的学习，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后来回忆说，“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精神是旺盛的。有一次‘带镣长街行’，脸上毫无愧色，心里是骄傲的、自豪的。后来呢，虽然给我这个共产党员戴了那么多帽子，我还是毫无愧色。入党以来，我没有做过一件不敢向党交待的事情，没有背离党做过任何一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民族的事情。”这是多么宽广坦荡的胸怀啊。

晚年再登讲坛 吐丝不尽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特别是在胡耀邦的多次悉心指导，经过细致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终于使杨献珍的冤案得到纠正。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批准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其应有的一切名誉。杨献珍在经受了一次次的磨难后，终于迎来了灿烂的晚景。

1980年11月6日，为杨献珍平反的大会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召开。此时，坐在台上的杨献珍已84岁，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他想起，当年是他亲自组建起这个礼堂，又多次在这里给学员们讲课，后来还是他在这里挨斗、受罪，而今天恰恰又在这里为他平反，他有多少话要说啊。但是，他没有诉说自己的冤屈，只是表达了要继续坚持唯物主义真理，为党的教育事业献身的愿望。他说：“我虽然身残体弱，仍愿意在有生之年，同大家一起学习唯物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为党的理论建设出最后一把力。”

杨献珍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校园和熟悉的讲台，以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坎坷经历向学员生动地说明坚持唯物主义的意义。直到1983年，杨献珍87岁时仍然亲自登上讲坛，给全体学员讲课。

晚年的杨献珍，尽管身体不好，但仍然积极参与党校建设，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并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为许多因他而受牵连横遭迫害的同志以及

众多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转递申诉书、写证明，使他们中许多人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与此同时他还孜孜矻矻地继续坚持写作，先后整理出版了《论党性》、《什么是唯物主义》、《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我的哲学“罪案”》、《杨献珍文集》一、二卷；发表了《“文化大革命”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等数十万字的文章。

为了更好地宣传唯物主义，杨献珍还充分利用晚年的有限时间，不辞辛劳地先后到湖北、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党校参观访问，对各地的党校的建设进行指导，热情接待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特别是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访问和求教。1985年、1986年和1990年他先后三次接受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访问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李可柔博士的采访。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杨献珍被收录到由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撰写的《中国参政知识分子》一书，杨献珍的著作《我的哲学“罪案”》英文版于1990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1991年7月24日，杨献珍迎来了95岁的寿辰。望着给他祝寿的一批批自己培养起来的学生，他欣慰地笑了。

住进医院后，杨献珍依然关心着党校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发展。当他知道今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谈话后，非常高兴。他说，中国应该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当提到人大会议讨论的“三峡工程”时，杨献珍也非常关心，并且表示还想到三峡去看看。

据杨献珍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杨献珍已同病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殊死搏斗。望着这位在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战线上倾注了一生心血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老人，我们不能不惊叹他的生命力竟是如此旺盛，不能不敬佩他为了党的事业甘做园丁的奉献精神 and 为坚持真理不畏邪恶的坚毅精神。

(1992年7月)

从世纪的一端走来 ——记汪德昭 张忠达

汪德昭，中国国防水声学领域的奠基人，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声学所荣誉所长，中国声学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荣誉理事长。这些头衔是对他成就的褒扬，同时也构成了他在科技界“权威”形象的素描。

汪德昭毕生研究水声学，85岁的人了。依旧身材魁伟，精神十足，让人肃然敬畏。

85年是一条长长的人生旅途。汪德昭从远远的一端走来，宛如远方来客。他的故事神奇而诱人，他的经历奇特而振奋人心。

早年立志 科学救国

汪德昭原籍江苏灌云。7岁时就随任农林部主事的父亲来到北京。或许家庭的艰苦境况，或许原本是“书香门第”，汪家兄弟读书都很刻苦，先后进入了当时质量最好的北师大附中就读。那时正逢五四运动，大哥汪德耀是很活跃的人物，他与同学赵世炎一道成立了学生会，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社会大潮。由于年龄小，汪德昭没有直接参加运动，但大哥他们的言行对他却影响很大。

附中读书的汪德昭，感受到国家的贫穷，人民的苦难。萌发了汪德昭以及他的兄弟们科技救国的志向。后来大哥汪德耀便率先出洋留学了。

多年以后，汪家的3个兄弟以所学知识为国作出了杰出贡献。大哥汪德耀成了著名细胞学家，解放前就担任了厦门大学校长。汪德昭本人是有名的物理学家，三弟汪德熙是化学家，为中国的原子弹制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身居异乡 为国争光

在海外，汪德昭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初去法国，他的导师，世界知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将其青年时就很喜欢却无暇去做的论文题目交给了汪德昭，那是关于离子的实验。当时围绕一般离子及大离子的各种参数问题人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汪德昭知难而上，采用人工控制方法，获得了正确结果。由此，郎之万及其他物理学家对这位中国学生便刮目相看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实验室被军方征用，进行国防研究，按规定任何外国人均不得留下工作。郎之万的实验室也在被征之列，正当汪德昭为不能继续他的研究而苦恼的时候，郎之万告诉他国防部特别批准他留任工作。汪德昭成了那个时候唯一为法国国防部工作的外国人。

当时，物理界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负光致现象”，爱因斯坦在给郎之万的信中曾提起过，可当时人们不明白这种现象的机理。为了揭示它，首先得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汪德昭采用真空操作，排除各种干扰，最终解决了这一课题。巴黎大学的著名光学家加办纳称赞它是一个“关键实验”。

由于汪德昭的不断创造，后来有的外国同行竟认为他是无所不能。

有一天，镭学研究的伊雷娜·居里找到汪德昭并对他说：“你能不能修一下这个静电计，沙维尔说你的手挺灵敏。”当时战事正紧，这种仪器坏了

便无法更换。

说实在的，汪德昭以前根本没修过这东西，但面对这位大物理学家期待的目光，他对自己说决不能让他们觉得中国人无能。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仪器终于修好了。这是项精细活，汪德昭成功地将直径仅一微米的铂金丝焊在了小圆柱上。这一下子汪德昭名声大噪。竟至门庭若市，大家把类似的坏掉的仪器都送来央求他修理。

70年代，当年的一名科学家还向郭沫若提起此事，说汪是当时唯一能修这玩意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才使法国人在战时仍能将继续下去。

1945年，汪德昭荣获了法国科学院颁发的“宇格”奖，为此，钱三强致贺道：法国科学院赠送德昭兄弟“宇格”奖，为我国科学界之光荣。

毅然回国 应做领唱

1956年汪德昭毅然返回了祖国。回来不久，他便着手开创我国的国防水声学。

在当时的情况下，汪德昭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培养一批水声学人才，还是自己进行几个题目的研究。

汪德昭选择了前者，在他指导下，一支年轻的水声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了。“简正波过滤”是项很重要的课题，汪德昭领导的声学所就此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此，美国一权威专家在报告中写道：世界上研究简正波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马赛，一个在北京。

几年前，美国海军曾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水声问题，即如何求声波小角度入射远距离物体的反射系数。这个难题悬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是让汪德昭的声学所给解决了，于是，在国际上又一次引起了轰动。

由于汪德昭的杰出成就，他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名科学家”小组成员，成为唯一的中国组员。

面对成就，汪德昭并不满足，他一再对大家说道：“我们不应满足于做国际水声队伍大合唱的一名队员，我们应做国际水声队伍的领唱者。”

性格豁达 开朗幽默

汪德昭是位开朗的老人，一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开朗的天性。由于受他的身为声乐专家的夫人李惠年的熏陶，汪德昭对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喜好。汪德昭主张心胸开阔，认为一个人的心情应该始终是愉快的，他说：“我就很喜欢说说笑笑。”

汪德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故事。他小时候左耳患过中耳炎，以后左耳听力一直不如右耳。为此，他常说，这样我是因祸得福了，人家说坏话我就用左耳去听，说好话才用右耳去听呢。

风趣的言谈有时在汪德昭这儿就不仅仅是松弛神经、积极休息的手段了。有一次汪德昭率团去日本，在参观日方的生产工艺时，每遇技术关键之处，日方必守口如瓶，以“这是我们的专利”应付。俟后在饭桌上，当日方代表询问汪德昭有何保养身体的妙方时，汪德昭则笑答：“这是我的专利。”

汪德昭认为不能只懂工作不懂休息。谈到这里，汪德昭高兴地告诉我，他还是中科院围棋协会名誉会长呢，他喜欢下围棋，他声称：技艺略逊张劲夫一筹，但与方毅却是旗鼓相当。

(1991年1月)

研究中国妇女理论的前驱

——记罗琼

傅运

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妇女青年委员会副主任罗琼，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妇女解放运动。她一生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有关的妇女解放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妇女群众的情况；她笔耕不辍，撰写、编辑了不少妇女论著。妇联干部尊重她，称她是研究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前辈。她自己却谦虚地说：我是党的前辈培育下的晚辈，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普通的妇女工作者。其实她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唤起了罗琼的民族觉悟。她在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进步学生中的一名骨干，却遭到校方处分。但她从此步入社会，结识了更多的爱国进步人士，融汇在更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探索救国救民改造旧中国的真理。1934年她加入阳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组成的进步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机会了解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她学习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1934年到1935年上半年，她发表的文章中表述了中国农村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流向城市，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中国农民受压迫的根源。她的处女作《江苏北部农村中的劳动妇女》，用妇女的身份，以敏锐的目光，从经济这个根本问题着眼，研究背负着沉重枷锁的中国农村妇女的问题。

1935年上半年，经中共地下党员杜君慧介绍，罗琼成为沈兹九主编的《申报》副刊“妇女园地”和《妇女生活》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日益高涨。罗琼先后在这两块园地上发表了近50篇文章。这些文章愤怒地斥责、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一步从社会各个侧面，透视了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如实描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妇、女工、女教员和被迫出卖色相的妓女们的辛酸、凄楚和苦难。这些血与泪的控诉，引起了一切善良与正直的人们的沉思、反抗。夏衍曾说过：“至今还有不少人铭记着是《妇女生活》等进步杂志把他们引上了抗日救亡，改造旧中国，追求光明和进步的道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政府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妇女，他们掀起一股“妇女回家做贤妻良母”的浊浪。霎时间，“新贤妻良母论”甚嚣尘上。沈兹九、杜君慧、罗琼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勇士们一起，以犀利的笔锋，驳斥“新贤妻良母”、“妇女回家”等谬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呼唤各界妇女肩负起救国重任，团结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妇女解放。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在我国现代妇女史上有关妇女回家问题的又一场大论战，意义深远。

1935年12月，罗琼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界妇女抗日救亡会，任该会理事、宣传部主任，主编该会刊《妇女救国导报》，组织各种各样宣传活动，在街头，在剧场……宣传抗日救亡，誓不当亡国奴。这时罗琼心中已经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救国；她早已向往苏联人民的新生活，认为中国妇女要走俄国十月革命指引的妇女解放道路。于是沈兹九和她合译了

苏联柯伦泰的《新妇女论》，同时还组织各界妇女的各种座谈会，请中共地下党员、左联的同志作报告，讲形势，越来越多的女工、女学生、职业妇女参加读书会，读进步书报；越来越多的妇女团聚在抗日、救亡、进步的旗帜下，与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琼先后赴南昌、长沙、武汉等地，继续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她除了继续在《妇女生活》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与姜平合著了《战时妇女工作》一书，从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妇女共同抗日出发，呼吁广大妇女群众坚持抗日、团结、进步。

1938 年秋，根据党的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总队执教，教授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妇女解放三门课程，为培育和巩固学员革命人生观做启蒙工作。她自己说：教学相长，对她本人也是很好的锻炼，她的学员实际上也是她的教员。1939 年冬，她在新四军全军党代会上被选为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1940 年 10 月罗琼到达延安后，在等待开会期间，先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但不到两个星期就被调至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从此，在妇女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几十年来，她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力争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她勤奋工作，用功学习。在党的培育下，她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聆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妇女工作的指示。她把 1942 年 3 月毛泽东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题写的“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年都要用相当时间深入农村和城市基层进行调查。她住群众家、住基层办公室、招待所，与姐妹拉家常、问情况、听意见、召开座谈会、探讨问题。1953 年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群众中有人有顾虑和想法。她在西安郊区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夜宿一农户家，发现屋顶时时落下麦粒。原来这位农户不理解政府的粮食统购政策，所以把粮食藏到顶棚上。老鼠戳穿了这个秘密。她们采取适当的方式教育引导，打开了这家农户的心。

几十年来，罗琼总是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联系妇女群众的实际情况，力求融会贯通。每逢召开全国性重要的妇女代表大会、工作会议，她多次受委托，根据领导集体讨论的思想起草重要的妇女工作指导性文件、文章，她总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心血奉献出来。

罗琼努力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她主持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论妇女解放》、《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讴歌解放区妇女的奉献。近年来，她参与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文集》等重要著作。她还写下了许多追述和怀念老一辈革命家和妇女工作前辈的文章。她被妇联干部们称为妇女工作的“活字典”。她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各级妇联组织编纂妇女运动史，用历史告诉现在，发扬革命传统。

罗琼自己也著书立说，1955 年撰写了《妇女问题基本知识》一书，1985 年又根据多年实际与学习，重新改写成为《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介绍妇女解放的基础理论及中国妇女运动发展。1990 年她的著作《妇女解放论丛》汇集了解放后她对妇女群众团体如何建立与妇女群众的血肉关系，真正成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

以及如何进行妇女工作的认识和作法，这是她从事妇女工作几十年的心血结晶。她说：“总结历史经验，千条万条归结为一条：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妇女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妇女解放事业同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起前进。”

前几年“性解放”的腐朽思想波及国内。在社会上，在妇女界引起一些反响。罗琼力主加强引导。经她建议，1987年3月在《人民日报》上重新摘要发表了蔡畅1955年写的《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与妇女解放》和邓颖超1942年写的《男女青年问题》，文章中有关正确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论述，引导妇女群众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1988年前后，当社会上泛起一股无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光辉成就，宣扬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的浊浪时，罗琼不再沉默了。她认为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予以回答。在1989年2月庆祝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成立10周年及庆祝《中国妇女运动史》出版的会上，她做了《让新民主主义时期妇女运动历史告诉现在》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有些文章散布的错误思想。

她现在虽已高龄，总是牢记自己是“党的人”，自己虽只是涓涓细流，一定要继续汇入社会主义洪流之中，学到老，干到老。

(1991年3月)

从不向困难低头的武衡

赵建勋

1940年的延安，一个艳阳天。刚满26岁的青年武衡走进毛泽东的窑洞。

“主席，请您写几个字。”

“你是刚来延安的吧？”毛泽东上下打量着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不，我已经来了一年多了。”

“都一年多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呀？”谈笑间毛泽东已把毛笔蘸饱了墨。

武衡连忙铺开那张从国统区带来的道林纸。只见毛泽东运腕挥笔，霎时写就：

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由于敌人封锁，当时的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武衡深深理解这幅题词的含义。

“主席的题词对我的一生具有极大影响，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它所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50多年来我从未在困难面前低过头……”武衡从深情的回忆中回到现实，目光却仍然停留在毛泽东的手书上。

从清华园到宝塔山

武衡，江苏徐州人，生于1914年3月18日。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为“清华第十级”。清华十级人才荟萃，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物理学家王天眷、女作家韦君宜、文学史家王瑶……都是清华十级学生。武衡的大学时代，正值金瓯残缺，困难日深之秋。然而，正如朱自清为十级同学所作级歌唱出的：“举步荆棘，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武衡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反帝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他逐渐抛弃了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抗战爆发后，武衡没有去西南联大继续读书，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时代，武衡曾在陈云任书记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担任过中山图书馆主任（馆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并且是中共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李富春、徐特立先后任院长）的教员。他还主编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从此，武衡就献身于党的科技事业，矢志不渝，奋斗至今。

经验丰富的主管科学的 行政领导人

1954年，曾担任黑龙江省工业厅厅长、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被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此前他和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1957年，他在由陈毅、聂荣臻先后担任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任副秘书长。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武衡任副主任。他长期担任这个职务，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

武衡于1956年、1962年、1978年三次参与制订中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

并多次率代表团前往苏联、东欧和亚非一些国家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谈判及签订协议。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武衡出色地开展了工作。因此，国际社会认为“武衡是北京经验丰富的、直接接触外国科学成就的主管科学的行政领导人之一”。

武衡是一帆风顺的吗？决非如此。早在延安整风之后的“抢救运动”中，他就蹲过 11 个月的监狱。“文革”中三次被“打倒”。但他从未放弃信仰、失掉信心。“对于一个人来说，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武衡又把话题拉回毛泽东那幅题词上：“‘文革’期间，造反派逼我交出毛主席的题词，把我打得够呛。我咬紧牙关说，可以交给中央，但决不交给你们！最后我到底把这幅题词交到了中南海。那是 1967 年 11 月 7 日凌晨两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十月革命 50 周年纪念日！”

历史上的巧合太多，几乎每一次巧合又都蕴涵着太多的意义。那么，武衡身历的这次巧合向人们说明着什么呢？

中国专利之父

谈到中国专利制度的建立，这位中国专利局的第一任局长兴致更浓：

“专利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主张就是鼓励人们把技术秘密向社会公开。‘专利’（英文 Patent）这个词就有‘公开’的意思。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是把技艺传给子孙，甚至传儿不传女。许多人把一身绝技带到棺材里去，失传的东西太多了！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专利制度就是要给发明人一定期限的专利权，使他有可能会得到高额奖励，从而愿意把他的发明贡献给社会……”武衡滔滔不绝地说着。

然而，专利制度毕竟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这姓“资”的东西引进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武衡着手抓这项工作时，遇到了重重阻力。反对意见颇多，有人主张仿制，有人干脆排斥。不知道困难二字的武衡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阐明专利工作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得到支持，终于在 1980 年成立了中国专利局，继而通过了专利法。改革开放以来，这是首次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事件。专利法实施已有好几个年头，无数事实表明了引进专利制度的必要性和由它带来的经济效益。

1984 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授予武衡一枚金质奖章，表彰他在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和促进保护发明权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功绩。看着这枚金灿灿的大奖章，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武老，去年我从《光明日报》看到一则通讯，在国外，人们都称您为‘中国专利之父’，我看这是比奖章更大的荣誉。”

“外国人喜欢用这种字眼”，武衡淡然一笑，“其实，我只不过起了铺路石的作用。”

好一块铺路石！

南极精神

早在“文革”之前，武衡就立志走出中国海，把中国国旗插到南极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的这个愿望更强烈了。他打报告给中央领导之后，又有 34 位科学家联名给中央书记处写信，终于得到批准。武衡和科学工作者们通力合作，艰苦奋斗，当年考察，当年建站，当年越冬。中国的长城站、

中山站先后在南极建成，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地球的最南端！外国人在南极建站一般需要3年，即第一年考察，第二年建站，第三年越冬。外国人3年才能干成的事，中国人1年就拿下来了。1985年2月长城站正式落成后，武衡回国途经美国。美国南极局局长对中国人当年就在南极越冬感到非常吃惊。中国人民对南极考察团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南极精神”。

我要说，武衡的精神也是“南极精神”。现在他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不知疲倦地活跃在科技战线。退居二线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发明协会会长、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地层委员会主任、国家大地图集主编、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主编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他的社会工作比离休之前还要多！

他也在编书、写书。由他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8册）、《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12册）和他的专著《延安时代科技史》均已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在这部著作中，他将以见证人的身份，追述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书名暂定为《科技战线五十年》。

（1991年7月）

故宫岁月七十年

——记单士元

李 虹

85 年的岁月积淀了多少沧桑往事，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坐在陈旧的家具和古老的字画之中，他自己也有着一段令人探幽的历史。

当年，大清王朝最后的主人溥仪含泪被逐出皇宫时，一个时代便从此结束。故宫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紫禁城”，它渐渐陌生了花翎顶戴的达官显贵，迎接着普普通通的众生。

单士元便是其中一位。

正是溥仪出宫的这年，18 岁的他怀着对红墙之后的好奇来到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帮助清查文物和历史档案。初见故宫宝藏时，他激动不已。尔后，单士元在故宫度过了近 70 年的风霜雨雪。他所诚服的不仅是故宫文物的价值连城，更是劳动人民那精深和博大的智慧……

1929 年，单士元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在故宫期间，他在编目、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档案学界，他是最早提倡档案目录学的学者。他认为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直接史料，是未经过改篡而仍保存事实真相的文书。其后，故宫文献馆即参照他的独到见解把档案译名列为整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使档案工作的质量大大提高了。

在长期从事档案整理和研究清史的过程中，他把成果汇集成册，题为《明清历史档案论丛》。遗憾的是至今仍被尘封在书柜里，尚未问世。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明清档案专著，不能出版，实令人慨叹！

单士元不仅研究明清史、明清档案，而且对于中国的古建筑学也是很有造诣的。在建筑学界，他第一个提出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纳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因而在研究古建筑工艺技术方面走在了前面。

1937 年他编成《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此书是迄今所见第一部大型实用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必备工具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解放后，单士元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便以主人的姿态行使了主人的权力。

他首先对故宫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维修措施，提出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第一步是清除垃圾瓦砾。自 1952 年至 1958 年间运出的碴土，就有 25 万立方米。据说如用这些垃圾修筑一条宽 2 米高 1 米的公路，可以由北京直达天津。难怪 1959 年劳改中的溥仪重返故宫时，深有感慨地说：“你们把这里打扫得真干净，我都认不出来了。”

随后，单士元又在故宫博物院里设立了古建筑研究单位，聘请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维修，把故宫作为一个考古学术工作的对象，精心地加以保护。但他遗憾的是，原来具有高超精湛技术的老师傅都已相继去世，现在的工艺水平比以前要差多了。

单士元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国古代文化遗存，出土文物和古代建筑。

“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故宫”便成为他一生执著恪守的信念，并竭尽最大的努力而实行之。

他永远也忘不了进宫的那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著名教授沈兼士

对他语重心长说的一段话，“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在故宫，要对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于是，单士元多年来特别注意收集和紫禁城有关的文物，包括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木雕花，琉璃小兽等，并将他拾到的这些文物交到古建部资料室，还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有一次，他在地上拾到一张从故宫马神庙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高丽纸。这块纸虽已历时 500 多年，仍然白净细薄而有韧性。他感慨之余，随即赋诗于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记因缘。”

一位 40 多岁的故宫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单老对故宫感情之深是出了名的。凡是对于破坏故宫原貌的事，他都坚决反对，包括一根古梁，一块砖瓦。

单士元这辈子喜欢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文物、视文物为生命，可有一条：他从不玩古董。他说：“文物不在于它值多少钱，更广的意义是代表着我国古文化。我不是复古主义，却也不能忽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元老，在故宫观四季之景是单士元的癖好。春观柳烟听松涛，夏望千龙四喷水，秋听细雨落梧桐，冬赏白雪覆琉璃。单士元常常说：“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这位迄今所知在故宫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业已把故宫当成另一意义的“家”。当年，溥仪在宫也不过 16 年的光景，而单士元却在这 72 万平方米的皇宫里度过了近 70 年的沧桑岁月。就此而论，他也算得上是故宫真正的主人了。但是，与这雄伟奢华的故宫形成强烈对比的，便是单士元那自称为“蠅斋”的小小天地了。他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会友于斯，随遇而安，落得几分超脱的安宁。

单士元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祖辈已在此居住生活了几百年。现在，他已不住祖传的四合院，而搬进了单元楼。可祖上传下来的那些古朴典雅的老式家具和一幅四季图画，单士元还一直精心保存，带进那依然窄小的书屋。这正是老人对一切古文化拳拳爱心的流露，这种爱心驱使他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的研究。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档案丛录》、《明代宫苑考述》、《清代建筑年表》、《故宫札记》、《中国琉璃技术史》、《小皇帝时代的溥仪》、《明末墨本书目提要》、《中国古建筑维修工艺杂录》等著作不计其数，珠玉琳琅。

单士元可称得上是一位辛勤治学的“老学究”，可他却丝毫没有“学究”的孤僻和怪诞。他待人随和，襟怀坦荡，虚怀若谷，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工人、学生，他都能聊得海阔天空，既富于老北京的幽默和风趣，又不失文人的儒雅。他对自己现任的众多头衔，这顾问那理事的，却不愿多谈。他说：“我是以樗栎之材问学无成。”这虽是老人的谦抑，却可窥见老人对自己的严格。

年轻时最迷恋打网球的单士元，如今虽步履不免有些蹒跚，但经医生检查，身体仍是“基本正常”。问其是否有祖传的养生之道，老人笑笑：“别看我这瘦老头子，可最喜欢吃肉，现在是无肉不饱。”

半生清苦的老人，如今已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1985 年为纪念入故宫 60 秋，老人曾题诗一首：“乙丑入紫禁，今又乙丑年。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奋蹄奔千里，直至到黄泉。”诗后附言：时已黄昏，余晖未尽，将以残烛之光为人民服务，死而后已，用报党教育之恩。

现在，单士元已退居二线，可最使老人牵肠挂肚的还是故宫。

多年来，他一直以旷达和淡泊伴随紫禁城的苦涩甘甜。今天，紫禁城和它里面大量珍贵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与这位蜚声中外的史学家、档案学家、古建筑学家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单士元与故宫之间建立的那种浓重且意味深长的感情是无法用寥寥数笔言说的。

听听老人自己的感慨，便不难从中领悟他的心胸了。“近 70 年来，我每天必来故宫走一圈。每当我看到它那红墙黄瓦、飞檐陡壁时，我就仿佛看见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看见了一种智慧的结晶，看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一天看不见故宫就吃不下饭去……

(1992 年 5 月)

“台胞之家”的文总管林丽韞

张 进

林丽韞女士的名字，是生活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台胞所熟知的。从 1981 年起，她已连任 3 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大陆上的 28000 多名台胞把她看作是“台胞之家”——同乡会的代表；海外和宝岛上的台胞则视她为可信赖的乡亲、朋友。

奔波大江南北 服务万千台胞

80 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成立一个同乡会性质的民间团体，以便于充分发挥台胞的桥梁作用，开展海峡两岸民间沟通与交流，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已显得十分必要。1981 年 12 月，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生于台湾并和海内外台胞有较多联系的林丽韞女士当选为会长。

台联会成立初期，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为大陆台胞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因此，林丽韞不辞辛劳，到处奔波。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西北边陲到东南沿海，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所到之处，她帮助台胞落实政策，解决生活困难，发放抚恤金，安置待业青年和病残人员，解决台胞子女入学问题等等。1985 年 12 月，林丽韞冒着严寒，乘汽车颠簸在中国西北崎岖的公路上。26 天里，她辗转天山南北、内蒙古草原，深入台胞家中间寒问暖，解决问题。在新疆，她了解到有一家台胞母女体弱多病，生活十分困难，便请有关部门贷款，帮她们搞起了服装加工，使她们开始了充满希望的生活。

林丽韞还十分关心第二、三代台胞青年的教育。近几年，全国台联和地方台联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先后选送 1000 多名台湾籍青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华侨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和广州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还组织夏令营、冬令营，吸收了海内外近千名台胞青年参加。1990 年 8 月，又组织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 40 多名台胞青年赴延安参观。

海外相会 共叙乡情

全国台联成立后，立刻引起海外和岛内台胞的关注。他们急于想知道“台联”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林丽韞是何许人。

1983 年，林丽韞首次以全国台联会会长的身份出访巴西，此后又多次访问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她和蔼可亲的风度、赤诚的同乡情谊，深深打动了旅居海外的台胞乡亲们的心，清除了他们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了使更多的台胞了解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林丽韞从早到晚不停地同各界台胞接触、交谈。林丽韞说得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她娓娓而谈，乡音带着乡情，亲切感人，这给台胞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她“很有耐心，很善良，有人情味，令人尊敬。”甚至主张“台独”的人也尊重她。台胞们争着接她到家中去住，请她品尝家乡菜，对她倾诉思乡的情怀，有时一谈就谈到凌晨两三点钟。一位陪同她出访的工作人员说：“每次在国外，我们都没有多少空闲时间，除了去台胞家中座谈，参加各种形式的聚会，就是坐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旅居美国多年的老台胞杨基振先生多年来一直做着归乡梦。在同林丽韞交谈之后，杨先生了解了祖国的巨大变化，不久就偕夫人来大陆旧地重游。他说：“林会长有一种魔力，把我们吸引来了。”

为人和善亲切 喜爱音乐文学

“林会长很和气，尊重人，没有一点架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许多从海外或岛内回到大陆的台胞常常慕名来见林丽韞。不论多忙，林丽韞总要亲自接见。她说：“乡亲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不见呢！”青年台胞联欢，举办夏令营、冬令营，她也是每请必到。但当她 80 高龄的姨妈一家来北京时，林丽韞却因工作繁忙不得不请秘书陪同老人参观故宫。对此，她感到很内疚，对老人说：“等我退休之后，一定陪您去各地走走看看。”

林丽韞喜爱音乐。“我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合唱，它要求众人统一和谐，能增加友爱。”

读书是林丽韞的另一爱好。她尤其喜爱文学作品。每遇到好书，她一定要买下。有时工作太忙没时间看，她就收起来，笑着自慰：“等我退下来再好好看吧。”

离乡五十载 思归情切切

林丽韞 1933 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县的清水镇，早年随父亲到日本神户读书。林丽韞的父亲曾担任神户华侨总会会长。1952 年，林丽韞随父回国，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

“客别家乡半个世纪，我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当年青梅竹马的朋友 50 年后才在大陆相见。家乡的老人何时才能再见。我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故乡，旧地重游，对老一辈人尽份孝心啊！”林丽韞动情地说。

林丽韞祖辈是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泉州渡海到台湾的。她是林家在台湾定居后的第 8 代人。在采访快要结束时，她说：“我 4 岁的小孙子已经是第 10 代人了。他属虎，活蹦乱跳的像只小老虎。我盼望着早日带他到台湾，看望家乡亲人。”

(1991 年 3 月)

李美林梦萦未名湖 叶稚珊

北京大学，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不少人是从这里培育出的。曾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美林先生，在这里任教已逾 40 年。他教过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但他自己仍在不倦地探索、学习。他钻研的并不是众人瞩目的热门学科，也并非有意避开人们追逐的目光，在知识殿堂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独享寂寞，然而他依然声名远扬。海内外的学人无不敬重这位宽宽额头，沉默寡言的学者。他渊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他的人格操守，凝结成了他特殊的精魅力。

季美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留德 10 年。1946 年回国后历任北大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后任北大南亚研究所所长。40 几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湖光塔影的燕园。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他的感情，已经和北京大学无法分开。现在，在北京大学蜿蜒的林荫路上，你偶尔会看到这位布衣老人骑车而过，你不会相信他已年近八旬。在南亚研究所的小楼上，有一间所长办公室，里边有木桌、木椅和许多书，季美林主持着这里的工作。在朗润园公寓前，数根摇曳的翠竹背后，有一扇窗，是季先生家的窗。每日清晨 4 点多，朗润园最早的灯光就从这里透出。

80 高龄的人很多。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津津乐道于养生、长寿。而季美林把他的每一天都浸沉在知识里，又用他的每一分钟写成传诸后人的著作。把季先生的作品垒在一起，已远远高出了“等身”。且不说他早年翻译的包括《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在内的 400 多万字的印度文学名著，也不说 he 已写下的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就是近几年，他仍平均每年写十二三万字。翻开那一部部凝结着几十年研究成果的专著，如同面对葱翠叠嶂、云雾缭绕的名山。高山仰止，我唯有崇敬和感叹。

但除此之外，那汇集了季先生几十年散文佳作的《季美林散文集》，曾把人带入一个意味无穷的境地。那是一个沉默的老人心中的文字，每一篇都体现了他对散文的理解：既注重文字修炼，又讲究谋篇布局，但最注重的是“真”，是“情”。写的虽是身边琐事，却情真意切。这样的散文，非大家学者是断然写不出的。

与季先生蜚声中外的作品同在的，是他一成不变的简朴生活。在他国内外大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几倍于他在山东老家的时光，但他却始终钟情于少年时代家乡给他的滋养。绿豆小米粥，是他几十年不更换的“佳肴”。那是长寿的良方，还是一介书生的清贫？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修身齐家的一种自我约束？其实，看看老人那张永远平静的脸，就如同看到了他永远平静的心。他所献身的是一个无比安静的世界，永不会浮躁。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就仅此而已。

在这样的导师身边，他的研究生学会了孤独的苦学。东方文化的深邃，远不是充满名利欲望的心所能接近和掌握的。季先生的两套住房中有一套是“图书馆”。他的私人藏书是属于他和他的学生共有的。不必惊动先生，学生可以轻轻进来，静静研读，敞开门的“图书馆”如同先生敞开的心扉。学生从先生言行中得到的，远比从书本上得到的更多得多。

在季先生身边，还有一位常年追随左右的助手李铮。他虽不曾得到博士学位，甚至不曾出过自己的专著，但季美林在他作品的后记中充满感激之情

地提到了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出于对亦师亦长的季先生的尊崇，李铮常年全身心地扮演了一个幕后无名的角色，外务内政，他为季先生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虽然他的家也在北大校园，但一年中有许多时间他就住在“季羨林图书馆”内。季羨林视他如家人。他也始终对季先生满怀崇敬之情。因为，时间越长，他就越清楚地看到了季先生人品的闪光。

1991年8月6日是季先生80岁生日。人们在准备向他祝贺，为他开学术讨论会和出版纪念文集。届时港、台和日本、韩国的许多学者都要来参加，那将是一个使人兴奋的热闹场面，季羨林到时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呢？他会发言说“……前见古人，后见来者，以吾老朽，尚何所求”吗？而他现在依旧是那么安静，一如既往的每日“点燃”朗润园的第一盏灯。累了，就在竹椅上靠靠，或和老伴聊聊天。在他的子孙辈中，有学建筑的，有学计算机的，唯独没有他的同行。在美国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孙子不久前写信来，向爷爷表示有意试笔，老人欣喜地回信支持。事业的延续并不一定要家传，他鼓励每一个孩子在本职工作中勤学敬业。

有时，老人也会放下笔，走到楼边的小山坡上，站在绿色的小树和草丛中，眺望工作生活了40几年的燕园，若有所感，若有所思。那是发思古之幽情，还是感念远游的学子？老人说，“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

(1991年6月)

中国核工业的英才姜圣阶

戴亚平 石岩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片硕大无比的蘑菇烟云在中国西北大戈壁上空冉冉升起。

它向世界宣布，中国没有原子弹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的核工业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在经过了20多年的秘密历程后，那些曾经为中国核工业铺路和奠基的“无名”人物才陆续在公众面前曝光，他们中间有在物理理论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也有姜圣阶、蒋心雄、刘书林这样一大批实干家。

1962年，担任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姜圣阶，突然从南京消失了。他到哪里去了呢？同事们都不知道。他当时已被选为江苏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人们却寻觅不到他的踪影。

冬去春来，15年之后的1977年，姜圣阶才传奇般地出现了。他先后在核工业部担任了副部长和科技委员会主任，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中国核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1962年，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能工业及原子弹研制工作由于苏联专家的撤走，许多任务亟需中国自己的专家去承担。人选名单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慧眼识珠玑，选中了姜圣阶。从此，姜圣阶就“失踪”了。不久，他来到了大西北的戈壁滩担任了西北综合核燃料工厂的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隐姓埋名，在大戈壁滩上工作了15个春秋。

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时，姜圣阶多次来到现场观看那绽开的蘑菇云，那中间凝聚着他的汗水和心血，作为核武器核心部件的制造和生产组织者，姜圣阶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后处理工艺的“沉淀法”改为“萃取法”，使中国的核燃料生产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

姜圣阶还是中国发展核电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981年，他就在中国核学会第一次大会上慷慨陈词，阐述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时，响应者为数不多。可是在8年后的今天，发展核电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核电将成为中国能源的一支重要支柱。

几年来，这位中国核电的倡导者为发展核电事业奔波于全国各地。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和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已先后破土动工，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并将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建成，并网发电。

从原子弹、氢弹转到核电，中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1986年，当中国的两座核电站刚刚开始起步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故给中国核电事业蒙上了一层阴云。在香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反核风波。这时，姜圣阶再次挺身而出，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兼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的姜圣阶就向记者指出，中国的核电选择的是先进堆型，不会发生类似苏联的事故。他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

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的访问团，向他们阐明核电的科学原理和安全知识，终于使这场越酿越大的风波逐渐平息。

姜圣阶于 195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1950 年 10 月回国。在南京工作期间，他领导并参加了合成氨塔内部的结构改造，使氨产量提高了 10 倍。他领导设计和制造出大型沸腾炉，在国内首次用于硫酸生产。他领导研制的多层式高压容器获得国务院特等奖。由于他对核武器研制的突出贡献，在国务院授予“原子弹技术突破与武器化”为全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他是获奖的 7 个人之一。

他先后编撰了《决策科学基础》、《决策科学引论》、《积分决策学》、《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学》、《法元论》等专著，1987 年 6 月，他获得了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现年已是 74 岁高龄的姜圣阶，仍在每天辛勤地工作着。命运已经注定把他和中国的核事业联系在一起。从昨天的核武器，到今天的核电，前者为年轻的共和国带来了和平，后者将为祖国未来带来耀眼的光华。

(1990 年 1 月)

十亿人的耳鼻喉科主席姜泗长 李艳华

中国有十亿多人，人类五官可能出现的毛病在中国病例中几乎全能找到。

欧洲耳科协会会长鲍特曼博士在法国国际会议上向世界介绍了一个人：“这是十亿人的耳鼻喉科主席！”

这个人是一位军医，叫姜泗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称他：“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

姜泗长自己说：“我这一生可以欣慰的有三件事：一、开展了一些疑难手术，为中国的颞骨病理学、耳外科学奠定了基础。二、创建了全军耳鼻喉科研究所。三、培养了许多值得骄傲的学生。”

少年意气济世梦

江泽民是 1993 年 9 月 14 日给姜泗长题的词，这个月姜泗长整整 80 岁。

80 年前他出生时，留日归国后一直在家待业的父亲突然找到了工作。“所以，父亲特别喜欢我，认为我给他带来了运气。”

可惜运气并没有一直跟着姜泗长。高中毕业后，他被保送到辅仁大学医预科刚一年，父亲的工作又丢了。姜泗长不得不转到学费低廉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靠着连年榜首的成绩，每年拿 20 块大洋的奖学金，读完了 7 年的医学课程。

1937 年夏，姜泗长走出校门时，北平城已插上了太阳旗。他南下南京做了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不到百天，南京又告急，姜泗长随院迁至长沙，而后再西进巴蜀，在成都正式做了中央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在这里，姜泗长遇到了影响他毕生人品医德的导师胡懋廉。胡当时是全国闻名的耳鼻喉科教授，在八年抗战中，姜泗长一直追随着他。胡懋廉不仅教他技术，而且还教他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当时，耳鼻喉科还不算中国医学的大科类，姜泗长身无分文，又患过咯血，研究工作几乎难以为继，全凭自己咬着牙创造条件。1940 年，按照一位热心病人提供的线索，姜泗长在成都找到了一处地基工地，扒出来 200 多个完整的头骨，他就靠着这笔“财富”打下了医学生涯中牢固扎实的解剖基础。

与此同时，姜泗长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耳科实验室，室里的第一笔不动产，还是他从成都郊区拣回来的那百十来个颅骨。

给吴阶平留下的第一印象

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的姜泗长开始全面主持学院耳鼻喉科工作，并于 1947 年获得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的资格。在大学附近的国际公寓里，与姜泗长住斜对门的就目前中国医学界另一位泰斗人物吴阶平。吴阶平说：“泗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翩翩学者风度。当时他从事耳鼻喉科工作已近十年，一到芝加哥大学就选中了学习刚刚发展起来的内耳开窗术。”

三年之后，这种先进的内耳开窗术被 37 岁的姜泗长写进了新中国的医学史。

共产党的官不能随便不干

1948 年底，姜泗长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泊后，踏上了上海码头。一上岸，看见街上到处是抢购黄金的人群，全都急急惶惶，又动荡又嘈杂。细一打听才知道，国内正打淮海战役，解放战争快见分晓了。听到这儿，笔者插了一句：“当时好多学者教授都去了台湾，您想过要去吗？”老人显得很意外，满脸不解地反问：“我去台湾干嘛？！”

姜泗长就这么继续留在了刚解放的南京，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大学医院院长。那时候，他一门心思扑在专业上，对做这个院长有点懵里懵懂，所以接受职务时就和解放军代表讲好：“只干三个月，然后就放我回耳鼻咽喉科。”三个月后，他跑去找领导辞职，军代表耐心地跟他解释：“共产党的官不能随便不干，除非你犯了什么错误。”姜泗长只好继续当这个“共产党的官”，从一个不懂政治的科学家一步步成熟为九死不悔的共产党员。身着戎装，历任南京第五医大附属医院院长、西安第四医大附一院副院长、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耳鼻喉科研究所所长，国防绿装点了他的一生。

让聋人听到时代的声音

耳聋是常见致残疾病之一，传统的诊断认为是由中耳炎所致。姜泗长经过无数临床诊治，怀疑某些患者是耳硬化症致聋。可是翻遍国外权威文献，统统一个结论：“中国耳硬化症罕见。”1949 年底，一位丧失了听力的病人来找姜泗长，低声地说：“家里人都讨厌我，不理我。您要是不给我开刀，我真不如死了！”姜泗长给他下了耳硬化症的确诊后，思虑再三，终于决定为天下之先，施行内耳开窗术。

姜泗长开始四处奔波凑器械：电钻是牙科用的线钻，一个将就着能用的听力计是从别的医院换来的，真正无可挑剔的只有“软件”——那套手术方案，姜泗长推敲了半年多。

1950 年 7 月，中国首例内耳开窗术成功了！为这些病例手术撰写的论文报告随即被收入了美国耳鼻喉科学杂志索引中。此后，姜泗长又公布了他的调查数据：中国耳聋者中每 120 例中就有一例耳硬化症聋。在前人不敢涉足的内耳“禁区”，姜泗长接连为一个个患者打开了通往有声世界的“窗户”，创下的 81.4% 的有效率，跃入国际先进行列。

1954 年，当这个实验室和南京中大都已经规模初定并声名远播时，中大改为第五军医大学后，军队院校大合并迁往西安。一片荒凉之中，姜泗长又以主任教授的身份领导起大家，开始走进一段筚路蓝缕新的创业里程。

“如果说从南京调往西安时我心里是惋惜、遗憾和恋恋不舍的话，1959 年从西安调我去北京时，我可真是感到深深痛惜了！”回首当年，姜泗长对解放军总医院调他出任耳鼻喉科主任、教授这件事还是叹喟不已：“从 1949 年至 1959 年，十年中三次大变迁，创了业又不能继续事业，那种痛苦真是刻骨铭心啊！”

这种痛苦不是无谓的。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姜泗长辗转于南京、西安、北京三地。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三个都城分别奠定了耳鼻喉科基础科学。

这十年里，尽管动荡，姜泗长还是在刚翻开的共和国医学史上写下一连串“第一”：1951 年，国内第一套成人颞骨成片和第一批死婴内耳标本制成；1954 年，国内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专著诞生；1960 年，西方由来已久的鼓室成形术被打破。姜泗长推出自行设计的鼓室成形术和鼓膜修补术。2500

例做下来，疗效高达 93.1%……

来到北京的第三年，姜泗长完成了石破天惊的又一首例：在高倍放大镜和双目显微镜下，姜泗长用一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银针探入患者一孔之微的内耳之内，成功地完成了镫骨切除术。其时，国外同类手术刚刚开始。30 年过去，由姜泗长开创的这类手术在临床施行已近 2000 例，提高听力有效率达 94.8%。

当年，《人民日报》郑重报道了这则消息，标题是：《让更多的聋人听到伟大时代的声音》。

磨难砺志 弥贞弥坚

姜泗长经历过共和国的伟大时代，姜泗长也经历过共和国的劫难时代。

在劫难时代里他自己却被迫沉入了长久的缄默。

在姜泗长教授医学生涯上，1964 年至 1975 年是空白的。

又是一个十年。

曾经以共和国名义填补了世界医学史上众多空白的姜泗长，对于自己生命中这长达十年的一段空白却回天乏力。

1968 年 8 月 1 日上午，姜泗长刚下手术台就有人通知他：“二部政委、主任找你”。他想也没多想就赶去了。进门一看，气氛不对，怎么当屋正中挂了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呢？“坦白”什么呢？琢磨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姜泗长被关了起来，整整 8 个月。

“那时候，我巴不得快点把我送进监狱，那样老伴还能按时来看看我。可关在这楼里，家里人连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8 个月，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手边只有四本《毛选》。我反复看了三遍，越学越坚信毛主席，坚信党。《毛选》成了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整了我 8 个月。到出来的那一天，我也没搞懂什么是他们给我定的‘资产阶级医疗作风’。我只是恪守不牵累任何人的信念，虽然受了些苦，可是保持了完整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想想还是心安。”

这位既天真又认真的医学教授终于又回到了他一手创建的耳科，任务是打扫卫生刷厕所。“这不错，起码可以天天回家了。”在当时境遇下，姜泗长真是由衷地觉得这样很不错了。“几天之后，又让我同时做护士，我学会了怎样开饭，怎样转抄医嘱，怎样执行医嘱。”

目睹伟人人生的最后历程

“1974 年冬天，一个晚上很晚了，我接到电话，说派我第二天出差，我问要带什么。通知的人说什么别的也不用，带上毛主席著作就行了。”蹊跷中又有几分神秘。

这一次，姜泗长是以一位医学专家的身份被派去中南海，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1974 年 12 月至 1976 年 9 月 9 日，姜泗长亲眼目睹了这位伟人生命中最后一段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时期”，说到这里，80 岁的姜泗长脸上现出格外的凝重。他说过：一生中对他产生根本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姜世尉、导师胡懋廉，最后一位也是他尤为敬重的就是毛泽东。

让学生超过自己

姜教授的生平大事年表从 1978 年以后又密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密。仅 1989 年一栏里，就记录了他获得的八项大奖。

继伟大的时代、劫难的时代之后，姜泗长在古稀之年才走进了他辉煌的时代。

1978 年，复职为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的姜泗长拿到了国务院批准的首批硕士、博士导师资格。百感交集中，第一个跳进他脑子的形象是当年他自己的导师胡懋廉。在姜泗长早年走过的几个关键路口上，胡先生都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南京方面肯于送姜泗长赴美留学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远在西南的胡先生来中大教书。胡先生二话没说，举家东迁任课于中大。用自己当梯子，把门下高足托到了他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30 年后，姜泗长也成了这样一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导师。

为了调一位听力专家进京，凡事不爱求人的姜泗长先是找到总后勤部长阐述要人理由，又跑到北京市委领导那里要求安排他的家属进京，终于保证了这位人才轻装上阵，不带任何后顾之忧。1984 年，从总医院乃至全军各医院科支任都还是老一辈的专家，姜泗长却力排众议，推荐自己的助手杨伟炎接替自己，使 48 岁的杨伟炎成了总医院第一位年轻的科主任和博士导师，成为欧洲耳鼻咽喉学会的两位中国成员之一。

最优秀的导师往往是集宽宏慈爱与严谨严格于一身的导师。姜泗长一旦“严”起来，学生真是不能不服他。他走进实验室，看见刚做完试验的学生满身试剂，就要批评：“看看你这一身就知道试验没有条理。搞科学的人处处要严谨。”他给学生修改论文，坚持要先看完几千张实验切片才肯动笔，而且将文中所有“可能”、“推测”一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全都删去，然后严肃地告诉学生：“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可能’和‘推测’。”

自 1978 年以来，姜泗长培养了 10 名博士生和 24 名硕士生，接纳传授过几百名进修生。目前中国许多所医科院校和各省市中心医院的耳鼻喉教研室主任或科主任，都得过姜泗长亲传。

在庆祝姜泗长从医 55 周年的大会上，总医院院长廖文海代表本系统感激老教授：“姜泗长为我国耳鼻咽喉科事业不仅仅是培养了一个个，而且是培养了一代代优秀专业人才。”

而姜泗长自己的理想却极为简单——“让学生超过自己。”

沉稳儒雅的姜泗长声称：“经历了变幻坎坷的一生，很难有什么事能令我再激动。可是 1990 年 4 月 26 日这天，我的心情真是心潮激荡！”一座雪白的小楼拔地而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耳鼻喉科研究所正式成立。而筹划这个研究所的最早一次报告，姜泗长起草于 35 年之前。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站在 80 高龄上的姜泗长教授，回首今生，既得育天下英才，又以毕生心志为祖国创立了一门基础科学，可谓无憾。而他终究彻悟出的一句箴言却是“行医苦行当”——这是 1992 年，姜泗长发表在《大众医学》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如果你选择了医学，那么你首先必须具备奉献精神。医生这门职业是一个高尚的受人敬重的职业，要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钻研医学知识，而且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德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姜泗长用他一生的人品和医德作了诠释。

在采访姜泗长之前，我已经耳闻了方方面面许许多多对他高山仰止的评价。于是我怀着极为敬重的心情去努力搜集尽可能多的外围资料。终于，我

得到了一份姜泗长本人撰写的《我的回忆》。真是如获至宝。文中最长的一章叫做“经验与教训”，罗列了他半个多世纪医学生涯中种种不该发生和本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每一例都描述得非常详尽。前因后果，自己的判断及其根据，乃至病人的音容笑貌和出事后自己痛悔不已的心情，无一疏漏。

我惊呆了。我从没见过这么揭自己短处的科学家，而且是这么一位扬名海内外，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按照预约的时间，我来到姜泗长家。秘书把我们迎到客厅里，悄声告诉我们：老人昨晚心脏病突发——房颤。此言一出，我觉得自己心里也忽悠“房颤”了一下，看来采访只能改期了。未及我再征询秘书的意见，高处有脚步声响起：一位身材颀长的老人连同他谦和温文的微笑，从楼梯上一级一级降下来。

他那种从容博雅的气度像是暖冬正午的阳光，不用着意挥洒，已经弥漫地笼罩了四处空间和空间里的我们。

我傍在这位既熟稔又陌生的老人耳边，听他娓娓道来的故事起伏跌宕，忘了自己走来采访。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恍然惊觉：老人抱病在身，不能再拖着他聊下去了。我们请老人多多休息，姜泗长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不要紧，反正今天我还约了位平顶山的病人。”“今天还约病人？改期吧！”我脱口而出。“姜老预约病人一般不再改期。”秘书接过话来：“姜老现在还每天在院里和所里转转，每星期四还坚持门诊。”

姜泗长向我们点点头，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和印象里他那阳光般的微笑缓缓地暖暖地升上去、升上去。

我很怅然。努力连缀自己来时准备得好好的思路，可是脑子里灿灿一片，那种亮丽的感动让我再也抓不出一条线索。

我坐下来，和秘书再谈。

背对着楼梯，我觉出阳光重新笼罩了我。

又走下楼梯来的姜泗长再一次轻轻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咛：“要写，就一定实事求是。”

(1993年12月)

德艺双馨唱河山 ——记骆玉笙 张世英

骆玉笙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几十年前她就唱“压轴戏”，现在她仍然是唱“压轴戏”，而且不论是曲艺专场，还是大型的文艺晚会，只要有她演出，她总是“攒底”（最后一个）。她款步出场，台下便掌声雷动；她一开口演唱，就赢得满堂彩。年近八旬的骆玉笙，虽是皓首银发的老人了，但是她的演唱却是高音响遏行云游刃有余，低音如潺潺流水玉润珠圆。不仅是中老年观众痴迷她的演唱，就是青年观众也被她的演唱所征服。

金喉女歌王却有凄凉身世

年轻的观众知道她叫骆玉笙，年老的观众知道她叫“小彩舞”，可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名字都是她。骆玉笙是她的名字，“小彩舞”是她的艺名，它们包含着她凄凉的身世和辛酸的经历。她生于1914年，出生才6个月就被卖给在上海变戏法的天津艺人骆彩武。从此她姓“骆”，成了天津人，但她对自己真正的家乡、生身父母，却一无所知。

这位艺术家从4岁起就跟着养父出入于上海大世界，作为养父变戏法中的玩意儿在台上演唱，成为轰动上海的“四岁小怪物”，演唱二黄。9岁时拜一代鼓王刘宝全的琴师、三弦圣手韩永禄为师，艺业日益精进。1936年，22岁的骆玉笙从金陵来到曲艺之乡天津，随之红遍津、京曲坛，享有“金喉女歌王”、“金喉歌后鼓界女王”的美誉。

推陈出新独创“骆派”

骆玉笙曾深有感触他说：“在旧社会，不管我怎样出名，霓虹灯上‘小彩舞’三个字在夜空多么耀眼闪烁，都丝毫改变不了一个女艺人被损害的地位。”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骆玉笙的苦难历史。

翻身的喜悦，焕发了她的艺术青春。

在继承传统和保持自己风格的基础上，她不断改革创新，逐渐改变了解放前以擅唱悲剧见长的特点，探索出用京韵演唱现代曲目的新路子，她在演唱《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珠峰红旗》、《韩英见娘》等新曲目的同时，形成了刚健、高亢、响亮的崭新风格。1985年，70高龄的她，又以一曲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风靡全国，她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

在60年的艺术实践中，她经过不渝地努力、不断地完善，创造了京韵大鼓中独具一格的“骆派”艺术。1991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在天津、北京举行庆贺骆玉笙曲艺艺术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陈云为她题词：“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李瑞环发来贺信，称赞她“不愧为当代德艺双馨的曲艺艺术大师”。

“骆派”艺术不乏传人

这位老艺术家，几十年来，不但活跃在曲艺舞台上，还在曲艺的沃土上

不停地耕耘，辛勤培育曲艺新苗。“我现在最着急的事，就是培养更多的接班人，我要尽可能地把自已几十年的艺术经验传给后人！”这就是骆玉笙这位老艺术家的最大的心愿。她除了经常不辞辛苦地到培养曲艺新人的所在地——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亲自为学生授课、指点外，还不断为弟子传经授艺。去年，她曾率多名弟子及弟子的传人，老中青少四代同台在京、津献艺，盛况空前。

前两年，台湾的两位女士仰慕她的精湛技艺，专程来大陆拜她为师，使“骆派”京韵大鼓艺术在台湾有了传人。今年6月底，她又在北京喜收3名高徒：饰演周总理的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朝阳区穆斯林餐厅经理何风仪和京剧女演员王树芳。这些多方面的人才醉心“骆派”京韵，可见其魅力！

如今已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的骆玉笙，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普通演员的职责。已是78岁高龄的她，仍然经常奔赴全国各省市巡回演出。她要把满腔的情和爱，奉献给千千万万的观众。

(1993年1月)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源 潮

光南走了，走得这样突然。

他倒在钢琴上，倒在他的歌声里——他的一生就是一组传世的歌。

《春天》

每个人都有他的春天，光南的春天夹着雨和雪。

“有人猜我是童子功，也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其实都不是。”光南在广州曾对我彻夜长谈过他的身世：“我小的时候，家里颠沛流离，能活命就不错了，哪里顾得上让我学习音乐，更甭说什么练琴练耳了。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位从育才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她特别喜欢音乐，不知怎么注意上了我，说我对音乐敏感，模仿力强，格外注意了对我的音乐启蒙。5岁那年春天，我在课隙随口哼了一阵即兴调调，有心的老师赶紧用笔把谱记了下来。她说：这段旋律虽然不及莫扎特的神童曲，倒也挺有点春天的情趣，就取个名叫《春天》吧。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光南真正的春天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刚解放的北京城是个歌声的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伴随着一个个生机勃勃、民心振奋的年代。这一段社会主义的春天是光南音乐创作最早的根基，他写的第一批创作歌曲几乎都是以歌颂党为主题的。

光南的父亲爱听京剧，在工作之余也常哼上几段。光南跟着听，跟着唱，小小年纪居然能流利地背下许多长段板腔，甚至能说出梅、程、麒、余等各派唱腔的艺术特色。小学快毕业那年，正赶上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汇演，中华各民族的民歌、民曲、民调使光南仿佛忽然来到遍布珠贝的海滩，一下子不知道捡什么好了。那阵子光南成了个民歌迷，一会唱一段河北梆子，一会又哼一段“四季调”，旁人听了都说：“韵和味还挺像回事的。”光南的同行王立平向我介绍：“光南是我们这辈人中民族音乐底子最厚实的。”光南说：“人家老问我从哪儿学来那么多民间旋律，其实都是搞音乐之前就哼熟了了的调。”

《我要飞翔，我要歌唱》

光南当年并不安心在第一流的101中学读书，他的心早就飞进了音乐世界，他一直想上音乐学院附中，但是妈妈不同意。光南无奈，只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的“音乐梦”。下了课就抄歌、唱歌、听歌，随身的小本子，几乎就是《新歌集》，班上要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来借他的小本子。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光南歌抄得多了，肚子里不知不觉地就酿出不少新的旋律。他在作曲者的位置上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而总是胡乱填一个假名。这些歌从光南的小本子上传到同班同学里，再逐步传到其他的学生中，居然就渐渐地唱开了。

50年代，俄罗斯民歌流行一时，在北京郊外的校园区，只要月亮一挂梢，到处能听到有人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时的光南开始给杂志上的苏联短诗谱曲，于是，他的小本子里“诞生”了不少谁也没听说过的“俄罗斯作曲家”。

1955年的一个夏日傍晚，他在报栏里浏览当天新闻，北京市少年歌咏赛

获奖节目将在当晚汇报演出的消息自然逃不脱这个“音乐迷”的注意。忽然，他眼睛一亮：在获奖的节目单里居然有一首《懒惰的杜尼娅》，再看作曲者正是那位除了光南再无人认识的“××斯基”。血顿时涌上了这位15岁少年的头，他转过身就向城里赶去。等到了剧场，他才发现自己没有票，到售票窗口，人家说今天的观众全是请来的客人，不卖票。急得他在门口乱转。这时有一位等人的中学教师看到了他，走来问他为什么老是不进去。光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连忙把自己写的歌得了奖，却没有一张听歌的票的原委都告诉了老师。这位教师听了很感动，就拿出自己的一张票给了他。光南后来回忆说：“当一个穿绿背带裙的小姑娘从幕后走出来唱那支歌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我好像和歌一起飞起来了。那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我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进入高中以后，光南的志向就更加专一了，以至对除了音乐之外的功课显得不那么专注。这引起了同班同学的一些非议。光南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团小组长伍绍祖：“有的人用劳动为祖国服务，有的人用知识为祖国服务。我的志向是用歌声为祖国服务。”伍绍祖最先理解了光南，他召集了自己团小组的团员们说：“谁知道光南今后就不能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呢？我们应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团小组有人提议：“光南写了这么多歌，可惜人家都不知道，我们给他出本书吧。”于是，这个五角，那个一块，大家凑了几十元钱，到誊印社为光南印了一本手抄的《中外歌曲集》。几十年后，当出版社争着要出施光南作品集的时候，他感慨他说：“我的第一本作品集是团小组出的。”

1957年的夏天，高中还没毕业的光南决心去投考中央音乐学院。他事先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作了准备，临进考场之前还信心十足的：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个重点中学的“音乐明星”嘛！谁知卷子一发下来就傻了眼，什么“和声”、“调式”、音乐的基础理论全讲不清楚，考莫扎特的奏鸣曲连三分之一也弹不下来。尽管如此，主考教师还是让光南在钢琴上弹了几段即兴曲，又看了一些他自己写的作品，就让他回家了。没想过了几天，音乐学院的教师找上门来，他说光南的基本功差得较远，但是从即兴弹奏上看，他的乐感好，节奏感强，有搞音乐的潜在素质，不学音乐可惜了。他建议光南去读音院附中，补上基础知识再进学院学习。

光南最早创作的男高音歌曲是《我要飞翔，我要歌唱》。歌中唱道：“天上的大雁有双金翅膀，请你借给我，我要飞翔。美丽的云雀有条金喉咙，请你借给我，我要歌唱。我要向宏伟的目标展翅飞翔，我要向灿烂的明天纵情歌唱。”光南后来回忆他的中学时代：“为了要让我的歌飞起来，我那时真有股‘九死而不悔’的劲头。”

《打起手鼓唱起歌》

1959年，光南如愿以偿地进了天津音乐学院，在校期间，他是校方宣传的“天才加勤奋”的典型。他把紧张的学习，有趣的生活，艰苦的劳动锻炼中的见闻和体验，都用五线谱记了下来。他当时写的《五好红花寄回家》很得群众的喜爱。

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刮起动乱的风暴，文艺界更处于风暴的前沿。光南可不愿理睬这些。他把熟悉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欢乐的情怀用跳跃的音符连在一起，写出了民族风味浓郁的女中音独唱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由

于光南的歌特别上口，群众爱唱，一时间到处都能听到人哼：“来来来，来来来”的歌声。谁知这几个“来来来”却触犯了当时文艺部门的一个“大人物”，那么多个“来来来”是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光南生性耿直，他容不下所谓“左派”对他作品的歪曲和指责，提笔就给那位大人物写了封据理力争的信，逐条反驳了对《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无端指责。好心人提醒光南别捅那个马蜂窝，光南说：“怕什么，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光南和祖国是同命运的。

《周总理，您在哪里》

光南最亲密的合作者晓光说：“这么多年来，我只见光南流过三次泪，其中两次是为周恩来总理而哭。”

光南的父亲和周总理是多年之交，周总理那令敌人都佩服的智慧和风度光南早有所闻，周总理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口皆碑的高风亮节为光南亲眼常见。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光南和大多数正直的人们一样，把周总理看作是人民与“四人帮”抗衡的正义之柱，看成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保护伞。1976年那个暗淡的1月，周总理离去了，融进了祖国的山川湖海。光南听到这个消息，失声痛哭了一场，他想写歌，但写不下去，就是写出来了，谁又能唱得出来呢？在中华民族那段充满着忧虑的日子里，光南的心中没有歌。

当人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想到了为人民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周总理。一时，怀念周总理、呼唤邓小平的诗词遍布街头。其中女诗人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最为感人。光南充满着内心的激动为这首诗谱曲，他写了一稿、两稿，总觉得有限的音符表达不尽对周总理的爱戴。歌写好以后拿到中央乐团试排，光南和指挥李德伦都感到意犹未尽。他们两个在一起悄悄商量：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迟早也要平反，应该把这层意思唱出来。于是歌中的高潮就出现了：“我们回到了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呼唤你：总理！敬爱的周总理……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里！你永久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你的人民世代想念你。”

这支歌上演那天，剧场里挤满了人。男高音的旋律牵着所有人的心，在夜空里回荡，当最后一句“人民想念你”的歌声渐弱渐远，数千人的剧场一片寂静。几秒钟之后，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掌声中夹着唏嘘，观众的脸上，演员的脸上，指挥的脸上，也包括光南的脸上都挂着心心相印的泪。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光南最擅长的是写抒情歌曲，时代和人民也给了他这个机会。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人心舒畅，社会安定。人们需要用歌声来表达来之不易的安居乐业的赞许，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这时的光南把积蓄了多年的灵感尽情地发挥了出来，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听，每一件使他激动的事他都能够化成歌声。在短短几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抒情歌曲，仅1979年就写了100多首反映人民心声、赞颂美好生活的歌。音乐界的老前辈李焕之说：“他心中好像有流之不尽的旋律，抑制不住地往外倾泻。”

在这段时期的创作中，光南最得意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却因为时限关系没赶上评奖。这首低回婉转，情意绵绵的女中音独唱曲使关牧村蜚声歌

坛。也使他与关牧村结下了莫逆之交。关牧村后来说：“只要光南招呼我们唱歌，我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赶来唱的。”

在为不同声区的独唱演员创作“成名歌”的过程中，光南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名演员，他在音乐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5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上，他当选为年纪最轻的副主席。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熟悉《在希望的田野上》。光南在这首歌中流露的对祖国的爱恋和对家乡的期望引起过亿万人的共鸣。

光南并不是一个对现实的一切都感到满意的人。他经常通过全国青联向上反映知识分子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的建议。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只得了30元稿费，他诙谐地表达他的意见：“才够买一张流行歌星音乐会的入场票。”但是光南从不让不满意遮住希望。他在去年底全国青联常委会的一次座谈时说：“不论社会上有多少让人不满意的事，我总是对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充满着希望的人，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呢？”

光南在祖国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写下了1000多首洋溢着赤子之情的诗篇。基于他的歌在爱国青年中的广泛影响，他被选为以爱国为基本宗旨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并且由于他的正直和负责，很快成为青联中享有威信的老大哥。

《屈原》

我是在北去的火车上听光南讲写歌剧计划的。8月的硬座车厢里闷热又嘈杂，汗流浹背的他完全沉浸在创作大作品的构思中。他说：“我要写一个能拿到世界歌坛去的作品。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优秀演员，这几年多次在国际大赛中得奖，可是他们的参赛曲目都是外国人写的歌剧，我要让他们能唱着中国人写的歌去得奖！”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最寄希望的歌剧《屈原》，这是光南一生中攀登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和感情的作品。

光南的生活确实不宽裕。他的社会活动和联系很多。为了装一部电话不得不卖掉心爱的摩托车。他甚至难以叫辆出租车让年迈的老母去听《屈原》音乐会，那天在民族宫的礼堂前停下了不少小汽车，可有多少人想到光南自己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呢？

曾经在一段时间，外面风传要推荐光南当副部长，家里人想这下可好了，至少有急事找车可以不用操心了。谁知光南听了以后说：“我不能当什么副部长，我的所长在音乐，一旦离开了音乐，我的事业也就完了。”

《伤逝》

去年夏天，全国青联在广州为光南举办《声乐作品音乐会》，凭着光南的威望，关牧村、关贵敏、佟铁鑫、胡松华、张暴默、殷秀梅、韩芝萍、程志、董文华等一大批著名演员都去了。我看到这么强的演员阵容，高兴地对光南说：“这么多名演员大聚会不容易，请他们每个人唱一首你近年来最喜爱的歌，出一盘磁带保证大受欢迎。”谁知光南不干：“我这回全上新歌。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写的数百首歌都没有出版或上舞台的机会。这次我

要让新歌和群众见面，在人民里找到知音。”他笑笑又说：“我现在是一心朝前看，还没有到开回顾展的时候呢！那些事等过了 50 岁再想吧。”谁能料到，50 岁将不再属于他。

1990 年 4 月 18 日晚，忽然听到光南脑溢血住院的消息，昨天还在电话上谈笑风生的光南，这时竟毫无知觉地躺在急救台上，没有一点生命的反应。光南的夫人洪如丁和女儿蕾蕾告诉我们：他是倒在钢琴上，他是倒在歌声里的。

团中央、全国青联、文化部的领导很快都来了。一大批名演员焦急地聚在急救室门口，协和医院的主任、教授们也赶到了，会诊的结果严酷而无情——脑死亡。

他静静地躺在白被单下，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他周围的人却说了很多。

晓光说：“这个星期日我陪他骑车跑了一整天，为《屈原》的上演到处求人，终于批到 30 万元钱，他特别兴奋，也特别劳累……”

几个演员说：“本来 2 月份就准备在北京开的《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没能如期召开，他到底没能在生前实现他多年的梦……”

洪如丁说：“早就该让他检查身体了，他有一年多没进医院的门，上次他头痛得厉害，就吃了点感冒药硬挺着去的……”

蕾蕾说：“我爸爸还有 200 多首歌压在抽屉里，都是这几年写的，没能发表，也没来得及排唱……”

是啊，多少事该做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想做而已经不能做了。

光南是属于人民的。

(1991 年 1 月)

三代御医之后 ——记赵绍琴 傅强年

73 岁的北京中医学院教授赵绍琴，是闻名中外的三代御医之后，是我国著名的热病专家。

著名专家的节奏是明快的。目前赵绍琴除了在学院教学、带 13 名研究生之外，每周还为 6 家医院的病人门诊看病。在繁忙的教学、临床工作之余，他还致力于整理祖上三代的医学遗产。经过 10 年时间，他将父亲赵文魁一生的经验整理成书，名曰《文魁脉学》。最近，他又完成一部新著《文魁医案选》，是他父亲给慈禧太后、宣统皇帝和皇亲国戚们看病用的药方，全书大约 15 万字。同时，他又着手撰写《赵绍琴内科学》一书。

赵绍琴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顾问。他对热病的诊治和研究，不仅在国内受到极大的关注，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他已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讲学，受到很高的赞誉。

赵绍琴是如何走上中医之路，又是为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代御医之后的呢？

赵绍琴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代著名的御医。其父是清末最后一任太医院院使（即院长）。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少年时便时常自读医书。稍大些，父亲请来了太医院学馆的翟书源指导他学习中医理论，十二三岁的赵绍琴每天清晨都要跟着老师用蝇头小楷抄写李时珍的《濒湖脉学》，还必须把它背得滚瓜烂熟。1934 年，年仅 16 岁的赵绍琴考取了中医师，取得了挂牌门诊的资格。此后，他又拜当时的京城名医韩一齐、汪逢春为师，专攻临床。其中，仅随汪逢春学习治疗伤寒病就用了 4 年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在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他又抽机会进修学习两年西医，这更使他如虎添翼。50 年代初，他以甲级中医资格，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时至今日，他在这个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经 30 多年。被聘为北京中医学院终身教授，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瘟病专家。

瘟病，又称热病。是世界上一常见的疾病。按赵绍琴解释，这是指由外感四时温热或温热邪气所引起的，以急性发热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多种感染性疾病。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把人体由表及里分为四个层次（也称四时），即“卫”、“气”、“营”、“血”。他认为哪里发热，就要在哪里散热。如果热在“卫”（表皮），你却治在“营”（内脏），用再好的药，也是徒劳。

他行医 50 年，主治各种急性发作或不明原因的高、低烧，尤以治疗肾炎、尿毒症、肝硬化、白血病等疑难病种见长。对于癌症引起的热，赵绍琴也始终坚信用中药是可以控制的。一次，他接了一位患食道癌并已扩散的病人，已滴水难进有气无力了。经赵绍琴诊治一个星期后，便能喝水、吃东西。又调治了一个月，这位患者就可下床走路，发烧的现象也基本控制住了。

其实，赵绍琴本人就是一位喉癌患者，那是 1973 年经山东医学院孙洪权大夫——我国喉癌专家确诊的。赵绍琴没有作手术，全靠吃自己调治的中药，加上练气功，控制住了，至今没有出现新问题。

作为著名的专家，赵绍琴强调要重视中医、中药，发掘中医、中药的宝库，使它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服务。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要能治疗高烧、昏迷、吐血、抽风等危急病症，以改变人们误认为中医只能治慢性病或只能对病人进行一般调理的成见。其次，要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他感慨他说，近 20 年来，中医水平降低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而切脉是基础。要能分辨出脉象的部位、形态、薄厚、宽窄，准确地判断病情，就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过去御医给皇帝、后妃看病，必须跪着，而且不许发问，所以没有切脉的真功夫是不行的。他说，现在有的中医只问问病情就开方子，这就缺乏科学依据，日本有人正在试制脉象仪，但还处于原始阶段，他们希望中国能试制出较好的脉象仪，作为人工切脉的辅助手段，这将对提高中医水平大有裨益。第三，要大力培养中、青年大夫，全国要建立一两个能治疗急性病的中医医院，以尽快改变中医后继乏人、对中医重视不够的局面。

(1990 年 5 月)

走过时代风雨的“老太太”

——记胡絜青

王越红

拜访絜青夫人之前知她有病在身，及至见面问起病因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85岁的老人竟然还踩着凳子往墙上挂东西，凳子一晃，伸手去抓立柜，整个身体被倒下的柜子压在下面……

“幸亏发现得早，”二女儿舒雨嗔怪道，“都80多了还什么事都要自己干，我妈就是这么要强。”语气中虽然有埋怨和责怪，更多的是敬爱和自豪。

女儿一席话引起了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我把它集成一束水仙，献给读者。

众家朋友的“白皮书”

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女士家世同为满族正红旗。老舍先生的父亲是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死于巷战中，全家靠母亲做工为生。老舍先生的母亲曾经做过第四女子小学的校工，其时胡絜青还是一个小女孩，她当然不会想到这位天天见面的、勤劳善良的工友后来会成为她的婆母。

说老舍先生有了结婚的念头完全是为了朋友，也许很多人不太相信。1930年老舍先生结束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学工作回国，和老朋友们见面使他欢喜非常。他是一个极重友情的人，朋友们也真心地希望他幸福，他们“威胁”当时已经34岁的老舍说：你不再结婚，那老光棍儿脾气会特别别扭，我们就没法儿跟你交朋友了。已经是有名气的作家的老舍认真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要了，但不能没有朋友，要是真觉得我别扭了，那你们就想法儿给我介绍吧。”幽默、机智的老舍又把球踢给了朋友们。时至今日，絜青夫人说到这儿也还是忍俊不止。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了四年书，没跟男生说过一句话。”絜青夫人的母亲是一位极有主见的人，她支持女儿读书，可又给文雅秀·丽的女儿做了那么多规定：一、二、三、四……

介绍人罗常培先生既是老舍先生的小学同学，又是絜青女士二哥的中学同学，他认定这是一桩极好的姻缘。他忙碌了起来，和朋友们商量好了请老舍和胡絜青吃饭。大家你请了我请，三顿饭以后，老舍先生拿起了笔写道：我们不能凭借朋友请吃饭才能见面，我们都有一支笔，就用它来谈心吧。

能干的“老太太”

那时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这“两地书”写了有150多封，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投缘。一个来信说：我寒苦出身，两袖清风，只会写几本书，倘若是想坐汽车你别找我，倘若是想天天吃鱼翅的也别找我。另一个回信说：倘若真想当花瓶儿、做阔太太，也就不上北师大了。7个月后的暑假，他们在北平幸福地结合。

当老舍先生携新婚的妻子回到齐鲁大学校园里，一位教师在向大家介绍絜青夫人时竟脱口而出说：“这位是老舍先生，这位是老太太。”唉，“老舍”这笔名的名气太大了，谁也不去注意“舒舍予”这个本名了，如花似玉的新娘子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刚结婚就成了老太太了？！

“老太太”却很能干，本来絜青夫人可以在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可老舍

先生怕别的夫人们会由羡慕而嫉妒，他劝说妻子到附中任教。絜青夫人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做着教师工作。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时，为了维持家庭，她同时兼职女子师范学院的师范部和乡村建设学院两校的课程，一周中有三天在重庆市，三天在歇马场。因为当时老舍先生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收入很少，后来又和曹禺一起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讲学，家庭的重担就落到妻子一个人身上。

絜青夫人很多家务事都是自己亲自做。她曾经给老舍先生手缝了一件皮袍，老舍从济南回北平见了岳母就说：“您看，您女儿给我做的皮袍比裁缝做的还漂亮、还好！”孩子们的衣服也都是絜青夫人亲手缝，不是袍子马褂，是大衣裙子一类的，当时叫“洋衣裳”。50多岁的二女儿舒雨至今对妈妈做的衣服赞不绝口。

十年动乱，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与老舍先生共同生活了35年的絜青夫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坚信正义总会得到伸张，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她努力地工作，丝毫没有懈怠。

1978年6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老舍先生的平反骨灰安葬会，邓颖超提前半小时来到会场，她拉着絜青夫人的手说：“你真坚强啊！儿女们要跟妈妈学，学她的坚强。”

从画家到“电视明星”

曾经有人问齐白石先生，平生最喜爱的女弟子是哪一位，老人说：“是那个舍……舍夫人。”他所说的其实就是老舍夫人。絜青夫人自幼酷爱书画，即使在战乱年代，在老舍先生去世后的艰难岁月里，她也没有放弃绘画。

早在1957年，她创作的工笔大画《姹紫嫣红》，就被作为国礼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贺寿。中法友协、中日友协、或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也常用她的画当国礼。她创作的国画《老松》被收入《当代中国画名家集粹》中。很多中外友人都以收藏她的绘画为荣。此外，为支援非洲灾民，为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筹款及瞿秋白纪念馆落成的活动，她都捐赠过字画。

她还积极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常常出现在屏幕上，孩子们善意地称她为“电视明星”。她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她忙碌的身影似乎不断在我眼前变幻着：美丽娴淑的少妇和称职的教员，治家有方的母亲和著名的画家、社会活动家。……一生的追求和奋进尽在不言中了。

(1990年5月)

贺绿汀“躲”寿 吴 霖

尽管贺绿汀“躲”进了华东医院，尽管这个以给高级干部看病而闻名的医院如何“森严壁垒”，但是，90岁的贺绿汀却躲不过追踪而来的问候、祝福和鲜花。这位曾写下无数精彩乐章，并以一曲《游击队歌》而名震天下的作曲家，这回是绝对无法再“游击”到别处了。

贺绿汀今年是整整90岁了，沧桑风雨的90岁。

按照中国做虚岁大寿的惯例，去年，贺老先生的祝寿活动可谓是“轰轰烈烈”。一切“贺绿汀音乐作品演奏会”，让人听了，就仿佛跟着音乐走路，走过了数十年的中国历史，有悲壮，泣而无声；有狂欢，喜形于色。有诸多的旧雨新知，尤其是无数桃李弟子簇拥而至，他实在是很高兴，虽然，也累。所以，今年快近7月20日生日时，他便不事声张地“躲”进了医院，就像一个“老游击队员”。

可是，他的“战略”“战术”，却绝对逃不过热爱着他的人们的眼睛。他们不屈不挠地带着鲜花和欢声笑语来了。于是，他的病房，不可避免地成了欢乐大世界，成了花房……

在这一天的同一时刻，在北京的皇冠假日饭店的艺术沙龙里，也聚集着一批带着欢声笑语来的人们。他们用乐器，用歌声表达着自己。从“嘉陵江上”的“百灵鸟”，到“晚会”上的“摇篮曲”，一曲“幽思”的“牧童短笛”，诉说了上海与北京相距遥远的“怨别离”……

感谢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得以使北京的声音热线传真给了病房中的贺绿汀。而贺绿汀的答谢，又乘着电波的翅膀，飞临首都的上空。他深谢关心他的人们，说“大家冒着酷暑，为我贺寿，实不敢当……”

许多年前，年轻的贺绿汀因革命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曾口占一首《浣溪沙》以言志，上阕的末一句是“不知何处是吾家”。下阕的第一句是“好梦有情来欢迎”。今夜，在贺绿汀的梦中，在医院做的这个梦中，有那样多的爱戴者陪伴，他还能找着回家的路么？

他的家，空空的了，像一只温暖的巢，等着他的归来。满院子的绿荫和蝉声，还有他所钟爱的四季鲜花，都在等待着已迈开人生第90个年头之步的老人。

他的失聪，使他永远的形象是费力地戴着助听器，认真地倾听着别人的诉说。此情此景，让人感动。他过去享有的“硬骨头”绰号，依然紧随着他，形影相随。他还是不平则鸣，用那带有辣椒味的湖南普通话。他依然酷爱音乐，而对酒吧音乐堂而皇之的泛滥感到愤怒。他就是他。或许你可以说他近乎偏颇，但这种执著，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份量。

贺绿汀最关心的，是国家大事。1988年时，他曾在某次会上诚恳他说：“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可是，他并没有从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每天听新闻广播，读多种报纸，他在政治上依然敏锐。他不仅是成功的音乐家，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中有着67年党龄的老同志，所以，他受到党内外的广泛尊重，应当是可以理解。所以，为庆祝他从事音乐工作7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为他题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贺绿汀每天坚持写回忆录和日记，而这一切，无疑和他所奉献给后人的音乐作品一样，将成为他生命的延续。他最近在重读唐诗宋词，还在读《张国焘回忆录》，而这两者，却使他浮想连翩。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和贺老一起消灭各种敌人，包括病魔。“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和贺老将唱着歌行军，在人生旅途愈走愈远，愈坚定不移……

上海的夜空，今天是一张乐谱，星星是流动着的不顿的旋律。

(1993 年 10 月)

姚雪垠与《李自成》轶事

孙嘉成

我国当代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姚雪垠，今年 82 岁了。别看他白发银眉，却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头脑清醒，有惊人的记忆力，尤其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依然闪耀着青春的光彩。

自信能活九十余

我为姚雪垠身体这样好而惊叹，问他有什么奥秘，他说：“我工作、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两三点钟起床，吃过早点便伏案工作，中午饭后稍事休息，又继续工作。接待来客，都在下午 3 点以后，晚间不到 10 点就睡觉。我饮食从不过量，不吸烟。常来给我检查身体的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血压都很正常，我相信自己能活到九十几岁。”他还说：“我之所以能保持健康，主要靠的是自信和乐观。我认为自己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我决心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李自成》情况轶事

谈起《李自成》后两卷的创作情况，姚雪垠告诉我，预计 3 年内可以写完。目前他正在写第 5 卷，然后再写第 4 卷。“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记者问。姚雪垠说：“整个 5 卷的故事、人物发展，我了然在胸，从哪里写都可以，但是我要从难的地方写。”

“看来您是抓主要矛盾啰。”记者试探地问。

“可以这么说。第 5 卷是一出大悲剧，崇祯、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各自系统中的悲剧人物，都要在第 5 卷中结束悲剧，而且内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又加上清兵入关，所以写这卷最难。而第 4 卷是两个内容：农民军与崇祯皇帝的政权斗争及同情军的斗争。”姚雪垠紧接着又说：前 3 卷有 230 万字，4、5 卷写成后，一共将近 400 万字。有人统计，书中已出现 270 多人，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说着，姚雪垠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沉思片刻，姚雪垠回忆起一件往事。他告诉记者，《李自成》一书得以顺利问世，与毛主席当年的支持保护分不开。他说：“毛主席曾经帮过我两个忙：一个是‘文革’初期，我还在湖北省文联，造反派要批斗我，说《李自成》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打倒姚雪垠。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资料，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久，毛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王任重同志通知武汉市负责人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于是我的住处立刻就有保卫人员出现，并封存了所有有关资料，以免被抄；为了使我有个安静可靠的创作环境，毛主席第二次批示：同意我的创作计划，给我提供条件，让我把书写完。这样，我就很快被调到了北京，安心写书。毛主席帮的这两次忙，使我终身难忘。”

有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姚雪垠告诉记者，回顾他 60 年的文学生涯，他非常重视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他的非常珍贵的思想启蒙和教育。倘若没有这一学习，他一生在文学道路上是不会有有多大出息的。正是因为姚雪垠不但具备丰

厚的史学知识、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古典文学修养，同时，他很注意应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并使之成为他搞创作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成功。

真实反映历史 教育后人

当记者问到《李自成》对今天我国社会有何意义时，姚雪垠说：“我反对拿历史来影射今天。但要能真正写出历史的成败规律，规律写得深刻了，它对后人就能起教育作用。”因此，姚雪垠一贯认为，写历史小说必须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然，就摸不清楚规律性的东西。同时，还要懂得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哪怕是一些常识性的方面，如日常生活，民情风俗，都要非常注意。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来，贻误他人。这些就叫杂学。杂学弄不通，典型环境就没法写，写不出典型环境，就无法创造好典型人物。姚雪垠举例说，有一部小说中，写袁世凯进北京，见北洋大臣荣禄开盛大跳舞会，赛金花参加跳舞。而实际上清朝末年的官吏是没有任何一个敢搞跳舞的，何况荣禄是个顽固派，怎么可能开跳舞会呢？再说赛金花裹着小脚怎么能跳舞呢？何况，袒胸露背，清朝末年怎能容许？要真实地表现历史，但又不泥古不化，姚雪垠主张要“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他认为，不深入就没有基础，不跳出就没有艺术；深入是前提、是根本，跳出以求得艺术的完满。

采访结束前，记者参观了姚雪垠的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还有许多书堆放在柜子上、写字台上。姚雪垠整理出的 12 盒卡片，约有近 2 万张，还有许多正待整理。作为一个小说家，姚雪垠告诉记者，他遇到书上有用的材料，包括相反的东西或类同的那怕只差一二个字的东西，他都要抄下来，从中找出矛盾，以便往纵深研究。这种极其严肃的治学态度与创作态度，的确难能可贵。正是他对于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责任感支撑着他的创作精神，使我们感到了他那颗报效祖国、献身事业的心永不衰老。

(1992 年 2 月)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钟敬文

董晓萍

我曾指着一棵树问钟敬文教授：“一年四季，您喜欢它的哪一种颜色？”
“新绿。”

钟教授现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是一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学者、老诗人，又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对他如此作答，人们大概都会得到一个奋斗不息者的印象，一种春天般万木吐绿、生机蓬勃的创造型思绪。

大约在 150 多年前，世界上兴起了这样一种学问：它专门发现民众眼睛中的万事万物，研究和阐释民众掌握这些事物的智慧与成果，从而以此为途径，致力于民众的幸福、乃至全社会的幸福。它就是民俗学。其中口耳相传的文艺部分，就是民间文学。

民俗学最初繁盛于欧洲，而后东渐日本。五四运动前后，民俗学传入中国。这时的泱泱中华在数千年文明史上爆发了最强烈的东西文化撞击，反帝反封建声浪迭起。中国民俗研究落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民俗处女地垂涎欲滴，东掘西采。这深深刺激着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钟敬文的自尊心，唤起他要以中国民俗研究为终生志向的欲望。终于，这位生于广东海丰，相继在广州中山大学、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和浙江大学等校执教的青年学者，先与顾颉刚、容肇祖等联袂筹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民俗学研究团体——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又与江绍原、钱南扬等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民俗研究领导机构——中国民俗学会。经过他们辛勤的耕耘，中国民俗学开始从“荒漠”变成了“花园”。到了 20 年代末期，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来了；德国民俗学家 W·爱伯哈特博士来了；日本学者也开展了与中国民俗学者的对话。

二三十年代的钟敬文，尤以文名。其散文的清新、小品文的雅致、诗歌的俊逸，颇得名家赏识，叶圣陶、郁达夫等都乐与为伍。但社会责任感极强、主张治学专一的钟敬文思考的结果，还是做出了人予我舍、人舍我取的选择。30 年代中叶，他东渡日本，师从西村其次博士，专攻民俗学。两年多留学的成绩，是他的《盘瓠神话考察》和《老獭雅传位的发生地》等优异论文，博得了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对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外国学者从此对中国民俗学界的理论素质和科学研究能力刮目相看。

学成归国后的钟敬文，无论是在内地大学，或后因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迫害去香港执教，还是 40 年代未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都从未停止过对建立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体系的构思。他在这一时期从民众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诸范畴对国内民俗研究新领域的开辟，使中国这方面的学术水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筹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创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力倡在全国高校开设民间文学基础课。国际同行称钟敬文教授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钟敬文教授和他所钟爱的事业，在学者书斋到人民文艺的沃野之间，伸展着一条越走越宽广的路。

然而，1957 年那个春天，对钟先生来说并不温暖，此后几年，他拔过草、扫过地，当过厕所的清洁工，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被迫中止。但他凭着对祖国的挚爱和献身事业的夙愿，在劳动之余，他深夜披衣拥衾，掀动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新的一页。《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等一系列重头文

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这些成果，填补了中国学术史和国际学术界的空白。“文革”的风暴把钟敬文又刮进了逆境，但他再一次挺过来了。问他苦不苦，怨不怨，他总是说：“当年爱国诗人拜伦被流放，离开英伦三岛时，他曾回眸故国春色，讲了一句话：‘祖国啊，我爱你，连你的缺点都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几年，钟敬文步入了花甲、古稀之年。然而，旧集新著《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新的驿程》等一部接一部相继出版了；他的弟子成为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骨干；在他和 7 名教授的联名倡议下，中国民俗学会恢复重建，并迅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局面。经过 70 载风风雨雨，他终于如愿以偿。到此，他本可以安度晚年，但他并没有驻足，并没有停息。近年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学科发展的现状，钟敬文积自己数十年学术研究之大成，又推出了《话说民间文化》等力著，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创建民俗学与文化学的边缘交叉学科——民间文化学。该学说突破了 150 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文艺学、哲学、原始文化史等各自学科的角度认识民俗学与文化学的局限，提出把民俗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更有利于探究这门学科的本质，发挥它增强民族主体性、提高民众素质、从而推动人类科学文化进步的独特功能。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在历史上已经不断融合了许多部族，现在境内还有 50 多个兄弟民族，民俗文化的积层异常丰厚，全国人民又要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钟敬文的这一新学说，尤其具有它的科学价值和适用性。目前，它已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又是一派春光，又是一片新绿。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曾题词赠钟敬文：“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谓知人之论。

(1991 年 11 月)

修瑞娟和她领导的微循环研究所

李京盛

(一)

1983年4月，全美第29届微循环学会在芝加哥举行。修瑞娟正在会上宣读她的《关于微血管自律运动的长期监测》的论文。她神态自若，嗓音清亮，用扎实而有吸引力的实验结果，新颖而有层次的电子计算机分析曲线向数百名美国及世界微循环专家进行了论证：“微血管的自律运动是以波浪式进行的，而微血管对器官组织的灌注，如同海涛的最后一搏，是一种强有力的跳跃和冲击。不像河流对田野的灌注，越到最后越无力。”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她的这一全新见解所激动，所振奋，所惊讶。论文刚刚念完，热烈的掌声立即响彻大厅。

“修氏理论”问世了。

按照这种理论，一系列疾病将得到新的解释，将可以运用新的治疗方法。这一理论的临床意义是极其广阔的。一个人如果发生急性脑缺血或心缺血，一旦注入能改善这些障碍的血管活性物质，缺血的微血管不是像河流支渠那样慢慢灌溉，而是发生急剧的冲击。

这个“修氏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还不是今天就能全部理解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医学科学家们，似乎从中触摸到了光辉的未来。

1983年初夏，各国的微循环研究大师们聚集在瑞典的一个宁静小城——乌普萨拉，准备成立国际微循环研究所。发给各国代表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研究所的5位发起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享有最高权威。他们是：

- | | |
|------------|--------|
| 一、修瑞娟教授 | (中国) |
| 二、格罗斯教授 | (美国) |
| 三、阿尔福斯教授 | (瑞典) |
| 四、梅斯梅尔教授 | (联邦德国) |
| 五、英泰格里亚特教授 | (美国) |

五星红旗升起在乌普萨拉，同其它三个国家的国旗并列飘扬。

修瑞娟被一致推选为国际微循环研究所5位领导人之一，她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国际微循环研究联盟主席、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 Marcos Intaglietta 博士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封信中写到的：“她的个性、为人和出色的工作决定了她是一个核心人物。国际微循环研究所的创立是与她分不开的，修博士是国际微循环联盟执委会的一个关键人物。”不过有一点应说明：严格他说，当时修瑞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教授的头衔。她是在1981年3月应邀到美国工作的第5个月被路易维尔大学正式聘任为襄教授的，第18个月被加州大学正式聘任为副教授、微循环研究室主任……1983年回到祖国两年后，才拿到教授职称。

(二)

1988年6月初。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微循环研究所内，我们见到了这位享誉世界微循环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她看上去要比52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匀称的身材，热情、开朗的个性，充沛的精力，第一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自我介绍：“我是山东人，又是O型血，这两点加在一起，你们就可

以想象得出我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了。”接着，她与我们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长谈。话题自然是围绕着有关“修氏理论”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我是在赴美国进修和研究期间创立的‘修氏理论’，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片面性的。因为早在1957年，我在莫斯科医科大学留学期间，在大学三年级，我就被病理生理强烈地吸引住了。有关这方面的那些引人入胜的实验占去了我大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全部暑假和寒假，并曾两次获得莫斯科大学生科研报告奖。1961年归国，我被分配到医学科研机构。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生理系，我既遇良师，又结益友，参加了重点科研项目——休克发病机制的研究。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摧毁的人生动力；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紧密结合，把我引入了探索的迷宫。1965年春天，一个临床研究微循环的机遇降临了：暴发型脑膜炎袭击整个北京城，住院儿童患者死亡率高达66.9%。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所与友谊医院儿科的大夫们，共同投入了这场抢救患儿的战斗。我承担的是对患儿微循环变化的观察任务。当时，我夜以继日地观察和分析了上百例患儿甲皱微循环的动态变化，并深深地被那些变化现象所吸引，甚至患儿死后，还要到停尸房继续观察两小时，直到血液完全从甲皱流尽为止。”

讲到这儿，修教授让助手打开她办公室的文件柜，拿出了一大叠当时临床观察病人的亲笔记录和分析报告。那一张张有点发黄的纸页，记录着她当年为此而付出的心血。

她从临床实践中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微循环方面的研究数据，这就是她的“资本”，也是国外微循环研究专家们相当缺乏的实践经历。

可以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她暗暗地把研究的目光，瞄准了世界医学界的这一高峰。

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危重患儿在输氧时甲皱微血管极度扩张、血色鲜红，但患儿却死了？氧与机体功能之间有何平衡关系？如何推测确定患者是否缺氧？”

“为什么有些患儿死后尸检时发现脑病？脑组织水肿与微循环障碍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些危重患儿的微血管中有亮晶晶的粒状物闪过？那是不是透明微血栓？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它们对病情的影响如何？”

(三)

创立了“修氏理论”，对修瑞娟来说，还仅仅是个开端。

她说：“我很欣赏这句美国名言：

‘This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这不是结束的开端，而是开端的结束）。 ”

1983年9月，从美国回来以后，她就立即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创建中国微循环研究所的工作之中。

她说：“我只是一滴水，只有投身于大海之中，才能永不被晒干。”

1983年11月28日，在南宁至北京的列车上，她动手起草了《关于在我国建立微循环研究中心的报告》。在报告中，她分析了当今世界上微循环研究的现状以及开展这一研究的重大意义，阐述了中国目前在微循环研究上的有利条件和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提出了一份详细的

工作计划。她最后写道：

“我恳切要求祖国，要求党，要求各位领导重视这一千真万确的动向和事实，看到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的力量，充分利用目前国际上的有利条件，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给予及时的、有力的支持，将我国的微循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从那时算起，到现在，5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修瑞娟了，我已经有了一个集体，有了一支队伍，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非常高兴。”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透出一股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她怎么能不高兴呢？现在，她领导着一个微循环研究所，她建立了一个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试验室，并把研究与中医中药相结合，她手下有30多名志同道合的生力军在与她协力攻关，更重要的，是她有着一个坚强的后盾：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为什么有些患儿的甲皱微血管时隐时现？这种现象与外国人于19世纪早期在动物实验时发现的微血管的自律运动有何关系？它是被动的还是自主的？”

“为什么微血管显现的时间越短，隐没的时间越长，患儿便越容易死亡？而在相反情况下患儿就会转危为安？”

“微血管自律运动的调节原理是怎样的？”

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引导着她推动着她，一步步地向世界高峰攀登。

一些为什么解决了，更多的为什么又出现了。

带着无数个为什么，她奔赴异国。

又带着无数个为什么她回到祖国。

2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文革”期间的艰难岁月，还是大西洋彼岸的优越条件，无论是鲜花和掌声，还是无情地打击与中伤，她顽强地寻求未知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几年来，这个集体的工作是团结的、紧张的、忘我的，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是常事。研究所的成果功勋卓著：

她的一位年青学生的论文，1987年在世界微循环大会上获奖。

1987年7月，在北京长城饭店，她和她的助手们成功地主持召开了第四届世界微循环大会卫星会议，并作了“微循环与中医”的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她以雄辩的事实，向代表们阐述了微循环发源地不是在300年前的西方，而是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她和十几位助手发表了15篇论文。这15篇论文，以严格的实验设计、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世界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分析图表，向中外专家显示了微循环所的科研实力。难怪外国专家要这样问修瑞娟：“这几年你和你的学生们睡觉没有？”

1987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又以《我国微循环研究又传佳音》为题，报道了他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文中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微循环研究所所长修瑞娟教授领导微循环全体科研人员，在对国际微循环研究现状作了周密调查之后，立足国际先进水平，自力更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成功地创立了世界第一流的人体及动物活体微循环、大循环多参数同步监测系列及电子计算机数据分析系统。”

近来，在修教授的领导下，他们利用这一最新系统进行气功对循环系统

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她和她的战友们还有着更远大的抱负，那就是要让中国的微循环研究永远走在世界前列。

修教授欣赏的另一句美国名言是：

“I am not afraid to face tomorrow, for I have seen yesterday, and I love today.”（我不害怕面对明天，因为我经历了昨天，而且热爱今天。）

如果让我们进一步来理解这句美国名言的内涵，那么，这里所体现的不正是一种“只争朝夕”的无畏的拼搏精神吗！

这就是修瑞娟的精神，也是她领导的研究所的精神。这正是中国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

（1988 年 10 月）

中国外交界的“夫妇大使”

——记 凌青、张联

宗道一

1991年仲夏，笔者有幸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公寓拜谒了温文儒雅、一副学者风度的凌青先生。这位年届古稀、精神矍铄的中国外交界知名人物在其布置典雅的客厅里，平静地叙述了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生涯，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其父官至北洋政府

内阁部长，可谓将门虎子

1923年4月生于古都北京的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四世孙。其父林步随是林则徐（林文忠公）的三子林拱枢之子。在海峡两岸林则徐众多的后裔中，作为资深外交家的凌青因在联合国的不寻常岁月，较之台湾国民党“最高法院”大法官林纪东，原国民党中央社社长、现任《中央日报》董事长林征祁等知名人士有着更高的知名度。

凌青的父亲林步随，是晚清最末一代翰林。他少年得志，由朝廷派往美国留学，嗣后担任留美学生总监督。民国初年，出任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的秘书长兼铨叙（人事）部部长。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林步随转入商界，曾任天津聚兴诚银行经理、通县电力公司董事等职。

由于家道中落，凌青的童年和少年判若天上人间。也许是风雨如磐的年代里的苦难生活，使得凌青和大多数兄长、姐姐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凌青的长兄林曾同（后改名李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解放天津作出过贡献。十年“文革”之初，这位公安战线的优秀战士惨遭迫害，身陷囹圄后终以绝食而殉职。粉碎“四人帮”后，公安部和中共天津市委追认李良为革命烈士。长相酷似哥哥的凌青，原名林墨卿，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家中的小弟弟。不过，他却是全家最早参加革命的战斗。由俞林、黄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墨卿改名凌青，先入晋察冀，再赴延安，

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作过译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翌年7月，凌青辗转到达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为了不连累尚滞留敌占区北平的父兄，林墨卿此时改名为“凌青”。

1944年初夏，凌青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旋即分配到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事务。基于工作上的机遇，凌青有幸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担任英文译员。

彼时，军委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联络、行政四科，凌青一人统揽三科，同时担任三个科的科员。“虽然没有科长的‘名分’，却有科长的待遇，吃的是‘中灶’……”凌青谈及往事，不无幽默。忙里偷闲，凌青当时还到新中国外交官的早期摇篮——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学习了3个月。

最早主管美国事务的新中国外交官员，开城板门店停战谈判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

1949年10月8日，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兼）在北京东城外交部街33号原奕訢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袁世凯生前未及见上一面的仿德式高大建筑里，庄严宣布新中国外交部成立。这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草创时期、外交界人士的第一次聚会。凌青作为筹建外交部的数十名成员之一躬逢其会。大家围着桌子入座，人数不足百人……

凌青当时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科长。回首40余年如烟岁月，凌青与美国事务和国际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后，凌青随李克农、乔冠华、毕季龙（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外交部国际条法司、新闻司副司长）、浦山（外交部原情报司科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要员来到风雪迷漫的开城板门店，任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专门处理文件，具体负责一系列发言稿的起草等事务。当其时，现时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要角”，诸如冀朝铸（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毓真（驻英国大使）、过家鼎（驻葡萄牙大使）、邱应觉（联合国原技合部副司长）、段津（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等，以及中国外交界翻译元老裘克安、朱光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周一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圻（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专家）诸教授，都与凌青共过事。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北京前的几分钟，凌青下令取下首都机场的反帝标语

20年后，毛泽东运筹帷幄，用小球推动大（地）球。凌青参与了导致对抗20余年中美关系冰雪消融的“乒乓外交”。他以对外友协理事的身份出面（中美政府无邦交，故以民间群众团体接待），实际上代表外交部。事必躬亲的凌青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叮咛，丝毫不敢懈怠。当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乘坐的民航班机降落北京的前几分钟，凌青最后一次到机场检查巡视。毕竟是阅历丰富、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官，他一眼就瞥见了那条悬在机场醒目处、取自毛泽东“五·二〇”声明的大幅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不知怎的，平时熟视无睹，此刻却感到不对劲，红底白字的标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似乎格外鲜明夺目。凌青踌躇了，他停下脚步，第一次如此端详，凝视，像发现了新大陆。“取下！”凌青示意左右，他想起了周总理耳提面命的接待原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极左思潮风行一时之时，这该是多么大的魄力，需要多大的勇气！

邓小平对凌青等人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1980年深秋，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凌青开始了长达5年的常驻联合国的生涯。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他一直活跃在这角角落落都是外交家纵横捭阖，开展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的国际大舞台上，出色地执行了中国政府一贯倡导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多少年来，凌青一直忘不了乔冠华主持、自己参加起草邓小平出席六届特别会议发言稿的情景。当时，正值邓小平在毛泽东干预下复出不久。他对起草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垂询有关情况。邓小平

曾亲口对乔冠华、凌青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段后来写入了发言稿的精辟论断至今还留在凌青的笔记本里。拂去岁月的尘埃，透过微微泛黄的纸面，仿佛还能感受到它昔日的光辉。

1981年第36届联大改选联合国秘书长，凌青代表中国政府不惜多次否决非第三世界人士的秘书长候选人——瓦尔德海姆。长达18轮的秘密投票，终于为德奎利亚尔出任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开辟了道路。凌青的每一次否决或赞成，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忠诚、坚定的一员。

1842年仲秋，耆英、伊里布签订《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可耻地割让香港，半月前林则徐满怀忧愤赴伊犁；1985年深秋，凌青和汤姆森完成了恢复香港主权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法律手续

告别纽约住所前夕，还有一事令凌青胸臆间气荡意回，歉歉万千。

诚如已故总理周恩来所言：“中国一百年来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凌青亲聆了首任外交部长这番极为感慨沉痛的话，联系祖宗家世，感触尤深。康有为亡命东流时作诗云：“千古伤心过马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千夫所指，京师盛传一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李二先生”即是“中堂大人”李鸿章。如果时间回溯半个世纪，就可以听到林则徐向英商决一死战的呼喊：“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注定了林则徐扮演的是一个悲剧角色。1842年8月29日，清廷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耻辱的割让香港的城下之盟——《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18天以前，林则徐刚刚自西安踏上充军伊犁的苦难路程……

俱往矣！百年之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正是林则徐、李鸿章的后代作为新中国的代表相继来到联合国，为国家主权、为民族尊严而樽俎折强权。中国现任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先生即是李鸿章胞弟李鹤章之四世孙，海湾战争前后，他在联合国讲坛屡有不俗表现。而凌青则在自己手中完成了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的有关文件的法律手续。林则徐倘若泉下有知，亦当快慰莫名矣！那是1985年深秋，凌青和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在纽约一道将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中英联合声明递交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福莱斯豪尔，最后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凌青为自己在联合国的使命划上了最完美的句号。他激动地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再也欺辱不了我们。”

自联合国离任归国后，凌青专事民间外交。在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3年后，凌青应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邀，返回桑梓报效故乡父老，在福建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少女时代来不及圆教师梦，建国伊始，
迈出40余年外交生涯第一步

当年跟随夫婿出使委内瑞拉的时候，张联也许没有想到16年后自己会成为新中国的第十位女大使。年逾花甲的张联是1991年9月成为中国第九任驻

斯里兰卡大使兼第六任驻马尔代夫大使的，这位当时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女高级外交官面色红润白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新的任命也使得张联成为中国十一位女大使中唯一“一身二任”的大使。

1930年出生在吉林九台县的张联在吉林市渡过了她难忘的少女时代。她10岁丧父，家境每况愈下，不得不投奔吉林市的堂姐家。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张联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市女中。初中毕业后张联考取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师范不交学费，又能免费食宿，这是穷苦子弟最理想的求学之道。1948年3月8日吉林市解放，张联考取了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人才荟萃的哈尔滨外专虽然最终并入黑龙江大学，但当时它确实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外交干部。

建国伊始，边陲小镇满洲里是我国与外部联系的主要进出口岸，亦是我与苏联、东欧各国出入境的必由之地，故外交部在此专设常驻联络处。1950年春暮，入党不久，年方20的张联便是在这里迈出了她长达40余年外交生涯的第一步。还差几个月毕业的张联因工作需要匆匆来到曾远辉处长手下充任一名普通的俄语翻译。

在北京东单的小饭馆，难得赴京公干的张联与 从板门店回国的凌青邂逅相遇

1953年张联因公，在东单外交部招待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就餐时与素昧平生的凌青不期而遇，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当时释俘工作全面开始，需要大批英语译员，凌青正是为抽调翻译匆匆从板门店赶回北京的。两人初涉爱河后结为秦晋。新婚燕尔不久，凌青调任驻罗马尼亚使馆，张联随行。1957年凌青转赴“千岛之国”，改任我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研究室主任（一秘），作为夫人，张联再度联袂而行。1961年张联先行离开雅加达回国，到外交部第一亚洲司二处（分管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事务）任科员。及至4年后的1965年，11年科员的历史划上了句号，接踵而来的又是15年的副处长的悠悠岁月。张联40年的外交生涯可以用“三进三出亚洲司”七个字来概括。1975年凌青出使委内瑞拉，张联第一次离开亚洲司，出任使馆二等秘书。1978年凌青卸任加拉加斯，张联返回再次进入亚洲司。张联第二次离开亚洲司是随夫君去联合国担任中国代表团一等秘书。3年后张联升任参赞，主管亚洲事务。二载春秋过去，依依不舍告别纽约后第三次进入亚洲司，当了3年参赞后升任副司长，直至她获准出使科伦坡和马累。也许是某种巧合，张联1965年升任第一亚洲司四处副处长，便是主管印度、尼泊尔、锡兰（现名斯里兰卡）事务。26年后的今天，她代表祖国，又持节踏上这片炎热的土地。

周总理曾在小科员的报告中找 出了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并批曰： “苍颉造字”；从此，张联再不敢乱写

张联对周恩来总理一丝不苟的谨严作风印象极为深刻。60年代初期，中印边界冲突时期，张联分工负责印度事务，与周总理的文字往来甚多。一次因总理急着审阅张联起草的一份报告，她未及送印刷厂打印便直接送至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细细审阅这份小科员的手写稿，并且订正了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芷”（藏）。总理阅毕在正文旁批：“苍颉造字”。对此，张联至今

记忆犹深。当时别人都这么写，她也跟着写。因这四个字，造就了张联 30 年来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从此，她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

(1994 年 1 月)

凌峰寻根 秀 萍

凌峰先生想寻根，自然要来大陆走走。他说他这几年常在台湾与大陆之间穿梭，怎么数也有四五十个来回。

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凌峰一首《小丑》唱破了人生的一种辛酸，从此大陆更多的人认识了“秃子”凌峰。

此刻，一身松松垮垮装束的凌峰正率领他的摄制组走出北京的台湾饭店。一条白底黑格的围巾从他的光头上中分而下，再扣上一顶黑色礼帽，扣出了阿拉伯式的风情。凌峰两手插兜，形象幽默且威风。正自暗忖凌峰如此打扮，猛听他大喝一声：“摄像机！”已经进了面包车的摄像师闻声而起，迅速架起了摄像机。诧异之间，我们却从监视器里看到一轮红红的落日正倚着穆斯林大厦的尖顶，好一种浑厚而悠扬的黄昏晚景。凌峰先生的艺术感觉确实敏锐。据说，他拍摄片子因此而显得很有底蕴和情调。

与凌峰一起坐进了那辆面包车，听凌峰一路神侃，却也懂得了几分凌峰。

凌峰1945年生于大陆，4岁始去台湾。他说他老家是山东青岛，青岛有他的外婆、舅舅等许多亲人。过几天他将陪伴母亲归乡，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自1987年以来，长期对峙的海峡两岸开始松动，无数游子重归故里，热泪盈眶地跪倒在炎黄陵旁。此间便夹着凌峰先生。

从歌星到节目主持人再到制片人，凌峰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在他踏上大陆的土地时，他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所感动。他立意要寻找深藏在民族历史之中，散落大陆各地的“两岸同根”的根。

凌峰十分感慨：“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不了解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中国人认识中国。”于是，他鼓足勇气冲破重重阻力，拍摄了这部介绍大陆风土人情、历史人物、文化艺术、人民生活等等内容的电视系列片。片名《八千里路云和月》，与内容一样恢宏一样气派。

此片一经播出，便在台湾引起轰动，凌峰先生因此也成了台湾风云人物。《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定只拍摄27集，谁知竟一发而不可收，现已有88集投入播出，效果很好。目前此片刚好拍到100集，但一时还无法“封顶”，预计前路畅通。今晚的这辆面包车正驶在通往北京市京昆协会春芽艺术团的道路上，凌先生想把那些学唱的娃娃们摄进这部系列片中。

八千里路洒满艰辛，凌峰说他这几年足迹已遍布大江南北。为了拍这部电视系列片，听说他押上了全部家产。今日笑问其真实性时，凌先生“正色”曰：“没有，老婆没押，只押了房子。”幽默中却透出几丝《小丑》一样的辛酸。

不掩饰，不做作，这正是我们面前洒脱、自然的凌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很透明，所以显得可爱。”接着大侃“缺陷美”。凌先生认为自己很丑，索性也就不介意别人评价他的尊容。问起秃头的缘由，凌峰回答得十分从容：从前有次拍电影，角色的头是光的，便剃了。剃了才知光头的好处，省钱省时省洗发精。一位同伴插言道：“但可费帽子了。”全车哄然。

正是因其自然因其纯真因其横溢的才华，更因其情系大陆寻根不辍，凌峰受到了大陆同胞的喜爱。那次《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来到广西南宁民

族学院时，正在参加运动会的同学们一下子拉开了一个巨幅标语“凌峰，我们欢迎你。”热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几次把凌峰抛向空中。

握别凌先生时，从心底祝他永远不再坎坷。路还很长远将继续，凌先生还要拍摄一部系列片《八千里路群英会》，介绍大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还要拍摄关于杨丽萍舞蹈艺术的电影纪录片……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光头里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他将继续对“根”的寻找，并让这寻找不断深入。

(1991年4月)

拨地苍松多远声 ——记夏衍 赵建勋

夏衍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奇迹！

被人们尊敬地称作“夏公”的老共产党员、当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夏衍与 20 世纪同龄，今年 91 岁了。凡是见过夏衍的人，无不为他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路所折服，无不为他幽默风趣、坦荡真诚的话语所感染。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夏衍。然而作为记者访问他却是头一遭。夏衍瘦小的身躯比过去更瘦小，但他的智慧依然丰富，脑力依然健达，记忆依然惊人。

“我已经是 64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夏衍说话声音低沉，但吐字十分清楚。

“您也是老国民党员。”夏衍的女儿沈宁在一旁打趣道。

夏衍爽朗地笑了：“不错，那是在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衍缓缓的话语，把我的思路拉向过去的岁月……

艰难的少年时代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轩，1900 年 10 月 30 日出生于杭州城外的严家弄。先辈历代为官。祖父沈文远，年少时被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带走，后在英王部下作“记室”（相当于文书一类的工作）。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有学问，善书法，喜藏书，未得中举，便当了私塾先生。夏衍 3 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徐绣笙依靠自己辛勤劳作和亲戚接济，艰难地抚育着 6 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夏衍 6 岁进私塾，8 岁上了杭州正蒙小学，14 岁毕业于德清县立高小。因家贫无力升学，夏衍到泰兴染坊学徒。翌年母校保送他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继续求学。

熊掌与鱼，都要

在工业救国的时代潮流影响下，少年夏衍决心学工以救国。他在“甲工”刻苦攻读，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大潮波及杭州，夏衍以一名先锋队员的姿态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同年 9 月，夏衍和进步同学一起，创办了浙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旬刊《双十》（第二期起改名《浙江新潮》），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最初的文章《评杭州的四家日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看了夏衍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给予热情赞扬。

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是夏衍那时的奋斗目标，但经过五四浪潮的洗礼，社会革命的理想也在召唤着他。他下了一个幼稚的决心：熊掌与鱼，都要，试试看吧！

孙中山安排他加入国民党

1920 年夏衍赴日本，次年 2 月考取明治专门学校官费生，开始了长达 7 年的留学生活。除了完成学业，他广泛阅读哲学、文学名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并热情投身社会活动。1924 年 12 月 1 日，夏衍作为留日学生代表谒见途经日本的孙中山。当孙中山得知夏衍是留学生中的领袖

人物之一时，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不是。”夏衍回答。“为什么不入？”“没有地方去入。”孙中山当即指定李烈钧介绍夏衍加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继而夏衍在东京的国民党左派直属驻日总支部任常委兼组织部长，由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高尔基《母亲》的第一个中译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风云骤起。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排挤国民党左派。东京的直属驻日总支部被砸毁，夏衍本人受到威胁无法存身，便于是年5月回国到了上海。一个月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夏衍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历经磨难，矢志不渝。

为了维持生计，使自己从事的革命活动得到起码的物质保障，夏衍开始用“沈端先”这一笔名翻译外国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1929年，他首次把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高尔基的《母亲》译成中文。此书一版再版，受到中国读者热烈欢迎。翻译家沈端先在20年代末驰名中国文坛，标志着夏衍文艺生涯的开端。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为执行委员。30岁的夏衍成为共产党在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从而确定了他将一生从事于革命文艺事业。

这一年的夏天，夏衍与早已相识的蔡淑馨女士完婚。这对夫妻和和睦睦，白头偕老。遗憾的是蔡女士却于1984年谢世。

电影事业家黄子布

1932年，夏衍作为第一批打进电影界的共产党员之一，化名黄子布，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经过勤奋学习和摸索，他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1933年3月5日，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狂流》首次公映，轰动黄浦江两岸，被誉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接着，夏衍又创作了《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脂粉市场》、《压岁钱》等电影剧本，还在田汉所写故事梗概和主题歌词的基础上，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这部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30年代初期，夏衍便在电影界享有盛名，老一代电影工作者无人不知“黄子布”。

北方出了一位“新进作家”

夏衍作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经常遭到敌人的追捕，1935年不得不过了一段隐居生活。隐居期间，他根据有关史料和文艺作品，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写作他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讽喻剧《赛金花》。剧本写成后，为了检验自己戏剧创作的真实水平，夏衍请人代为抄写（以免文艺界熟人认出笔迹），使用“夏衍”（父字“雅言”的谐音）这个笔名，并让一位亲戚把稿子带到北平，再寄上海《文学》杂志。剧作发表后震动剧坛。上海进步文艺界不知道“夏衍”是谁，以为北方出了一位“新进作家”。直到几家剧团争相排演时，这个秘密才被公开。

自《赛金花》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夏衍的戏剧创作一步一个台阶，陆续写出《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十几部话剧剧本，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夏衍戏剧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没有一点政治说教的味道。他的剧作是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他严格遵循生活本身的规律、人物性格的规律和构成作家风格的规律，把平凡化为真实，把琐碎化为陪衬，让人物在舞台上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让观众在沉痛之后欢笑，在欢笑之后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夏衍是作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被载入史册的。

“白头记者”

夏衍自封“老新闻记者”。这自然有其深意，即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站在人民中间。然而作为历史事实，夏衍的确有长达 12 年的新闻工作者生涯。1937 年七七事变后，夏衍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去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同年 8 月 24 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后来从上海转移到广州，又从广州转移到桂林，前后历时 3 年有余，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与后方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救亡日报》终被当局勒令停刊，夏衍又先后在香港《华商报》主持文艺副刊，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特约评论员（后任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1945 年 8 月 29 日《新华日报》关于毛泽东抵渝与蒋介石谈判的新闻报道，系夏衍所写。其文笔之精彩，堪称典范。此后夏衍在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为一些进步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稿。

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夏衍文思敏捷，倚马千言。抗战 8 年中，除去十几部戏剧创作和一部长篇小说《春寒》，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闻事业，写下各类文章达五六百万字之多。

为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

建国后，夏衍马上积极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上海市文联主席、华东作协主席等职。1955 年任文化部副部长。1960 年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夏衍于 50 年代后半期分别将鲁迅小说《祝福》、茅盾小说《林家铺子》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将陶承《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剧本《革命家庭》。这三部影片的上映获得巨大成功。夏衍又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添上了值得荣耀的一笔。由于受“左”的错误的的影响，夏衍从 50 年代末开始受到不公正的批评，1965 年初被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夏衍被抓进监狱，关了 8 年零 7 个月之久，在狱中，他的右腿被打断竟无人医治。断骨自行愈合后比左腿短了一大截，落下终生残疾。夏衍解放前长期在白区工作，凭着他的机警过人，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被称为“福将”，却被关进了理应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监牢！这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然而夏衍从不谈这一段遭遇，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朋友问及，他一概不予回答。老人是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讲这样的耻辱，因为这耻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劫后余生的夏衍以饱满的热情活跃在新时期的文化战线，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他陆续出版了《劫后影谈》、《夏衍近作》、《杂碎集》、《懒寻旧梦录》等

文集。在这些文章中，他真诚地坦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火热的情怀。1989 年夏衍将历年收藏的珍贵字画共 90 余件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近来又把多年集邮的珍品捐赠上海博物馆……为了祖国的文化事业，他还在贡献着。

最近，北京图书馆举办了《夏衍文学创作生涯 60 年展览》。该展览以丰富的翔实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了夏衍作为革命家、翻译家、剧作家、散文家、新闻事业家、电影事业家的辉煌道路。夏衍 60 余年所作戏剧、电影、散文、杂文、随笔、评论、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及翻译作品，字数逾千万，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他的写作范畴几乎无所不包，但只有几首少为人知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夏衍当年为他和于伶、宋之的合作的剧本《戏剧春秋》所作的《献词》：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
天快亮，
我们颂赞我们的英雄。
已经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
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1991 年 6 月)

为卫生事业再倾心力

——记郭子恒

段承祥

在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记者走访了全国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著名骨科专家郭子恒教授。

今年 68 岁的郭教授在医疗卫生领域已辛勤耕耘了数十年，并在创伤骨科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

记者曾在历史博物馆见到过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一幅代表作《白求恩大夫》，画面上白求恩正与几位中国医生在临时搭起的战地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年青时的郭子恒曾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

郭教授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说：那时的战地医院一个战役下来便要收治上千名伤员。我们白天检查病人夜晚整夜做手术，一干就是十几天。遇有抢救危重伤员的情况，经常是连手术衣都不脱下，挽起袖子，伸出胳膊就让护士采血，然后立即接着做手术，我是“O”型血，因此这样的机会自然就更多些。

手术台上的磨练，无疑为郭子恒教授积累下宝贵的临床工作的经验，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骨科医学专家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郭子恒作为我国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来到列宁格勒创伤矫型科学研究所攻读创伤骨科，他也是建国以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位专攻创伤骨科的留学人员。四个学年的假期，俄罗斯旖旎风光并未使郭子恒驻足，因为学年的假期也正是留学生参加临床实践的最佳时间，他放弃假期去东欧旅游观光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骨科临床实践之中。

学成归国后，正逢卫生部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以创伤骨科为重点科室的大型医院，这所医院就是如今的北京积水潭医院。年轻的郭子恒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名创伤骨科博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该院骨科的创建工作之中。

在郭子恒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 29 年的辛勤耕耘，积水潭医院在国内外骨科医学领域已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先后成功地攻克了显微外科断肢再植术、严重开放性骨折彻底清创、做内固定等多项高难度的临床医学课题。由郭子恒教授参加主编的《创伤骨科学》一书，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积水潭医院治疗各种骨关节创伤的经验，该书所阐述的论点在国内外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我国创伤骨科领域最权威的理论专著之一。

1977 年 4 月底，正值春暖花开大地回春之际，为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国政府派出了医学界数名专家组成的特别医疗小组，由郭子恒教授亲自带队前往朝鲜平壤，为金日成主席进行健康检查及治疗。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郭子恒教授和小组医生们对长期患有腰腿痛的金日成，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全身检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使金日成的病痛得到了明显的减轻。中国专家组人员高超的医术令金日成钦佩。他对郭子恒一行说：你们不仅带来了精湛的医术，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此时，正逢金日成 65 岁寿辰，他破例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与全体中国医务人员合影留念，记录下历史永恒的瞬间。

归国不久，郭子恒调往卫生部担任党组成员、工业卫生局局长；1979 年任卫生部副部长，主管医政、防疫、妇幼及干部保健工作。在卫生部的领导

岗位上，郭子恒很少坐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他总是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担任部领导的8年中郭子恒先后走访了200多个县，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和一些同志，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办好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和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在卫生部举行的全国医院管理工作会议上，郭子恒及时指出：对青年医务工作者仍要强调加强“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作风、严谨的科学方法）的训练，要把对中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培训工作当做一项长远的任务来抓。

对某些医院长期存在的管理松懈的状况，郭子恒经过调查分析提出，医院管理应首先整顿好日常的工作秩序，并从抓好日常病历书写、查房、手术病例讨论、业务资料积累、愈后随访等项基础工作做起。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医院管理只有依靠群众，结合各医院的实际，制订出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业务规程，并在临床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执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医院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担任部领导工作后，郭子恒并未只忙于行政事务，他在抓好自己分管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并亲自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先后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会诊治疗。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患有老年性骨关节疾患，郭子恒既是会诊的组织者，又是会诊的参加者。

1986年郭子恒进入全国政协担任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至今，谈及政协工作，郭子恒感慨良多，他拿出一份《七届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工作总结》的初稿说，这些年在政协医卫体委工作期间，虽然有时较忙，但感到很充实。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几年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18份调查报告，许多建设性的提案，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已着手加以解决。郭子恒感到欣慰之余，更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名卫生战线的领导，和一名医务工作者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在谈到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时，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协医卫体系统参政、议政的职能，为尽早使我国医疗卫生体育等工作迈上新台阶，再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1993年5月）

预测大劫难的先知翁文波 任晓路

翁文波写了一本“天书”。包括去年我国特大水灾在内的国内外多次自然灾害赫然载于书内。这本名为《预测论基础》的“天书”，在1984年就已付梓出版。

1992年6月28日。拂晓。美国南加州的大多数人还在梦中。保龄球赛馆外，数百名参赛者正等待进场。突然，大地摇撼不已，整个城市顿时漆黑一片。数百人眼睁睁地看着赛馆顷刻之间成为废墟。一场里氏7.4级的大地震将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这片城市抛入了强劲的震颤之中。这是美国本世纪第三次最强烈的地震。

1992年1月7日，一份内部文件已呈送全国政协。文中提到：预测1992年加州可能地震，三要素如：

时间：1992.6. 19

震级：6.8

地点：旧金山大区域范围内

时间与预测相差9天，震级相差0.6级，地点完全准确。预测精度已达到惊人的水平。

《人民日报》1992年7月1日至11日载：长江洪水持续上涨，近300多万亩农田受涝；湖南490余万人遭受洪涝灾害，受灾面积511.1万亩；湘潭、长沙部分城区和通道进水；闽北暴雨成灾损失严重，福建4万多间房屋倒塌；临沂地区久旱无雨，受害面积821.1万亩……

1992年3月19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以上各地旱涝预测，在大会书面发言之四十一上提出。

这位神奇的预测者，正是中国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现任理事长翁文波先生。

神话故事、佛教传说中，有知道上一千年，下一千年的，而这不过是故事和传说；大气功师、特异功能者有预测未来与洞察过去的，而这不过是子虚乌有。

翁文波并不是靠占卜、看水晶球来预测自然灾害，他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缜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我国自然灾害的预报科学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春风初度玉门关

翁文波是浙江宁波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投考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生。193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深造，专攻应用地球物理学科。他大胆探索，潜心研究，自行设计，亲自动手改制了一台新型“重力探矿仪”。当他荣获博士学位时年仅27岁。留学毕业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想为中华民族、为抗战提供石油出一份力，毅然决定启程回国。

1939年翁文波回到祖国，在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翁先生在工作中一贯重视教学也重视实际运用。1941年，他西出阳关任玉门油矿工程师，从此开始了他野外石油物探的工作生涯。

戈壁滩，一望无际，荒无人烟。一辆大卡车在孤独地爬行。车上挤满了去油矿的新工人。其中却有一位稍显纤弱，标致俊秀的女子，只见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着蓝布旗袍，足登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一对清澈明亮的眼睛专注

地欣赏着塞外风光。

她是冯平女士，一个爱好文学的医务工作者。一路上，她不断听到这样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去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她这次忍受长途颠簸，远道去往荒芜的玉门，是为了和心上人完婚。真挚爱情的召唤，心上人的事业以及她那富于文学色彩的罗曼谛克遇想，使她下决心踏上了这遥远的旅程。

当翁先生把冯女士拥入玉门油矿职工宿舍的平房内举行婚礼时，两颗心已紧紧连在一起。婚礼中，一位来宾问新郎：“您是英国留学的博士，中央大学的教授，怎会到这荒凉的油矿，而且在这里结婚？”翁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祖国积弱太甚，为振兴中华，我看到了中国石油的希望，我的事业在玉门……”

新中国成立后，翁文波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48年编著《中国石油地质概论》，1953年参加编绘《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两著作明确将东北松辽盆地列入有利的远景地区，为发现大庆油田提供了重要的地质理论依据。

“文革”中与周恩来的联系断了

1966年3月8日，我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地震灾区，并通知石油工业部，指名要翁文波立刻赶赴灾区考察。翁文波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6年3月9日，一位副部长告诉我：总理命令你晚上12点赶到邢台。当时情况紧急，时间仓促，我乘上一辆吉普车就上路了。12点零5分赶到现场。”

印入翁文波眼帘的景象令他震惊：到处是残山剩水，断壁颓垣，惨不忍睹。翁文波心情十分沉重，同时也感到了科学工作者肩上的重任。

1966年4月27日，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和有关领导人正在接见翁文波等科学家。总理详细听取了汇报，指示他们今后要搞地震预报研究工作。总理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们，叮嘱说：“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转而又对翁文波说：“你可以从后门进来。”

然而，时隔不久，比天灾更无情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冲毁了一切。翁文波也成了连队里的一个兵。一天，他在办公室坐在连长身边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了，接电话者在连长耳边嘀咕了几句，翁文波隐约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连长说：“问问是江青还是周总理。”回答是“周总理。”连长叫道：“不去！”就是这两个字，使翁文波与周恩来的联系从此中断。

破译无序的奥秘

与周恩来的联系断了，但有关地震预测理论的研究并没有中断，周总理的委托一定要完成。

早在30年代初，就读于清华大学时，翁文波就以《天然地震预报》的毕业论文荣膺理学学士学位。邢台地震后，翁文波默默潜心致力于天然地震的研究和预报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

翁文波认为，预测的基础是认识科学，而“演绎法”是认识科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严格的数学演绎定理只能是对一切事物都真实的定理。这在实际认识科学中，远远不能满足对复杂事物的认识，它必须扩大为“信息演绎”。地震预报三要素中，地点、震级不难把握，而时间几乎是无序的。翁文波就

是要破译这无序的奥秘。他重新发掘出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可公度性”理论，并提出了“浮动频率”说，这是他的预测理论的两大支柱。所谓可公度性，即在看似无序的活动中，也能找到可以用来衡量的“尺子”。当他 72 岁时所著的《预测论基础》面世的时候，认识世界的一个新领域业已形成。面对复杂的看似无序的世界，翁文波独树一帜，创立了一套完整概括的、科学的认识预测体系，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目前，预测理论的应用已由地震预测拓展到多种自然灾害的预测。近几年，翁先生已向国家行政部门提供了多种自然灾害预报信息。

培养人才的标准其实不俗

翁先生年届 80，仍每天俯身工作台或计算机前辛勤工作。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批批地球物理石油勘探技术人员，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个油田，目前都已成为技术上的骨干和领导力量。翁先生的研究生、博士生常常亲聆先生的教诲，无不为先生的学风和为人所折服。

笔者曾听说这样一段轶事：W 君为翁先生得意门生，联系出国深造时，恰遇翁先生去了外地。W 君情急之中竟冒充翁先生在推荐信上签了名。富于戏剧性的是，翁先生回京后收到海外来鸿，上面称十分感谢翁先生推荐如此优秀的学生云云。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差点断送了 W 君的前程。当笔者向翁先生提起此事时，他笑着说：“照教委的规矩是要除名的。我批评了他，也保了他。W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以后不犯了就行了嘛。”一个谦谦学者的宽容之心溢于言表。

“您培养人才有没有什么标准？”这个问题已在笔者脑海中酝酿已久。

翁先生的回答有些惊世骇俗：“有的，我有一个标准，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必须在工业界挣一笔钱来。”这钱当然是给研究生院。

翁先生见我有些吃惊的样子，接着说：“我有时也觉得这个标准不太对劲，太俗气。但我一直坚持，我觉得，培养出对人类有用，有新颖的创造性的思想、有能力、哪儿都抢着要的人才不会错。”

翁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地球物理，石油勘探学方面的顶尖人物，但却没有一个灾害预测理论的研究生，因为按规定他无权招收。他的《预测论基础》已被选入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国内却反应寥寥。当香港记者问及他的预测学是否后继有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时，他只能以“无可奉告”答之。他谈到这些，依然很豁达，很宽容。他自信他的预测学终究会被人接受，终究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掌握。

翁文波写了一本“天书”，但他并不想自己的著作永远被称为“天书”。

(1993 年 2 月)

中国的莎士比亚翁偶虹

王奎庭

翁偶虹，戏剧界无人不晓。1990年，在庆贺翁偶虹从事戏曲活动60周年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曾题词：“京剧圣手，德高望重”。至今他已编写了112部戏，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京剧泰斗”。

翁偶虹，原名翁麟声，笔名偶虹、藕虹、怡翁、碧野，1910年生于北京东城烧酒胡同的一所大宅院。5岁始读书，在小学和中学时勤学英语，但是更吸引他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他特别酷爱骈文和诗词赋曲，在读书之余，勤于写作，10岁时曾以“小学生翁麟声”的名字，在北京的《京话日报》上投稿。后来陆续在《平报》、《黄报》、《翰海》等报刊载骈文、诗赋。1925年，程砚秋排演了新剧《文姬归汉》，广征诗文，翁偶虹写了一篇《文姬归汉序》，刊登在《黄报》上，程砚秋看后极为赞赏，后来收在评介程砚秋新剧的专集《霜杰集》中。此后，翁与程结下了文字之交。

翁偶虹喜爱京剧，是受他的姨父梁惠亭的影响。梁惠亭是京剧花脸演员，嗓音高亢，能唱正宫调的《芦花荡》，常与著名武生演员孙菊仙同台演戏。翁偶虹被其精彩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向往着自己能做一个演员，便央求姨父教授他。后来又向胡子钧、黄占彭学戏。但是有家规一条：只许在家唱着玩，当真“下海”可不行。

翁偶虹在京兆高中读书时，许多同学也喜爱京剧，他们便利用庆贺新年、暑期毕业的机会，举办游艺会，租赁戏箱，粉墨登场。后来渐渐唱出了名气，其它学校在举办各种游艺会时，也请他去演。从至踏出校门，以净行票友的身份，出演于各大剧场。他曾在第一舞台与尚和玉、刘仲秋、钱宝森合演《阳平关》，在哈尔飞戏院与周端安、傅小山合演《盗御马·连环套》，在吉祥戏院与言菊朋、新艳秋、卧云居士、刘宗杨、高维廉合演《龙凤呈祥》，真是过足了戏瘾。

1928年，翁偶虹高中毕业后，曾为北京、上海的三四家小报撰写白话体章回小说和戏曲评论文章。他曾写过《海走山飞记》、《柳岸春风》、《水浒别传》等小说。

1930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校长焦菊隐曾请他帮助组织，并邀请他任职授课。这时，他更致力于戏曲研究，结合在舞台上演戏的经验编写剧本，他连续写出两个京剧剧本《还我河山》（这也是他的京剧处女作）、《孤忠传》，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0年的编剧生涯，并成为我国京剧职业作家中的第一人。

1936年，翁偶虹担任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先后编写和整理了《平阳公主》、《美人鱼》、《鸳鸯泪》等剧。那时的京剧界，还没有建立起导演制度，而戏校的老师们都只能是口传心授的老演员，不愿接受排戏的任务，翁偶虹只得兼任导演。当时翁还为程砚秋编写了《锁麟囊》、《女儿心》等剧本，演出于平、津、沪、汉，影响颇广。特别是《锁麟囊》，集程腔之大成，成为程砚秋的代表作。

1948年，焦菊隐在北平成立了校友剧团，请翁回北平，帮助他排演了《桃花扇》、《铸情记》等戏。1949年1月北平解放，6月份校友剧团解散。不久，翁偶虹正式参加了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组建的“新中国实验剧团”担任专职编剧，先后编排了《将相和》、《血溅泪》、《夜奔梁山》、《云

罗山》、《虎符救赵》等剧。

《将相和》（与王颀竹合作）的编写和演出，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文化部的奖励，翁偶虹被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评选为优秀文化工作者，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获得文化部剧本奖。当时的许多著名老生演员几乎都挑牌排演了这出戏。据闻当时有这样一副对联：“有生皆将相（和），无旦不锁麟（囊）。”足见翁剧成就不凡。

1951年11月，翁偶虹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1954年又调到中国京剧院，担任艺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组编剧。他先后编写了《李逵探母》、《桃花村》、《响马传》、《摘录楼》（与马少波合作）、《金田风雷》、《闹天宫》等十七八出戏。

《闹天宫》的改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的。周总理指示了三点：第一要突出表现孙悟空的彻底反抗性，不与天宫妥协；第二要突出表现天宫的阴谋；第三要表现孙悟空以朴实的才华，讽刺性地制服了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这出戏曾多次到国外演出，受到国际朋友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1964年，全国第一次现代戏会演，翁偶虹与阿甲合作改编了京剧《红灯记》，阿甲导演，李少春主演的这出戏，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文革”中，江青夺取了《红灯记》的成果，反诬原编导破坏革命现代戏，翁偶虹被批评为“封建文人”，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并在1974年被勒令告老退休。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得到解放，翁偶虹精神振奋，重新笔耕，自1977年起，他应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之邀先后编写《小刀英雄会》、《美人计》、《周仁献嫂》、《罗成》四出戏，后又为北京京剧院三团青年演员温如华编了《白面郎君》，演出后，都受到好评。此后，他却封住编剧之笔，苦心经营写作回忆录。这自有他的理由：一是精力远不及从前那样充沛，再者，编剧界人才辈出；二是写回忆录可以单枪匹马，独立作战。

自1980年起，他写出了《编剧五十年》、《翁偶虹戏曲论文集》、《北京话旧》、《翁偶虹编剧生涯》，还有散见于《戏剧论丛》、《戏剧报》、《戏剧电影报》、《戏剧艺术》等报刊的百余篇文章。

现在80高龄的翁偶虹仍为京剧界发挥余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栏目每周五的“梨园夜话”中向听众热心介绍京剧知识、梨园界的趣闻轶事。

（1991年8月）

唐由之为毛泽东作手术 李方

毛泽东说张晓楼的“楼”永远盖不大

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大夫跟着汪东兴和铁鹰走进一间房子，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沙发里，头发花白，眼睛没有什么神采，穿着一件旧浴衣，浴衣上打着补丁。

唐由之感到迷惑：“难道这就是敬爱的毛主席吗？外面不是一直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吗？”

他不禁想起 1974 年底的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只是把病情告诉专家们，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

这次是 1975 年春节，唐由之正在家里休假，一位解放军军官来到家里，很客气地请唐由之准备随身用品，并告之第二天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断定飞机是在往南飞。等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他看到了雷锋塔的旧址，知道了目的地是杭州。作为杭州人的他，到杭州来做什么呢？这时飞机上有人对前来的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第二天要接见大家。“原来是毛主席！”唐由之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毛主席当时已经 82 岁了，还是努力要从沙发里站起来迎接大家。那天毛主席正患感冒。唐由之忙抢步上前说：“不敢当，不敢当！”但毛主席还是执意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同张晓楼大夫握手时，诙谐他说：“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惹得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于是专家们开始为毛主席检查，诊断为白内障。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这回的任务要落在我头上了。”唐由之回忆说，“果然如此。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后来汪东兴叫我去上海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发现毛主席的房间里除了彩电，其它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于是他准备的医疗器械也全是国货。

周总理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

准备好医疗器械，毛主席已经回京了，医学专家们就在北京组织了一个 7 人医疗小组，由唐由之负责。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做出的。为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过许多次会议。那时周恩来已经患了膀胱癌，住在 305 医院。定下来后，周恩来就把唐由之叫到他住的医院，详细地询问情况。“我切身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忘我的爱。周总理还要我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他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唐由之深情地回顾道。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把中南海毛主席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阳光屋”手术室，进行消毒、准备。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主席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毛主席也开始了为期 10 天的术前准备。一次毛主席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主席耳音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服务员告诉毛主席是唐由之来了。毛主席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毛主席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白菜、菠菜、白切肉，一盘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唐由之说：另一次我去看毛主席吃饭，他高兴了，说：“唐由之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他还特

意地要我尝一尝辣椒酱，并且介绍不同的辣椒风味。毛主席真平易近人。

转瞬 10 天过去，要作手术了。毛主席作息不分昼夜，累了就睡，醒来就工作。已经晚上 8 点了，毛主席一觉醒来，唐由之进去请示毛主席是否准备好手术。毛主席一挥手，说：“作！”于是大家忙起来，有入去通知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在窗外看着。

毛主席喜欢昆曲、弹词，手术的后部分就是在《满江红》的曲词声中进行的。毛主席不愧为一代伟人，这是一种很疼的手术，因为眼部神经密集，不易完全麻醉，但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始终没有动一下。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唐由之出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成功了，太好了！下一步一定要注意护理，不要有并发症。”

毛泽东欣然送唐由之墨宝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主席的外间。毛主席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主席问：“谁来了？”服务员说是唐大夫，毛主席吟诗相迎：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唐由之说不懂。毛主席吩咐服务员拿纸和笔来，亲自把这首诗默写在纸上。唐由之请求将主席的手笔留作纪念，毛主席欣然应允，并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毛泽东。

毛主席的眼睛几天后就复明了。唐由之再去时，毛主席正在看黄庭坚的字帖。告别时，医疗组和毛主席合影。毛主席对唐由之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作右眼的手术！”

可惜第二年毛主席就去世了！唐由之非常遗憾，没能为毛主席作右眼手术。

他在毛主席身边 10 个月。术后，毛主席曾邀请他看电影《创业》。他从未见过江青。

现年 66 岁的唐由之大夫，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活动很多，但仍坚持进行视网膜色素复性的研究工作。“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有决心攻克它！”唐由之从给毛主席治眼病那时起，这个信念就更加坚定。

(1992 年 7 月)

一代名净袁世海 徐城北

喜、连、富、盛、世、元、韵——这是著名的京剧科班“喜（富）连成”在本世纪上半叶培养的7科学生，他们在红氍毹上所展现的光辉，足以代表半部京剧史。现在元、韵两科学生大多已告别舞台，然而原本属于“盛”字科的袁世海，虽已七五高龄，但不时仍在大合作戏中露面，比如在《龙凤呈祥》中扮演张飞。张飞只是一名配角，只有最后一折十来分钟的戏。然而观众偏偏把最大的审美期待，留给了张飞。每当身着“草笠芒鞋渔父装”的袁世海，以轻捷的脚步飞也似地奔上舞台之际，全场总是爆发出空前热烈的掌声，我多次发现，同台的中青年演员齐聚在侧幕里观摩，袁先生的功力和激情常常使后来者由衷感叹：“咱们是没法儿比！人家不愧是‘一代名净’嘛……”

两位恩师

京剧演员出科后为求深造，一般都要拜一位本行当的名师，袁世海也不例外。他早在坐科时就敬仰郝寿臣先生的大名，处处刻意模仿，因为郝寿臣青年时曾有“小桥红”的艺名，袁便被称作了“小小桥红”。出科不久，他终于实现了拜师宿望。郝对这位弟子，不仅在艺术上倾囊相授，更在做人方面谆谆教诲。他举出一些刚刚小有名声的年轻艺人，经不住声色诱惑而失足泥潭的事例，教导世海一定要守身如玉，敬业到底。袁牢记恩师教诲，在搭尚小云、马连良的戏班过程中，这些名伶也把“郝爷”在台上的风范，一一说与世海。袁听得之后，仔细玩味，于是技艺大长。

袁世海还有一桩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科班时，经常违反班规，私自与高盛麟、裘盛戎几个外出偷听“麒麟童”的戏。那时的北京，是“京朝派”京剧的大本营，对于来自上海的红角儿，大多有一种盲目排斥的偏见。但袁世海几个不为所动，不但出外偷听，还回来就学，以致被老师发现，通通遭到“打通堂”（集体被打屁股）的惩罚。出科之后，袁利用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之机，仔细揣摩“麒派”艺术的真谛，并且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实践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通过排演《九江口》一剧，使得京剧界赠给他“麒派花脸”的美誉。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袁世海之所以获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经过了两个不同的学习阶段：最初，是在本行当中，选择了最负盛名的郝寿臣先生，这时袁主要是纵向上的继承；及至纵向继承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他又开始了斜向上的传递——特别注意从周信芳的艺术中取得营养。当然，他不是死学“麒派”的一招一式，而是要学周的方法。在这时期，同被京剧界称为“麒派花脸”的，还有袁的“总角之交”裘盛戎。

裘袁并世

裘盛戎比袁世海略大几个月，因此袁称裘为“二哥”，裘也比袁早几个月进入“富连成”学戏。他俩似乎有过两度“裘袁并世”的局面。

第一次是坐科时节，裘主要唱铜锤，袁主要唱架子花。有时，两人也故意交换着演对方所擅长的角色，甚至为了争演一出能“卖一手武打绝活儿”的开锣戏，两人还要用划拳——“石头、剪子、布”来一决输赢。这一时期两人旗鼓相当，“富”社里重要一点的净行角色，几乎让这哥俩儿给“包圆

儿”了。

第二次“裘袁并世”，大约是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裘那时在民营的北京京剧院，袁则在国营的中国京剧院。裘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合作，经常演唱本门本派的传统剧目；袁则和李少春、叶盛兰、杜近芳搭档，则以演出新编的历史剧见长。裘、袁每有新戏，总是约请对方观摩彩排，然后再凑到一块儿琢磨。裘在《三顾茅庐》中以铜锤扮演张飞，总觉得不合适，袁就提出应该运用架子花的某些技巧。裘深以为然，又觉得自己“一是来不了，二要真的一来观众也未必买我的账”，于是就把这一角色拱手相让。袁感谢“二哥”的真诚，也把自己刚刚接到的一个《三请姚期》的剧本转送给裘，尽管本子十分有“戏”，但用架子花演，无论如何也敌不过铜锤。

使袁十分惋惜的，是“二哥”的早逝，以及延续至今的“十净九裘”的尴尬局面。袁曾经对我讲：“今天花脸中的‘裘派’，特多，仿佛用一点鼻音就算，可真是糟踏盛戎的艺术了。他的成功并不仅仅靠‘唱儿’，更不是靠鼻腔共鸣。他身上为什么那么好看？就因为他演过许许多多的架子花，翻回来又归到自己的铜锤上。他同样注意学其他行当的东西，特别是周信芳的方法。但是他的方法不同于我的方法，我们各有各的立足点……”的确，“十净九裘”一方面是实情，一方面又十分不科学。近年，袁世海十分注意培养架子花的接班人。好不容易，从大连京剧团发现了一个杨赤，是个能“三门抱”（架子花、铜锤、武打）的难得人才。袁世海十分器重这个学生，把自己最后一出新编戏《西门豹》传给了他。当杨赤进京参加重大演出时，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以便随时为他说戏……

赤壁鏖兵

当年的“富连成”科班，有一出经过萧长华老先生修改并导演的八本《赤壁鏖兵》，反映《三国演义》当中孙刘联盟对抗曹操的故事。这出戏除了旦行学生用不上，其他行当都得全体出动，气派之大是少见的。这个“鏖”字着实生动，即表现出三国战事之激烈，又能暗喻每一个学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都得发扬“鏖”的精神去和一切阻碍进行斗争，方能取得事业上的进展。袁世海当年曾从最次要的龙套演起，一直演到最主要的净角——曹操。在他之前，已经有过两代“活曹操”：一个是他景仰的恩师郝寿臣，一个则是“师爷”黄润甫。袁没有赶上看“师爷”的戏，但他到处打听第一代“活曹操”的舞台风貌，以及郝老师为什么和如何把太老师的艺术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袁的心思没有白费，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袁的第三代“活曹操”的艺术地位已经无可动摇。50年代时，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等合作拍摄电影《群英会》，演曹操的郝寿臣因为体力不支，临时退了下来，并推荐世海接替。袁感谢恩师提携，一方面把拍片收入全部贡献出来，给郝老师出版脸谱专集；更利用这个大好契机，深入钻研曹操这一角色，从脸谱直至动作、唱腔，都一点点在郝老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袁觉得，把曹操及曹操戏揣摩透彻，是他这一代净行演员的历史使命。

值得欣慰的是，在30多年之后，由文化部和一些企业单位的支持，袁最近拍摄了8本《赤壁鏖兵》的电视灵像带。这部片子不得不以“曹操戏”为贯穿线，因为当年同台的伙伴多已辞世。这一点使袁感慨万端，同时又使他充满力量——当年“富”社的弟兄们无不是“鏖”来“鏖”去的，只有自己“鏖”到了今天这个好时候。如今自己拍片子，实际是代表全体弟兄在向历

史做一汇报，自己又怎能不认真对待呢？

漫步人生

袁世海喜欢走路，更喜欢在走路时思索人生。50年代他住在宣武区菜市口，每逢有演出（地点多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时，他习惯在早晨九十点钟起床（晚上睡得晚），洗漱之后，到上房陪老太太说一会儿闲话，然后出去遛弯儿。遛的当中，可能通过沿街风景回忆旧事，也可能独自背戏。大约中午1点多钟，才遇到西单南面的“烤肉宛”饭馆。这时，一般吃客刚刚散去，但炉子中的炭火没灭，因为老板嘱咐了伙计：“一会儿袁老板来，封好了等着。”原来，在老老板在世的时候，袁世海就是这儿的常客……袁的饭量可观——牛肉两斤，烧饼四两，有时还喝一些黄酒。吃好之后，与老板拱手而别……等走进人民剧场，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先在后台稳坐片刻，沏一壶好香片。等到肚内刚刚要打嗝上来，拿茶往下一压——每当此时，袁觉得浑身这份舒坦，这份滋润。于是立即勾脸……架子花演戏非常之累，卸妆时，脱下来的“水衣儿”用手一拧，牛肉两斤和烧饼四两早就化为汗水落地了。剧团的汽车送袁回家，老伴准备的饭菜正热腾腾地等着他……

就在袁世海卯足中年人的全部力气去攀登艺术高峰时，谁料糖尿病忽然找上门儿来，并且症状不轻。同行们都为他担心，因为这种“富贵病”和架子花的“力气活儿”之间，是很难求得平衡的。然而也奇，袁世海30多年来从没耽误过演出，他的血压胜过了青年——经常是120/80。原因何在？去年，我和他合作写了一本研究架子花的专著，每星期都要谈几次，这才于无心中发现了他的养身之道主要在于走路。他现在居住在东郊使馆区附近，每天两次（有时三次）去那里散步。老伴一起去的时候，他就听她讲农贸市场上的种种新闻。独自散步时，沿街的花鸟树木都成了他交流感情的对象，甚至连使馆前的警卫也认识了他。有时，他则沉默着脸子专心背戏——不光背自己演熟了的花脸戏，也背老生、武生戏。他曾幽默地对我讲：“我经常替（李）盛藻、（高）盛麟师兄背。我背他们的戏，是怕将来去那边儿见到萧（长华）先生时，万一二位师兄背不出时，我好提他们个‘醒儿’，免得一块儿被罚，又来个‘打通堂，呀……’

（1991年7月）

袁晓园与汉字研究

夏 莲

“归来喜看新颜，首都美景无边，四化进军队里，必容老骥争先。”这是1985年毅然放弃美国国籍，只身回国定居的袁晓园女士归国后写的一首词中吐露的心曲。

又是新年伊始时。在袁女士北京崇文门附近住所的客厅里，节日气氛颇浓。一盆青翠欲滴的雪松上，悬挂着镶金嵌红的丝绦带。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贺年片似一群五彩缤纷的蝴蝶栖落在塑料贴花的纸墙上。

年逾八旬的全国政协委员袁晓园精神矍铄，谈吐清晰。话题自然从她为什么放弃有些人求之不得的美国国籍谈起。

袁晓园说：“这个问题我也是经过郑重考虑的。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推动下，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打开了禁锢20多年的中美民间来往的大门。我即组织了第一批学者访问团，回到阔别30多年的祖国。以后每年都回来，直至1985年，我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所吸引，看定中国大有可为，终于作出了放弃美国国籍、只身回国定居的决定。”

她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那里有我的丈夫、儿女和孙儿们，在美国生活很舒适。因此，我在古稀之年回国定居，许多人不理解，包括我的亲人。他们主要是从物质生活上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不如美国。我倒觉得，正因如此，我才应该回来加一点力量。如果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已差不多，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而最主要的，我是研究汉字的，酷爱中国文化，回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我钟爱的事业，使我的有生之年有用武之地。当然，我仍可常回美国与丈夫、女儿见面，继续为中美友好出力。”

袁晓园是江苏武进人，父亲袁励衡是民国初年的有名的银行家，伯父袁珏生是逊清翰林，曾做过宣统皇帝的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中南海新华门上至今悬挂的金字横匾上“新华门”三个字，就出自这位翰林公的手笔。袁女士从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诗同歌赋、琴棋书画有浓厚兴趣。30年代赴法留学，攻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熟谙英、法、俄等语言。抗战时，与丈夫叶南一起参加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工作，后在中国驻印使馆、外交部工作多年。赴美后担任过美国几个大学汉语师资班主任、客座教授。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直至退休。

袁晓园对汉字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讲起从事汉字研究，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她担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副领事。有一次她到一位老华侨家中作客。只见客厅里悬挂一条粗大的皮鞭，她好奇地问老人，鞭子作什么用？老人说这鞭子是用来鞭策那几个不好好学习祖国语文的不肖子孙的。老华侨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挚爱使她深受震动。从此，她将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对汉字的研究之中。

她在联合国工作的7年中，广泛地接触和比较了世界多种语言文字。联合国的文件一般翻译成中、英、法、俄、西班牙5种文本，在同一内容的5种文本中，用中文写的文本总是最薄的。袁晓园认识到，汉语汉字用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语言文字，是智慧的结晶，文化的奇迹，她常为中国语言文字感到自豪。

1974年，她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将她多年研究的心得《汉字现代化理论与方案》呈给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复印几百本进行研究。

1980年3月，袁晓园等人发起的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袁晓园任会长。袁女士感到欣慰的是，研究会的成立，终于实现了黎锦熙、唐兰两位中国语文大师生前与她曾计划要成立一个真正能对汉字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的夙愿。1986年，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也宣告成立。

1988年10月，袁晓园发起的汉字研究座谈会在京举行。1989年秋，研究会主办的一个汉语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出席上述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热烈讨论了汉字的实用性、科学性，汉字的简化，汉字能否拉丁化，汉字教学和计算机输入等问题。袁晓园教授倡议对汉字要“识繁写简”，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的形势发展需要。几年来，袁晓园和她的助手们，还在北京、内蒙古几所小学和幼儿园试验“袁氏拼音汉字”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由她担任主编的一本以论述汉语汉字科学性为重点的学术性杂志《汉字文化》也于1989年问世。研究会所组织的活动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主要由名誉会长安子介和袁晓园资助。袁晓园将她在美国的房产变卖，慨然作为研究会的基金。

袁女士为归国后几年她在汉字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感到欣慰。她说：“我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中华民族，我都要努力去做。”除进行汉字研究外，她还经常参加政协的会议，接待来访的美国人士和侨胞、台胞，促进中美和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她每天工作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最近，袁晓园大声疾呼：重建《泰山刻石》。《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是李斯等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在泰山立的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残损殆尽。袁晓园说，此碑记载，秦始皇采纳李斯书同文的建议，使中国成为政令达于四方的大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书同文，就没有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化也就没有统一的中国。统一的汉字，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因素。重建此碑，将可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热爱汉字，热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袁晓园说，她的这一倡议得到山东省的重视，专门邀请她去泰山，落实重建泰山第一碑的具体事宜。

(1991年3月)

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记柴泽民 隆莉 夏莉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外交舞台上，恐怕没有什么比70年代发生的事更富戏剧性了。

1971年4月，全世界听到中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出去——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到了7月，美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回来——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在相互隔绝22年之后终于开启了一扇窗户。

1972年2月21日，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北京。尼克松总统伸出手与周总理紧紧相握于首都机场，这双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2月27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在概述了双方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不同、但并非不可调和的观点后，也讨论了共同点，并提出在科学、文化、体育、技术、新闻以及贸易发展等领域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尼克松在结束1972年中国之行的最后一次祝酒时宣称：“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他兴奋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

然而，在激动人心的1972年过去后，中美关系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突飞猛进的进展。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等架起的桥梁上，行人寥寥。

1978年，这种僵硬的关系终于有所缓解。当时正在泰国当大使的柴泽民应召回国，被告知准备接替黄镇作驻美联络处主任。于是，柴泽民开始熟悉美国的情况，每天阅读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当年的谈判记录。此时，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柴泽民参加了接待工作。布热津斯基在与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会谈时提出美国想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并将由伍德柯克作美国方面的代表。随后，黄华与伍德柯克进行了多次建交谈判，柴泽民参加了其中两次。柴泽民到美国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后，又与布热津斯基保持密切的联系。于是，经过数月的秘密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换大使。柴泽民就任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在坚冰已破的航道上，开始了艰难的首航。

中国旋风

中美刚建交一个月，邓小平就应邀到美国正式访问，并横越全美国进行参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

美国方面对邓小平的礼遇很高。为了欢迎邓，美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文艺演出。这次演出集中了美国最有名的演员，每个节目都由一个美国的著名人士报幕，讲一段话，然后才开始表演。柴泽民记得，当时报幕的有世界著名的华裔建筑设计师贝幸铭、美国的第一个宇航员格伦（当时是参议员）……这台演出是美国的一些大企业联合出资办的，其规格之高，在美国是空前的。

讲到这里，柴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后来，邓小平到卡特总统的故乡乔治亚访问。州长举行了一个欢迎招待会，美国所有州的州长都参加

了招待会，这也是任何国家的元首都没有享受过的高规格礼遇。这两件事轰动了美国。”

中美刚建交时，美国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赞成，但邓小平访美后，美国人又重新认识中国，中美关系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了，签定了交换留学生协定、贸易协定、科技文化协定等一系列协定，双方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于是，柴泽民穿针引线的工作便更加繁忙了。

闯激流过险滩 首航充满乐趣

首航是冒险的，却也充满了探险的乐趣。中美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辫、小脚和孔老夫子阶段。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天壤之别。作为首任大使，柴的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刚建交3个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台湾关系法》，于是台湾问题便成为一个随时可以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比如，美国把武器卖给台湾，就用那个“法”作为盾牌。柴泽民任大使期间，美国方面有两任总统。柴说，卡特时代尽管中美之间也有磨擦，但关系还逐步向前发展，但里根上台时，围绕里根的就职典礼就展开了一场斗争。

里根举行就职典礼前，柴大使得到消息，台湾当局应美国方面邀请，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来参加。这显然是在制造两个中国。于是，柴大使去跟美国国务院交涉，国务院却说就职典礼是国会搞的，他们不管。柴又找白宫，白宫也推到国会。然而，国会有100个参议员，400多个众议员，他们都有权力推荐参加典礼的客人，该找谁去交涉呢？于是，柴就对美国国务院说，如果台湾派代表参加就职典礼，他就拒绝出席。他们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中国不参加，美国政府就会很难堪。于是，“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三天”，柴回忆道，“在一个招待会上，陈香梅见了我，高兴地说：‘柴大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台湾不参加就职典礼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台湾方面的人病了，住医院了。’”说到这里，柴泽民大笑起来，仿佛又看到了美国 and 台湾方面当时的尴尬模样。

后来，中美双方又在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从1981年冬季开始谈判，直到1982年8月，双方发表“8.27联合公报”，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因此柴大使在美国那几年，是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期，所以，他不无幽默地说：“我在美国工作几年的特点就是总在不断地交涉。”

柴泽民眼里的美国领导人

柴大使在美期间，经过2个总统、4个国务卿，同时和前后3个总统、2个国务卿都有过友好的交往。岁月流逝，昔日“外交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美国政坛上的这些风云人物给柴大使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尼克松。尽管我驻美期间他已不是总统了，但他仍很关心中美关系，因此我和他接触得比较多。这个人很有头脑，有战略眼光，是个政治家、战略家。

“卡特很有学者风度，比较随和，平易近人，没有总统的架子，谈话很轻松，穿着随便，经常跟夫人上街散步。在他自己的就职典礼时，他没穿礼服，典礼完了以后，也不坐车，和夫人手拉手从国会山走回白宫。

“里根有着绅士派头，比较严肃，态度强硬，语言简单，但他很会表演。里根和南希都非常讲究衣着，他一上台，凡是有重要活动都要求大家必须穿

大礼服，并且在请柬后面特意注明。不过，在招待会上我还是穿咱们的中山服。

“ 布什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中国比较友好，他经常接待中国 的代表团，大家都愿意跟他交朋友，我经常到他家作客，彼此有很深的友谊。

“ 美国的几个国务卿也风格各异。基辛格是个政治家，知识渊博，看问题比较深刻。万斯不太爱说话，对人非常客气，即使去向他提抗议，他也从不当面顶撞你，所以不难接近。 ”

现在，柴的这些美国 “ 老友 ” 们有的归隐，有的还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柴自己也从外交的前台退到后台，但他们仍然热切地注视着世界，注视着彼此。

称职的大使 “ 不称职 ” 的父亲

从 1961 年进入外交部开始，柴泽民历任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泰国、美国等国大使，时间达 22 年。开始还可带孩子去，“ 文革 ” 之后，孩子就不能随父母出去了。柴泽民夫妇总在国外，5 个孩子留在国内，上学、工作、结婚他们都没管过。所以柴不无遗憾他说：“ 孩子们跟家里老保姆的感情比跟我们还深。孩子们对我也 ‘ 有意见 ’ ，说我不管他们。我在美国时，孩子们也想到美国去，可是那时有的干部子弟通过各种关系来到美国，影响不好，所以我规定，使馆人员的孩子，除国家派出的以外一律不许来。我跟孩子们讲，你们想去自己凭本事去，我不管。 ” 所以柴泽民的孩子都在国内工作，他们的路都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记者曾去过柴泽民的家，那是在外交部的一幢公寓里。不大的客厅堆满了杂物和书籍，一点也没有想象中外交官的家的那种气派。只有书架上摆的那些柴大使夫妇与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基辛格等人的合影，凝固了柴穿越过的历史风雨。在那上面，柴大使和历史一起微笑。

(1992 年 8 月)

中国领导人的专机驾驶员徐柏龄

宋立新

为了李鹏总理出访南亚三国的飞行安排，徐柏龄亲自飞往上海，匆匆归来，连机长服都未脱，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当了国际航空公司的总裁后，还飞行吗？”大家坐定后，我先开了口。“是呀，我从1954年开始飞行，30多年来，我的飞行保持着连续性。我还是一个飞行员嘛。”他拍了拍身上的机长飞行服，笑得十分自豪。此时，任何人都能够看得出他对于飞行的喜爱，他的墙上是飞机的照片，桌上是飞机的模型，在他的窗外，不时有一架架飞机轰鸣着冲上天，他生活在飞机的世界里。

是的，徐柏龄，在这个名字前面的定语里，大都会有“飞机”、“航空”、“飞行”这一类词出现。闻名全国的先进集体、中国民航事业的骄傲——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队长；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驾驶员：1971年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基辛格访华时飞行领航员；安全飞行11000多小时优秀飞行员；甚而是一个飞机地勤人员的丈夫；一个民航售票处工作人员的父亲。于是，他的名字总结人一种和天空、飞机一样的神秘感。可是，当他换下机长服，换上漂亮的灰西装，坐在离我一米多远的沙发上时，他便成了一个风度十足，谦和大气，说话带一点吴侬软语音韵的普通人，就连人们当做传奇故事来讲来听的徐柏龄飞行经历中，我也发现了朴实、平凡的东西。

“第一次为周总理驾驶飞机的头天晚上，我兴奋紧张得睡不着觉，想到睡眠不足就要影响飞行。我心里就更紧张，于是便更睡不着，那种滋味我真是忘不了。至于最后怎样睡着的，我倒是忘了。”他的话没完，我们几个记者便都笑起来了。

“在地面上，怎样说笑都觉得轻松，可到飞机上就不能有半点松懈，尤其是遇到险情的时候。”曾经是徐柏龄的老搭档周士贤讲起徐柏龄和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的一些经历。

1965年，徐柏龄作为正驾驶，执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亚非14国的专机飞行任务。那次是首航亚非14国，在中国民航开辟国际远程航线的历史上，可是件大事。为了在瞬息万变的复杂飞行环境中顺利完成任务，徐柏龄和机组同志做了充分准备，然而，飞行中的险情却是难以预料的。

飞机航行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时，已是黄昏时分，刚要着陆，地面突然停电，机场顿时灰蒙蒙一片，光线差，环境生，机舱内的乘客不觉有些紧张。然而，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发现飞机已经在苍茫的暮霭中安全降落了。巴格达机场的管理人员几分钟前还在惊慌失措，此刻，见到专机平稳地停在机坪上，欢呼着跑上前来，有的鼓掌，有的举手致敬。

而后在苏丹机场上空，遇到赤道风的袭击，在埃塞俄比亚机场上空时，又遇到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危险气候，每一次，徐柏龄都在机组同志的通力协作下，化险为夷。

“总理在任何时候都很沉着，遇到险情时，总理常常对周围的乘客说：‘我们的飞行员是有经验的，大家请放心，把安全带系好。’他的话总在非常时刻起到很好的作用。既稳定了乘客，又鼓励了我们。邓大姐也常说：‘总理讲了，坐徐柏龄的飞机，就听徐柏龄的，他说能飞就能飞。’总理在任何紧急情况下的镇静自若和尊重飞行规律、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给我留下根

深的印象。”回想起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日子，徐柏龄颇有感触。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性格气质、思想气魄在他的心里占有很大的位置，而这些给他的成长也留下深深的痕迹。

看一看徐柏龄的飞行纪录，我们发现在与美国相联系的三次有意义的飞行，徐柏龄都参加了。

——1971年6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柏龄等人，交给他们一项特别绝密的任务。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派他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经由巴基斯坦的首都拉瓦尔品第到达北京；使用巴基斯坦的波音707飞机；由当时的第一飞行总队队长徐柏龄带队领航。这便是人们常大书特书，极富传奇色彩的绝密飞行。这次飞行也常被人们称为中美交往中的第一架空中桥梁。

——1979年1月28日，徐柏龄做为领队，驾驶着波音707专机，送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专机飞行航线是北京——上海——安克雷奇——华盛顿。虽然飞行遇上的气候十分恶劣，上海大雾，能见度300—500米；安克雷奇夜间下中雪；华盛顿刮大风。然而徐柏龄以高超的飞行技术和指挥才能，使飞机安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受到代表团和美国同行的称赞。

——1981年1月，作为中美开航的领队，徐柏龄率机组飞越太平洋，首航纽约成功，标志着中国民航事业发展迈进到一个新阶段。

“那都是历史了。”徐柏龄指着墙上张贴的世界最新型的波音747—400型飞机的照片说：“这是我们国际航空公司最新买进的飞机，机尾上所画的凤凰是我们国际航空公司开航的标志。在这种中国古老吉祥物的保佑下，国际航空公司已经成为国家重点的赢利企业了。”和他的光荣历史相比，徐柏龄更爱谈现在，谈他的国际航空公司的群体形象，谈这个刚成立一年多的新兴企业。

“进入90年代了，我们的民航事业在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里，要安全迅速地向前飞，明年我们要开辟一条新航线去维也纳。我们的电脑订票也要逐步实现和国外连成一体。我们公司的维修基地已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维修手段最为齐全的综合性的飞机维修单位，但我们又和德国汉莎公司合作，建立AMCO的维修基地，以便更快和国际先进水平看齐。我们和香港合资办的航空食品加工公司……”从一个飞行专家走上企业家的道路，徐柏龄很乐意也很有激情地接受了这个新的挑战。对于这个企业，他有着对飞机一般的感情，从空中服务到地面维修，从客运到货源，从经验教训到发展前景，他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

“当了总裁以后的生活怎么安排？”为了满足读者了解徐柏龄个人情况的愿望，我打断了他兴致勃勃的话题。“我当了总裁以后，各方面的事情比以前多了，呆在空中的时间就少了。不过，我还在每天运动，在地面上只能打打网球，跑跑步，以便保持飞行员所需要的体质。”他三句话离不开飞行。

“所有的爱好中，我最爱的还要算开新飞机，每一个新机型的飞机到来，我都很激动，渴望着第一试飞，渴望着适应新的挑战。我想，每一个飞行员都会把试飞新飞机当做一种幸福的。”他的话离不开飞行，就像他的生活离不开飞行一样。

窗外，又一架飞机轰鸣着腾上蓝天，像一只大鹏振翼飞翔。

(1990年1月)

谈家桢八十高龄忙办三件事

冯学锋 周描坤

“八十少年，天下英才。”在谈家桢教授客厅里悬挂的众多的祝寿条幅中，这8个字的条幅最有概括力、最引人注意。

宽大的扶手椅似乎容不下谈老先生发福的身躯。他还像个孩子似地好动，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和我们说古道今，诙谐风趣，声如洪钟。他正在寻找减肥措施，但又忍不住要吃点肥肉；刚比划几下他自己创造的、每天要做半小时的自由式操，又急着请我们欣赏挂满一房间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年片……我们端起照相机，调准焦距，捕捉瞬间。谈夫人吴蕴芳女士忙吩咐“老头子，快去戴上假牙”，老先生又乐呵呵地去找他的“装饰品”。

这就是名闻中外的遗传学家，几项国际院士头衔拥有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家桢教授。他80高龄，仍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两度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

谈家桢告诉我们，他的这80年人生可以分为两段。真正出学术成就的是在40岁前，“那时年轻，精力体力充沛，可以没日没夜地干。”

1933年，燕京大学研究生谈家桢的一篇论文《亚洲瓢虫鞘翅色斑遗传》，深受遗传学鼻祖摩根教授赏识。次年，谈家桢获得了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摩根实验室深造的机会。

留美3年，谈家桢全心投入研究，共写成10多篇论文。1936年，他以《果蝇染色体遗传图》这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出众才华和治学严谨的态直很得导师摩根和杜布赞斯基的赏识。他们热情挽留他留在美国。但他在赴美前，早就立定“科学强国”的志向，身在异国，何以强国？他毫不犹豫地辞别了导师和朋友，回到祖国开创遗传学事业。

在浙江大学，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1944年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嵌镶显性现象。接下来两年，他又弄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论文一经在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便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回响。

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赴瑞士参加国际第8届遗传学会议，并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的常务理事。这时，许多朋友动员他去美国定居，但谈家桢初衷不改，他认为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志向是无法在异国实现的。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他怀着满腔报国热忱又回到了祖国。

不向反科学势力低头

谈家桢为中国遗传学奠基立业、搭桥铺路、培养下一代的后40年，却是坎坷艰辛、风雨飘零的40年。

“遗传学家谈先生”，这是毛泽东主席对谈家桢的称呼。1958年，毛主席曾两次约见他，一次在杭州刘庄，一次在毛主席专机上，两人一边用小碟子喝黄酒，一边谈遗传学。谈家桢感慨地说，要不是当时毛泽东说了公道话，中国遗传学那时就全军覆没了。

当时苏联风行“李森科主义”，把摩根的遗传学说视为“反动生物学”。苏联多所实验室被迫关闭，一些科学家遭逮捕，这股风也随“李森科主义”

刮到了中同。当时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受到了批判，勒令他不许讲授遗传学。但是，在科学面前，他毫不畏惧。“李森科”派的苏联教授来到复旦，谈家桢和他公开辩论：“染色体是我们都能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怎么能说是人工产物？”驳得对方面红耳赤。

后来，毛泽东主席发了话，1958年复旦大学终于又开设了遗传学课程。1961年底，还成立了由谈家桢任所长的遗传研究所，研究成果接近国际一流水平，尤其在家禽及作物育种应用方面，更是出色。谈家桢的创造力也发挥到了极致，5年间发表了50多篇论文，出版了16种专著、译作，不但奠定了中国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遗传学人才。

然而“文革”爆发，中国遗传学在劫难逃，实验室被破坏殆尽，谈家桢被抄家批斗，谈夫人含冤自杀身亡，最小的孩子流浪街头。但谈家桢还是凭着一份信念，咬紧牙关挺下来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谈家桢重整旗鼓，把复旦大学遗传所迅速现代化起来，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子生物与细胞生物学的国际研究网络成员之一。

谈家桢教授说，没有50年代同反科学势力的斗争，就不会有遗传所，也不会有重新振兴中国遗传学研究的这一批人才。

直言不讳的秉性

提起眼下的工作，谈家桢笑呵呵地说，我现在是废物利用。这不是谦虚，人的衰老是自然规律，我不能倚老卖老，还以权威自居，年轻一代认为我们还有用，我愿贡献意见，但决不要求他们非听我的不可。谈家桢感叹道，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阴魂不散，在科学界也有流毒，有的老科学家不愿年轻人超过自己，这是对科学的扼杀。

谈家桢依然保持着直言不讳的秉性。他说，现在中国的科学家是人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但我们没有创见，没有自己的独立创造，所以中国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关键在教育制度有问题。老一套教育方法把学生思想束缚住了，我认为要让他想入非非，敢于去闯，不能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

谈家桢教授曾在那里深造过的美国摩根实验室就是以作风开放、独立见解而闻名世界的。他以此为例说，美国教授上课没什么课本，自由发挥，也接受学生的诘问。为什么美国的科学成果大都出在大学里，是因为教学相长，出人才、出成果，后浪推前浪。他说，我对学院式、学究式的教育制度是不满意的。

告别这位精力充沛的老科学家时，他请记者转告关心他的读者，他正在忙三件事：一是上海电视台正在为他拍摄一部专题片，最近又到他的宁波老家、在苏州上大学的地方、复旦大学拍摄，片子今年上半年将与观众见面。二是忙于《谈家桢文选》的审校，这部书将在今年夏季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士民还约请谈先生再次详谈，将在今年完成《谈家桢传》，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2年7月)

周恩来的中医保健医生高辉远

秦 萍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解放军 305 医院中医科主任高辉远的办公室。屋内没人，小黑板上写着“我正在查房，有事请打电话”，下面是电话号码。将近 11 点，高辉远查房回来，一见我们就说：“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在高辉远的桌上，有一尊石刻的李时珍雕像，那是李时珍的故乡，也是他的故乡——湖北蕲春人送给他的。

从 1958 年起，高辉远就随同他的老师蒲辅周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分领导同志的中医保健工作。他根据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及病人的体质和老年人的特点进行整体治疗，形成了“辨证为准，立法慎审，选方精当，用药轻灵”的治疗风格，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赞扬。同时，也还兼顾着日常医务工作。他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有求必应，认真诊治，决不放过一个疑点。为了使更多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他坚持门诊不挂专家号，常常是早上班，晚下班，顾不上吃午饭，近几年来每天上午平均门诊量高达 60 多人次。他从未享受过一次休假，不是他不想休，而是舍不得休，怕耽误了为病人看病。

作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的高辉远，从 18 岁正式行医至今已整整 50 年了。1990 年 12 月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著名老中医高辉远先生从医 50 周年座谈会”，李德生、钱信忠等亲临祝贺，邓颖超、聂荣臻也派人出席会议，很多有名的老中医像协和医院的祝谌予等也都参加座谈，感到很高兴，很自豪。这可说是建国以来中医史上的第一次。

生于 1922 年的高辉远从外表看不像年近古稀的人。他和蔼慈祥，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解放初期，高辉远还只是蕲春县的普通中医，后被选送到黄冈中医培训班、湖北省卫生厅干部培训班、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等处学习。1954 年高辉远从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被留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建院筹备小组，主要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中医。

1958 年，为了发展中医事业，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为老中医配备学生、助手，整理中医经验。著名老中医蒲辅周点名要高辉远作学生，从此他追随蒲老 17 年，尽得其真传，还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专著，受到中医学界的重视。谈话间，高辉远特意拿出《蒲辅周医案》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1972 年为出版这部书，周总理曾几次催询，还就书的字号、印刷出版等亲自批示，使得这部 13 万字的专著很快就出版面世。

蒲辅周生前曾是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蒲老去世后，很多人向总理推荐名医。总理说：“别人来了对我不了解，高大夫跟我时间长，对我很了解，我就要他。”事实上自从 1954 年起高辉远就跟随在总理身边。周总理病重的那两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总理，吃住都在医院，连家也不回，日日陪伴在总理床边，直至周总理去世。

谈及往事，高辉远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对我不是一般的关心、爱护，而是非常的关心、爱护。记得有一次，国务院召开医疗工作会议。临开会前，总理特意问道：有没有中医出席会议？听到说没有，他老人家道：派人去把高大夫请来。我来后怕打扰大家，就没吭声，坐在会场边上。这时总理又问高大夫来了没有，我站起来说：总理，我来了。总理向我招手道：你到这儿来，他们不重视，我重视。会后吃饭时，总理又拉我同坐。总理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他关心的是整个中医事业啊！”说到这里，高辉远显得很激动，停

了一会儿，才慢慢讲下去。还有一次，周总理在西山开会时生了病，高辉远去给总理看病，正逢午休时间总理在睡觉，高辉远不忍心叫醒他老人家，就坐在邻屋等着，总理醒来后第一句话便问：高大夫来了没有，几点来的？听说已来了一会儿，总理批评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让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

“总理还非常信赖我”，高辉远还告诉记者，总理虽然是一代伟人，可他怕输血，但是只要高辉远坐在身边，他就不紧张，按总理的话就是心里感到踏实。所以总理每次输血时，高辉远就坐在他身旁，与他聊天、谈家常，分散总理的注意力，一直陪着直到输完血才离开。如果高辉远不在，即使需要输血时总理也不输，一定要等高辉远回来。

高辉远平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与周总理照一张合影。“当时机会很多，可就是没想到要照张像，现在想照也不可能了。”高辉远神色黯然。“只有总理逝世时，我守在他老人家身边照了一张。可是又不敢看，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心痛。”

临别时，高辉远的学生吴登山大夫指着桌上的书稿告诉记者，不久将要出版一本新书。这本由邓颖超大姐作序、聂荣臻元帅题写书名的《医门新录》，是对高辉远一生医疗活动和医疗经验的一个总结。邓大姐将之称为医学界的一项宝贵财富。

(1991年6月)

秋雨黄昏访盛成

小眉 淡秋

北京语言学院座落在北京西北郊著名的学院路上。这所小巧玲珑的大学，在向往到中国求学的海外学子中，颇有名气。盛成先生则是该校名声在外的一级法语教授。这位 1899 年出生在江苏仪征县的教授，屈指算来已步入人生的第 90 个年头。现在，他和他的夫人——美籍华人李静宜女士宁静地在中国安度灿烂之后归于平淡那种境界的岁月。他们于 1978 年从海外回国定居，按流行的说法叫“落叶归根”。当我们冒着黄昏的秋雨，出现在盛宅客厅，我们的手被盛先生紧握时，我们真切地感到生命之树的葱郁。三天前，他刚从医院出院。

盛先生现在的生活平静而寂寞。盛成——这个名字渐渐被人淡忘，而正是这个名字，曾给他的祖国，增添了一份自豪。

1985 年 4 月 1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盛成“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因此，他成了“新闻人物”。人们似乎终于发现，这位甘于寂寞的教授，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曾留下过众多斑斓的足迹。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拥有了一位国际文化名人。

让我们回眸往日的风景吧，它是那么遥远那么真切。

1910 年，11 岁在南京读书的盛成，跟其兄盛白沙秘密加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南京之战役，成了当时最年幼的著名的“革命三少年”之一，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称赞。其兄盛白沙是民国史上的功臣烈士，曾任肇和号军舰舰长，后在汕头海军叛变时殉难，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明令抚恤追授海军中将军衔。

1919 年，20 岁的盛成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长辛店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会长，奔走于京津两地与爱国学生联合战斗，并和年轻的周恩来结下了战斗友谊。直至今日，时光虽已过去 70 个春秋，盛成对此依然记忆清晰，他肯定地记得是在 6 月 2 日，在郭隆真妹妹家中初遇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向他询问了长辛店工人的情况。盛先生曾说：“旧中国如一盘散沙，周恩来好比水泥，正是有了像周恩来这样一批伟大的革命家，中国才能变成坚硬无比的混凝土……”

后来，他和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中又再次相遇。他和周恩来、王若飞、赵炎年、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一起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些斗争活动。同时，他又热衷于当时风靡欧洲的“达达”（一种文学艺术流派的名称）运动，并与另两位狂热者毕加索和海明威成了莫逆之交。以后，盛成又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后与党内左派加香、弗昂沙等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Langnedoc）的省委书记。

盛成获得蒙白里大学理学硕士后，曾执教于巴黎大学，当时他醉心于《动物社会学》和《比较蚕桑学》的研究。1928 年，他用法文写了传记文学《我的母亲》一书，震动了法国文坛。小说很快被译成英、德、西班牙、荷、希伯来文而传遍世界。罗曼·罗兰、纪德、居里夫人、萧伯纳、罗素、梅特林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上校的戴高乐，特意结识了盛成，并与之保持了终身友谊。

30 年代后，盛成先生回国投身抗战，曾参加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战斗，

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所属三支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又身兼数职，奔波于抗战前线。因为他经常在各大学辗转任教，被老舍戏称为“游击教授”。抗战胜利后，1947年，他被邀去台湾大学任教。直至1965年，他侥幸从台湾出走，重新开始了旅居欧美十余年的生涯。1973年10月10日，正巧是农历“九九”重阳佳节，盛成伉俪回到了祖国大陆。

盛先生的《我的母亲》出版之前，当时法国文学泰斗瓦雷里曾为之写了长达16页的序文。在序文中，瓦雷里盛赞这部法文作品是法国文学“新时代的诞生”，是一部“精美、伟大的作品”，并称盛成是“世界语言简化新纪元的开创者，巴黎学派的杰出人物、法国文坛的一颗明星。”法国的中小学课本、教学用的录音磁带都印制有他的作品和他的优美而标准的语言。现在，在法国还有一些崇拜者组织了“盛成协会”，每逢周末活动。盛先生也时常寄一些诗去，供其成员阅读和欣赏。盛成的作品，用法文写的诗集就有好几部，如《秋心美人》、《狂年吼》……

盛先生坐在我们对面，戴着深色的小绒帽，一口仪征乡音，说起话神采飞扬。他向我们介绍最近从事语义学方面研究的心得，说要写一部《中国人名、地名与马来语义的关系》的论文。并就泰山、曲阜等地名向我们娓娓道来，思维严谨，反应敏捷，很难使人想到这是一位九旬长者。

他的儿女都在海外，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太太李静宜女士也已年逾古稀。盛先生经历人世沧桑，因此仿佛已视功名如水。但当他说起在美国刚入大学学建筑的外孙女时，却兴致勃勃地从书橱里拿出外孙女小时候的绘画作品，频频指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时，他是一位温和善良的好祖父呵！

当我们告辞而出，天已近夜色，但雨已歇了。走在语言学院清爽的院子里，想着这位语言天才的传奇一生，心中充满钦佩。

(1990年1月)

滴血成花 独饮芳香

——记曹禺

张 我 威

一辆“皇冠”小卧车缓缓驶出北京医院，几分钟后，又缓缓地停在首都剧场门前，一位老人从车里走下来。当他被搀扶着走进观众席时，立即被大家发现：“是曹禺同志！”问候、签名、握手……很快，大家发现他面带倦容，便又自动散开，从四面八方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大幕在电闪雷鸣后拉开，曹禺一扫疲惫的神情和迟缓的节奏，时而眼中闪现泪花，时而脸上绽开笑容，时而又压抑着愤懑——他“走进”了舞台，和他几十年前塑造的人物鲁妈、周朴园、繁漪、四凤、周冲等一起，又回到了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散戏后，曹禺在休息室对《雷雨》剧组说：“谢谢导演，谢谢大家，又一代青年演员把我几十年前写的剧本搬上了舞台！”望着曹禺兴奋而又疲惫的状态，望着他那依然故我的真切神情，他过去说的几句话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耳际：“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要讲。她是初春的雪水，夏日的莲花，秋日的黄菊，冬天的霜雪。她贡献给人民以娱乐和教育，人民给予我们滋养与恩情。”

这诗一般的语言，是他深沉情感的流露。这真情实意，贯穿在他 65 年戏剧事业中。

早在 1934 年 7 月，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曹禺，发表了话剧《雷雨》。巴金看了剧本后，被“感动得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当年，正在东京避难的郭沫若，看了日文本后，兴奋地宣告：《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他肯定地评价曹禺“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从那以后，这位“杰出的”作家，连续发表了《日出》、《镀金》、《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改编）、《艳阳天》（电影剧本）、《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从 1935 年 4 月，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首演《雷雨》起，几十年来，曹禺的许多作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美国、朝鲜、匈牙利、新加坡、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日本、越南等国或被搬上舞台，或被送上银幕，或被改编成舞剧；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戏剧家、导演、演员不断研究探索曹禺及其作品的强大生命力。几十年来，曹禺的作品跨越了国界，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超脱了民族的局限，他代表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世界性的艺术丰碑。这座丰碑，为我们争得了国际地位，为我国培养了几代导演艺术家和表演艺术家。

曹禺谈到创作时指出：“写作不只是靠着某个观念，是要流着心血写的。”他的“心血”来源于长年的生活感受——直接的和间接的，来源于思想感情的积累。曹禺出身于封建官僚大家庭，他“不喜欢这个家，这个家的气氛太沉闷”；他曾经在天津、北京、太原、成都等地“目睹了妓女的悲惨生活”，他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既是业余剧团的组织者，又是出色的导演和演员，被人们赞为“演剧五虎”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是校“抗日宣传队”队长和“救护队”队员。他经历了国破山河碎的苦难，目睹了蒋介石反动派的腐败，领略了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等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牺牲精神；他参与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结交了无数不同国籍的友人；他博学多才，涉猎古今中外众多文化艺术领域：从元杂剧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从明清传奇剧本到莎士比亚、契柯

夫、奥尼尔，从戏曲、书法、《红楼梦》、《左传》、《史记》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到用英语教授“圣经文学”……，他苦心钻研、潜移默化、博采众长、化为己用。这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的积累，成为“心血”流进曹禺的作品，影响着他人格，决定了他对北京人艺和中国戏剧事业的深厚情感。曹禺理所当然地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全剧协主席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友联谊会”名誉理事长。

当我们赞叹他的业绩、博学和人格时，他总是在学问面前深感“仰之弥高，赞之弥坚”，一丝不苟地严肃对待。直到1990年1月，就在曹禺即将八十诞辰，已经离休的北京人艺老演员方瑄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谈到莎士比亚时，曹禺忽然停住说：“这个‘莎’字，有人念SUO……”，随即他就让身旁的李玉茹把带到医院的字典找来查阅。很快，李玉茹就查到了答案：“这个字可以念‘莎’，也可以念Suo”。从那以后，方瑄德就经常向我动情地说：“没想到我的老师治学精神如此严谨。他在病中还一丝不苟地要分清一个‘莎’字的念法！”

……想着这些往事，望着眼前兴奋不已的曹禺和围着他的新一代《雷雨》演员，忽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8个字：滴血成花，独饮芳香。

做为后来人，在曹禺老师八十诞辰和从事戏剧事业65周年前夕，就用这8个字献上我的一片心意！

(1990年5月)

黄胄笑谈沧桑事

臧伯良 姜苏鹏

“死活都是中国人”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老天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

黄胄本姓梁，1925 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荒僻的小村。祖父是乡里戏班会头，所以小时候他常画“戏子人”，没人教，全凭自己喜欢。初中只上了一年，就因父亲病故而辍学。为了学画，他背井离乡，过着飘泊的生活。

1943 年，他拜西北著名画家赵望云学习中国画，在战乱中成长。1949 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做美术编辑，从此常到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区速写。1957 年他的国画《洪荒风雪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金质奖章，从而确定了他在我国美术界的地位，32 岁的他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画家。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速写，创作出许多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秀作品，如《打马球》、《出诊图》、《人畜两旺》等，他还为堂兄梁斌的小说《红旗谱》创作了一套插图。

“文革”期间，他含泪烧了一筐的速写，并被强制劳动改造，被迫搁笔。

“文革”结束后，他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77 年病情恶化，致使瘫痪。但他却激情饱满地坚持创作，在病榻上画了一幅 20 米长的《百驴图》作为邓小平访日时的国礼，送与日本天皇。80 年代，他曾在香港、新加坡、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画展，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绘画艺术，使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

“还是改革开放好，”他说：“24 小时可以画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算算从 1949 年到 1980 年，真正画画的时间，也就五六年时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珍惜大好时光。”

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绝口不谈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他几乎是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尤其是“文革”中“驴贩子”的绰号几乎家喻户晓，可他却说：“没什么苦难可谈，我也不希望写这些东西。我的观点，多写些给人以向上的、激励人的文章。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也最了解这个国家。你是中国人，你死活都是中国人。我这人就是一辈子不害人，别人害我呢，我过后也就拉倒了，不愿吭声，没意思。有人说过去运动挨了整，既然是过去，还提它干嘛！人要往前看，有功夫多做点事，多画点画，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怨天，不尤人。打嘴仗，沽名钓誉，无聊。我过去在国外办画展，外国记者问起‘文革’中的事：中国政府都说是十年浩劫，你谈谈你在‘文革’中的劫难。我差不多都回答：没什么可谈的。对于画家来说，生活是绚丽多彩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美好的事物，你要画也画不完，写也写不完。”

人有多高，画有多高

“我画也没画够，用功也没用够，到老了，身体不行了，后悔都来不及。”他感叹道：“在生活面前，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特别的笨拙，画得再好，也就是一点一滴，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黄胄的每一幅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无华。“我的绘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源泉，是根。任何艺术家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

能靠天才，努力不能在房子里努力，离开生活就没有激情，画也慢慢变颜色。”他早年的许多作品，现在看起来依然非常精彩，技法上也非常严谨。“早年随军驻地，在大西北，像柴达木盆地，很荒凉，也很壮美，国家在那里搞开发，采石油。《洪荒风雪图》描述的就是勘探队员在那里风雪找矿的场面。其实艺术这东西首要的是有感情，其次才是技法，有感情就可以创作出真情的东西，如果无病呻吟一味追求形式，没有感受，只为讨人喜欢，创作出的东西早晚要被历史所淘汰。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艰难坎坷，死了大家才认可。好的作品要群众认可才行，不要自己把自己抬得多高。艺术必须有生活，形式主义绝没有出路。”

几十年，黄胄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这也就是他的画为什么从不拘泥一个题材。他说：“中国好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思想踏实，哪儿都不错。戈壁有戈壁的情调，西双版纳有它的味道，江南有江南的特色。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大自然是黄老永远读不完的书。

黄胄的速写，在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都久负盛名。他的画极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尽致，他所画的人物大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一扫传统中国人物画的旧风。最具风情的是那些边疆少女，西方绘画的色彩块面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逻辑。他主张：画家一开始就用毛笔速写，才能与中国画的笔墨功夫结合起来。他创造的写意泼墨与工笔重彩相结合的独特画法，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创造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

速写讲究线条，一笔下去很难是准确的。“但每一笔，你捕捉的对像都是明确的，是有根据的，你都有追求，追求自己看到的生活。物象的美、生活的美反映在你的脑子里，通过你的手刻画在纸上。”黄胄极谦虚的说：“我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主要靠师承，但更主要的是靠来自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接着黄胄阐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根有据的事，说的時候也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有十分功，说两分，别人觉得还可以；说多了，写多了，让人反感。”望着老人两道浓重的剑眉，听着他细细地叙说，句句话语穿人心底，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这一代做人的原则，却由衷地钦佩艺术大师的高尚情操。

曾经有一位国画大师生前说过：“人有多高，画有多高。”此话正是黄胄先生的人生速写。

上下五千年，文化知多少

“中国画是中国艺术门类中一个很深的学科，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够。我国老一辈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等，开始都是学西方艺术的，留过洋，早先对中国画也有看法，认为是少数达官贵人的玩物，但随着对中国画的进一步了解，越老越要学中国画，因为它包容了很多文学和哲学的东西，民族性很强。学中国画不易，中国画历代都有高峰，你老照着高峰学，按它的路子走，就没有高峰了，你只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一个高峰一个高峰的达到，永远没有标准。”欣赏一幅中国画，无形中是在琢磨一部中国的文化史。

“中国艺术不光绘画，收藏也很丰富，无边无沿。不是瞧不起外国人，他们收藏个邮票、茶壶还可以。但你要是搞中国收藏，整个精力投进去也不满足，好东西太多了。”他 50 年代正式开始收藏，那时工资很低，只有 80

多元，钱全用来搞收藏了，卖画也是为了买画及古玩，黄胄的画当时卖的极便宜，也就 20—30 元一幅（齐白石的作品 45—50 元一幅），他欠了不少帐。但他认为这样做很值得。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没有断层。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我们究竟知道多少，一说就是四大发明，实在知道的太少了。作为中国人首先应研究自己，我们祖先曾对人类做过辉煌的贡献。我不反对研究外国丰富自己，但我有这样的信念：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贫。我对有些瞧不起中国的人，非常反感。外国人偷的抢的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一知半解出本书，还说抢救中国文化艺术，把我们看成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我们应引以为耻。我们应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有些外国人把到中国说成是探险，瞎扯！我们用得着你来探险？中国人要自己瞧得起自己。现在有一批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对过去遭到破坏的文化，正在想尽办法补救，研究、挖掘。这次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的，‘93 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一些科学家根据确凿的证据从各方面证明，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源于中国。”

“我和我的一切属于国家”

采访时，黄胄一再强调：“我没什么可写的，写我意思不大，要写就写炎黄艺术馆。”事实上黄胄和炎黄艺术馆是不可分割的。

炎黄艺术馆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民办公助的艺术馆。早在 1958 年，他和邓拓就曾经想联合搞个博物馆。黄胄先生不无感叹地说：“中国搞艺术博物馆的历史非常短，到今年才只有 68 年的历史，国外在这方面时间较长。有一个英国收藏家，临死要求盖个博物馆，并立下一个碑：我属于这个国家，我的一切也应交给这个国家。中国自古就有收藏的传统，但都是传给子孙，或因秘玩而失传，很少能过三代的，这个观念应根本改变。盖艺术馆是一项公益事业，它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办炎黄艺术馆的初衷是在 1987 年，我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陈希同在新加坡对我说，给我办一个人艺术馆。我觉得自己如此而已，要办就办一个综合的，给社会做点事。”黄胄心胸很宽广，在古代的字画上常有这样的题跋：“子子孙孙永保之”。不愿把自己珍爱的东西昭示于众，他却摆脱了这种因循的观念，颇有远见地说：“我觉得这些收藏品，在个人手中没好处，传给孩子更没有好处，放到艺术馆里，让老百姓看，自己想看也可随时去看。”

黄胄诚恳地道出了建炎黄艺术馆的背景：“搞炎黄艺术馆我只是张罗。主要是政府的扶持，国内外朋友的支持，没有这些，我个人是办不到的，还是毛泽东那句话：得道多助。艺术馆投资 4000 多万元，用掉 1650 吨钢，4600 吨水泥，1991 年 3 月正式破土动工，到 1992 年 9 月正式开放，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建成。”

黄胄说起自己总是轻描淡写，当时建艺术馆时，一块砖、一块木，老人都要亲自看，并且住在工地的棚子里，和工人们朝夕相处，一年多几乎没有离开工地。笔者曾多次亲眼见到黄胄浑身是土，拄着手杖，拖着半瘫的身体从工地回到家中的“狼狈”样子。如今建成炎黄艺术馆，大家都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而黄胄却感慨万千地讲出心里话：“建炎黄艺术馆是件好事，只是不该我搞。”黄胄的话确有他难言的苦衷。炎黄艺术馆一年花费需要 150 万元，馆里还需要不断补充新的收藏品，就必须要有收藏基金，这些都需要他亲自去筹集；作为基金会理事长和炎黄艺术馆的“一把手”，有许多烦杂的行政事务等着他去处理；因此，近几年他只有挤出少量的时间

作画。黄胄讲到这里沉思着说：“我非常想搞搞创作。”

艺术大师黄胄究竟是该专心一意地多画些画，还是应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搞炎黄艺术馆，这是许多人争议的问题，也是黄胄非常困惑的事。因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艺术瑰宝，是是非非说不清，也许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1993年8月)

剧人黄宗江 李 方

“九九那个艳阳天那哎哟，十八岁的哥哥要把军来参……”中国没有几个人没看过电影《柳堡的故事》，也没有几个人不被这首美丽的情歌所打动。当年春风词笔的编剧黄宗江现虽年已古稀，可坐在他面前，依然如沐春风。

僻居京西六里桥，斗室之中书卷气扑面而来。尽管一排放满书籍的红木书橱严严实实遮住了一堵墙，可首先引起记者留意的还是壁上一幅主人的写意漫画像。画中，黄宗江脚蹬中国传统戏剧的厚底靴，右手持笔，左手却拿了一面古希腊戏剧中的面具。乍看有些不伦不类，细细品味方悟出画中的深意。的确，黄先生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区区盈尺之间，非如此手法实难以表现。

“我一介剧人而已。”他再三强调。舞台大世界，世界小舞台，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虽已稍稍闲淡下来，但与他坐而谈艺论道，仍感他词锋犀利，出语惊人。

“搞艺术的最忌媚俗，但更忌媚雅。幻想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必不得脱俗；希冀左右逢源者，必落于左右难圆之地。”

老子论道讲究博大浑厚，而黄宗江论道虽未臻此境，但显然他也并不追求这种境界。听先生臧否人物，峭拔无比，绝无人至暮年的平和之气，说到兴浓之时，但见他干脆脱鞋盘腿坐到床上，以手指点当世，白发皆动，斗室之中剑气隐然。遥想当年魏晋名士风度，也不过如此了吧。

人之于世，以一团正气立身。黄宗江心目中，很崇敬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到周恩来总理，他深情地忆起了一件往事。那是1958年的一天晚上，他去长安戏院看一个小剧团的演出。戏无甚味道，他也就看得懒洋洋的，颇有不屑之色，但蓦然回首，却见周总理正坐在后一排上津津有味地观看着。有感于总理对新人新事的支持与扶持，再想想自己，他深感愧疚，并在此后每每以此自警。说到张学良，他也神情肃然，说：“少帅张学良，赤诚做人，于国于民识准的事干起来就义无反顾，对朋友则是清清白白，肝胆相照！”

黄宗江以童年对戏剧的兴趣投身此道，以勤奋和天资终有所成。从《农奴》、《海魂》、《柳堡的故事》到《柯棣华》、《秋瑾》，耕耘的足迹历历在目。记者探问他目前正在做什么，曰京剧《贺龙刀》。“贺龙当年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他能说清楚革命是什么吗？还不是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的嘛！”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搞文艺创作的，也要有这种一把菜刀的精神，才能出于前人而胜于前人。”

“于局限中做最不局限的文章！”他又一次语出惊人。其实一个人有所局限是难免的，客观条件的局限也是存在的，关键看怎样突破这些局限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正是黄宗江毕生的追求。

虽自称剧人，但他兼职文人亦无可。出于文人雅趣，他曾向黄胄索画二十年来果。吃逼不过，黄胄居然打来欠条一张，云：“二十年前欠宗江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若非黄宗江风趣，黄胄这“高利贷”欠条是万万打不出来的。

黄宗江谈人论事，有一下子记不起的，就急匆匆地跑到厨房大喊：“若珊，某某你还记得吗？”如此反复数次，他的妻子阮若珊也来到客厅就座，以免他再跑。望着相濡以沫的妻子，他毫不掩饰那份深情，回头对记者说：

“你知道吗？那首《沂蒙山小调》就是若珊写的。”边说边打开录像机为记者放《沂蒙山小调》的录像带，看到好处时，他就以掌击节，完全沉浸在那种优美和纯朴中。

夕阳余辉不觉已渐渐投入室内，这才使人感到一种日暮的氛围。但这氛围与主人的神采是那么格格不入。因为，黄宗江有着一颗年轻的心，一股精进的锐气。就凭这一点，想他晚年所获也必然丰硕。

(1992年3月)

谡容有个快乐的家

杨 飞

如果你有意去谡容家，她会热情地告诉你：“我住东城煤渣胡同三号，欢迎你去作客！”等你跑到东城打听煤渣胡同三号，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用手一指：“嗨，就谡容、梁天家那儿呗！”一次，我七拐八拐找到了谡容家。噢，她们家住的那栋楼和中国星级最高的王府饭店墙脚挨着墙脚。

谡容家是一个快乐的家，也是一个出“大腕儿”的家。

谡容算是这个家庭大腕中的大腕。她当初刚刚一脚踏上40岁的门槛，就以一部《人到中年》的小说在全国家喻户晓。从此，她长篇、短篇一部接着一部，不断加固加高知名度的大堤。

她的小儿子梁天，从小就有强烈的表演欲。上幼儿园时，他就与上一年级的哥哥梁左关在屋里演活报剧。打声、骂声、哭声连在一片，爸爸妈妈在门外急得团团转。

谡容的大儿子梁左，读大学中文系时就偷偷学妈妈发表小说，后来又一个劲儿地编写电视剧、写相声，文艺界称他为中国知名的相声作家。他的作品《虎口遐想》让本来就已出名的相声演员姜昆更加走红。

谡容的先生范荣康也是个大名人，比妻子、儿子出名都早。他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前参加革命，是写社论、政评的老手。而今离休后，埋头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梦中的女孩》、《不了情》等一系列言情小说，他说：“大陆人会争着读台湾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而大陆却很少有人写言情小说。现在我专攻言情。”一支写了40多年政治评论的老笔，猛然转身奔向言情小说，那口气，那用语扳得过来吗？范荣康说：“我这叫重操旧业。”原来，40年代他就在上海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小说。

谡容家是充满感情、洋溢着爱的现代家庭，而且现代得整个家像个松散的沙龙。谡容说：“当儿女的在父母身边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从属的地位，孩子们大了，还是与父母拉开点距离好。”范荣康说：“与儿女们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朋友聚在一起就是玩玩，热闹热闹。”梁天说：“爸妈都是忙人，没时间儿女情长。”谡容的两个宝贝儿子早就各有各的窝。她若临时想见梁天，必须先去影视界打听；找梁左，就得先找到姜昆。

节假日，儿女们想孝敬父母，得先打电话看父母有没有时间。全家人想在一起亲热亲热，只能靠几个大节日了。每年最有把握的就是中秋和大年三十。就是这么一线光明，也由于谡容想“跟形势”当“改革家”差点儿被她弄得不光明了。1992年春节，她将儿女们回来吃团圆饭改成二老下基层慰问辛苦一年的儿女们，免得他们拖家带口地跑。结果，第二天梁左、梁天还是带着妻子、孩子来了，说：“当儿的不能不给爸妈拜年！”这位大作家面对儿女的亲情，不得不勇敢地宣布脱离群众的“改革”彻底失败。

谡容在家里对孩子们从不说这不行、那不行，也从不发号施令，她尽量让孩子们感觉到自由。孙子们玩得高兴，突发奇想要在奶奶家吃饭的桌子下面睡觉，谡容忙拿来毛毯、枕头。梁左、梁天反对，谡容说：“要让孩子做最快乐的事，给他们将来留下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孙子们拍手大叫：“世界上只有奶奶家最自由。”

谡容家完全称得上是电脑之家。全家共有3台电脑，实现了写作现代化。北京的作家中谡容是最先使用电脑的。她想“赶潮流”更新换代，决定将原

先 8000 元买的那台电脑给梁左，没想到立即遭到全家反对：“现在是商品社会，那么贵重的东西哪有白送的？”谿容说：“那好，2000 元卖给梁左。”而买主却嫌开价太低，甩出 3000 元将货搬走。

在作家中，谿容算得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会做服装，出国穿的衣服都自己做。她很会做菜，特别会烧鸭子。文艺界的老前辈陈荒煤、夏衍都专门到她家吃过她烧的鸭子。她还在冰心老人家中露过一手。

谿容还爱好绘画。她书房里的电脑与很气派的画案背靠背，写作累了，转过身就抄起画笔画画儿。她写小说笔触细腻，而画画却是豪放地泼洒大写意。前不久，谿容突然宣布以后写作之余不再玩做菜、做衣服和画画了，要“玩玩”公司！

谿容早有想法：现在的人们都爱看电视，读小说的越来越少，这种趋势一时难以扭转，必须用电视的形式将当代的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送进千家万户。梁左有一次对妈妈说：“谢晋都开公司了，我们家写、编、演都有，完全可以开个影视方面的公司。”母子俩一拍即合，建议家里立即组成董事会。梁天提议推选爸爸当董事长。谿容向他们很详细地讲解如何当董事长，因为她对此不仅有过认真的研究，而且有过亲身的经历。梁天又觉得妈妈是最称职的董事长，立即改口说：“还是让妈妈当董事长，给爸写个致敬电，请他光荣退居二线当董事。”1992 年的初冬，中国第一家由全部家庭成员创办的“快乐影视中心”正式成立。谿容任董事长兼“快乐影视中心”总经理。范荣康、梁左、梁天和女儿梁欢为董事会成员。

可以相信，这个由快乐家庭组成的“快乐影视中心”将会给中国的千家万户带去更多的快乐。

(1993 年 6 月)

活跃于台湾政商两界的巨子辜振甫

丁 乙

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会长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董事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以后两岸有关方面授权民间机构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备受世人瞩目。辜振甫，一时间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人物……

超级富豪

名列台湾第四超级富豪的辜振甫，在岛内政、商两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上，他受国民党高层青睐，现在是台湾“总统府资政”、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在1993年8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李登辉指定为中常委，是台湾工商界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唯一的代表人物。

辜振甫又是工商界的巨子。他手下的“和信集团”拥有近百家企业，其中包括了以台湾水泥集团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和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的服务业。1993年统计财富净值超过500亿元新台币，是全球180个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翁之一。

出生望门

以辜氏今天的身份地位，在台湾可谓崇高显赫矣！然而，他为何可以在台湾政、商两界如此“双管齐上、游刃有余”，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辜振甫1917年1月6日出生于台北市，祖籍福建惠安。辜家在庸康熙年间迁台后，世居彰化鹿港镇。其父辜显荣在台湾拥有6000多公顷农田，300多公顷盐田，此外，还拥有大片的茶园、凤梨园。在台中、云林、台南等县设有18家糖厂，拥有糖、盐专卖的权力，是台湾当时三大地主之一。

舍家苦读

辜振甫在1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从小就聪明过人而深得父亲疼爱。他少年时代即随行担任老父的日文翻译，从中一点一滴地继承了父辈的人脉关系。1937年辜显荣去世。他继承了父业，那时年仅20岁，刚读大学二年级。但此时此刻他已看到辜家的衰微之势，明白靠守住已有的家产难以开创大业，知道不接受磨练，“后患无穷，前途有限”，于是他毅然舍弃家业，负笈东瀛，到东京帝国大学潜心学习财经及工商管理。

在日本求学期间，他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从帮人端盘子、抄文章做起，深入到生活最底层，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辜振甫求学不仅仅是为了做学问，更是为了日后如何光大自己的家业，所以在课余时间，他遍访三菱、三井等日本众多大型企业，发现这些大企业集团都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重视发挥人才的作用，这对他日后的影响很大。

善把机遇

1943年，辜振甫学成回到台湾致力发展家族企业，担任了10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及全台官盐运输总馆理事长。国民党逃台后，为摆脱经济困境，于1952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鼓励大地主以手中的土地换取工矿、农林、

纸业、水泥等企业的股票，让农民优先承购土地，使“耕者有其田”，辜振甫认识到这是发展自己事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抓住机遇率先响应，卖掉了手中大部分的土地，换取了台泥、台纸、台林、台矿等4家大公司的大量股票，摆脱了父辈在土地上经营的旧模式，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全新的观念开创了辜氏家族重新繁荣的历史。

1954年，辜振甫任台湾水泥公司协理，5年后任总经理，奋斗到70年代，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跃成了台泥的大家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创立了通运仓储、光和耐火工业、士敏土工程等6家子公司，组成台泥集团企业，成为全台当时最大集团企业之一。

60年代，他发现当时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供需矛盾很大，企业经营缺乏资金，银行存款又苦无出路，于是他大胆提出“资本证券化，证券大众化”的主张，并率先创立了台湾证券交易所和中华证券投资公司，70年代改组为“信托投资公司”。台泥、信托，便是今日辜氏事业的两根擎天柱。

“把握机会的人就能成功”，辜振甫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格言。

谦冲致和

辜振甫掌管的企业在台湾都很知名，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他以“开诚立信、谦冲致和”的信条来管理企业。他不搞特权，以员工的利益为利益，要求员工们行得正，坐得稳，决不要求为了公司的利益做违背良心的事。他尊重人才，信赖人才，充分授权给下级。他曾说“让员工有一定的自主性，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他这么说，也这么做，让部下充分发挥才干，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从而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正因为如此，以致于他常年在台为台湾当局奔波，也丝毫不影响家族企业的效益。

雅儒机敏

与辜氏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是雅儒机敏。他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措词典雅，一点商人味也没有，这种性格使他大获益处，不仅政界高官对他完全撤除了“政商勾结”的心理防备，就连往来的生意人也常常忘了他是生意场上的“敌人”。

“放长线，钓大鱼”是辜振甫人际交往的原则。在商战中习得的机警敏锐，使得他在台湾政坛上也连连告捷。辜振甫在政经发展中，虽未正式出任“政府”官员，却深受当局倚重，历任“总统”都给予了他很大殊荣。当年他卖田买股，获聘为“经济部”顾问，并曾客串做过蒋介石的日文秘书，并凭他在国际商界的广泛关系，数次受托携巨款赴外活动。如在日台断交前的风声鹤唳中，他受托到日本秘密游说，然而大势已去，只得受命签订断交后的议定书。中美建交后，辜振甫又以其身兼台湾工商界民间身份到各国游说，企图争取“国际活动空间”。他“经年累月，忘我开展‘经济外交’”，受到了当局的赞赏。1969年，辜振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以后至今一直是国民党中常委，使之政商两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痴迷京剧

辜振甫的文化素养高，他精通日文、英文，懂音乐书画，擅写作诗文，著有小说《浮云》、诗集《鞲鞲杂存》及《辜振甫言论选集》等。最与众不同，他还痴迷京剧，是台籍大老中极罕见的京剧迷，不仅台下听，还

以票友的身份上台票戏，年轻时如此，甚至到了1993年76岁高龄了，仍粉墨登场，唱了一段《空城计》。

辜振甫对京剧的痴迷从小有之，稚龄时常到父亲开设的戏园子里听戏，长年的耳濡目染，使京剧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环。年轻时，每逢大陆各地有精彩好戏上演，他甚至不远千里渡海前往一偿心愿。票友听戏久了，总要自己哼上几句，而粉墨登场票戏，尤其至乐开心。早年辜振甫对余派别有所好，对余派大戏如《二进宫》、《大保国》等是常听不厌。甚至私下还聘琴师，吊嗓子，习唱腔，练身段。据说辜振甫年轻时上台票戏，扮相俊逸，唱腔韵致也很好，颇受好评。

1993年5月9日，“汪辜会谈”刚结束没有几天，辜振甫在台湾“国家剧院”演出《空城计》，为年老失依的台湾京剧艺人义演。这次义演的时机非常好，大陆的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在此前后都在台湾献艺，辜振甫非常高兴，他带着骄傲而又惶恐的心情说：“各位多捧场了！”

伸手示好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6分，历史已铭记下这一刻，举世瞩目的海峡两岸有关方面授权民间机构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4楼会议大厅举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面对中外200多名记者，同时伸出手来相握致意，这是两岸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他们的握手，是两岸隔绝40多年来最高级别的正式握手，代表彼岸示好的手是辜振甫先生伸出来的，两岸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这次会谈是在两岸有关方面和人士长期共同努力下促成的，无论会谈成果大小，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辜先生曾经说过：

“海峡两岸不仅有地理、历史、文化的渊源，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台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切不断的。”“如何消除彼此间多年来的隔阂与离异，这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企盼海峡双方都能以开阔的胸襟、理性的了解、高度的智慧、务实的态度以及稳健的步伐来加以推动。”

自“汪辜会谈”以来，两岸人民的往来一天比一天频密，经贸交流一天比一天增加。辜老先生作为彼岸政商两界的巨子，如何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影响，继续“为两岸交流秩序化、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做出贡献”呢？

两岸人民正关注着！期待着！

(1994年2月)

中国影视界的“第一把剪刀”

——记傅正义

方 非

被誉为中国影视界“第一把剪刀”的傅正义，现在已不是只有导演才知晓的名人。他的名字在 100 多部电影和 200 多部（集）电视剧的字幕上映出，人们从一部部影视名作的一组组剪辑得十分精彩的画面中，感觉到这把“剪刀”的非凡与神奇，开始越过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构思，认识了这位劳动在幕后的电影艺术家。

傅正义 1925 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5 岁进入电影厂，20 岁开始电影剪辑工作。解放前，他参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片的剪辑工作。此后，他独立剪辑的《三毛流浪记》，是成名之作，标志他剪辑技巧的成熟。解放后，《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著名影片一部接一部地在他“手下”诞生。在最近这 10 年里，他剪辑的电影《伤逝》、《知音》获得了中国电影剪辑史上的最高荣誉——金鸡最佳剪辑奖。电视剧《四世同堂》、《红楼梦》等鸿篇巨制，更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40 年来，他的生活历程是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道路紧紧连在一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片的制作，最后是一剪刀一剪刀地“剪”出来的。剪辑，是鲜为人知的幕后艺术，却是影（视）片制作决定性的最后一环。因为靠剪辑艺术，好的片子可以锦上添花，差的片子可以弥补不足。在长达 36 集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里，每组动人的画面都显现着傅正义的艺术匠心。给观众留下很深印象的黛玉告别江南、乘船北上的一场戏中，他不是一般化地用黛玉的愁容、眼泪、无休止的哭泣来表现黛玉的离情哀愁，而是使用电影蒙太奇多镜头互相撞击的手法，渲染烘托，于是出现在观众视听里的是：黛玉低眉凝思、满面含愁的特写，老父林如海劝慰的画外音时远时近，不时掠过船帆的白云、飞雁和悄悄逝去的流水……这就创造了一个惆怅、哀伤而又悠远的意境，把观念带入一种同情、关注黛玉命运的情绪中。而黛玉进府一场戏，傅正义采用对比和反衬的手法，把贾母、探春等人审视黛玉的镜头和黛玉低头看众人的镜头交错连接在一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黛玉那种初入贾府的复杂心情和黛玉性格中“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敏感，都被细腻、传神地表达出来了。当电视连续剧《郑和下西洋》拍完全部镜头后，摄制人员才发现海上行船的镜头竟然一点动感也没有，这如何办呢？还是请“第一把剪刀”来吧。于是，在傅正义那双能呼风唤雨的手下，凡是背景上看得见山的镜头都被剪掉，却轻描淡画地点了几个海浪、鸥鸟、浪涛撞击船头的镜头，居然使船在海上乘风破浪起来。这一“手脚”做得巧妙干净，不仅“蒙”过了无数观众的眼睛，该电视片还夺得了电视剧“金鹰奖”。

傅正义就是这样在剪辑台上工作了 40 多年。剪辑台是他艺术创造的天地。他无声无息地为中国电影艺术奉献着自己的智慧、才思、想象和热情。他那把剪刀愈来愈神奇，剪辑艺术日臻完善，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他获得的金鸡奖的颁奖辞中说：“傅正义同志在《伤逝》、《知音》中的剪辑创作，准确流畅，有创造性，尤其是《伤逝》旁白画面的剪辑更见功力。”他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

傅正义在剪辑实践中，摸索了一套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他提出“剪出

戏来”的主张，并阐述了剪辑创作的基本标准：1.内部结构符合逻辑；2.外部结构达到流畅。他认为实现以上标准的关键是大至一部影片、小至镜头的衔接、场景的转换、段落的构成都要在总体构思总体把握下进行。他还提出了影视片剪辑的三大因素理论，这三大因素即：动作因素、造型因素、时空因素。他认为，处理三大因素是剪辑艺术创作的基本功。他的这些理论观点，都已著成文章，发表在《电影艺术》、《电影技术》、《中外影视》等 10 余家刊物上，他的著作《实用影视剪辑学》即将出版。

为使中国影视剪辑事业后继有人，傅正义还做了大量的培育人才工作。这些年，他在各艺术院校和剪辑进修班讲授电影、电视剪辑艺术与技巧 300 多次，培训的人员达 2000 名之多。

傅正义现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剪辑师，中国剪辑学会会长。他还被海南国际影视公司、深圳影业公司、河北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影视单位聘为艺术顾问，工作十分繁忙。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记呼吁广播学院和电影学院设立剪辑系，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为从事电影、电视剪辑工作的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

(1990 年 1 月)

亲历一至八届政协会议的元老 ——记葛志成 任晓路

一至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像一幅历史长卷，已经储存在葛志成的脑海中。第八届政协大会之初，我们在香山饭店，找到了这位亲历包括新政协筹备会在内的一至八届政协会议的政协元老。73岁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葛志成，对这幅长卷的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记忆犹新。远郊的宁静和清新的空气，仿佛也给这幅历史长卷增加了几分清晰度。

毛主席向我走来

1948年，一直在上海搞教师民主运动的葛志成，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离开上海辗转来到解放区。解放区明朗的天使葛志成觉得心情舒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1949年初，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葛志成就是代表之一。当中国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会场，全场轰动，几十个国家的与会代表用持续几分钟的鼓掌和“中国——毛泽东”的口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葛志成当时心情十分激动，是的，当东方睡狮猛醒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将震惊。葛志成继续回忆道：“我们一共40位代表，回来后，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政协会议。”

随着葛志成缓缓的语调，他的记忆点定位在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这是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始，进行了5天，选出了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推出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在大会休息室，葛志成感到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正向自己走来，他眼睛一亮，“是毛主席！”年轻的葛志成从心里喊了出来。当时的葛志成年仅29岁，显得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毛主席走到他身边，和他握手并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葛志成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毛主席显然想起来了，接着问：“哦，你是从华东来的吧？”葛志成既惊奇又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竟然知道我这个小人儿。“你们那边的工作好啊？”毛主席面目慈祥，语气温和，像是聊家常。葛志成回答说：“我是搞教师团体的，工作很好。”毛主席又说：“国统区是第二战场，教师运动很重要哇。”葛志成是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理事长，上海教育界同人团体联合会理事。当他向毛主席介绍自己是搞小教联的时候，毛主席笑了：“我也做过小学教师。”毛主席的亲切随和，给葛志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时的情景。”

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相当繁复，除了拟定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人选以外，还要起草组织条例、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等。葛志成说，我总是能看见周总理忙碌的身影，他与各党派人士反复协商讨论，工作做得很细。“他可真辛苦。”葛志成由衷地感叹道。

第一届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葛志成向我们特别解释说：“筹备会的时候是叫‘新政协’，为的是和国民党的旧政协区别开。等到一届政协会议正式召开时，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加上了‘人民’两个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届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三个文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葛志成说：“这次大会主要是通过共同纲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身。还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确定北京为新中国首都。”葛志成盛赞这次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大会“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是黎明前的一抹霞光。”

事事有商量

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与会者分三个层次：常务委员、委员、代表和候补代表。葛志成是作为候补代表身份参加一届政协的。二届政协以后的与会者则分两个层次：常委和委员。葛志成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政协常委。从一届到八届政协会议，葛志成场场到会参加，从没有缺席过。他为这一点感到自豪，他说：“我是人民政协的见证人。”

葛志成当然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先后分别担任第一届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后，人民政协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进入六届、七届，政协工作逐渐走上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在邓颖超、李先念两位主席的领导下，围绕改革开放这个中心，以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为重点，积极开展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成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主旋律。谈到本次大会的印象，葛志成总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大会气氛热烈，许多新委员思想活跃，所提意见和建议既科学又切中时弊，青年委员给大会带来了活力和朝气。

葛志成向我们比较了历届大会的异同，他的突出的感觉是“现在的政协体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活动比过去丰富多了。”过去政协是设一些工作小组，对某些问题协商研究。近年来则设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如经济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科技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宗教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等等，更大范围地吸收、网络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这样各方面的人士都有，能听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和好的建议，使工作更趋完善起来。

葛志成本人是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历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所以他非常重视和关心教育方面的问题。在前两次政协会议上，他代表民进在大会发言，主要是谈关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的问题。这次大会，又代表民进作了关于大力加强基础教育要落在实处的大会专题发言，呼吁依法治教，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保证发展教育这一手也不软。前两次提案，中央已作答复，国家教委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文件中作了很大程度的吸收。葛志成深有感触地说：“我看现在党派的意见越来越被重视。政协会议不但有委员个人的提案、发言，还可以有以党派名义的提案、以党派名义的发言，比从前进了一步。”

葛志成特别提到中共中央 1989 年 14 号文件，他认为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总结”。文件的精髓也是葛志成参加一至八届政协体会最深的三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一定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此其一。第二，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民主党派之间也合作，这样无论是搞经济建设还是抵御外敌，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第三就是政协协商。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很重要、很好的形式。重大事件都协商、讨论，各类文件才得以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这种时候就要

事事有商量，可不能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没商量’哦。”（笑）

我不怕录音了

笔者曾听说一个传闻：1959年，也就是反右以后的那次政协会议，有些委员在衣服口袋里装上一个瓶子，每当自己按捺不住，即将口出“狂”言的时候，便赶紧将手伸进口袋，摸一摸瓶子，以提醒自己“守口如瓶”。葛志成回忆道，政协有一段时间也谈协商，但更多的是强调学习、改造。好些人还心有余悸呢。像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次政协会议，许多被整的人，还没有正式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就恢复了政协委员身份。他们当中，有的人高兴、激动，有的人则观望，不愿意多说话。“他们有三怕：怕说错、怕记录，更怕这个了（指着桌上的录音机，笑）。”也难怪，那时候，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人们说话都战战兢兢、三思而后言，深怕哪一天就惹麻烦了。葛志成接着说：“现在没有这种问题了。不用怕录音，说错了也没关系，是认识问题。如今也不搞运动了，没有被整的顾虑，大家基本上能畅所欲言。”葛志成对全国政协会议的政治协商气氛和民主开放程度还是基本满意的。“这就一点而言，全国政协是在朝前走的。”葛志成的语气十分肯定。

香山饭店大堂幽雅祥和的环境，使葛志成久久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之中，昨日的风云印刻在他瘦削而坚毅的脸上。当这位满头银发的政协元老，向我们讲解一至八届全国政协会议这幅历史长卷的时候，他那并不伟岸的身躯也显得高大起来……

（1993年5月）

韩美林红尘有爱 姜苏鹏

据说，印第安人有三道茶，第一道苦若人生，第二道甜如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其实，这每一道茶都是人生的一处风景。

他看起来很平常，像一个大艺术家，谈起自己也只是轻描淡写，我只有细细地去品味他说的每一句话，品出来的滋味竟有如印第安人的三道茶。

能尽人心下佛心

他曾立下宏愿：在有生之年，铸塑 1000 个佛头。该不是看破红尘，要出家？其实不然，“我搞的是宗教艺术，而不是宗教，”他慨叹道：“我只是希望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地层里挖出我们这代人的东西，不只是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和塑料玩具……现代中国的艺术家，应为后代留下点值得看看的艺术品”。

自古山东出圣贤，但他不是圣贤，而是艺术的殉教徒。在他的家乡济南千佛山上已没有一尊佛头了，他怀着一腔虔诚，准备在这儿安放 1000 尊佛头。后来有人攻击他是在搞迷信活动，他只好另找他乡，安置这 1000 尊佛头。“现在基本选定的地方是杭州的陵山。我还准备继续选地方，才跑了 4 万公里，还要跑 10 万公里。”他说：“佛教讲的四大皆空，文物部门讲的是尽力保留，它们是矛盾的。我则是站在文物部门的立场上，用艺术家们的眼光来看宗教艺术。中国有几千年的宗教艺术，但历代浩劫对它的破坏是惊人的，山西 1.3 万座庙，现在只剩下 31 个，绝大部分都被砸了。南京栖霞山 2000 多个佛像几乎都无佛头。”说到这里，韩美林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难道我们留给后代的只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个悲哀的回忆！”他铸塑的佛头像，不但融和了中国两千年的宗教艺术，有着中国传统的形象，还揉进了印度、缅甸、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宗教艺术，甚至原始艺术、印加文化、玛雅文化。铸塑这 1000 尊佛头像将动用 200 个雕塑家，5000 个工人。

山东还出梁山好汉，他就是一条好汉。他淡然地说：“我这人不轻易讲苦难。有时我给佛磕头，五体投地，真想大哭一场，在佛的面前倒苦水，绝不在人的面前道苦难。在九华山，我看到用手指抠出的山洞，有人在里面修佛修身，都成干尸了。我崇拜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信仰佛教。人可以不信佛，但不能没有佛心。佛心是一种爱心，能尽人心亦佛心。我并不逃避现实，我很正视现实。”的确他很入世。

改变缘于对人性的认知

他坐过 4 年零 7 个月的牢，下放劳动 14 年，尝尽了人生的苦涩。”我刚出狱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那么可爱，画了一大批可爱的小动物，就是笔下的小老虎也只是虎头虎脑的，绝不虎心。”现在说起来，仍给人一种甜美的感觉。他把生命的喜悦、未泯的童心倾注于作品里，呼唤着人们的爱心。

但他终于痛苦地认识到，人不但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凶恶的一面，所以他不再画小动物。七八年前，他就开始画牛，画马，画老虎。他笔下的牛浑身都是肉，他说，谁也不敢骑它，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凶悍，就是西班牙斗牛士也会心悸。这些画依旧保持着 he 独有的装饰性风格，但笔锋却含着凝重和犀利。

他除了绘画，还一头扎进了古陶瓷的王国，他以 1300 度窑火同等的热情，烧制出他对生命炽烈的感受。他最钟爱钧瓷，它的釉色神秘得令人陶醉。在他家随处可见这些激动人心的罕物。古语道：“钧瓷不过尺，过尺就是宝。”他的钧瓷有的都过了米。

搞陶瓷实际上很苦，钧瓷很讲究，烧出一件很难，烧窑经常是“十窑九不成”。如要烧出一窑来，他和大家都激动得要命，跪在尚有 180 度余温的窑里，又哭又笑。

日本陶瓷大师专程拜访他，抚摸着钧瓷爱不释手，要他随意开价，他却笑着说：“不卖，多少钱也不卖！”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是国宝级的。

他拥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工作室，“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全国唯一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工作室。谈起他的工作室，他深有感触：“我们这些人干起活来，男的的女的都是那么玩命，吃着馒头，就着汽水，唱着《红高粱》，照样干！正如这幅对联所描述的，‘英雄笑忍寒天上牙打下牙，好汉不怕茹饥前心贴后心’，横批‘上下贴心’。可惜呀，我们连个厕所都修不起来，搞事业真是很难。由于不会经营屡屡赔钱，大连的‘群虎’赔了 17 万元，济南的‘天下第一牛’赔了 48 万元。我最好的徒弟也离开我了，他临走时含泪对我说，韩老师，我没办法，我有老婆孩子要养呀！”在大连“群虎”的剪彩典礼上，韩美林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一向是流血不流泪的汉子，那天下着大雨，他爬到石雕的最高点，挥舞着一双拳头，仰天嘶喊：“老天有眼哪！……”

再难，他干得依旧令人骄傲，令世人瞩目。他的工作室每年都推出一件世界级的作品。前年是大连老虎滩的花岗岩“群虎”，全长 36 米，整座石雕总重量为 4800 吨，最长的一只虎，可站 140 个孩子。去年是济南金牛山公园塑出的 15 米长的“天下第一牛”，由 60 吨紫铜锻造而成，今年将在淄博锻造一只高 20 米的不锈钢雕塑“金鸡报晓”。在这一系列城市巨型雕塑里，凝结了他全部的悲哀与愤怒，以狂飚之态迎接着世俗的挑战。明年他将推出另一惊世骇俗的作品，宽高各 50 米的“西楚霸王”，用不锈钢锻造，立在长江的乌江口，低头看长江，抬头望黄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正是他人生心境的另一种写照。

什么艺术，去他的吧！

“什么艺术，去他的吧！就像小时候唱戏玩票，做票友，今天喜欢唱评剧唱两句，明天又喜欢唱京剧，说不定过两天又喜欢唱大鼓，我搞这些东西都是闹着玩，觉得自己过瘾就行。”

“我不是谦虚，我总感到我搞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像是学来的。我烧的那些瓶瓶罐罐，也不是现代陶艺，只不过是传统造型罢了；那些雕塑也只是玩得大发了一些。”最终想搞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他评价自己：“就像小孩，上午做的事下午就不承认了。”艺术本来就是兴之所致。

其实不难懂，艺术已是他生命的内容。他对艺术的怀疑，正如人们对生命的质询。他说过：“绘画、雕塑、陶瓷犹如人手的十指，割了那个都让我心痛。”他画牛，画过上千头，绝无一张重复，全是默写。他搞的“群虎”雕塑，所有石料从山东莱州运往大连，足足用了 160 个货车车厢。

他说：我的激情来自压力，灵感来自天赋。”有一天，他灵感突发，抑制不住的激情，使他竟画了 163 张画，不重样，而且他自认为都非常的漂亮。

他说：“一般来讲，我在秋天的感觉好，画的最多，夏天画的相对少。”难怪 56 岁的他，已识尽人生愁滋味，才道天凉好个秋。他说他的压力还来自他的“对手”。有人说他不会画人，他要画就画女人体，且全是默写；有人说他不会写字，他要写就写大篆；有人说他只会画“豆腐干”，他一画就能画到 25 米长，做一只老虎能 20 米一个，做一个佛头高达 138 米。他就是倔强的个性，从来不服输。

讲起小时候，有一种淡淡的温馨。“小时候，我们年级六个班，三个美术教师，对我的启发很大。教我们话剧的老师，是赵丹的老师也是江青的老师。我演过话剧，演《雷雨》里的周冲、《龙须沟》里的二嘎子，自己觉得满不错。唱过京剧《苏三起解》，唱的是青衣，反正最后还是选择了画画。”艺术是相通的，但人生只能有一种选择。

你说这两个女人，我喜欢哪个？

有人说，每一个杰出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法则对他似乎格外的相悖。

“我有过两次很惨痛的婚姻，我害怕了，害怕再找一个不合适怎么办，人是越离越怕。我韩美林也有七情六欲，说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是瞎话，我需要一个女人，一个爱人，谁不希望一个理想的女人在身边呢，又可以当模特，又可以做妻子……我独身 5 年了，我们家是单身汉宿舍，孩子是单身，我们家的小狗、小猫都是公的，也是单身。”

“人一旦有了名气，又是独身，介绍对象的也就很多。但我想爱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老天爷造就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是要他们组合的，上天注定的缘份。在我看来，男人要刚，女人要柔，男人铤而走险，义不容辞，像城墙，但男人不能缺少爱心。女人要柔里带刚，以柔为主。我讨厌女人瞪眼，我不喜欢女人搞大事业，但也不是说女人要做男人的附庸。”

“女人的标准很难讲，但也很简单，具备一个女人的特点就行了。艺术家很重视形象，但内在的东西也很重要。作品可以修饰，人的感情是不应有任何雕琢的。我身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没看过我画过一张完整的画；另一个女人一上午就从头到尾看我画完 33 张画，后来她真有急事非得走，她说：‘你不准再画，等我回来才可以画。’她走了，我忍不住又画了 8 张，她回来埋怨我说：‘你怎么搞的。’我听后打心里高兴，她理解我。你说这两女人比起来，我喜欢哪一个？”

他的红颜知己是不是传闻中的著名影星潘虹，我忍不住要问，他坦言：“我和潘虹的事，报刊都报道烂了，我们的确很好，但都是搞艺术的，谁也没有时间，成不了夫妻，就像两条平行线。我天天弄牛、弄老虎、弄大公鸡，怎么去支持她？她天天拍电影，怎么支持我？她只是我的铁杆好友，现在我们还经常通电话，有时一打电话四五十分钟，柏拉图式的爱情当然受不了，但两个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形式上的婚姻又有什么意思呢。”他表情黯然。他说：“我喜欢她演的《人到中年》，不喜欢她演的《独身女人》。”毕竟潘虹已是一个 39 岁的女人，一个成熟的女人。问他，潘虹是不是他感受最深的女人，他说无可奉告。

艺术是诠释他生命的最有力的注脚，而生命不过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即使有一天所有的悲欢都将离去，相信人世间最难忘却的，依然是曾有过的

(1993 年 7 月)

杰出藏医与天文历算学家强巴赤列 多吉占堆

强巴赤列成为 1991 年西藏十大新闻人物之首，不仅是因为他 1991 年被选为全国科协第一位少数民族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对藏医和天文历算学的杰出贡献。

少年即怀凌云志

强巴赤列是拉萨人，1929 年出生在古城中心八廓街一个藏医世家，祖父多吉坚赞、父亲贡觉维色都是拉萨的名医。

强巴赤列才 3 岁就随父学藏文。6 岁时可以读懂一般的藏文书。13 岁那年，父亲不幸故去，母亲很希望儿子进入布达拉宫的俗官学校成为一名达官贵人。可小小的他受到长辈的后发选择了父辈的基业，要把解除人间苦痛作为自己毕生的神圣事业。

于是，强巴赤列正式从师于现代藏医巨擘钦绕罗布大师门下，在门孜康（藏医历算学院）接受藏医正规的九年制教育。

在门孜康里，学习分三步进行。头 3 年作为入门和打基础，学习天文历算、古藏文、修辞学和数学。中间 3 年要背熟、理解《四部医典》全套 20 多万字的理论。后 3 年则在老师指导下实习。由于勤奋好学和钦绕罗布大师的悉心栽培，强巴赤列 20 岁出头已是精通藏医和天文历算理论，能够独立采制药材，背起药箱为病人治病了。

1953 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年，强巴赤列参加了革命工作，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钦绕罗布大师以喇嘛居多的学生中出现了新一代共产党员。

在学术领域内辛勤耕耘

强巴赤列从医之路并不平坦。60 年代中，正当他埋头进行藏医临床和历史研究时，“文革”开始了。

藏医学被认为是宗教的产物，逐出了科学的殿堂，强巴赤列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赶出了藏医院，去扫地、种地。

但是，他豁达开朗。那段时间里，精神上虽然受到很大刺激，却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他钻在一间小屋子里苦心研读起医学经典。在他“靠边站”的日子里，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为藏医教学编写了《基础医学》、《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妇科学》、《儿科学》、《方剂学》等一套通俗教材，达 20 余万字。这套书如今不但在西藏，而且连青、甘、川、滇、内蒙也都用于藏蒙医教材。80 年代以来，他已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于宗教意识对学术的影响，过去始终把藏医学的产生定于佛教传入时的吐蕃初期即公元 4 世纪。强巴赤列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藏医学产生于公元前 4 世纪西藏苯教像雄文明时代，常松·杰普赤西是当时最早的一个名医。这一新论断，把藏医学的发展历史向前推了 800 余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四部医典》被公认为是藏医学的基石，拥有很高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关于其作者却争论不休。许多国内外学者认为它是从印度传入的，似

乎与西藏人无关；而一些藏族高层人士又把这部经典神化了，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化身“药王”神授的，与人类无关。然而，当强巴赤列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西藏分卷》时；以科学的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取得 24 项令人信服的证据后。大胆地提出了新观点：《四部医典》的作者是公元 8 世纪西藏一代名医，曾经到印度、尼泊尔和内地五台山云游、学习，他的名字叫宇妥宁玛·云丹贡布（享年 125 岁）。强巴赤列的这一论断，已成为西藏学术界的定论。

1990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视察，强巴赤列把一本精美丰实的画册双手献给总书记，总书记连连称赞这是一本“无价之宝”。这本由强巴赤列为首编译的藏汉、藏英版《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含 80 幅彩色挂图、4700 多张细部照片、23 万余字，被誉为“我国中医界第一部医学彩色挂图”，荣获 1986 年中国图书奖，1990 年首届中医博览会银奖和 1991 年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药工具书金奖。

强巴赤列费 10 年心血，查遍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以及北京、青海、甘肃等地的书库、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写了一本《藏族历代名医略传》，已出版发行。强巴赤列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给不懂古藏文和看不到更多历史文献的广大青年提供这本书，使他们从祖先身上汲取进取的力量。强巴赤列说：“我愿做一座桥，让年轻人踩着我，走进古藏医学的宏伟殿堂接受洗礼，再走向现代藏医学的广阔世界。”

强巴赤列是一位勤奋、睿智的耕耘者。目前，他又在全力编写《藏医藏药目录学》。迄今，他发表的关于藏医、藏药、天文历算方面的专著、译著、译文约 30 种，上百万字，为此 1986 年国家授予他“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一个出色的藏医管理专家

强巴赤列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务管理专家。

1962 年，刚刚进入拉萨藏医院的强巴赤列便被委以副院长职务。次年，他最崇敬的导师钦绕罗布老院长不幸病逝，仅 34 岁的他当了院长。1980 年，中央在西藏的民族、宗教等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强巴赤列恢复了名誉和职位。他把传统和现代的管理方式结合起来，使独特的藏医院的管理科学化、正规化。现在，不管是拉萨人，还是从远道而来的求医者，都有个普遍的结论：在拉萨数家大医院中，藏医院以其和蔼热情的服务态度，整洁的花园式的环境，严谨的工作秩序，留下深刻的印象。80 年代以来，藏医院长年开展门诊、住院、家庭病床、巡回医疗、信诊等多种服务形式，每年为 20 余万人次的国内外患者解除病痛。作为主任医师的强巴赤列院长也经常下病房临床诊断。藏医院成了自治区文明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强巴赤列也于 1988 年被评为全国医院优秀院长。

藏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制药、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多年来，在强巴赤列院长的带领下，众多名医、专家、学者致力于藏医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已取得多项科研成果。

1989 年 9 月，附属藏医院的藏医学校正式升格为西藏藏医学院，强巴赤列担任院长。他所写的教材，是藏医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藏医学院设有大学部、中专部和进修部，教师多为藏医院名医、学者。来自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近 400 名学生正在接受严格的藏医教学，藏医学可谓后继

有人。

(1992 年 4 月)

人生难得是自醒
——记靳尚谊
姜苏鹏

读他的画，每一次都有一种生命的感动。当视觉与那种古典的感觉接触时，永恒的宁静让人忘却尘嚣。我确信那画布的背后一定有所不能了解的。

原以为他是一个较情绪化的人，而他的理智却令我吃惊，他的率真从一开始就咄咄逼人，“我的经历平淡无奇。”

简简单单才是真

“我这人简单得很，生活没遇到过什么太大的波折，除了小时候动荡以外，总体上比较顺利。”其实，简单，有什么不好？简单，人才不会有太多的奢求。

“小时候，家乡河南焦作，是一座小镇，只有两条街。镇上有一家英国人开的煤矿，父亲是中学教员兼任煤矿董事，家境算是不错。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我影响很深。那时候小镇尽管很安静，但社会很动荡，根本没考虑过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有时高兴也随意临摹个汽车或连环画上的人物。12岁，父亲就去世了，生活开始艰难，于是母亲把我送到了北京姥姥家。”

“姥姥家也不宽裕，解放前夕的北京物价飞涨，发工资是发洋面，一家大小全靠做大学教授的姨父支撑，我上初中已经很勉强。毕业后正在考虑出路，恰好姨父的一个同学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当秘书长，他劝我报考艺专，因为艺专是公费，吃饭可以不要钱。那时的年轻人流行‘工业救国’，没有多少人想学艺术。但经济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我只得选择艺专。进艺专我念的是绘画系，教我的老师都是徐悲鸿的学生，其中董希文对我影响最大。毕业后留校任教。”

从1949年15岁的他考入北平艺专，到如今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44年没离开过学府大门。人们很容易以为他的画代表的是“学院派”，他坦然地说：“不错。我是学院派，但绝不是学院主义。”

在似与不似之间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里，“学院派”带有贬意，代表着保守，故步自封。他对此颇为反感：“这简直就是想当然。”

“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学院派的特点是，整个基础教学是按程式化来要求的，理想主义画素描，都是照着具体人来画着非常标准的希腊式的人体，它是概念的。学院的毕业创作都是命题的圣经题材，十九世纪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学院派在不断地改造。其中以俄罗斯契斯恰霍夫（译音）为代表的学院派，对教学改革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处理题材方面融入了现实生活人的感情，特别是反映普通劳动者。俄罗斯学院派传到中国以后又进行了改造，并往前发展了。中国的学院派就是要反映现实，主张在创作上反映工农兵。在这之前，徐悲鸿那时根本没有创作课，教学体系是非常不完备的，艺术的发展还是初级阶段。解放以后，创作课得到加强，从苏联、文艺复兴及法国现实主义画派吸收了很多东西，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流派才从50—60年代慢慢发展起来。80年代艺术界一些人把现实主义

批得一塌糊涂，批契斯恰霍夫，把现在的学院也作为‘学院主义’来批，完全是胡来。这就是‘文革’后，人们对极左的东西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这种不顾历史事实、借学术讨论来发泄个人情绪的做法，是不成熟的表现。”

他的少言寡语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谈起学术问题，却滔滔不绝，“说来说去，其实整个欧洲的油画是一个体系出来的，基本原理完全一样，区别只在于民族风格的不同。我们研究西方油画，先要弄清西方油画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从80年代初我开始思索这类问题。我采取东西方艺术的比较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从哲学上讲，西方的哲学体系是理性主义；中国的哲学体系讲的是关系，儒家讲如何处理社会关系，道家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绘画上的表现，西方的绘画体系是写实的，是以明暗为基础，体积是它重要因素；东方绘画体系以线为基础的，是平面和装饰性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美感。如果你的绘画演变搞不清这些，你就不该搞油画了。”说到这里，他的视线不由地移向墙上挂着的那幅《青年歌手》。乍看起来，这幅画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构图很象，但背景却大有区别，《蒙娜·丽莎》的背景是真实的风景，而《青年歌手》则采用宋代范宽的山水画《雪景寒林图》，运用西方的技法，体现的是东方的理念。“我主张学习西方油画就要学得彻底，学到它最根本的表现力。但同时要体现本民族的风格，有了民族的特点，才有了我的个性。”

他的画既无“古味”，也无“洋味”，而是以他自己特有的“品味”，把观者带入一个远离尘俗的澄明的境界。“这也就是中国画的原理：似与不似。中国画的哲学非常高深，艺术与哲学讲的是相互写意，写实又不写实，很有弹性。而欧洲的理性主义，使绘画走向极端，先写实，写实到头然后抽象，抽象到头搞装置（即“波普”），反艺术，觉得没意思又来个大回潮，搞超现实主义——照片放大。欧洲艺术发展到今天，他们正全面向东方学习，法国人尤为敏感。从80年代中期，通过办展览把我们的民间艺术一个一个弄过去，如民间剪纸展览、刺绣展览、民间烟火展览等等，艺术的发展，都是相互交流才产生的。”

生命中不可错过之美

80年代，他曾画过一组关于塔吉克女孩的作品，每一幅都蕴含着很深的情味，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美。他说：“这些是我尝试古典主义风格的第一步。”这表白让人不免有些失望，多少次读这些画，多少次相信，在那遥远地方有一个遥远的梦。

“我1981年去的塔吉克，在那儿收集了一大批素材，其中有一幅写生，画的是一个围红头巾的塔吉克新娘，我把她加以变形处理，融进我的追求。这跟我以前搞的现实主义不同，既是现实的人，又不让观念的视野焦点落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身上，而是给观众一个总体的感觉，宁静和崇高，也就是理想的美。”

这个时期，他还画了大量的女人体，其中以《侧光》为代表，被外界称为“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作品，他解释：“这跟我的古典精神是一样的。”

“女人体除了体现人体美本身以外，还体现理想主义的一种崇高的精神，通过人体本身，表达我的一种情感和一种观念。我个人把女性美看得很崇高。我选择的模特，渗透着我的审美观念和对社会的理解深度。通过对人

体动作、线条、明暗处理，背景黑白衬托，体现一种宁静的、崇高的、单纯的、含蓄的美。”

他的人体作品，个人情绪很浓。画布上所传达的肢体语言，纯粹、凄迷，像是夜的笙箫，悠悠地在静谧里飘荡。于是所有的感觉也在飘忽之中，但突然会凝结在一个点上，那就是生命的不朽。他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在民风偏于保守的东方，人体美并不是被完全接受的，很长一段时期，这是一个禁区。这反映了东方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其实唐代还不完全是这样，主要是宋代出现的理学思想发展到明、清，封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已根深蒂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你根本就不能接触。要想打破旧有的观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毕竟比刘海粟那个时代要强多了。但我的作品是给100年以后的人看的，那时的人会比现在的人更懂我。”

80年代中期以后，以《医生》为代表，预示着他对理想美的超越，而进入对人性美的思考。作品背景是一个放大的B超荧光屏上所显示的人的肝脏部分，让人想起那个著名的疑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现代人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生命意义的思考，追求的是人性的崇高。

随着谈话的不断深入，越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说：“艺术是一种宗教，对艺术家来讲，应该拜倒在美的面前，去研究美、发现美，是很虔诚、很热情的一种追求。虔诚就要求创作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杂念，须冷静地思考；热情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无动于衷是打动不了别人的。外国人形容中国人是‘暖水瓶’，内热外冷，很恰当。我这人做事相当理智，情感也比较现实，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夫人就是我最初的恋人，当年是同学，从1957年结婚到现在几十年了。她学的是雕塑，原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研究室，现已退休。”他说他自己的性格趋于柔和，而夫人的性格反而刚强一些。他特意从柜子里堆放的一大摞画册里找出他以前为夫人画的肖像画，题为《台籍女雕塑家》。还从一个精巧的小夹子里，取出一张十几年前与夫人的合影，“我们都很忙，留下的合影实在太少。”顿了一下指着照片中的夫人大声说：“她可比我漂亮多了。”不知谁说过，平实的情感是绝对的美好。

人生难得是自醒

“我的古典主义绘画在中国五、六十年代是没有的，那时的中国绘画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对于古典主义绘画，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是很不理解的，因为没看到过原作，印刷品又很糟糕，80年代开始，我先后到欧洲、美国出访，惊讶地发现古典主义绘画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恰好与我当时的心情结合起来。”

“我当时的心情烦躁，对现实世界的一些丑陋现象深恶痛绝，于是希望在精神世界中找到一种宁静一种崇高。”蓦然间，我想起他画的那幅《瞿秋白》，人物的目光凝视着自身的思想空间，有一种“内视”的神情，揭示出人物痛苦的人生，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无奈的独白，把那种欲进不能，欲退不能的内心矛盾冲突，表现得动人心魄。我忍不住要问，您和瞿秋白的心境有某种相似吗？“有可能”，语气很深，“文革以后我画的《瞿秋白》，他的《多余的话》我读过，非常受感动，体现了他一生中复杂的心境，他说因历史的误会而选择了革命道路，他的气质更适合搞文化。我觉得身为党内高级领导人，在狱中面对死亡能有如此勇气清醒地解剖自己，很真实，很坦荡。

在表现他时，我找到与自己心灵共鸣的东西。他的气质也与我吻合。”他语气中的一丝无奈不难理解，身居艺术院校最高学府要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繁忙的行政事务已使他很少有时间搞创作。

靳尚谊，一个艺术家，一个思想者，通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使所有的人生涌入笔下。透过斑驳陈杂的人的世界的表面现象，倾注了对人类生命的关注及对人性的反思。

(1993 年 9 月)

台盟主席蔡子民切盼回故乡

潇 怡

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四届四次中央委员会上再度当选为台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的蔡子民先生，呼吁台湾岛内各政党、团体及各界人士，共同推动国共两党谈判的早日举行，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早日实现。

蔡子民先生 1920 年出生于台湾省漳化县，祖籍福建石狮，到他这一辈已在台湾定居六代。他在台中第一中学读到初三，便离开了家乡。1939 年考进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专业，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中国的历史和哲学。他常常跑到大学的图书馆，翻阅中国的文史哲类图书，还偷偷看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正在领导祖国人民走向解放道路的毛泽东也非常崇拜。日本投降后，蔡子民到东京的一家华侨报社任总编辑，该报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在日本的台湾乡亲和华侨争取权益的进步报纸。

台湾光复的第二年，蔡子民回到了家乡，并很快就认识了苏新、王白渊、王添灯、潘钦信、萧友山等早期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他们当时正酝酿办一份进步报纸，用以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政治劣迹。蔡子民认为这很符合自己的意向，也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办起了《自由报》。

在蔡子民任《自由报》主编的第二年，即 1947 年 2 月底，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蔡子民也毅然加入了这次起义。这次武装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蔡子民死里逃生，到了祖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蔡子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4 年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化部对外司工作，1981 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与夫人李玲虹女士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台湾与大陆尚处于隔离状态，但蔡子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是台湾人，促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日本期间，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了大量的推动海峡两岸交流的工作。他热情地接待旅日台胞，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发展变化情况，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台政策，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海外及岛内台湾同胞的意见和建议。

1985 年回国后，蔡子民一直在台盟担任领导职务，他是第二、三届台盟总部常务理事，台盟中央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并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台湾研究会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蔡子民稳健温厚、学识渊博，在对日关系和台湾问题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为有关方面所重视。他著有《美蒋统治下的台湾》、《台湾历史的潮流》、还在日本出版了《唐诗旅情》和《四季的唐诗》（日文）。

作为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台盟的首脑蔡子民先生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后，台盟作为一个参政党任重而道远，台盟要为此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更积极地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谈到祖国统一问题，蔡子民很有感触，当年他只身离开台湾到大陆，原以为这辈子再也无法见到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但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精神感召下，在海峡两岸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打开一点长期禁闭着的大门。从此，在北京、在祖国大陆各地，蔡子民都可以看到回大陆旅游观光和探亲的台湾老乡，听到那熟悉的乡音，这份亲切和欣喜对他的晚年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呵！

但他的 40 多年的“相思梦”还只实现了一部分，他和台湾乡亲的往来现在只能“有来而无往”，他还不能回到台湾故土去走上一走。笔者曾听他激动地说：“我是台湾人，我要堂堂正正地回到台湾！我一定要回去！”

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是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愿望。蔡子民向全体盟员呼吁，要尽力与台湾人士进行多层次的接触，以便努力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进而实现祖国的统一。只有实现祖国的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我们的祖国就会更强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1 年 3 月)

清风晚节老梅香

——记臧克家

吴 霖

1989年10月8日，恰好是中国传统的重阳佳节。对著名诗人臧克家来说，喜庆是双重的，因为这一天，正是他85岁的生日。

那天，在臧家这座朴素雅致的四合小院里，春意和秋光一起荡漾，笑声不断，前来祝寿的亲朋挚友络绎不绝。大凡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加关心的人，就不难从进出赵堂子胡同这座小红门的人群中，认出众多文坛宿将与新秀的面孔。那两天，“高朋满座”是确而又确的，“谈笑有鸿儒”也绝对当之无愧。张光年、冯牧、玛拉沁夫、林默涵、刘白羽、草明……那天都曾欢聚在这片小小的天空之下。

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就已在文化部代部长、《中华英才》画报社社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提前来此祝寿。李铁映送给臧克家一盆葱郁的香橼，枝头硕果累累。李铁映微笑地祝臧老健康长寿，并祝愿老诗人晚年的创作也像这喜人的香橼一样丰硕。

贺敬之紧紧握住臧克家的手，说：“你的诗歌影响了几代人，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读着你的诗走上流亡道路的。所以，今天怀着很真诚的心情来为你祝寿！”贺敬之本人也是著名诗人，且已年过花甲，故此言份量极重。

臧克家精神健朗，兴致勃勃地向来宾朗诵了自己的自勉新作：

同志众朋友，鞭我向前走。

愿做老黄牛，拉车到尽头！

臧克家自1933年，在闻一多、王统照、卞之琳等师友帮助下出版了处女作诗集《烙印》起，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了。其间，他创作出版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臧克家诗选》等名重一时的著作。其中有诗集、散文集，还有小说集和艺术评论集。如为纪念鲁迅先生而创作的诗歌《有的人》，脍炙人口，久而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臧克家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了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的第一任主编。1957年1月，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召见了臧克家和袁水拍（著名诗人，《马凡陀山歌》的作者），谈了他对诗歌的意见。同月，《诗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毛主席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和旧体诗词18首。从此，毛泽东作为一位气魄恢宏的诗人享誉世界。

风风雨雨的岁月中，臧克家历经沧桑，如今虽已上了年纪，但他对生活仍充满热爱，达观如初。除了应邀担任一些社会团体的顾问之外，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自己写道：“虽年已八十有五，仍不知老之已至，终日孜孜不倦，读书、写作。有诗云：‘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我们去拜访臧克家那天，时值1989年岁末。天灰灰的，也冷，仿佛要下雪。先见了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她是一位让人感到温暖的慈祥老人。后见了臧克家。平易近人、富于诗人气质的臧克家，和我们亲切交谈了不一会儿，就给我们吟诵了他自己的三首新作，只是浓重的山东诸城口音，使抑扬顿挫的诗句听不真切，直到拜读了原稿，方才恍然大悟。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名家字画。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叶圣陶、冰心、

老舍……等十几位著名作家、诗人的手迹，使四壁生辉。臧克家十分钟爱这些字画，因为面壁而坐，如同欢晤老友。中间那幅刘海粟书写的斗大“寿”字，煞是精神。放在案上的那株香橼，落下了几枚金黄的果实，叶子却仍翠绿的，仍有好些个果实悬于枝头。屋的西北角，有臧克家的一尊塑像，神似得很，总让客人们注目不已。

沙发之间的案头上，有一座绿非绿、黑非黑的石头，未经雕琢，很古朴自然的模样。臧克家告诉我，这是一种叫“海底绿”的石头，产在极深的海底，我试图捧起，发现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

郑曼女士告诉我们，臧克家除了写作和写字外，就是会朋友和读书学习，没有其他嗜好。要说嗜好，大概要算每天三次散步了。臧克家每天5时半起床，6时出街散步，此时街上静无一人，街灯灿然……这是他最大的乐趣了。此外，臧克家还爱和小朋友们在一起。胡同里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认识和喜欢和蔼可亲的臧爷爷。

臧克家每天勤奋写作不止，1990年，将出版了第58本著作了。1975年，他在《祝茅盾同志八十大寿》一诗中，有这样两个句子：“雨露明时花竞发，清风晚节老梅香。”后一句，我想，不正是眼下他自己的写照吗？

会客室未生炉子，有些冷，房间里摆满了绿色植物盆景。书柜上有许多斑斓的贺年卡，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为人民讴歌了一辈子的老诗人！

(1990年3月)

精通十艺的大师臧真白

洪永固

“文化交流结墨缘，厦门盛会正新年，相逢艺友话亲切，一片热情感万千。”这首诗是台湾艺术名家臧真白 1991 年二三月间题赠给厦门文艺界的朋友的，诗中朴素地表述了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举办的第三届《海峡情》征文活动中，他的征文作品《海峡两岸书画交流之我见》获得了特别奖。

臧真白是位多才的艺术大家。他对诗、书、画、篆刻、摄影、软木刻画、版画、雕刻、竹刻、剪纸等 10 项艺术样样精通，尤以草书领衔闻名台湾。

臧真白原名臧南乔，山东省日照市人，年满六旬。他自幼喜爱书法和绘画，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嫡传弟子。那是 1955 年，于右任观看了臧真白的书法作品，认为是难得的人才，经人引荐，臧真白便拜被誉为“草圣”的于右任为师。自此，臧真白在于右任的教授下，勤学苦练，成绩斐然。于右任曾计划将历代名类繁多的草书加以归纳整理，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便去世了。臧真白继承老师遗志，整整用了 12 年时间，收集了历代诸家草书，经过考证、选择，苦心孤诣完成了《中华章书篆书大字典》，成为台湾书法界的一大名家。他认为写草书并不是随心所欲，只要写得潦草便行，而是要有一定的写法和格式。他的著作受到台湾青年学者的喜爱。

臧真白几十年间游走艺林，在艺术世界里呕心沥血，成为一位有名气的诗人。早在 1967 年，他的一首怀念老师的诗作：“展墓看来荐瓣香，白雪飞共纸灰扬。师恩如海徒难报，空洒临风泪两行。”获得了全台诗人大会作品第一名。他认为，作诗不但能变化人的气质，还能探讨人生真谛。他出版的《作诗无师自通》，解答了青年诗作者的疑难问题。打开此书，就可明白作诗的奥秘。臧真白倡导诗书配合，常有题画诗问世。他认为，一首好诗如果题在一幅成功的画上，诗画融合，艺术效果更佳。他在一幅自画白菜的画上题诗道：“平生吃得菜根香，万事无优益寿长。此味百蔬推第一，为何白菜不称王。”此题画诗在台湾多次展出，被认为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当完美。

摄影又是臧真白爱好的艺术之一。他的摄影以国画章法为主，凡有佳作，均以图中内容自题诗。由于他绘画功底深厚，各种艺术门类便融会贯通，使他常常用相机捕捉到艺术之美。

近 10 年来，臧真白还潜心研究书画上的印章印泥和落款，并在他所在的台湾桃园文化中心开设专题讲座。他认为，一方印章的好坏，章法即布局最为重要。每刻一印之前，先要酌用印石大小方圆长短，而后决定选用何种篆文；篆体写法要力求统一，疏密适当。在臧真白传授弟子的十艺楼中，就陈列了他自刻自用的石印 300 枚，任人观摩。

臧真白告诉笔者，凡书画作品完成后必须落款、盖印。他说，一幅好的中国画，要是印章印泥不佳，如同美人打扮不时髦；而落款不适当，如同美人脸上有了黑点。题画、题句与画的内容要吻合，字多少、印章大小、盖在什么地方，事先都得安排妥当。他说：“题山水画，最忌将字写在山顶；印章盖在树枝上，看上去杂乱一片；题花鸟画，最忌将文字写在花头上，印章盖在鸟尾上。”臧真白将上述经验提炼成为一首诗：“书法丹青纸一张，善题落款有良方。花头鸟尾禁题字，山顶树枝限盖章。印色印章要讲究，选诗选句莫荒唐。构图完美高风格，一幅千金玉尺量。”

臧真白深知艺术天地广阔，艺海深奥无穷。他常以自己步入艺术之门浅近自励，总觉艺途无止境。他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刻苦不断求进，手下不断出新作。目前，他手头正在完成的第 11 本著作，期盼脱稿后能够在大陆出版。他也正在做着各种准备，争取早日在大陆举办他的 10 项艺术展览。

臧真白 40 年前离家后不久，妻子就已改嫁，他在台湾也早已知道。然而，他在台湾 40 年，依然孑然一身。他告诉笔者：“我艺术实践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兴趣越来越浓厚，艺术生活更加充实。虽然工作很忙，误了终身大事，但我愿意做的事情，圆满完成之后，心里觉得非常舒服，从中找到了心灵的安慰。”

(1991 年 10 月)

**蔡志忠从童年的小黑板上
找到一生的路
石正茂**

曾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偷偷蘸了父亲的红颜料，在自家大门上涂了一个人像：侧面，盘腿而坐，似注视，又似思考……

蔡志忠第一笔朴拙的漫画便这样永远地留了下来。40年后的今天，他终于以其独特的画风饮誉中外，成为深受海峡两岸广大民众喜爱的漫画家。

前不久，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在首都宾馆走访了这位来自台湾的文化使者。

蔡先生很瘦，宽额头、长发齐肩。一副典型的闽南人面孔，言谈之中流露出宁静与安然。

说起他的“从画史”，蔡先生回忆道：“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5岁那年，父亲交给我一块小黑板，原本让我习字，哪知我却用它作画，画完了童年。”从这块黑板上，年幼的蔡志忠找到了他一生要走的路，并且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蔡先生的画抽象与具象交融，古代与现代结合，通俗雅致，幽默生动，连10岁的孩子都能看懂，特别是那套中国古籍漫画丛书更是打动了百万读者的心。我问他画漫画有什么秘诀？蔡先生微笑道：“我只是从不自我设限罢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能画。我早已如条件反射一般，看到有意思的东西，第一个动作就是画。”读《庄子》、读《相对论》、读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他都是一边用心领会，一边下笔传神，随意而行。画反映了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他十分推崇老庄的顺其自然。他自己解释道：“就是与天地同存，让自己与外界相融，在自然中体会事物的本性，没有任何‘我’的观念，也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乍听这话，我有些诧异：以蔡先生这种处世方法会不会与社会环境冲突呢？

“不会。我画画也好，做事也好，从不为任何目的，唯一只有两个字——喜欢。能够不断地推出新作正因我爱画，并最积极地去画，而不是刻意要创作。”

心想事成，道法自然，这是蔡先生一贯遵循的生活信条。多少年来，他心如止水，一支画笔撑起整个天空，在遂愿的生活中体味着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他是从容的，也是超脱的。

除爱读书，画画，蔡先生还钟情于园艺。在台湾，他亲手种植的树木就有100多株。其他诸如篱笆矮墙，花草园圃之类，他布设起来更是拿手。说到此，他还找出一叠照片给我看，并指着其中的庭院格式说明他的艺道精通。

此次大陆之行，蔡志忠先生将再次与三联书店合作，推出另一套幽默漫画丛书——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系列漫画丛书。另外，他手上正在创作的《波罗蜜心经》和《金刚经》漫画，将来也要出版，之后还要画《易经》……

旷达而寓智慧，早悟而寓坚持。蔡志忠先生以其敏锐的感触，借助于漫画的亲合力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孜孜以求，不倦不悔。盛誉之中的蔡先生以自己的平实驾驭着生命之舟渐行渐远，无喜无忧。

(1992年2月)

伟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记穆青 朱玉生

提起穆青，人们自然会想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当我走进巍峨耸立的新华社新闻大厦，面对这位新闻界前辈时，他那奔放的热情、和蔼的神态释解了我所有的拘谨。

现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已两鬓染霜，但面色红润，目光炯炯，高额深眼的面部轮廓显示着他那典型的回族人特征，话语中带有明显的河南乡音，言谈举止既有文人的风雅，又多政治家的风度。

穆青原名穆亚才，河南杞县人，1921年3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回族知识分子家庭。他小时候就喜爱文学，5岁便开始跟随祖父读书习字，12岁考入当时在中共党组织影响下的私立大同中学，积极参加学校的救亡运动。1937年，当穆青初中毕业考入开封两河中学时，七七事变爆发，年仅16岁的穆青毅然离开家乡，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以后跟随着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转战晋冀，一面拿枪一面拿笔进行战斗。1939年5月，穆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穆青奉命到革命圣地延安深造，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两年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穆青被调报社当记者。从此，他走上了新闻工作道路。他在《解放日报》工作3年，写出了不少反映陕甘宁边区新人新事的新闻和通讯。其中关于工人劳模赵占魁的连续报道和通讯《雁翎队》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穆青奉命从延安徒步赶往东北，参加《东北日报》的创建工作，并及时采写了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事迹的报道《东北抗日联军史略》，为此，他还专程赴朝鲜采访过金日成将军。以后他担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组织了东北土改和辽沈战役的报道。1949年初，穆青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军南下，报道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过程和著名的衡宝战役，并写下了《淮河两岸》、《十里长鞭》、《狂欢之夜》、《湘中的红旗》等数十篇战地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解放大军南征的足迹。

新中国的诞生，进一步激发了穆青的工作热情。1951年，他开始担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1958年调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次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982年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并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40多年来，穆青虽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他总是挤时间、牺牲休息日进行采访与写作。60年代，他写下了使社会为之震撼的著名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再访兰考》；粉碎“四人帮”后又发表了《历史的审判》、《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河南农村见闻》、《人民呼唤焦裕禄》等力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大量新闻理论作品和新闻业务文章；编辑审改了许许多多的新闻作品；并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了许多情景交融、行文优美的国际见闻；结集出版了《意大利散记》、《维也纳的旋律》、《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等多部作品集。

穆青认为：“当今的记者应该有文字、摄影两套本领。”他自己也正是

为此而身体力行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用手中之笔讴歌人民、鞭鞑丑恶的同时，又拿起了照像机，不辞辛劳地拍摄了大量照片。穆青说自己不是摄影家，也不是专职摄影记者，更没有“成套”的照相设备和专门从事摄影活动及摄影艺术研究的时间，他的作品都是在国内外访问和采访空隙“抓”拍出来的。而行家们认为，穆青的摄影作品题材广泛，角度新颖，立意深刻，艺术性高。从他已发表的数百幅独具匠心的摄影作品和先后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九寨沟》、《穆青摄影集》、《彩色的世界》以及在广州举办的《穆青摄影作品展览》中，不难窥见其孜孜不倦的追求。

近几年来，穆青针对新华社新的实际，从业务思想到管理体制，从报道内容到报道形式，进行了重大改革，使新华社从一个长期以国内报道为主的通讯社发展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有较大规模的世界性通讯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新闻报道体系和服务中心，被国际新闻界公认为世界六大通讯社之一。

穆青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他并不满足，在采访结束时他告诉我，他想早点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趁自己身体还好，到全国各地跑跑，继续写点东西，拍些照片，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多姿多彩的风貌；他还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和摄影技艺；他还想……

“人要有新成就，就要有点精神。就是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有一股激情，有种拼搏精神。”这是作为兼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的穆青给青年人常讲的一句话，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是啊！穆青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激情和拼搏精神，才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名记者。

(1992年12月)

具有传奇色彩的外交家冀朝铸 宗道一

1991年早春，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任命为负责开发技术合作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外交家冀朝铸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最近于联合国秘书处改组后又被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委以出掌新设的经济发展部重任的高级官员，从译员起步乃至进选获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近40年不寻常经历，庶几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个缩影。

冀朝铸假回国公干之暇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了笔者长达3个多小时的访谈，他动情地说：“17年的译员生涯对我一生都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我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宝贵品质和终生难忘的东西。”

冀朝铸1929年出生于山西汾阳建昌村一个亦儒亦吏、诗书簪缨之家。冀朝铸呱呱落地时，父亲冀贡泉已年近半百，老来添丁，自然宠爱有加。

曼哈顿有一名中国“打工仔” 哈佛培养出一位“少年革命家”

冀朝铸是在美国纽约下车城的意大利裔贫民窟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由于全家生活拮据，他迄今为止的60余年生命旅程里约有1/6是充满辛酸与汗水的“打工仔”生涯。

那时，冀朝铸在长兄冀朝鼎帮助下进入纽约的一所“城乡学校”（City and Country School）读书。冀朝铸小小年纪，从一开始就在学校食堂里洗刷盘子，用微薄的血汗钱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活和学业。他真的穷酸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或者靠别的同学“布施”，弄几件旧衣服穿，或者临时借别人换下来的衣服穿，境况实为尴尬。

1948年秋，胸怀大志的冀朝铸自地处纽约市中的曼哈顿数一数二的私立中学（Horace—Mann Lincoln High School）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全美第一流的哈佛大学化学系，他为自己能跻身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而买了平生以来第一套西装。

名家辈出的哈佛大学座落在美国著名“秀才城”波士顿西郊坎布里。四周爬满长春藤的美丽校园古树蔽天，绿草如茵。每当夕阳西下，天边燃烧着火一般的晚霞，在迷人的落日余晖里，如诗如画的查尔斯河水微波荡漾，晚风轻拂河面，吹起阵阵涟漪。当莘莘学子为查尔斯河两岸的秀丽景色沉醉留连的时候，冀朝铸正汗流浹背，为生计，为学业而大卖苦力。冀朝铸是百分之百的“赤贫”。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肚子问题。

当时，一个“哈佛”学生维持最低开销即需1500美元。学校发给的奖学金是650美元。作为优等生，冀朝铸又可得到额外补贴200美元，但所缺的650美元只有靠自己打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于是，冀朝铸在寒暑假里常到农场当雇工。他替人收土豆、西红柿，锄草、翻土。有时他又去给有钱人家做佣仆，看管园子，打扫宅院卫生，在花园锄草，修整草坪……别人半工半读，冀朝铸则是半工全读。

平时，他一般是下午课余打工四五个小时，到深夜里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几小时后，东方初露曙色，从酣梦中惊醒的冀朝铸一骨碌起床，简单漱洗一下，甚至来不及揉揉惺松迷糊的睡眼，便大步流星地赶到饭馆开始洗刷那些永远洗不完碗盘。然后，冀朝铸顾不得喘气歇息片刻，夹起书包，行

色匆匆地跨进课堂。在“哈佛”的最初日子里，冀朝铸从来没有娱乐活动（连电影也不看），除了上课便是打工，他别无选择。

学生时代的冀朝铸时刻都在关注着整个世界的变化，不曾忘记自己是一名远在异乡的炎黄子孙。

他从广播里听到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后，就想去参军，解放沦陷的波兰国土。当国民党外交官的儿子在学校里大骂共产党时，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冀朝铸和激进的美国同学到华盛顿参加抗议游行，甚至到纽约黑人区发动黑人兄弟“罢（房）租，俨然是一位“少年革命家”。

由于极度贫困生活的煎熬，也由于深受父亲冀贡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即使在大洋彼岸，那种炎黄儿女常有的故国魂牵梦绕的悠悠情感在冀朝铸幼小的心灵里滋长孕育得尤为良好，该时，冀朝铸的长兄冀朝鼎和同窗徐永焕（后任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以及不同届的校友唐明照（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曾与冀贡泉共同创办蜚声北美侨界的《华侨日报》都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这些来往密切的共产党人多少也给了冀朝铸父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少年冀朝铸和乃父一样忧国忧民，关心中国的前途。

他偷偷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曾经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台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eman），其所著《北行漫记》（即《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是冀朝铸少年时代在美国读到的所有革命书籍中印象最深刻的两本书。特别是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更使冀朝铸的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从此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青年冀朝铸心往神驰，激动万分。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以赤子之心在书上精心绘制一面五星红旗。按照原先与父亲商妥的计划（冀贡泉已于1946年应胡适先生之邀，回国就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冀朝铸读完本科，再读博士学位，然后回国。但是，1950年，美国政府发动了侵朝战争，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亦已在福建沿海作出部署。形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唐人街人心惶惶，山雨欲来。比任何时候都关心形势的冀朝铸当时判断：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中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不免焦虑，忐忑不安，倘若中美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冀朝铸可不愿呆在敌国，他不及和父亲商量，心急火燎地向学校当局递上了退学申请。

1950年9月的一个清晨，毅然中止“哈佛”学业的冀朝铸登上东驶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回到了阔别了12年故国，他走在50年代初期回国的2000名留美中国学生（约占当时全体中国留美生的2/3）的最前列。在罗湖桥头，冀朝铸耳边回响着当时还很陌生的雄浑的《东方红》乐曲，他一头栽倒在地，激情难按地亲吻刚刚获得新生的祖国大地，热泪盈眶地喃喃自语：“祖国啊母亲，我回来！……”

朝鲜停战谈判使得冀朝铸崭露头角，日内瓦会议又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契机。于是，冀朝铸来到了伟人周恩来总理的身边。

板门店谈判：冀朝铸初试锋芒

王炳南建议：小冀搞点“化学外交”

回到国内，冀朝铸旋即入清华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当谈谈停停、停停谈

谈的朝鲜停战谈判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的时候，冀朝铸终于遂了投笔从戎的夙愿。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莫斯科留学的良机。于是，中国科技界少了一位留过洋的化学家，外交部却多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外交家。

1952年4月的一个漆黑夜晚，冀朝铸和朱光亚、裘克安、邱应觉、过家鼎等人乘车日夜兼程前往开城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靠着那本又黄又破的 Gregg Shorthand 英文速记课本，无师自通的冀朝铸在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英文打字员”美称后，又摘取了“首席英文速记员”的桂冠。其实，依冀朝铸那时的资历，开始还轮不到坐在谈判桌前作记录。只是后来谈判气氛变了，双方代表的脾气也大了，争执白热化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说话又急又快，还夹着不少难听的骂词，冀朝铸才匆匆领衔登场，坐到席前，速记下美方代表那渗杂着许多俚语方言的爆黄豆般的脏话，待会后经过研究后，再在下次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奉还给美国的代表先生们。冀朝铸就是这样，靠着勤奋刻苦、锲而不舍的努力，靠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天赋，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速记组争得了一席之地。

1954年4月20日，首席代表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机离京参加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崭露头角的冀朝铸随团而行，对冀朝铸个人而言，莱蒙湖畔的这次著名国际会议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契机，它使冀朝铸谨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乃至周恩来，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回到北京后，王炳南不无幽默地对冀朝铸说：“小冀，别回清华大学读书了，你搞点‘化学外交’吧！”王炳南指的是翻译。于是，冀朝铸正式调入外交部，来到办公厅秘书处速记组，稍后又转至翻译科，在周南科长和裘克安处长麾下开始了漫长的译员生涯。在翻译科的最初日子里，冀朝铸只是服务于来访的外国政府首脑如尼赫鲁、吴努及佣仆、卫士的生活起居。或者陪伴他们逛街买买东西，或者陪伴他们看看中国电影、做英文“解画员”。每当来访贵宾与我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外交部有关部门便安排那些随从人员看电影以消磨时光。此时，冀朝铸就开始投入工作，他的“职责”便是用英语详细介绍剧情，不时将剧中人物的华语对白同步译出。冀朝铸恪尽职守，他的“同声传译”作得十分出色。

两年后，冀朝铸迈出了外交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步。冀朝铸饶有感慨地说过：对他一生事业起关键作用的，除了总理、陈老总、章文晋以外，就是浦氏兄弟。浦氏兄弟即浦寿昌和浦山。浦山是朝鲜停战谈判时冀朝铸的顶头上司，浦寿昌是新中国初期最优秀的口译专家，当时任周总理外事秘书兼翻译，他无疑是独具慧眼的伯乐。在浦寿昌的推荐下，冀朝铸继黄华、龚澎、章文晋、浦寿昌后成为周恩来的第五任英语译员。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使得冀朝铸激动万分，不能自己。

冀朝铸感慨：好的外交官是老实人

总理坦言：“洋娃娃”喜得“冀小坦”

1959年9月27日晚间，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北京饭店隆重设宴，欢迎来访的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一向“叨陪末座”，后来被周总理戏称为“洋娃娃”的冀朝铸首次以“总理译员”身份公开露面，与总理、首相在首席桌比邻而坐。遗憾的是耀眼的镁光灯闪亮中“亮相”几分钟后，便出现了令冀朝铸极为狼狈难堪的场面。原来，周总理有个独特的习惯，他在照讲话稿致词时，如发现稿子有未尽人意之处，就会临时自行增补删节，但冀朝铸并不清

楚。果然在致欢迎词快结束时，周总理离开讲稿，补充了一段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冀朝铸依然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照本宣科”。周总理迅速明白初出茅庐的冀朝铸没有“改弦更张”，他语调温和但又果断地挥手制止冀朝铸：“哎，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你去休息一下，换一个！”冀朝铸狼狈退场，从宴会的第一桌又回到了最末一桌，他满以为这一下全“砸”了，没想到第三天周总理还是让冀朝铸继续上场。在彭真主持的北京各界人士欢迎集会上，冀朝铸再次担任周总理和尼泊尔首相的翻译。礼宾司的同志特意找到了忐忑不安的冀朝铸，作了一番叮咛：“总理、首相说什么，你就翻什么，其他的事你都别管……”冀朝铸牢记在心，再不敢造次，一个劲听总理、首相讲话。所以当讲话完了，彭真说：“向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献礼献旗”时，冀朝铸便毫无反应。“小冀，你给首相翻一下彭真市长刚才讲的话。”急得周总理在一旁轻声提醒。“现在市长要向阁下献礼”，冀朝铸如梦初醒，慌乱中又落了词，其实他也没听清彭真讲的话。“还有献旗……”周总理连连提词。冀朝铸一脸沮丧，不知所措，幸好另一位翻译作了补充翻译。“小冀，你没有翻出原话。”周总理压低声音批评道。“已经翻了。”冀朝铸恢复了平静。“小冀，你刚才可没有说实话啊！”周总理稍稍迟疑后神色严峻地说。“总理，刚才是另一位翻译给翻了，彭真市长的讲话我没有听清楚。”冀朝铸满脸赧色。半年后，周恩来到外交部作报告，最后特别强调：“作为新中国的一个干部，最重要的是要诚实，讲真话，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要永远诚实，不然，轻者毁掉自己，重者危害国家。”周恩来说的未必是冀朝铸，也许他只是有感而发，但字字句句都像烙印一样，留在了青年冀朝铸的脑海里，永生难忘！直到35年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仍感喟不已地说：“好的外交官是老实人！”

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把“接力棒”交给唐闻生（唐明照之女），冀朝铸担任总理译员长达17年之久。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几多潮涨潮落，云卷云舒，周总理那种耳提面命，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冀朝铸一闭上眼睛便感恍如昨日，铭心刻骨，此生实难忘怀。但是更令冀朝铸心潮难按，歉歉不已的是周总理在逝去的悠长岁月里对自己的那种善解人意、极为细腻的关怀、爱护和体贴，那种一如慈父般悠悠深长的情和爱。

冀朝铸婚后久未生育，一晃春秋七载过去。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风闻此事，他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找冀朝铸谈心，并由章副部长邀请全国第一流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博士亲自为冀朝铸作了全面检查，精心诊治。在一次会见外宾后，周总理宽慰冀朝铸：“小冀啊，你没孩子，我也没孩子，咱们一起干革命！……”听了周总理极为真挚的话语，冀朝铸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是机械地点点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和自己的普通译员说话。多少年过去了，周总理那深长的语调和熟悉的淮安口音，那两道浓浓剑眉下炯炯有神的眸子里透露出来的无限温情与挚爱，一切的一切都是言犹在耳，历历在目。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位至今宝刀不老的吴阶平果然妙手回春。1963年12月，冀朝铸随同周总理出访亚、非13国。次年2月，周恩来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征尘未卸的冀朝铸收到了夫人怀孕的来信，大喜过望，风尘仆仆，席不暇暖的周总理闻风赶来分享属下的欢乐。他向沉浸在“未来爸爸”的喜悦之中，已不太年轻的冀朝铸道贺，并且高兴他说：“这样吧，因为正好在我们出访的时候你爱人怀孕了，如果生个女孩就用非洲来

命名，如果生个男孩就用巴基斯坦来命名。我们新中国需要很好的劳动者，我看到非洲的女人勤劳，男人却懒得很，老闲在家里喝茶聊天。在巴基斯坦，则多半是男人干活，女人呆在家里……”后来，冀夫人生了个男孩，他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在美国纽约亨特学院攻读英语专业的冀小坦。

陈老总入主外交部 冀朝铸两贴“大字报”

冀朝铸成年之后哭过三次，为父亲、为陈毅、为总理。他动情地对笔者说：“陈老总更像一个父亲。”“让我真正要大声恸哭的是陈老总的去世。”“现在我每次看《陈毅市长》的电影，总是鼻子发酸，忍不住想掉泪……”

冀朝铸早在大洋彼岸就从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神交了充满浪漫气质、叱咤江南的新四军统帅陈毅将军。不过，冀朝铸给这位从周恩来手中接过外交部大印的元帅外交家的见面礼却是一张“小字报”。

1958年初夏，当陈毅来到北京东城外交部街33号就任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时，他在这幢当年袁世凯修建的仿德式建筑里大声说：“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一员骁将，雄风依旧，豪气依旧，令数百属下心荡意回，冀朝铸也侧身其间，自然受到感染。但是，50年代后期的那种“敢想敢说敢做”的氛围中，冀朝铸在外交部小礼堂给新部长贴出了一张小字报，措辞尖锐地批评陈毅在外交场合不注意礼节：“过去周总理向外宾敬酒，酒杯总是低于外宾。为什么陈部长敬酒，总是把酒杯举得比人家高呢？这样不够尊重人家，反映了外交作风问题。”云云。陈毅居然看到这张贴在角落里并不十分触目的小字报，只是他新来乍到，还不认识末尾署名“冀朝铸”的哪一路的英雄好汉。也难怪陈老总眼生，冀朝铸那时毕竟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翻译。“冀朝铸何许人也？”陈毅大大咧咧问左右。“……”陈毅记住小字报的内容，也记住了冀朝铸这个不一般的名字。在下午外交部的整风大会上，陈毅立即作出“反应”：“有同志贴我的小字报，提意见说我向外宾敬酒时酒杯举得太高。同志哥，你才不懂哟，酒杯举得比人家高，这才叫尊重人家哩！总理举得低，是因为他手臂受过伤。”说到这里，陈毅话锋一转：“不过，这位同志观察得很仔细，批评也很尖锐，精神可嘉！”散会后，陈毅单独留下耷拉着脑袋，多少有点心神不定的冀朝铸，谈锋仍健：“哦，是你。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哪个学校毕业的？英语又在哪儿学的呢？”“……”冀朝铸恢复了平静，只是偶然有点腼腆不安。“啊，不简单嘛！化学专业也不要丢了……”

有趣的是10年后，冀朝铸又贴出了一张关于陈毅的大字报，不过这次是为处境十分困难的陈毅仗义执言。“造反派”揭发陈毅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丧权辱国，对苏加诺说：“您是统帅，我是元帅，您下命令，我来执行。”等等。再次掀起了一股“打倒陈毅”的黑浪。作为当事人，陈毅、苏加诺会谈的中方译员，冀朝铸无法保持缄默，勇敢地站了出来，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写成了洋洋洒洒的数千字的大字报，贴在外交部最显眼的地方。那次陈毅出访印尼，就陷入僵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地点再次与苏加诺磋商。但苏加诺固执己见，说不但要在亚洲开，还非在印尼开不可。“总统先生，为了亚非团结，还是在非洲开吧。”“不行。”苏加诺把门关得紧紧的。陈毅接下来讲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话：“阁下是总统，总统就是统帅，而我只不过是元

帅，元帅当然要听统帅的话。统帅下命令，我元帅就要执行。但是呢，元帅嘛也有义务给统帅提意见，提建议。如果统帅老是不接受元帅的建议呢，元帅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这段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话完全是婉转的外交辞令，显示了陈老总充满睿智的语言艺术和高超的外交才能，这最后一句的潜台词就是说：如果你苏加诺一意孤行，我们中国就要和你分道扬镳了，苏加诺是聪明人，待冀朝铸用纯熟的英语译出后，他就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脱掉帽子，在座位附近转了两三圈后坐下说：“元帅阁下，您真厉害！我接受您的意见，就在非洲开吧……”冀朝铸的举动固然为陈毅解了围，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扣上了“铁杆保皇派”的大帽，随后下放晋西北“五七”干校。只是幸赖周恩来多次保护，冀朝铸的境遇才有所改善。待到冀朝铸获得解脱，出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之时，陈老总已是一病不起了……

邓小平出访美利坚 副司长欣然做译员

60年代，英国路透社对冀朝铸的译技叹为观止：“如果只听其声，宛若伦敦皇家广播公司的流利播音员。”70年代，美国国务院人士则不无幽默地说：“如果闭上眼睛，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张中国人的嘴巴。”1979年早春，“重操故伎”的冀朝铸随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朝野为之轰动。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结束了30年的对抗，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在瑞雪初霁，十亿中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之邀出访美国。邓小平一行中，除要员外还有两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浦寿昌和冀朝铸。他们分别作为邓副总理的特别助理和译员随访。在此之前，外交部有关方面曾探询冀朝铸是否有意与邓小平同行，再当一次翻译。时任国际条约法司副司长的冀朝铸闻之，欣然答应“再作冯妇”。

在邓小平一行途经上海、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到达华盛顿次日，卡特总统夫妇在白宫南草坪上为来访的中国贵宾举行仪式。冀朝铸和浦寿昌这两位哈佛校友格外为美国传媒所注目，有影响的评论家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其为《纽约时报》采写的一篇题为《化敌为友，欢宴邓先生》的特约通讯中用1/3的篇幅介绍冀朝铸：“今天早晨当邓小平副总理到达白宫时，第一个走到他身边和他一整天待在一起的是55岁（引按：应为50岁），头发开始灰白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引按：应为肄业）冀朝铸”。“冀朝铸是邓先生的翻译，也是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他的出身经历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冀先生今天在灰色毛式制服的上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大衣。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冀先生非常宝贵，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完全合格的从英文到中文的同声翻译。”2月2日的《纽约时报》还专门为此发表题为《不可缺少的冀先生》的社论：“冀先生在美国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可是冀先生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如果邓小平没有把外交部的这位前哈佛毕业生（引按：应为肄业）带来做翻译，他和卡特总统的会谈就可能无法沟通。”“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会谈时只能用他们的翻译。7年以后，这种屈辱——也许是损失——继续在美国本土中出现。不管用哪国话来说，这种情况都叫做 Absurd（荒唐）。”社论作者和巴特菲尔德先生此言不谬。美国没有专门培养口译人员的学校。确确实实，直到前一阶段，国务院二楼译员部少得可怜的22名译员中，汉语只有两名。当时，白宫为应急，临时聘请美籍华人陈立家博士充任卡特的中文翻译。有趣的是陈立家的出现虽然让

美国政府坍了台，但他本人却藉此得到美国第一流的企业家哈默博士的青睐和赏识，遂脱颖而出（陈立家现任美西方石油公司副总裁）。趣事之二是冀朝铸的随访还引出了一场有关中英文翻译人才培养的争论，这种抑或可以称之为“冀朝铸效应”也算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桩佳话吧！

冀朝铸联合国再肩重任 外交家归故里赤子情深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62岁的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为联合国负责技术合作事务的副秘书长。翌年初，新官上任的加利秘书长大刀阔斧地调整秘书处机构，冀朝铸出掌由原来的5个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合作部门合并而成的经济发展部。

1991年2月18日，北京朔风凛冽，出奇的寒冷，章文晋猝然离去，仓促地划上了人生的句号。噩耗传来，宏图已展的冀朝铸正是离国赴联合国总部履新的前夕。云天迢迢，遥望乘风归去、融入天河的恩师、兄长、挚友，冀朝铸不胜欷歔，怅然久之。

在马克思故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章文晋在50年代中期自津门奉调外交部，先后担任亚洲司、第一亚洲司司长。该时中国外交多集中在亚洲国家，故而冀朝铸与章文晋颇为熟稔。冀朝铸深情地回忆说：“如何为总理当好翻译？如何熟习外交业务以便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章文晋先生不断给予我具体的指教。”后来两人一起参加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系列谈判。章文晋时任西欧美澳司司长。未几，并入国际司和条约法律司又划出另设国际条约法律司，章推荐冀朝铸担任副司长，主管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事务，他是最早与联合国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之一。后来，升任副部长的章文晋又将冀朝铸调任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章文晋出使华盛顿后，冀朝铸接踵而至，出任公使衔参赞。嗣后，冀朝铸遴选获任斐济等南太平洋三岛国和英国大使，也与知人善任的章文晋扶持、提携直接有关。经过近20年的砥砺磨炼，冀朝铸俨然就是一位中美关系和联合国事务的专家了。

冀朝铸在唐宁街、白金汉宫辞别梅杰首相、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于1991年3月14日从伦敦起程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任新职，也许是他结束外交生涯以前的最后一个“驿站”。接替谢启美的冀朝铸是主管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第三位中国人。1978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技合部，这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个部门，其职能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颇为相似，具体担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任务。

冀朝铸来到这个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的技合部时，也和联合国职员一样签字，宣誓如仪：“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不接受任何政府和组织的指令，只接受联合国的指示。我只忠于联合国，而不忠于任何政府和组织。”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冀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他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在五洲四海穿梭来往。上任那一年8月抵京，9月初第一次到海南，应刘剑峰省长之邀，到海口几个开发区和三亚一带视察，留在冀朝铸记忆里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热带风光，主要是海南大有希望的未来。然后匆匆返回纽约。11月又飞上海出席联合国技合部与上海联合发起召开的“大都市城市与地区规划国际研讨会”。稍后又直飞斯德哥尔摩，出席技合部与瑞典政府共同召开的“能源与环境会议”，讨论如何既发展能源又保护环境的问题。12月，冀朝铸第二次从联合国来到海南，出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1993年1月，又首途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主持召开为6月在巴西举行环境大会作准备的水资源会议……

冀朝铸的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的热血，他渴望祖国早日腾飞，中华振兴，这也是自己42年前不顾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归国的初衷。在海口，冀朝铸深深地为有海南这样的大特区而感到振奋。冀朝铸说：“邓小平先生说要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的话是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度说的，非常正确。海南地处亚太经济圈中心，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政策优惠特殊，四面环海，容易封闭，最有条件在经济上建设一个类似香港的地方。海南是一个岛，只有600多万人口。倘若搞特别关税区，‘造香港’成功，不仅可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而且将带动全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这端的是真知灼见！他充满激情地对有关人士说：“海南应该抓紧机遇，推进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不要局限于某几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应扩大，既要争取港台、日本等毗邻国家、地区的投资，也要设法争取较远的美、英、法、德的投资。外资成片开发，除了洋浦，还可考虑逐步多搞几个，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海南来竞争。”冀朝铸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美、英等国有很多政界、企业界的朋友，可以牵线搭桥。其意至诚，其情亦切，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93年2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总部机构改组宣布生效，冀朝铸被委任主管经济发展部，负责对第三世界提供经济援助。任重道远，祖国人民期待着远在异国他邦的冀朝铸能不负重托，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3年10月)

